

台灣人的 長征紀錄

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作者◎蔡孝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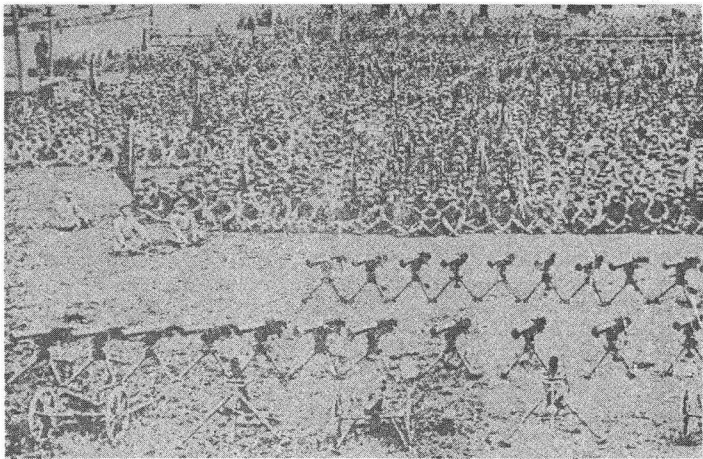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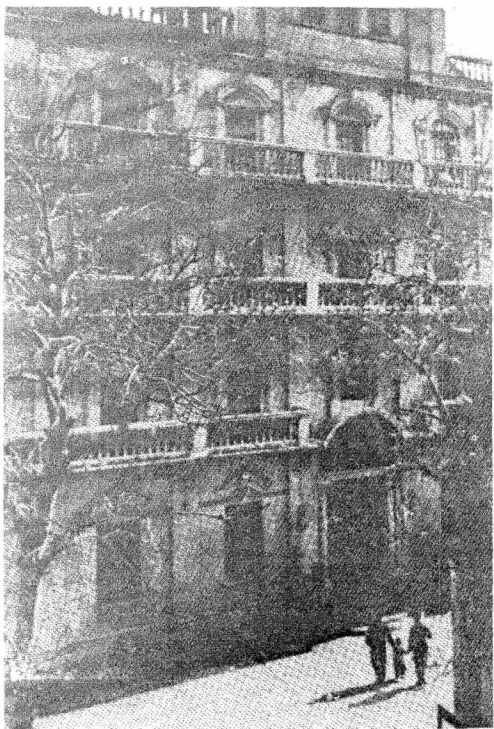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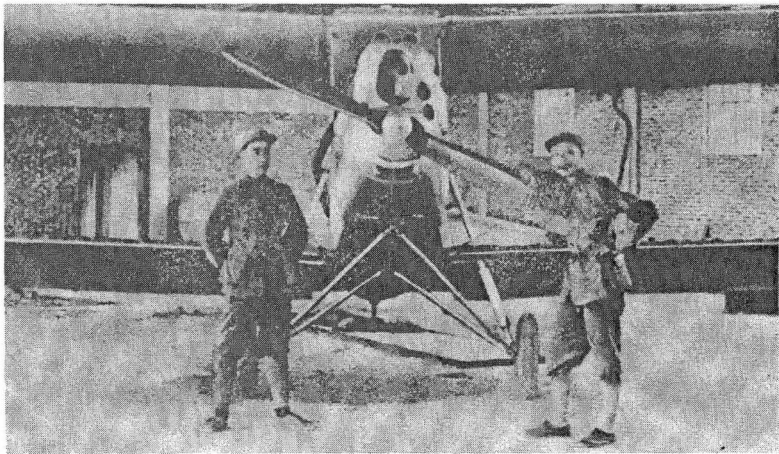
蔡孝乾 著

圖爲一九三二年四月佔領漳州之紅軍「東路軍」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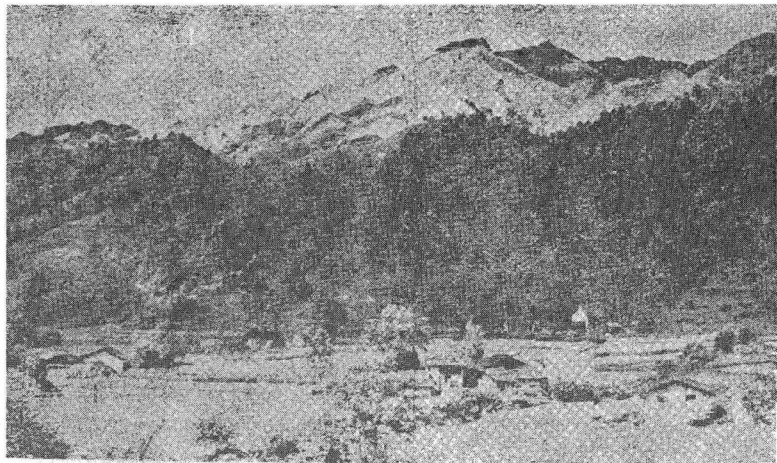




圖爲中共「八一」南昌暴動指揮部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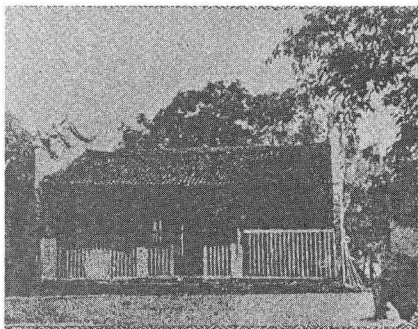
圖為佔領漳州之紅軍「東路軍」總指揮林彪（圖左）及政委聶榮臻。其後面之飛機即為由「紅色航空員」陳德勤（朝鮮人）駕駛由漳州飛往瑞金途中墜落於農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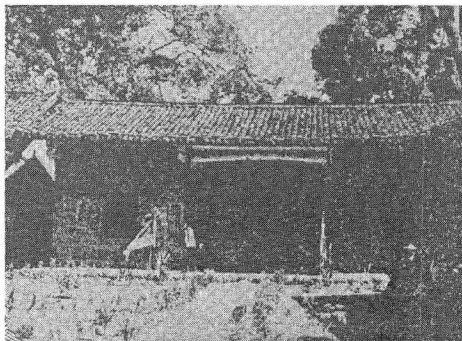
圖爲紅軍第一個根據地——井岡山全景



圖爲井岡山主峰



圖爲一九三一年「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辦公廳（在瑞金葉坪村）「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即在此召開。



圖爲一九三三年毛澤東在瑞金沙洲壩的住所



圖爲一九二九年二月紅四軍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流竄的隊伍



圖爲一九三三年毛澤東在贛南閩西八縣貧農團代表會議上講話



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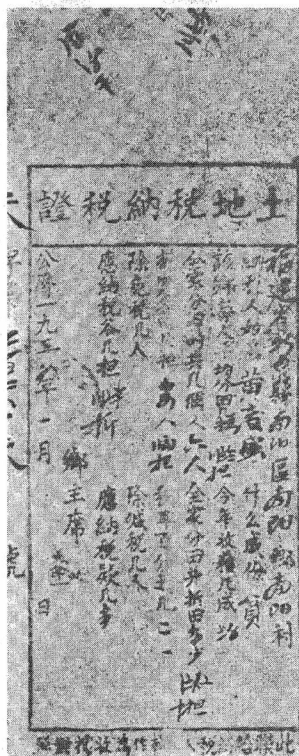


政治保衛局長鄧發



圖為中共在江西發行偽紙幣壹圓券之正面式樣

圖為蘇區農民「土地納稅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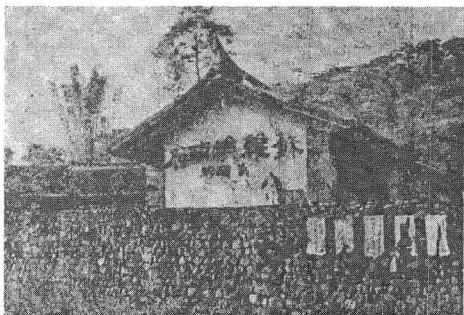
瞿秋白



徐特立

圖為中共在江西發行之「經濟建設公債券」，分為伍角、壹圓、貳圓等面額，下列兩張為其壹圓及貳圓券之正面式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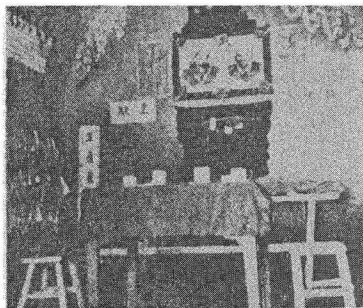




「蘇維埃政府」的宣傳標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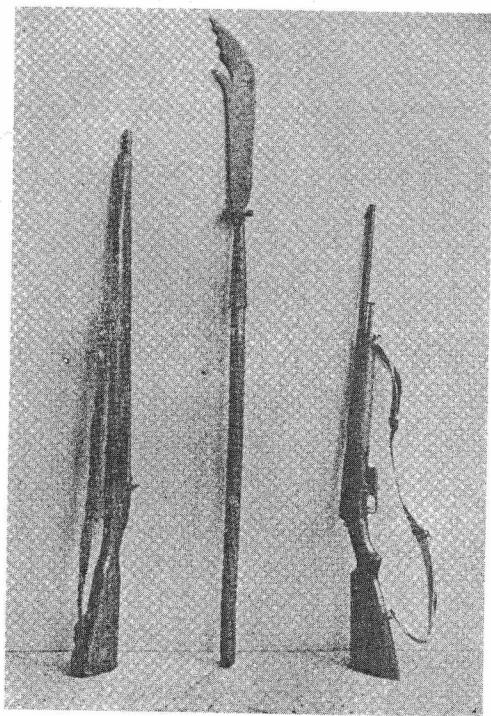
蘇區婦女赤衛隊



列寧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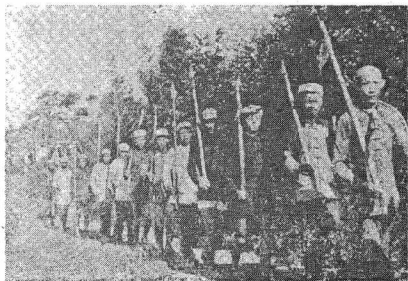


牆報



紅軍初期使用過的武器

「擴大紅軍獎旗」



圖為當年蘇區農民赤衛隊

紅軍西竄路線圖



為解決糧食而開工 開始開工 糧食收集運動 為解決糧食而開工

為解決糧食而開工

國民經濟人民委員會訓令

為解決糧食而開工

為解決糧食而開工... 糧食收集運動... 國民經濟人民委員會訓令...

土地人民委員會訓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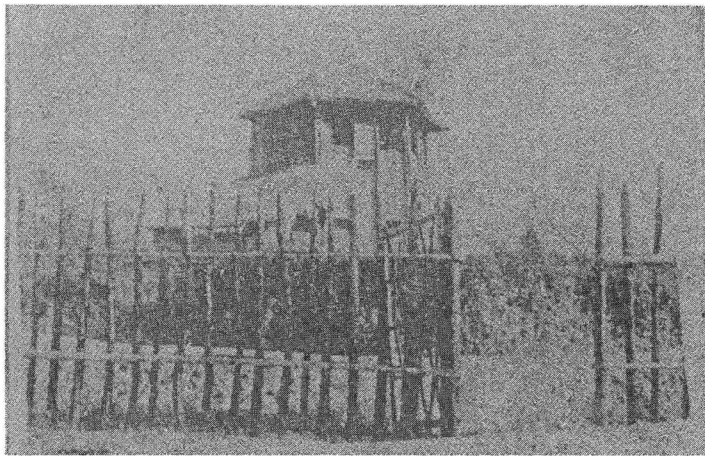
為解決糧食而開工

土地人民委員會訓令... 為解決糧食而開工... 糧食收集運動...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搜括農民糧食之文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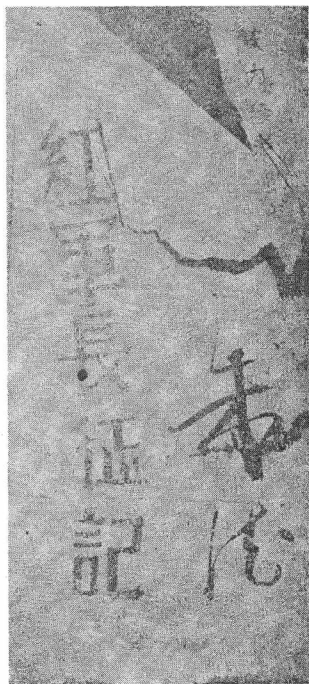


國軍碉堡封鎖線之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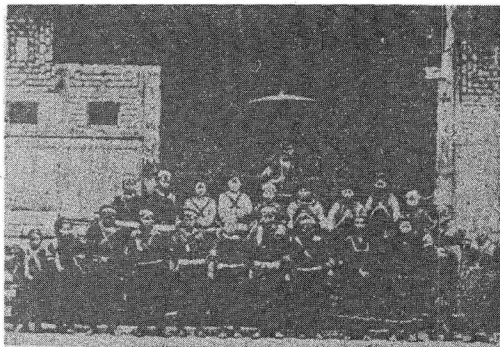
國軍碉堡之構造

圖為由「長征幹部」合寫的〈紅軍長征記〉密本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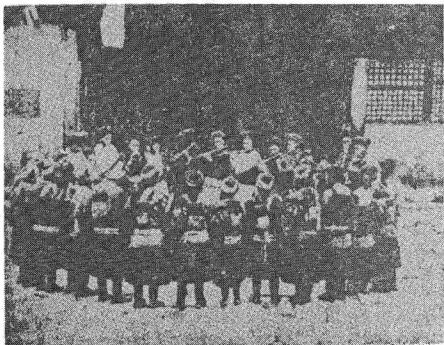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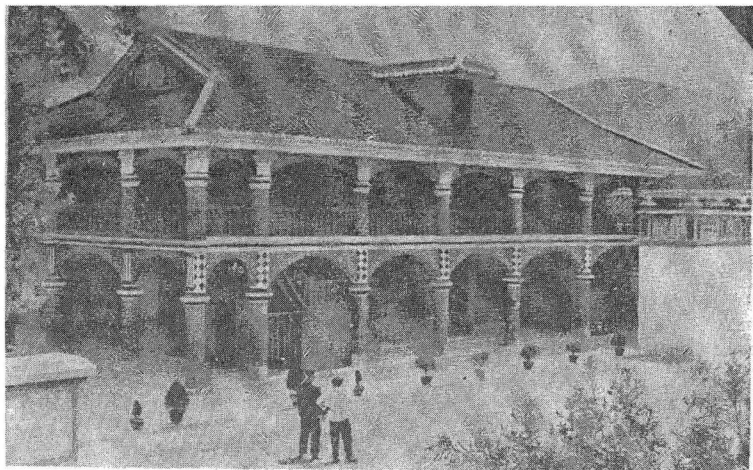
圖為西竄紅軍過湘江之漫畫



苗族婦女之裝束



苗人演奏音樂



連義會議會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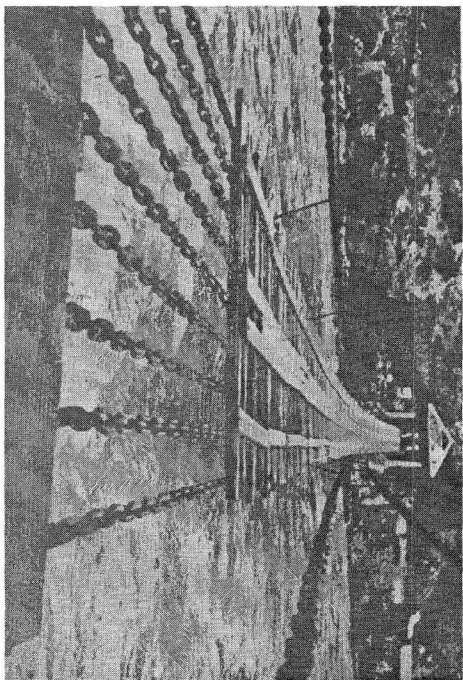
天廐烏江

紅軍搶渡金沙江的油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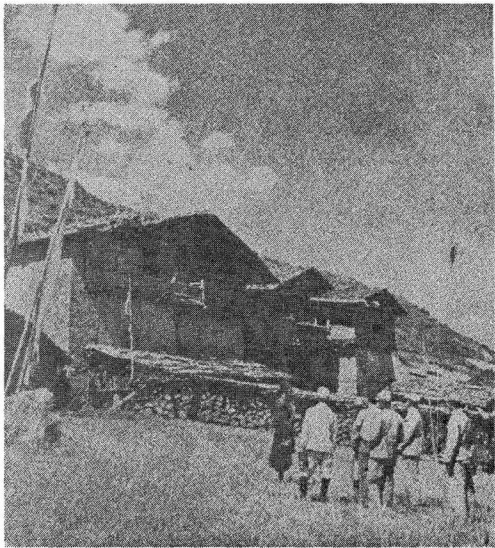
天險雲山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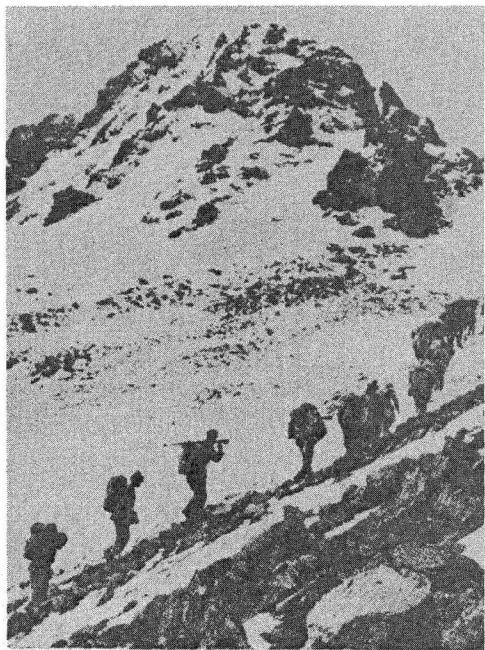
天險大渡河上的溫定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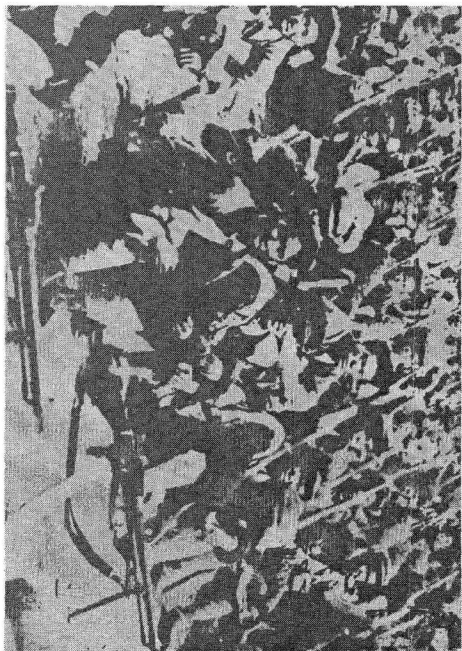
夷民紅軍沽鵝支隊隊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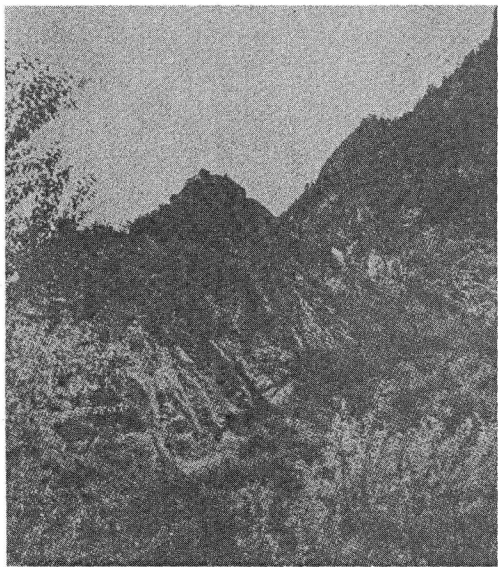
這是毛兒蓋之一角，中間一所較高的樓房，
即係當時毛澤東住過的房屋。



紅軍翻越夾金山



這是西區紅軍到達陝北的一部



天險臘子口

出版說明

本書初版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出版者為《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研究》是台灣軍事情報局發行的一份學術刊物，著者是蔡孝乾先生，並有曾任情報局局長的葉翔之將軍作序。原書名為《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今作副題，改以《台灣人的長征紀錄》為題，作為本社「台灣史料新刊」叢書系列之一。

馬關割台後，四百萬同胞，義不臣倭，從台灣民主國（一八九五年）至後壁林之役（一九〇二年）林少貓被殲滅，血戰七年，功敗垂成，深知「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故對祖國革命事業莫不抱有終極的期待。

一八九四年，孫中山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一八九七年，派陳少白來台，即由楊心如等人成立台灣「興中會」分會；一九〇五年，孫中山於東京成立「同盟會」；一九一〇年，翁俊明等人亦於台灣秘密成立「同盟會」分會；後又有翁俊明、蔣渭水、杜聰明、賴和、郭國基等在台秘密參加「中華革命黨」。

「惠州起義」時，孫中山在台灣，負責港台交通的就是「興中會」台灣分會；「黃花岡之

役」又有「同盟會」台灣會員羅福星、許贊元與役；孫中山北伐又任命台灣霧峰人林祖密將軍為閩南軍司令。北伐、抗戰，無不有台灣革命志士馳騁在祖國戰場的身影。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亦誕生於被帝國主義蹂躪的祖國的上海。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國共內戰，台灣的革命志士被迫只能選擇國共一方。蔡孝乾則是選擇共產黨這一方的台灣革命志士，並且，在一九三四年，參加了中共黨史上最艱險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蔡孝乾奉命潛返台灣重建台灣共產黨組織，後被國民黨逮捕，據葉翔之說，他「一九五一年拋棄共產黨投效國家，參加反共鬥爭行列」，長期任職情報局，並逝世於任內。

蔡孝乾不但是台灣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和參加中共長征，早年他亦是活躍於二〇年代台灣非武裝抗日啟蒙運動的知識份子、先覺者，並在當時的《台灣民報》上留下不少的著作，都是有關「文學革命」、「婦女解放」、「中國改造」之類，晚年而有《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之著。

雖然，蔡孝乾在寫作《回憶》之時，已是「參加反共鬥爭行列」的情報局將軍，但本書平鋪直叙，除了批判毛澤東在「文革」期間鬥爭中共老同志外，對長征的回憶應屬平實。這本書不僅是「台灣人的長征紀錄」，也當是中共長征史研究的一份重要史料。

蔡孝乾在政治上，後來雖然「拋棄共產黨投效國家，參加反共鬥爭行列」，但是，他為台灣人寫下了台灣人參加長征的歷史也是不可抹煞的。國共鬥爭至今，已門到從日本人手中光復的台灣，又落入次日本人的手裡。「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與蔡孝乾已經不

能再相逢了。

蔡孝乾已經逝世，我們為了不忍這段歷史遭到泯滅而重印本書，望蔡孝乾先生的後人見到此書，請能與我們聯絡。

出版說明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序

研究中共同題，不可不了解中共的歷史，惟有從歷史的發展與演變，始能對中共各項問題的因果，作較為客觀而正確的分析與論斷。所以，第一手歷史資料，對研究工作確有最重要的意義。

本書作者蔡孝乾先生，早在日人佔據台灣時期，即參加共黨組織。一九二八年擔任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一九三二年進入中共江西蘇區，任偽「中央蘇區」反帝總同盟主任；一九三四年，朱毛紅軍在我國軍圍剿下撤離蘇區時，隨中共紅一方面軍西竄，一九三五年抵達陝北蘇區；一九三六年任偽「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一九三七年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台灣省委書記；一九五一年拋棄共黨投效國家，參加反共鬥爭行列。近二十年來，蔡先生始終致力中共問題的研究，著作頗多，尤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一書，已譯成數國文字，在國際上極獲好評。

本書為作者新著，所述皆第一手資料。與本書類似的著作，如中共軍人所寫的江西紅軍與「長征」之回憶錄，多為誇張失實的宣傳；即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

行漫記》，也是中共一面之詞的記載，與誇張宣傳無異。而本書則為作者親身的經歷和體驗，它對於中共在江西蘇區所推行各種暴政的真相，當時中共的內部鬥爭的詳情，以及中共之名為「長征」實乃「逃跑主義」等等鮮為外人所知的內幕，提供了翔實的歷史資料。相信本書的出版，對研究中共工作必有高度的參考價值，其將受到重視，是可以預卜的。

葉翔之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自序

兩年來，我以「江西蘇區回憶」和「紅軍西竄回憶」為主題，撰寫了二十四篇文章，連續刊載於《中共研究》雜誌。這一工作是在國防研究院講座，也是《中共研究》雜誌社長項迺光將軍鼓勵和督促之下完成的。現在將其彙編成冊，題名為《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交由《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

三〇年代初（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中共以瑞金為中心，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邊區，以暴力進行「土地革命」，建立所謂「蘇維埃政權」。但因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國情，與中共本身的基本弱點，如路線、政策錯誤及其內部思想嚴重分歧等，加上強大國軍的圍剿，中共創立叛亂根據地的企圖終告徹底失敗，遂於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突圍西竄。

本書是作者親自經歷那一段歷史悲劇的真實紀錄。作者撰寫本書之目的，是希望能夠為研究中共同題者提供一些實際史料。

書中的地點和里程，因年代久遠，一時記憶不清，其中很多是根據原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製作的「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的記述。雖然紅三軍團和紅一軍團

每天的行程不盡相同，但憑個人記憶所及，並參照《紅軍長征記》中有關地點和里程的記載，大體上還能推算出來。為了便於讀者明瞭紅軍西竄全部行程起見，特將該「一覽表」附於書後，以供參考。

本書付梓之際，承蒙葉翔之將軍在繁忙中撥冗賜序，謹致以衷心謝忱！

蔡孝乾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六日

目錄

出版說明／一

序／五

自序／七

江西蘇區回憶

小引／001

壹、我是怎樣踏進江西蘇區的？／003

一 紅軍進城／003

二 紅軍嘴臉／005

三 街頭所見／007

四 到政治部／009

五 「五一」特刊／012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六下鄉宣傳／014

貳、踏進閩西蘇區／019

一紅軍回竄／019

二閩西的鬥爭／023

三三竄閩西／025

四游擊區域／027

五抵達汀州／032

叁、周恩來和中共蘇區中央局／039

一會晤周恩來／039

二紅軍醫院／042

三周恩來這個人／044

四中共蘇區中央局／048

肆、「紅都」——瑞金／053

一會晤項英／053

二瑞金城的爭奪戰／058

三「中央蘇區」的建立／061

四紅軍學校／064

五列寧師範學校／067

伍、蘇區的反帝運動／071

一 蘇區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071

二 反帝運動與土地革命／074

三 毛澤潭這個人／076

四 「禦侮救國代表會議」／080

陸、查田運動／085

一 查田運動的由來和經過／085

二 王觀瀾這個人／088

三 查田運動的缺點和錯誤／091

四 毛澤東又犯了一次錯誤／093

柒、蘇區的經濟情況／097

一 蘇區農民為什麼窮困？／097

二 中共的經濟政策／100

三 「向困難投降」的鄧子恢／103

四 爲糧食而鬥爭／106

捌、蘇區的文教情況／111

一 有關文化教育的幾個統計數字／111

二 中共的文教政策／114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三 掃除文盲運動／116

四 徐特立和瞿秋白／119

玖、二次全蘇大會／125

一 砲火連響、戰號頻吹中的大會／125

二 兩種情況、兩種說法／130

三 「福建事變」的經緯／133

四 場邊餘話／136

拾、擴大紅軍運動／141

一 經常性的動員工作／141

二 紅軍的後備隊——赤衛軍／145

三 連續「擴紅突擊」運動／147

拾壹、蘇區的男女關係／153

一 饒有趣味的一夕談／153

二 性的解放／155

三 另一種方式的典型／156

四 柯崙泰女士「自由戀愛」的流毒／158

拾貳、最後的掙扎／161

一 決戰的緊要關頭／161

紅軍西竄回憶

小引／173

壹、大規模的搬家／179

一別了，出發了！／179

二走出蘇區／181

三夜行軍／183

四想念家鄉／185

貳、衝過四道封鎖線／189

一碉堡封鎖線／190

二游擊隊長的匯報／191

三彭德懷砲攻大來圩／193

四築路工人／195

五竄進道州城／197

六險渡湘江／201

二突圍、西竄的準備／164

三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166

四一再進行糧食的搜括／169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叁、在廣西侏苗山區／205

一 老山界的一夜／205

二 侏人村莊／211

三 誰是放火者？／215

四 大家動手碾穀／218

肆、在黔东南苗族聚居區／221

一 苗族的神話／222

二 苗族人之風習／224

三 貴州的乾人兒／226

四 紅二方面軍的西竄／230

伍、強渡烏江／233

一 逼近烏江／233

二 各項準備工作／235

三 渡江戰鬥／236

四 奔向遵義城／239

陸、在遵義地區／241

一 遵義民衆大會／242

二 遵義城一瞥／244

目錄

- 三 在赤水、烏江之間徘徊／246
- 四 婁山關戰鬥／249
- 五 休養連的夥伴們／251
- 柒、奔向金沙江／257
 - 一 轟炸／257
 - 二 北盤江邊／260
 - 三 江邊結盟／262
 - 四 逼近金沙江／265
- 捌、從金沙江到大渡河／269
 - 一 渡金沙江／270
 - 二 對邊疆民族的爭取／273
 - 三 大涼山夷民的生活習慣／275
 - 四 從會理到冕寧／277
 - 五 歛血結盟／278
 - 六 搶渡大渡河／280
- 玖、紅一、四方面軍會合／287
 - 一 抱相崗的一夜／288
 - 二 翻越夾金山／290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三 歡迎大會／293

四 兩河口會議／296

拾、在黑水、蘆花地區／299

一 卓克基／300

二 藏民的生活／302

三 割麥的鬥爭／304

四 宣撫與運糧／306

五 準備過草地／308

拾壹、從毛兒蓋到巴西／311

一 第一夜／312

二 分水嶺／313

三 后河／315

四 色既壩／317

五 到班佑／319

六 分道揚鑣／321

拾貳、從甘南到陝北／323

一 突破臘子口／324

二 哈達鋪／327

三 渡過渭河／339

四 老爺山／332

五 踏進陝北蘇區／334

附錄／338

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338

江西蘇區回憶

小引

從一九二七年毛澤東率領「秋收暴動」失敗後的殘部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蘇維埃」根據地起，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止，中共以江西瑞金為中心，在閩、粵、湘、鄂、陝等省邊境，先後建立了十三個蘇維埃根據地，製造了中國歷史上是一群面目猙獰、混血畸形的怪物「蘇維埃」，蹙迫地、蹣跚地出沒爬行於貧瘠落後的叢林地區。這是中國的亂源，也是亞洲的禍根。

「蘇維埃」這個怪物，是從蘇維埃俄國那邊移植過來的。當時，中國人包括盲從的共產黨人在內，對它都感覺得非常的陌生，非常的不習慣，就連蘇維埃區域的農民，也覺得莫名其妙，以致發生了誤以為「蘇維埃」是一個姓「蘇」名「維埃」的人的大笑話，足證當時中共在共產國際導演下，推出「蘇維埃」這個名堂是如何的荒誕不經。

一九二八年秋，設在上海的「台灣共產黨總部」遭受破壞，台灣島內黨員的安全因而面臨威脅。當時筆者是台共中委，因之不得不逃離台灣，流亡大陸，在廈門、漳州一帶，以公開職業掩護秘密身分，從事地下活動。

一九三二年四月，來自江西蘇區（蘇維埃區域之簡稱，下同）的朱毛紅軍佔領漳州，由於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關係，我參加了紅一軍團政治部的工作；並且因此而獲得進入江西蘇區的機會。我在那邊生活、工作了兩年多，接觸過不少中共黨政軍領導人，其中包括：當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項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紅軍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劉伯承等。

一九三四年十月，盤踞江西的朱毛紅軍，在國軍圍剿下撤離蘇區，我又參加了一方面軍六千英里（合二萬五千華里）的長途流竄行列，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抵達陝北蘇區為止。而在漫長的抗戰時期，我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長，初在山西太行山根據地，對日軍和汪偽軍展開政治瓦解工作，後因整個華北敵後根據地形勢嚴重，我在中共「保存幹部」政策下被調回延安。

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大陸，僭立偽政權之後，許多紅軍將領寫了不少有關江西紅軍的回憶錄，但都偏重軍事行動方面，鮮有關於江西蘇區的實況，特別是有關行政、經濟、教育、擴紅、生產，以及人民生活的具體反映和報導，更為少見。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雖然記述了一些有關紅軍成長過程和陝北蘇區情況，但對江西蘇區實況的報導，則付闕如。

本篇是筆者根據親身體驗和歷史資料揉合而成，目的在於揭露中共在江西蘇區所推行的各種暴政——土地鬥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以及當時中共內部鬥爭諸種鮮為世人所知的真實情況，為世界各國反共人士探討中共問題提供真實的歷史資料。

壹、我是怎樣踏進江西蘇區的？

一 紅軍進城

一九二八年八月，因上海「台共事件」發生，惟恐波及台灣島內組織，經會議決定，當將幾個重要幹部撤離台灣。八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我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在北部後龍港秘密乘船逃出台灣，來到漳州，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為了生活和掩護，我先後在石碼中學和龍溪女子中學教書。

漳州，位於福建東南的九龍江下游，它是福建省的第二大城，早時曾為中國對外重要貿易港之一。及廈門港興起後，遂為其所代替，但仍不失為九龍江流域的物產集散中心，閩南地區水陸交通的樞紐。附近盛產大米、水果、茶葉、菸葉、麻類、甘蔗和竹筍等，物產甚豐，尤其香色俱佳的水仙花，更是馳名國內外的特產。城內有芝山、南山和八卦樓等名勝古蹟。

漳州城南六十華里的石碼和一百二十華里的浮宮，小輪船可靠岸，城東一百五十華里的

壹、我是怎樣踏進江西蘇區的？

嵩嶼，五六千噸級的輪船可靠岸，嵩嶼的對面就是廈門港。這些地略形勢，使漳州成為古今兵家必爭之地。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駐防長江流域各省國軍主力陸續北調，江西朱毛紅軍乘此機會大肆蠢動，向外發展。並於突破了國軍的第三次圍剿之後，於同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城北郊葉坪村召開「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僭立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任主席，項英、張國燾分任副主席。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正在江西圍剿紅軍的國軍第廿六路軍一萬多人，受中共「中央軍委」的陰謀策動，在寧都縣城暴動投共，中共遂將該叛變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下轄十三、十五兩個軍。廿六路軍的投共，對當時瀕於土崩瓦解的江西紅軍，不啻是起死回生的強心劑。自此江西紅軍的聲勢囂張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初，中共「中央軍委」為了打到外線去，決定把「紅一軍團」的第三軍及第四軍，和「紅五軍團」的十五軍組成所謂「東路軍」。「東路軍」總指揮由林彪擔任。同時「軍委」還決定改組「紅一軍團」領導機關。原來「紅一軍團」的軍團長和政治委員，係由「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和政治委員毛澤東兼任，改組後，軍團長由原「紅四軍」軍長林彪擔任，政治委員由原總政治部副主任聶榮臻擔任。「軍委」對紅四軍的人事亦作了相應的調整：紅四軍軍長由原紅十師師長王良昇任，紅四軍政由羅瑞卿擔任。

四月初，林彪的「東路軍」，從閩西的長汀、上杭地區開始行動。四月十日佔領龍岩縣城之後，繼續向東南挺進，連下合溪、芝田、水潮、龍山，直逼漳州西側的天寶山。龍山距漳州不過百華里，天寶山則緊靠著漳州城，山高勢險，石壁陡峭，著名的風霜嶺、楊梅嶺、十二嶺，峰峰矗立，嶺嶺相連，構成為漳州的天然屏障。國軍楊逢年旅，以十二嶺、大尖山

為中心，構築工事，憑險據守。因此，紅軍要想佔領漳州，必須先奪天寶山，要奪天寶山，又必須搶渡龍江。這個奪山搶江的戰鬥是相當激烈的。紅軍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奪佔了天寶山，搶渡了龍江，逼近了漳州城。

四月十八日晚間，有個台灣同鄉黃營長的勤務兵，扛著兩大箱行李寄到我寓所來，黃營長是漳州駐軍張貞師楊逢年旅的一個營長。據勤務兵說，黃營長已隨大軍向漳浦、雲霄方面轉移。黃營長太太亦已於當日上午跟其他幾位軍官太太一起乘包車到廈門去了。城內大商號老闆也都逃之夭夭。漳州已成了一座混亂、沉寂、冷落的空城。

四月十九日晚十時左右，張貞部設在城內的一所彈藥庫爆炸了，熊熊火光和爆炸巨聲，延續了三小時。這是國軍為了「不資敵」所作的必要措置，市民們心裡卻已經明白，漳州城的陷落只是時間問題了。

四月二十日早晨，紅軍先頭部隊，以輕機槍隊為先導，排著四路縱隊進城了。房東老太太和她的兒媳們，我和鄰居施至善先生一家人，都到靠近馬路的竹籬笆那邊去看熱鬧。紅軍士兵穿著襤褸不堪的淺灰色軍服，領子上有兩小塊紅色的領章，戴著全紅五角星帽徽的帽子，穿著用布條編製的草鞋，腿上裹了綁帶，機警地行進。馬路口都站著紅軍哨兵，在監視著居民。誰也不敢出門，大家都待在屋裡，既恐懼又憂困不安，等待著禍患的來臨。

二 紅軍嘴臉

紅軍的行動非常迅速，兩小時後，就有一小隊紅小鬼，拚命地敲大門。房東老太太出去

開門，讓他們進來，一個紅小鬼大聲叫嚷：

「你們是幹什麼的，是做生意的嗎？你們都有田地嗎？」態度蠻橫傲慢。施至善先生說：「我們都是讀書人。」指著他的兒女們說：「他們都是學生。」又指著我說：「他是中學教員。」紅小鬼用敵視的眼睛注視著我們的每個人，觀察我們的寓所和庭院。顯然，紅小鬼看不出我們是他們都要獵取的對象——土豪、劣紳。於是他們的目光就集中到後院。

我的寓所是一所純閩南式建築，分前後兩院。前院是我和施至善先生合租，後院是一位菲律賓華僑林先生的寓所。林先生的名字已記不清了，他在建甌某中學教書，我們都叫他「林老師」。他的太太納美美，是西班牙後裔的菲律賓人，秀外慧中，待人和藹，原在漳州崇正女子中學教英文和音樂。他們在風雨飄搖中早已離開了漳城，大門上了鎖。紅軍認為凡是逃走的人，必是官僚、軍官或者豪紳，他們的住宅都要搜查，財產都要沒收。紅小鬼把後院大門的鎖撬開，一擁而入，翻箱倒篋，把林家所有的衣服和細軟都搜刮而去。

一群台灣學生驚慌地跑到我寓所來了。他們住的那家房東黃應賢（台灣同鄉），有點資產，已經逃到廈門去，全部財產都被沒收。台灣學生說，駐在黃家的紅軍，可能是一個連隊部，門口站著衛兵，裡面的佈置好像是一所俱樂部，我一時好奇，就跟他們到了黃家。一進門，只看見在那寬敞的大客廳上，掛滿了印有斧頭鐮刀的小紅旗，客廳中央放著乒乓球桌，桌子上面擺著紅軍政治部和蘇維埃政府出版的書報，讓紅小鬼們自由取閱。

客廳右邊壁上佈置一大張「牆報」，它是紅軍中特有的宣傳工具。「牆報」上貼滿了漫畫、標語、山歌和謎語。士兵中什麼人做了好事，或做了什麼壞事，都要利用「牆報」這個園地進行表揚或批評。這些在我看來是十分新奇的玩意兒，後來我才知道這種場所，便叫做

「列寧室」，一般以連隊為單位，每一連隊佈置一所。

三 街頭所見

根據台灣學生談話所反映，以及我在城內的所見所聞，我對於紅軍佔領漳城三天的情形，已有初步印象。

首先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漳城大街小巷都塗滿了紅軍的政治標語。這些反映了當時中共政治綱領和中心口號的標語，是用紅黑白三色顏料塗成的，都用簡體字書寫，字很工整，內容不外是：

打倒土豪劣紳；

實行土地革命；

建立蘇維埃政權；

實行赤色恐怖；

推翻國民黨統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武裝保衛蘇聯；

打到外線去，響應國際事變。

最後兩個口號是值得玩味的。所謂「國際事變」是什麼一回事呢？當時中共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國際帝國主義集團瓜分中國、進攻蘇聯的先聲，「工農紅軍」應該暫時離開中

壹、我是怎樣踏進江西蘇區的？

心根據地，打到外線去，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用武裝來保衛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但事實證明，紅軍打到閩南來的真正目的，卻是在於搜括物資，擴大兵員，以作為擴大叛亂之資本。那些所謂「響應國際事變」，「打到外線去」，「武裝保衛蘇聯」等口號，只不過是中共用來欺騙世人和他們的幹部罷了。

我和幾位台灣學生走到張貞司令部大門口，看到佈告欄上貼滿了槍斃地方惡霸、土匪頭，沒收大財主、大商號的佈告。從道口街走下去，看到陳嘉庚的橡膠鞋商店、胡文虎的萬金油商店已貼了封條，店門口站著紅軍衛兵，店內貨物已被運走。幾家較大的西藥行也遭洗劫，他們的西藥品全部被沒收了。一家糖業貿易行的赤糖和一家鹽業公司的鹽都被沒收運走了。紅軍的「佈告」說，一切商號不准停業，閉門者必是逃亡的大官僚或大富商，他們的財產將被沒收。

紅軍把沒收來的物資，都集中到設在天主教堂的「沒收徵發委員會」去管理。負責主持這個工作的便是「蘇維埃中央財政人民委員」（即財政部長）鄧子恢。這些沒收來的物資，都是當時紅軍最迫切需要的藥品、布疋、糖、鹽以及舊衣服等等。

我們走到東門街基督禮拜堂門口，看見紅軍宣傳隊在宣講時局和關於蘇維埃和紅軍的「道理」。聽眾都是宣傳隊在街頭用拉夫式的辦法「鼓動」來的。除了小孩和老太婆之外，都是一些游民、苦力、船夫和少數的郊區農民。他們拿著宣傳隊在街頭宣講時發給的「貧民證」。拿到「貧民證」就可以到禮拜堂來領取食米和舊衣服等救濟品。顯然，他們到禮拜堂來的目的，並不是來聽紅軍的政治宣傳，而是來領取救濟品的。

西街禮拜堂是新成立的王占春「紅三團」（紅軍閩南第三團之簡稱）司令部。大門口樹

立著大幅的「紅三團」的血色軍旗，迎風飄拂，倍增赤色恐怖之感。王占春這個有閩南「夏伯陽」之稱的土共首領，原是有幾十條土槍的游擊隊，主力紅軍東進漳州時，曾充當嚮導，送情報，調查土豪和「不在地主」等，立有「汗馬功勞」這次獲得補充不少，把土槍都換成了新式步槍，至六月初紅軍撤離漳州時，紅三團已成為擁有一百多條槍的一支地方游擊部隊，但紅軍主力撤離不久就被國軍殲滅了。

四 到政治部

紅軍佔領漳城的第五天——四月二十四日，一個戴黑眼鏡的高個子青年來到我的寓所。他是二年前曾以「巡視員」身分來和我聯繫過的中共地下人員李文堂，他說：

「前天我到你以前的寓所去找你們，房東太太說你們已經搬家了，我便依她寫給我的地址，總算找到你了，哈哈！」

老朋友久別重逢，不免一陣寒暄。李文堂說：

「老楊，有二年多不見了，你現在還在教書嗎？」我當時化名楊明山，曾先後在石碼中學和龍溪女子中學教書。「沒有，從去年下半年起，我便不再教書了。」我同答說。

李文堂是海南島人，海員工人出身，曾參加過一九二四年的省港大罷工。那時——一九三〇年，李文堂名義上是個巡視員，實際上卻是「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局委員」，直到此刻，他才坦率告訴我這個公開的職務。這次他來找我的意思，是要邀我到江西蘇區去工作。

我於一九二八年秋從台灣來到漳州，四年來先後在漳州、石碼，斷斷續續教了幾年書，為了生活，我還在詔安當過一個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為了做台灣學生工作，我曾在廈門住過一個時期。那時我的主要任務是做台灣居民工作，尤其是學生工作。我與中共組織只有橫的聯繫而已，在工作上直接受設在上海的台共總部領導。

關於進入江西蘇區工作問題，我曾經與施至善先生從長商討過，施先生也想到蘇區去。因為對於當時紅軍行動方向，前途如何，我還摸不清，進入蘇區後能夠做些什麼工作，自己也沒有自信和把握。我便把這些問題和盤托出，讓李文堂知道。

「老楊，事到如今，時勢如此，你還有什麼可以猶豫的呢？」李文堂熱情地、懇切地說。當天，我留李文堂在家吃中飯，並介紹施至善先生和他認識。關於進入江西蘇區，施先生有一些具體問題，諸如他一家人都進去，是否能適應蘇區那樣的戰鬥環境？施先生本身工作問題，子女（一男四女）的工作和教育問題等等還不能解決，所以須藉此機會讓老李和施先生當面談談，談的結果，老李認為有些問題需要反映上去，讓「上級」決定。

第二天早晨李文堂又來我寓所，他說，我的事情已經報告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了。羅榮桓很表歡迎，叫老李特來邀我到軍團政治部詳談。關於施先生一家人到江西蘇區問題，羅榮桓說讓兩方面都多多考慮以後再作決定。意思是說，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困難。問題主要是一家人當中有老年人，有小孩，是否都能吃苦。對於這些情況，羅榮桓想多了解一下，今天羅榮桓邀我先到軍團政治部去談話，顯然是有些事情，需要和我面談，作進一步了解之後才能決定的。

紅一軍團政治部駐在漳城西郊一棟洋房，軍團司令部在右邊的另一棟洋房。李文堂把我

引到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辦公室。這位長得結實，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政治部主任，起立和我們握手之後，就用湖南腔爽朗朗地說：

「你的事情，李文堂同志已經和我談過了，歡迎你到紅軍中來工作。我們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蘇區物質條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點苦，工作是愉快的。你的一位同鄉施老先生一家人，還有幾位台灣青年朋友志願到蘇區去，我們都歡迎，請轉告他們，蘇維埃工作者，就是勞動人民，生活都可以獲得保障。施老先生的子女教育更沒有問題，大的孩子可以參加少先隊工作，小的孩子可以參加兒童團活動，或進入列寧小學讀書，蘇區的青年、兒童都是在工作中、在鬥爭中學習的。」羅榮桓這一通「動人的談話」，造成了魔力，引起了施老先生一家人和那幾位天真幼稚的台灣青年的共鳴。經我回去一傳達，施先生一家人和幾位台灣青年都決定要到蘇區去。但兩年以後，他們所得到的是什麼呢？當一九三四年江西紅軍要撤離蘇區時，他們被遣散、被遺棄了，有的失踪了，有的化裝討飯逃出了魔窟……這些將在我的「回憶」中躍現的悲慘故事，不啻是對羅榮桓這一通「動人的談話」的極大諷刺。

就這樣迅速、乾脆地決定我在軍團政治部工作，隨後，羅榮桓帶我到大辦公廳，並把政治部兩位得力幹部蕭華和舒同介紹給我。看來不過二十歲的蕭華，是軍團政治部青年部長，舒同的年齡和蕭華差不多，他是組織部長，此外還有一個宣傳部長出差去了。羅榮桓說，軍團政治部編印的一種刊物《紅色戰士報》，原來由他自己主編，現在要交給我負責主編。關於《紅色戰士報》的編輯工作的一些具體問題，明天再詳細討論。「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紅軍佔領漳州，帶給我的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這，不僅是屬於實際生活方面的，而且

也是屬於意識觀念方面的。從那天起，我就成為所謂「紅色戰士」的一員了。

我帶著既興奮又不安的心情走出了紅軍政治部。可是此時，我又有另外一種奇妙的感觸——我覺得我是走進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另一種新境地。

五「五一」特刊

第二天，我到軍團政治部上班，接受《紅色戰士報》編輯工作。羅榮桓對我說：

「《紅色戰士報》是發給全軍指戰員（指揮員、戰鬥員）看的，在戰鬥環境裡發行。文字力求通俗淺簡，圖片、連環畫、山歌，最受戰士們歡迎。部隊中各團都有義務『通訊員』負責撰稿，他們把部隊生活、軍中娛樂活動、戰鬥情況、軍民關係等不斷地反映上來，不愁沒有稿源。你只要把部隊通訊員寄來的『報告』加以整理潤飾一下就行了。」說著，羅榮桓就拿出許多未加整理的「通訊報告」交給我，並要我趕編五一特刊。從這天算起，只有一星期時間，就要把「五一」特刊趕印出來。不過，羅榮桓還告訴我：「五一」特刊的重要稿件，諸如「五一口號」、特載——「為紀念五一勞動節告全體紅色戰士書」是現成的，「部隊生活」、「前線小故事」、山歌、謎語等作品都還有不少存稿，現在最需要一幅漫畫。我深知這項工作相當繁雜，但無法拒絕，只有接受。

因工作上關係，我開始和蕭華、舒同有所接觸。在與他們坦率的談話中，我對於羅榮桓已有了初步印象。

這位皮膚淺黑，粗脖寬肩，戴著深度近視眼鏡的政治部主任，說話坦率，態度嚴肅。他

是湖南人，年約二十七八歲，出身地主家庭，長沙中學畢業後，考入廣州中山大學。一九二七年初加入CY（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九月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湖南「秋收暴動」，騷擾平江、瀏陽、萍鄉，經國軍追擊潰散。毛率殘部八百餘，在江西省永新縣境的三灣村進行改編。羅時任紅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黨代表，嗣隨毛澤東率隊進入湘贛邊境的井岡山，建立游擊根據地。一九二九年春下井岡山，竄入贛南、閩西。一九三〇年先後任紅軍二縱隊政治委員和紅四軍政治委員，一九三二年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紅色戰士報》的「五一」特刊，果然漏夜趕印出來了。這是一張鉛印的四開小型報，是紅軍挺進閩南後出版的第一張報紙。就從「五一」特刊開始，《紅色戰士報》在新的條件下作了一項重大的改革——由以前的油印刊物改變為鉛印刊物。以前在江西蘇區，除了《實話》（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和《紅色中華報》（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在後方中心區出版，可用鉛印外，《紅色戰士報》因為是在前方的環境，就沒有這個條件，只能用油印。我把以前油印的《紅色戰士報》都翻閱了一下，覺得在那樣的戰鬥環境裡，在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都相當困難的情況下，能夠出版那樣一張的油印刊物，實在是很不容易的。

《紅色戰士報》的「五一」特刊，有一幅題為「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上海」的漫畫，描繪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戰役時上海（淞滬）遭受日本軍隊蹂躪的慘狀。這一張漫畫為沈乙庚君所作，曾受到羅榮桓的讚賞。顯然這是對於一個剛剛參加紅色隊伍的知識分子的一種鼓勵，並不顯示這幅漫畫本身具有什麼特殊的宣傳效果。若說它有點夠得上稱為出色的表現，還是得力於當時擔任「軍團政治保衛局」工作的胡底從旁的具體指導。沈君在構想畫意時，只是採取了胡底所提的建議，把日本軍閥的一隻長統皮鞋作「誇大的描繪」而已。不

過它確為「五一」特刊增光不少。

胡底可稱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從事「左聯」戲劇活動，進入蘇區後，紅軍中的戲劇活動都由他領導。他曾寫過一本題為「新十八扯」的板話，傳揚於紅軍中。那時他很忙。後來我才知道，胡底當時兼任「軍團政治保衛局」偵察處長，正在為偵察一樁所謂「反革命案件」——「原國軍第二十六軍黃仲岳、蕭世俊案件」，大傷腦筋。在戲劇活動方面，他擅演話劇。我在瑞金時常看到他在「紅色舞台」上現身說法。在紅軍西竄中，紅一、四方面軍在川北會師後，胡底由紅一方面軍調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後來在川康地區神秘失踪：一說是被邊疆少數民族殺害；一說是因他在職務執行上開罪了紅四方面軍的反毛派，而被反毛派秘密處死。

六 下鄉宣傳

和我一起參加紅軍的台灣學生都分配在政治部工作。沈乙庚在軍團政治部，協助我編纂《紅色戰士報》。林飄萍、施碧晨、沈存薦、余曉陽等四人則分配到各師政治部。此時紅軍政治工作的重點是下鄉宣傳，每天他們分別率領由紅小鬼組成的宣傳隊下鄉做群眾工作。

宣傳隊的紅小鬼多來自江西和閩西。江西的紅小鬼叫「江西老表」，都不會說閩南話。閩西的紅小鬼叫「福建土狗子」，來自長汀、上杭、永定各縣，多半是客家人，也都不會說閩南話。紅小鬼雖然都能領會紅軍的政治口號和宣傳八股，但在言語上他們在閩南地區卻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而台灣學生雖然都會說閩南話，但因還不十分領會紅軍的政治口號和

宣傳八股，所以只能充當紅小鬼的翻譯。

宣傳隊一到農村，首先挨戶訪問，向農民講解「分田地、打土豪」，叫農民燒田契，和地主土豪鬥爭。但往往宣傳隊還沒有到，村裡的農民都因恐懼而逃跑了，只有一些年邁體衰的農婦和小孩在家，她們連最起碼的燒毀田契和高利貸借據等小事都不敢作主，遑論鬥爭地主，因此，所謂「下鄉宣傳」的實際效果是非常低微的。

軍團政治部對此已有所感覺，有一天，羅榮桓召開全軍團宣傳工作會議，檢討下鄉宣傳工作。各軍、各師政治部主任、宣傳部長、宣傳隊長都前來參加。我以《紅色戰士報》編者名義出席了這個會議。會中各軍、各師政治部宣傳部長都做了報告。羅榮桓對於這個時期紅軍的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很不滿意。他沮喪地說：

「紅軍佔領漳州以後，宣傳工作和群眾工作很不夠，工作效果很差，原因何在？按照你們所說，工作效果不大的主要原因是言語上的隔閡，但是言語上的隔閡，僅僅是原因之一，不是主要原因。以我的看法，造成我們工作不深入，工作效果不大的主要原因，是我們在主觀上對目前局勢的嚴重性和對目前政治工作任務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大家一到了大城市，禁不起花花世界的誘惑，加上『勝利』沖昏了頭腦，敵情觀念淡薄了，太平觀念濃厚起來了，工作鬆懈了，這些便是我們工作不深入、工作效果不大的主要原因。」羅榮桓這些為「紅色戰士」打氣的話，自以為能夠打動政治工作人員的心弦，提高他們的戰鬥情緒，增進工作效果。但根據紅軍撤離漳州後的又一次政治工作會議的總結，羅榮桓這篇「講話」的實際效果，仍然是非常低微的。

為了加強此項工作，軍團政治部幾個主要幹部都奉派下鄉，加強領導。羅榮桓還徵求我

的意見。《紅色戰士報》的編輯工作已經有了頭緒，上了軌道，是否我也願意下鄉宣傳？我接受了此項工作，因為我也希望多了解一下基層情況。

根據軍團政治部「下鄉日程」的安排，五月×日的工作地點是漳州城南四十華里的徑口村。我便選擇了那天下鄉。

徑口這個鄉村，對我來說，並不是陌生的地方。徑口有一所農場是一位台灣人創辦的。先是台灣中部望族林季商，因不滿日本統治，早年離開台灣，投奔國父孫中山先生率領下的南軍。南軍領袖之一陳炯明（那時尚未叛變）奉命鎮守漳州，曾規劃把漳州建設成為閩南革命根據地。在這樣的背景下，林季商轉移了一部分在台灣的资金到漳州買土地，開辦農場。當時徑口農場擁有幾十甲土地，計畫種植甘蔗，並從日本輸入了一部新式製糖機器，聘請了一位台灣製糖技師，創辦了一所閩南地區第一所現代化糖廠。為了運輸，徑口農場還鋪設了以漳州南郊為起點，到徑口農場的一條四十餘華里長輕便車軌路。到紅軍入漳時，仍有十多輛破舊的輕便車，供鄉民載人運貨之用。

後來因為局勢對南方革命軍不利，駐漳南軍向粵境轉移，林季商既失去革命軍支持，徑口農場也就停辦了。

繼林季商經營徑口農場者是另一位台灣青年志士李山火。當年李氏年輕熱情，曾參加過台灣文化運動，後來逃出台灣，來到漳州接辦徑口農場。一九二七年，李山火寄寓於漳州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由於小同鄉的關係，李山火把徑口農場的一切業務交給我父親管理。我父親於一九二八年秋從台灣來到漳州，受聘於徑口農場，直到一九三二年四月江西朱毛紅軍佔領漳州時仍在那邊。

五月中旬的一個璀璨的早晨，金黃色的陽光閃爍遍地。我和沈乙庚率領著由十多個紅小鬼組成的宣傳隊，從軍團政治部出發，來到漳城南郊，分乘四部破爛不堪的輕便車，約一小時光景抵達徑口農場。我先分發紅小鬼到各農戶去做個別訪問，動員農民到農場本部來開會，當我和沈乙庚兩人來到農場本部時，奇怪，我父親不在農場本部，我心裡已經明白，父親是給這群紅小鬼嚇跑了，便叫一個雇工去請我父親回來。不一會父親回到農場本部，我把紅軍下鄉來此之目的告訴了父親，並請他即轉達給各戶農民，要他們不要害怕，都來開會。

分頭到各戶農家去「動員」的紅小鬼也陸續來到農場本部。據他們反映，農民都逃到山上去，「動員」來的都是一些老太婆和小孩。於是我叫紅小鬼們留在農場本部，我、沈乙庚和我父親則到山上去「動員」農民。我們用閩南語向農民們解釋，先爭取了幾個年輕農民，並通過他們再去「動員」，結果來了二十多個農民，加上老太婆、小孩，好容易湊成了七八十人，就假農場本部廣場開會了。照例，紅小鬼先唱歌，沈乙庚用口琴奏了《太湖船》和幾支中國小調。接著宣傳員揮著手，高聲激昂，用那老早就準備好了的宣傳八股，一套又一套地向農民們宣講。最後又是來了那一套陳腔濫調的政治口號，結束了這場下鄉宣傳。

農場擺出了兩桌不算豐盛的菜餚，款待了紅色戰士，作為他們下鄉宣傳，為農民「開導」的酬勞。

太陽西斜，我們在涼爽的和風吹拂下離開了徑口農場，乘著原來的輕便車回到漳城。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018

貳、踏進閩西蘇區

一 紅軍回竄

一九三二年四月，江西紅軍主力調集閩南，在漳州地區的騷擾、囂張，使全國輿論譁然，國軍對江西紅軍的第四次圍剿於焉開始。

紅軍為對付國軍的圍剿，林彪的「東路軍」不得不回竄蘇區去。從五月下旬開始，佔領漳浦、雲霄的部隊已逐漸開始作收縮行動，向漳州、石碼一帶集中。

五月三十日那天，紅軍在漳城召開了一個「人海」式的所謂「紀念五卅運動群眾大會」。事前，紅軍宣傳隊四出郊外去「動員」群眾來參加，照例是利用「群眾大會」公審土豪惡霸，散發「救濟品」，製造群眾運動的「高潮」。

正當「紀念大會」進行中，一架塗有「斧頭、鐮刀」紅色徽號的飛機飛臨上空。一時群眾驚駭，會場大亂，以為是國軍飛機來襲，紅軍宣傳員用擴聲筒，大聲叫喊：「大家不要驚

慌，這是「紅軍飛機」。」不一會「紅軍飛機」散發大批「告閩南群眾書」，暗示國軍新的圍剿已經開始，紅軍就要回竄去「保衛」蘇區。

六月三日早晨，羅榮桓特別告訴我，現在汀州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的任弼時來了電報，要我隨軍入「中央蘇區」，擔任新的工作。任弼時是留俄學生，一九二四年，我在上海大學攻讀時，他擔任俄文教授，我選修過他的課，算是師生關係。一九二八年春台共在上海舉行成立大會時，任弼時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的聯絡工作。他知道我是台共領導人之一，因此我這次被調「蘇區」，無疑是與任弼時有關。羅榮桓還要我轉告施老先生一家人，也立即準備隨軍行動。

六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和施老先生、施師母、劉月蟾、施月英、施月娥、施月震、施月仙、沈乙庚一行，都帶著笨重的行李到軍團政治部，候車出發。此時，從軍團政治部出來四個背著行李的「新戰士」，經組織部長舒同的介紹，才知道其中兩位是台灣青年，兩位是漳州工人。這兩位台灣青年，一位據他自稱是工人出身，一位曾經參加過台灣農民運動；他們是昨天才從廈門趕來參加紅軍的。

林飄萍、沈存薦、施碧晨、余曉陽知悉我們今天要走，特來看我們。他們都穿上了「紅軍服」，他們的部隊是昨夜從漳浦地區轉移來的，現駐紮在漳州城郊。林飄萍特為向我介紹了一位穿紅軍服的朝鮮青年。他說：「這是『五卅』那天駕『紅軍飛機』在漳州上空盤旋的『紅色航空員』——陳德勤同志，他是朝鮮青年。」我和他熱烈的握手，同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弱小民族」，幾句寒暄之後，彼此很快就融洽起來了。以後在瑞金的一段時間，我和他仍經常保持聯繫。這位「紅色航空員」駕的那架「紅軍飛機」，是張貞部遺留下來的

破爛飛機。它是在這次「東路軍」挺進漳州時，飛往前線轟炸紅軍被打傷的。張貞部將它遺棄在漳州城南飛機場，紅軍把它修理好了。陳德勤駕著這架破爛飛機，飛返「赤都」瑞金的途中，由於方向上的偏差，這架獨一無二的「紅軍飛機」竟然墮落於會昌尋烏邊境的農田裡，機身損壞，「紅色航空員」受傷。陳德勤因此遭受「嚴酷的鬥爭」。——這是後來的事，將在「瑞金回憶」中再作細述。軍團政治部調來一部破爛卡車給我們乘坐。卡車快要開了，我們和「紅色航空員」、台灣青年握別，登上了卡車，告別了這座劫後的古城——漳州。當天下午五時許抵達和溪。我們被安排在臨時兵站住宿。卡車只能將我們載到這個小鎮，從明天起，從和溪到龍岩有兩天的路程是要步行的。

第二天，兵站派來了兩個民伕為我們挑行李，我們提著水壺和兵站發給我們的「飯包」，開始步行。我們走得很慢，下午下了一場暴雨，但我們還是冒著風雨步行。

越日，走了大半天，祇是在山嶽連綿，峰巒層疊，險峻而陡峭的山徑行進。原來，我們是在一座海拔一千五百公尺的大山嶺上行進呢。下午四時許，我們抵達閩西蘇區的門戶——龍岩。

龍岩——這個古柏森森、蔥綠蔚秀的山城，它是閩西蘇區的重要屏障。紅五軍團司令部駐在這裡。兵站的「交通」把我們帶到紅五軍團政治部。不一會政治部主任劉伯堅接見我們。他吩咐管理科長要好好照顧我們。管理科長遵命照辦，我們每人都領到灰色軍衣一套、布草鞋一雙、搪瓷碗一個，我們幾個男戰士還領到了綁帶一副。我們都把老百姓衣服換成軍裝，成為名副其實的「紅色戰士」了。我們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行軍」，走得很累了，在管理科長的安排下，在這個紅色的山城過了一夜。

第二天，紅五軍團政治部和龍岩「縣蘇」（縣蘇維埃政府之簡稱，下同）召開了一個盛大的群眾大會，歡迎我們這批才從「白區」（政府區）來到的「新戰士」。原來除了「台灣同志」和漳州「工人同志」之外，還有一批自廣東五華來的「工人同志」，男女老少共有十來個人，他們是先我們兩天到此的。

群眾大會開始了。龍岩「縣蘇」主席郭滴人，以「地方長官」的身分致歡迎詞。他說：「今天才從『白區』來到『蘇區』參加工作的有兩批同志：一批是台灣革命學生和進步知識份子，另一批是漳州的工人同志和廣東五華的工人同志。他們在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壓榨之下，無法生活下去了。這次主力紅軍打到閩南去，拯救了他們，他們毅然地參加紅軍，來到『蘇區』參加工作，我們熱烈的歡迎。」

「縣蘇」主席講話之後，台灣學生代表、漳州工人代表和五華工人代表分別向群眾大會講話。

我從紅軍政治部和蘇維埃政府這樣「熱烈」的歡迎和我們在歡迎大會上所表演的情況觀察，不禁有這樣的感覺：紅五軍團政治部和龍岩縣蘇聯合舉行這個「歡迎大會」的用意，乃在於誇大地渲染「白區」的「黑暗面」，竭力吹噓「蘇區」的「光明前途」，為當時萎靡不振的紅色戰士打氣。而我們——台灣學生、漳州工人、五華工人，不過是被「紅軍」和「蘇維埃」利用為誇大宣傳的工具罷了。

二 閩西的鬥爭

歡迎大會散會後，龍岩「縣蘇」請我們到縣蘇禮堂舉行座談會，並請吃飯。出席這個座談會的有郭滴人和縣蘇的幾個委員、縣「少先隊」代表、工會代表、紅屬（紅軍家屬）代表、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以及閩西蘇區開創者之一、蘇維埃中央政府財政部長（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在這個座談會上，郭滴人漫談了龍岩的赤化經過和閩西的鬥爭情形。鄧子恢漫談了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三次竄入閩西經過。郭、鄧兩人的漫談給了剛剛踏進蘇區大門的我們極大的興趣，留有深刻印象。雖然事隔數十年，至今記憶猶在。

郭滴人說：一九二六年，他和他的夥伴阮山、林心堯、藍壽二等共產黨員，先後從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廈門集美師範學校和其他地方回到閩西，分別在龍岩、永定、上杭、長汀、武平等地，發展共產黨組織，組織工會、農民協會和學生會等群眾團體，進行赤化活動。

接著，他向我們介紹了閩西在軍事上的地位。郭滴人說：

閩西——它在歷史上包括汀州府屬的長汀、上杭、永定、武平、寧化、清流、歸化、連城八個縣，和龍岩州屬的龍岩、漳平、寧洋三個縣，共為十一個縣。這個地區，層巒高峰，山深林密，北自寧化、清流，南迄上杭、永定，縱橫三百餘里，奇峰峭壁、風景秀麗之武夷山脈綿互其中，形成與江西（國軍剿共指揮中心）的天然屏障，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確是開展游擊戰爭的理想根據地。郭滴人強調地說：

閩西由於長期以來，封建地主、惡霸、土匪的壓榨蹂躪，激起廣大貧苦農民群起反對封建剝削，是一個反抗軍閥統治的鬥爭最激烈、最尖銳的地區。

閩西又是有名的三條「地頭蛇」：郭鳳鳴（盤踞長汀）、陳國輝（盤踞龍岩）、盧新銘（盤踞上杭）實行封建割據的地方，由於南京中央政府「鞭長莫及」，而讓那三條「地頭蛇」橫行霸道，肆意壓榨蹂躪老百姓，因而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乘虛而入，煽動農民叛亂，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

當時，我們一面宣傳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也宣傳三民主義。閩西各縣的共黨組織，雖然在會議上一再通過要取消苛捐雜稅，實行二五減租政策，但是一直沒有付諸實施，更沒有好好地貫徹。屠宰稅是取消了，但大量的繁重的捐稅卻依然壓在農民頭上，工資標準提高了，工人得到一點好處，但是直接危害農民的土豪劣紳，卻未打倒，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沒有獲得實際利益；農民協會雖然辦起來了，但工作還是停留在口頭宣傳上，有些地方過早地打了「菩薩」，引起了廣大農民的不滿。共黨組織雖然在城市中、在知識份子和個別工人中間有了一些發展，但並沒有向農民開門。這就是說：共黨並沒有能夠在群眾中間生根立足。這些都是由於當時閩西共黨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下所引起的。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清黨以後，閩西的共產黨轉入農村。由於過去的「教訓」，才真正在農民中進行艱苦的工作。這時，龍岩縣以鄧子恢、郭滴人為首，在農民中展開了宣傳教育，逐漸建立秘密農會，集合了一批貧苦農民的堅決分子成為農會的核心。此外，張鼎丞在永定的溪南里；陳正、盧肇西等人在永定之金豐；傅柏翠在上杭的蚊洋，藍為仁、李立民在上杭的蘆豐、豐稔市等地，都深入地進行了農民工作。

一九二七年八月，閩西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局面：於國民黨省黨部改組，隨之各縣的黨部也就逐漸恢復，吸收了一些左派分子和共產黨員進去。

鄧子恢、郭滴人等人都是冒充的國民黨員，分別擔任黨部祕書、組織、宣傳等工作；上杭縣國民黨的黨部則掌握在共產黨員藍為仁和藍為龍手中。這樣，便出現了便利共產黨公開進行農民運動的機會。從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底短短的三個月時間，龍岩就有十萬人口的地區，普遍成立了「農民協會」，實行了「二五減租」；上杭各地的農民運動也大大發展起來。許多地區都建立了三套組織：共產黨支部——祕密農會——公開農會。這樣共產黨成了群眾組織的核心，這種「縱深配備」的組織形式，具有堅強的戰鬥力和充分的靈活性，使「共產黨組織」便於應付任何情況，禁得起考驗。

三 三竄閩西

我們聽了郭滴人這篇富煽動性的「談話」之後，對於朱毛主力紅軍未竄入閩西以前的閩西土共的活動情況，大致已有初步了解。我希望郭滴人能夠把毛澤東的主力紅軍竄入閩西的經過情形談一談。剛好此時郭滴人的談話告一段落，我便率直地說出了我的願望。這位穿著灰色中山服、大眼、矮胖的「縣蘇」主席，很謙虛地說：

「關於主力紅軍到閩西的經過情形，我們閩西蘇區的創造者鄧子恢同志比較熟悉，我們請他談談。」於是鄧子恢發表了另一篇「談話」，下面就是他當時談話的大意：

一九二九年二月，朱（德）軍長，毛（澤東）代表率領紅四軍下井岡山，經過贛南地區的雩都、會昌、瑞金等邊境山區，於三月間進入閩西地區。在長汀縣屬的四都打敗了盤踞長汀的「地頭蛇」郭鳳鳴部三千多人（郭鳳鳴被打死），佔領了長汀城。紅四軍在長汀駐紮了

約半個月。那時，中共閩西特委（鄧子恢任書記）設在上杭城水南，我得了這個驚人的消息之後，立即趕去會晤毛代表。中途聽說紅四軍已經去江西，乃折回，將閩西黨群衆組織、鬥爭情況和敵我情況，寫了一份詳盡的書面報告，派人星夜送給毛代表，要求紅四軍再開進閩西來開展游擊戰爭。

不久，閩西特委就接到毛代表的回信，說紅四軍將再度入閩，要我星夜趕到古田，共商大計。閩西特委接信後立即通知各縣，準備暴動響應。

四月間，紅四軍第二次挺進閩西，迅速佔領了龍岩城，在城內展開了宣傳活動，滿街貼滿了標語、佈告。毛代表在龍岩第九中學向學生講話，又撥了一百多支步槍給龍岩縣委，裝備龍岩游擊隊。

毛代表在龍岩召開了「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後，便兵分兩路：一路由朱德軍長率領二、三縱隊出擊漳平、寧洋、永春、大田、德化等縣，開展游擊戰爭；另一路由林彪率領第一縱隊分佈在閩西各縣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紅色政權。

同年八月，閩西特委在毛代表指導下，在蛟洋召開了「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後。閩西特委集中閩西各縣游擊部隊，擴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由胡少海任縱隊司令員，張鼎丞任黨代表，譚震林任政治部主任，羅瑞卿任參謀長。

九月，朱軍長率領之二、三縱隊回到閩西，與林彪率領之一縱隊和四縱隊會師，攻下了上杭城，毛代表即在上杭城召開了「紅四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十月間，紅四軍又出擊廣東省之梅縣、蕉嶺等地，但都失敗。

同年十二月初，紅四軍回師閩西，再克長汀。這是紅四軍三次進入閩西。之後，紅四軍

就在連城的新泉一帶整訓。毛代表利用部隊整訓時間，在上杭縣境的古田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由毛代表撰寫的《古田會議決議》（即《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紀念日）閩西中共在龍岩召開了「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定了《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條例》等法令，以及文教政策和財經政策，並選舉了鄧子恢、張鼎丞、郭滴人、傅柏翠、藍為仁、張赤民、陳正……等三十五人為閩西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鄧子恢為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閩西蘇區縱橫近三百華里，建立了五十多個區蘇，六百多個鄉蘇，約有八十萬農民分得了土地。各縣都建立了不脫離生產的赤衛軍、少先隊，凡是十六歲至四十五歲的男子和青年女子都加入少先隊和赤衛軍的組織，歸蘇維埃政府軍事部指揮，武器多是些土槍、刀矛，也有些步槍。」

鄧子恢講完了這個「故事」，座談會至此宣告結束。隨後龍岩縣招待我們吃飯——「蘇維埃式的會餐」。

四 游擊區域

我們在龍岩逗留了兩天，洗洗衣服，整理整理行李。有「婆婆媽媽」之稱的劉伯堅主任又來看我們。他勸我們把不必要的東西丟掉，減輕以後行軍的負荷。我們剛剛從「白區」進來，不免帶了不少自己認為「必要」的東西，例如襪子、白襯衣、西裝褲、皮鞋、髮蠟等等，這些東西一到「蘇區」不但毫無用處，而且是一個「累贅」，我們盡可能清除了一部分「奢

侈品」，背包減輕了不少，但我們畢竟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都相當的保守，仍保留了一部份「外面」的衣服、被單、床單等之類的東西。劉伯堅已經看在眼裡，卻說：「這些東西還是留著吧，到了『大後方』——蘇區的中心區，還是用得著的。」這些話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來說，是一種犯錯誤的「溫情主義」。但當時我們聽來卻覺得他說的很得體哩。

第二天早晨龍岩「縣蘇」派了兩個強壯的農婦來給我們挑行李。我們一行十多人都穿著「紅軍服」，離開了這座在「紅色恐怖」中戰慄的山城。

約莫走了十來里，到了龍門——它是個小鎮。這一段路還算平坦，沿途看到了幾處天然煤礦，原來這一帶盛產無煙煤，可惜未曾作有計畫的開發。

我們在龍門休息了一會兒，旋即走進群山環抱，石徑紆迴的羊腸小路，窄狹而陡峭，十分難行。這是一條通往汀州府的古道，古木參天，每十里便有一個驛亭，讓行路人駐腳休息。我們每到一驛，也就稍作休息。

這天，我們走得很慢很慢，黃昏的時候才走到龍岩西北六十里的大池——一個寧靜的鄉村。兵站的「交通」將我們帶進了一所破舊的祠堂，原來是大池鄉「蘇維埃政府」。門口站著衛兵——一個穿便服、手握紅纓槍的農民。一個青年農民急忙地跑進去「報告」，不一會一個穿著灰黑色「紅軍服」戴紅星帽、純樸誠實的中年農民出來迎迓我們。這便是「鄉蘇」主席。他左肩上掛著一支駁殼槍，右肩上掛著書包——裡面裝著「蘇維埃」文件、課本以及碗筷等等。這個地方是一個「紅」「白」交錯的游擊區，「蘇維埃」工作人員都要武裝起來，時刻準備著戰鬥，所以這位「鄉蘇」主席才有這般的打扮。

「鄉蘇」主席以奇異的眼光端詳了我們一番，看過兵站「交通」交給他的介紹信之後，

態度就轉為和藹，親切地招呼我們。這時，我自己打量了一下：我們到底像個什麼呢？是「白區」來的難民嗎？我們卻是著紅軍服，戴五角星帽子。是「紅色戰士」嗎？我們手指尖尖、皮膚白，一點也不像是生活在戰鬥中的「紅色戰士」。不一會，就有一大群兒童團來「歡迎」我們，他們總是以奇異的眼睛望著我們。我們都走得很累了，把「紅軍服」一脫，躺在「鄉蘇」為我們鋪設的「床板」，馬上就露出「白區人」的原形來了，更引起了這一群「蘇維埃」兒童的好奇和疑心。

三個月前，當主力紅軍打開龍岩城的時候，這個村子裡還駐紮著土著軍閥陳國輝的一營人。後來地方游擊隊才把他們趕走了。游擊區的鬥爭形式一般是這樣：江西的主力紅軍來了，「白軍」便退到城裡去，紅軍去了，「白軍」又立即開進來。有時「白軍」偽裝「紅軍」，對老百姓施點小「恩惠」，聰明的老百姓，就用扁擔、木棍、掃帚打「紅軍」，甚至用大糞潑「他們」，並大罵「打倒共產黨」，狠狠把「紅軍」打出去，這樣就可以「保險」無事，不然的話，「白軍」就認為這個地方的老百姓都是「赤化」了，就要予以嚴辦。

晚上，為了我們的「安全」，鄉蘇主席加派一班赤衛軍來保護我們。在大池三十里內外的範圍，還有游擊隊的活動，準備隨時和「白軍」周旋。

這裡的老百姓都受過土共有計畫的訓練，教他們怎樣同民團、「白軍」作鬥爭。老百姓也受到雙重的剝削：紅軍來了，要糧、要人（當紅軍），「白軍」來了，也要糧、要錢。老百姓用堅壁清野的辦法，平常把糧食都搬到山上去，或者藏在地窖裡。白天青年男女都是赤衛軍、少先隊員，他（她）們一方面幹活，努力生產，一方面幫助游擊隊站崗放哨、守夜、送信、查路條。他們藉著山區的特點和有利地形，設置山頭聯絡哨，監視「敵人」的行動。

每當「白軍」從城裡或據點出發時，他們的前沿山頭哨，就響「號銃」報警。屬於那一條線的山頭哨，便接二連三的各響一通。游擊隊的首領很習慣地辨別「號銃」的響聲，判斷「敵情」發生的方向和遠近，使游擊隊得以從容地做好戰鬥準備。如「敵人」繼續前進，山頭哨就繼續發出「號銃」聲，游擊隊就迅速進入戰鬥。赤衛軍、少先隊放山頭哨，對游擊隊的活動是如此重要。

在鄉蘇主席的照顧和安排下，我們很快就睡著了。

午夜時分，我們都在熟睡中。突然從遙遠的山崗上接二連三的響起了槍聲。我們都從夢中驚醒。原來是在大池東北面十五里的山莊發生了「敵情」，有不明數目的民團，從據點出來了，前面的山頭哨頻頻響出了「號銃」報警。從黑暗中傳來遠處狗吠的頻叫聲，顯出埋伏在附近村莊的游擊隊已開始行動。在游擊區過慣了的農民說來，「有了情況」那是家常便飯，不算一回事。可是對初次踏進「紅區」的我們說來，卻是一件頗為嚴重的情況。我們不免驚慌起來，在黑暗中整理行裝，準備萬一。不久，鄉蘇主席從紛忙中特來看我們，親切地說明了剛才發生的「敵情」，安慰安慰我們。一陣「虛驚」也就悄然過去，我們又進入睡鄉。

第二天早晨，鄉蘇主席復將從龍岩來的兩個青年農婦帶來給我們挑行李。因為今日的路程全是游擊區。沿途村莊不完全靠得住，惟恐從大池鄉蘇派出的「伙子」——婦女少先隊員，「暴露」給「敵人」，引起不良的後果。顯然是鄉主席說服了龍岩的女少先隊員，叫她們再辛苦一天，繼續為我們服務。

我們有幾位女同志很快就和這兩位女少先隊員交起「朋友」來了。我也參與其中，和這兩位淳樸天真的女少先隊員聊天。

其中的一位，年紀稍大，在「赤化」以前就是個挑肩擔的「苦力」，那時她家裡連一分田地也沒有，父親是一個長工，長期給地主做活，沒有錢蓋房子，一家人就住在草棚裡。赤化以後，她的丈夫跟紅軍「鬧革命」去了，幾年沒有回來過。今年三月尾，紅軍打開了龍岩，她的丈夫才請假回來在家休息了兩天。原來她是一個紅屬（紅軍家屬之簡稱）哩。

另一位女少先隊員也是紅屬，她的丈夫是在地方游擊隊裡，除了他的部隊跟主力紅軍打到外線去的特別任務之外，平常每兩個月可以請假回家一次，在家休息幾天。這兩位紅屬都很健談，政治水準也很高，據她們所說：無論是主力紅軍也好，地方游擊隊也好，所有眷屬都稱紅屬，都可以獲得蘇維埃政府的特別照顧，一般稱為優紅（優待紅軍家屬之簡稱）。他們紅屬可以優先分得好田，而且蘇維埃政府還組織所謂「耕田隊」，免費給「紅軍家屬」插秧、施肥、除草、刈稻，還有少先隊、兒童團經常派他們的隊員團員來替紅屬做挑水、砍柴、撿糞等勞作。

由於「敵情」發生變化，本來今天的宿營地是古田，因為那邊接近「白軍」據點，現在改為朝向西北面的舊縣走。那是屬於中心區，早已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這裡，我們順便說一下古田。古田——毛澤東在此召開了所謂具有「歷史意義」的「紅四軍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毛澤東草擬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毛在這個「決議」中強調提出所謂「政治領導軍事」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問題。

今天上半年走的仍然是游擊區。上午我們越過一座層巒聳立的大山，所看到的盡是一些光禿禿的峻峭和青郁郁的叢林，沿途很少遇到老百姓。

下半年以後，我們便踏進蘇維埃「中心區」了。女少先隊員加速了步伐，當我們於黃昏

抵達舊縣時，她們已先於半小時抵達目的地——舊縣鄉蘇。

五 抵達汀州

從龍岩來的女少先隊員完成「任務」已經回去了。舊縣「鄉蘇」派來了兩位年紀較大的挑夫，是女赤衛軍，她們體魄都很矯健。兵站「交通」對我說：

「今天我們的地是『老革命』的才溪。」我們問他：「才溪為什麼叫老革命？」他說：「因為才溪鬧革命最早，便叫『老革命』。」

我們在「老蘇區」行動，走得比較慢，沿途有老百姓賣甜酒（用糯米做的麴水酒釀）、花生米、豆腐乾等等。有些村莊還設茶站，為行路人免費提供茶水。但我們還是常常買甜酒喝。喝了甜酒不但可以止渴，而且可以提神，消除疲勞。

「兒童團」在各村的人口處或雙叉路口站崗，檢查「路條」，不管你是什麼人，那怕是「蘇維埃」官員，或是「紅軍將領」，照樣要拿出「路條」才能通過。如果遇到沒有「路條」的人，便以為是「反動派」、「偵探」，捉到「蘇維埃」軍事機關去究辦。兒童團還在哨崗的地方設有「識字牌」，檢查路條時，順便強迫行路人認「識字牌」上的文字——都是紅軍的「宣傳口號」，行路人必須唸了以後才放行。不會唸的，兒童團一定要教你唸。

今天一路上，看到不少少先隊和赤衛軍挑著一擔一擔的木箱子，從舊縣往才溪的路上走。他們不是整隊走，而是零零落落地走，有的走在我們的前面，有的卻掉隊在我們的後面很遠很遠的地方。每口箱子上面都寫著「毛澤東收」四個大字。這事引起了我最奇異的疑問：到底

箱子裡面裝著什麼東西，要毛澤東親收呢？是子彈嗎？裝子彈的木箱子我看過，這種箱子卻是比裝子彈的箱子大得多。顯然不是。是銀元嗎？那裡來的這麼多銀元？如果是銀元的話，紅軍必派出部隊來護送，不會讓少先隊、赤衛軍零零落落挑著走。後來，我在瑞金竟然看見這許多木箱子堆滿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教育部）的走廊上，才曉得原來木箱子裡面裝的全部是圖書。這次毛澤東親自隨「東路軍」來到漳州，除了搜括物資，擴大兵員之外，還沒收了不少的圖書。這些沒收來的書籍裝進一個個木箱子裡，上面寫「毛澤東收」四個字，表示這些東西非毛澤東親收不可。同時也表示少先隊和赤衛軍的紀律非常差，如果不寫「毛澤東收」，則少先隊和赤衛軍可能把箱子裡面的東西任意偷走，或是加以毀壞。後來，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葉坪（瑞金城北郊）成立了一所「中央圖書館」，便把從漳州沒收來的圖書全部收藏進去了。

今天的路程雖然只有五十里，但因我們在路上東盼西望，常常休息，走得也慢，當我們抵達目的地——才溪時，已是黃昏時候了。

才溪——它是「蘇維埃」的「模範區」，毛澤東曾在這裡做過一番艱苦的群眾工作，使一個十分落後的鄉村變成了「蘇維埃根據地」。這裡的農民都徹底的赤化了，實行了毛澤東制定的所謂「五抗政策」——抗租、抗糧、抗稅、抗債、抗息的群眾鬥爭，建立了游擊武裝和暴力政權。

毛澤東不但在這裡做了初步的「赤化」工作，也在這裡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工作。他基於「製造典型」、「取得經驗」、「普遍推廣」的邏輯，對於才溪「鄉蘇」特別下工夫。他在這裡召集了無數次的「調查會」，同農民，特別是貧農，以及區、鄉幹部，做了深入的談話，

親自做了紀錄，並據此寫成了一篇《才溪鄉調查》發表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報》上。經過毛澤東的渲染、號召和區鄉幹部的賣力，才溪在閩西蘇區確是一個比較突出的「鄉蘇」。「蘇維埃」的刊物都一致「稱讚」，認為才溪鄉是閩西蘇區的模範鄉，正如同興國縣的長崗鄉是江西蘇區的模範鄉一樣。一九三四年二月毛澤東在「二次全蘇大會」（「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之簡稱）上做「工作報告」時，又再一次把才溪和長崗這兩個「模範鄉」加以誇大的渲染。

我們抵達才溪鄉蘇時，才知道原來和我們同一天從龍岩出發的漳州工人和五華工人，已先一天抵達才溪。他們身體強壯，行李簡單，走得也快。

這一天晚上，才溪鄉蘇特別為我們舉行了一個很別致的「晚會」。貧農團、赤衛軍、少先隊、兒童團等都派了代表參加，把鄉蘇的「列寧室」擠得滿滿的。這個晚會有一個特別出色的節目是少先隊員們的「山歌」。這一帶是客家人聚集的地區，他們樸實熱情的山歌是很有名的。當「晚會」開始時，同以後我在其他地區所看到的「晚會」一樣，一開頭就是「國際歌」、「少年先鋒歌」，以及歌頌「紅軍哥哥」等富於政治氣味的歌唱。可是一到後半節，慢慢地「山歌」的內容就是表現青年男女熱戀的「情歌」了。

這說明，即便在「蘇區」，馬、列、斯、毛的思想觀念，仍是不能取代傳統文化，也不能泯滅人性溫情。

現在憑我記憶所及，錄一首富有政治性和一首純抒情的山歌在下面：

紅軍被困在深山，

糧盡衣單受飢寒；
老鄉冒險上山頭，
送了糧食和衣衫。

月亮彎彎在半天，
兩人情愛莫論錢；
雲遮月光沒幾時，
同妹交情萬萬年。

在這個別致的「晚會」上，男女少先隊員都盡情地歡唱。和其他地區的青年男女一樣，他（她）們在田間，在茶山，在忙碌的勞動中，經常用那些「山歌」去忘記體力勞動的疲乏。「晚會」的時間拉得相當的長，有些老農、兒童團員先後回家了，剩下來的只有那些唱得最起勁的少先隊員。我們一連走了幾天路，也有點吃不消了。此時主持晚會的鄉蘇主席似乎也覺察到我們的情緒，便宣告散會。

我們從才溪出發，大約走了四小時，當夕陽西斜的時候，剛剛爬過一座相當高的大山，在一處寬敞的山麓，遇到一支紅軍部隊。據兵站的「交通」對我說，這是工農紅軍總司令部 and 總政治部的隊伍。難怪，這一支隊伍裡面馬匹特別多，顯然騎馬的都是紅軍的「長官」。兵站的「交通」昨天晚上便接到電話，今天我們會在中途遇到這一支龐雜的隊伍。「交通」叫我把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交給我們的一封「介紹信」遞給一位騎著一匹深棕色馬的

「長官」。原來他就是「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穡。他看過「介紹信」之後，下馬來和我們握手，慰問有加，他立即為了一封「介紹信」，並對我說，到了汀州把這封信遞給「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原來，這是我由「紅軍」轉到「蘇維埃」的正式手續，而這種手續必須經過「黨」的領導機關。王稼穡把「介紹信」交給我之後，又騎上他的馬繼續前進。

據「交通」說，從才溪到汀州有四天的路程，中間要爬兩座大山。我們已經爬過了一座大山，再爬過一座大山，就接近汀州平原。這天我們在一個不知名的村莊「宿營」。第二天便爬第二座大山。這是自龍岩出發以來走過的最大一座山，足足走了一整天，才走過去，到了汀州平原。這兩天的行軍實在把我們累壞了。

第三天（從才溪出發算起）抵達河田。在河田休息了一天，使我們有時間參觀紅軍設在這裡的一所兵工廠。這所兵工廠分為二個部門：一為「修械廠」，一為「造彈廠」。我們經當地軍事機關的許可，先參觀修械所。這是一九二九年紅四軍首次打到閩西來，在汀州繳獲了郭鳳鳴的一所小型的修械廠，便把兩部破舊的車床和一部發電機搬出來，先在一處深山密林裡開辦起來。後來閩西蘇區逐漸鞏固，一九三一年閩西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才把修械廠搬到河田來。這次林彪的「東路軍」在漳州又繳獲了張貞的修械廠，給這所修械廠裝配了一部新式機器。那時這所修械廠已有五十多個工人，其實他們在不久以前還是農民哩。其中也有木匠和鐵匠。他們的技術非常的差，修理「好了」的步槍送到前線，打一下又損壞了，又是一批一批地運回來再修理。我們在轟隆轟隆的機器響聲中參觀了約半小時，接著去參觀「造彈廠」。這一所造彈廠又分成兩部門。一為造手榴彈，一為造步槍子彈。造手榴彈的部門比

較危險，我們沒有去參觀。我們只參觀了造步槍子彈部門。大約有七、八十個工人在那裡勞作著。他們把一些從各地收集來的銅錢和銅幣作為彈頭的原料，用鐵鑽、鐵錘、銼刀等工具把一個個的銅幣作成子彈殼，又用洋硝（又名白藥）、硝酸、棉花等作成火藥，裝進子彈殼裡，完成裝藥的程序。最後用銼刀把粗製的子彈銼得光亮，成為一粒一粒可以傷害人體的凶器。

我們在充滿著火藥氣味的河田，度過了一天。第二天繼續向汀州平原前進。我們終於抵達閩西蘇區的政治、軍事領導中心——汀州城。

汀州是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所在地，它離「紅色的首都」——瑞金只有六十華里，中間只隔著一座牛嶺大山，它是「中央蘇區」的腹地，也是蘇維埃區域的經濟中心。所以汀州在蘇區有「紅色的上海」之稱。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038

叁、周恩來和中共蘇區中央局

一 會晤周恩來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的一天，夕陽西沉，暮靄如煙的時候，我們抵達汀州城。兵站的交通把我們帶到閩西「省蘇」招待所住宿。漳州工人和五華工人及他們的家屬已先一日到此，也住在這裡。

「省蘇」派了文化部工作人員陳正來招待我們。後來我才知道，陳正是和郭滴人、鄧子恢等一夥人同時發跡的「老革命」同志，因犯了某種錯誤，被鬥爭，現在貶降在「省蘇」文化部工作。我們是「白區」來的知識分子，特別被「重視」，惟恐「招待」不周，所以加派文化部人員前來照料。據陳正對我說：閩西「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於一九三〇年三月，鄧子恢擔任省蘇主席。一九三一年九月在汀州召開閩西工農兵第二次代表大會。此時鄧子恢已離開閩西，大會乃選舉張鼎丞為閩西「省蘇」主席，「省蘇」之下轄有土地部、糧食部、勞動

部、工農檢察部、文化部等機構。

在汀州城內，除了「省蘇」之外，還有「國家政治保衛局」閩西分局、省總工會、省少先隊部、反帝大同盟等省級機關，以及一個「閩粵贛邊軍區司令部」（駐河田），下轄一個兵工廠、一個被服廠和一個接收英國教會福音醫院改編而成的紅軍醫院。

第二天，我在陳正陪同下會晤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據陳正說，中共蘇區中央局本來是駐紮在瑞金城郊的，因為中央局最近在汀州召開了一個重要的軍事會議，周恩來特地從瑞金趕到汀州來主持。陳正把我帶到一座很別致的洋樓上，這便是周恩來在汀洲的臨時公館。我們進入一間寬敞的辦公室，陳正向前走一步，對周恩來說：「這位就是剛從漳州來的蔡乾同志。」在我當時的記憶中，周恩來曾經是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參加過東征之役和北伐戰爭，一九二六年策劃領導上海三次暴動，一九二七年策劃「八一」南昌暴動。我在上海時曾經見過他，那時他是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身材瘦小，眉目清秀，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可是現在出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臉上留著長鬍鬚，看起來好像是個五十來歲的老年人。那是因為他來蘇區時是化裝老頭子混進來的，現在長鬍鬚還留著。一個紅小鬼倒了兩杯白開水放在我們的面前。周恩來說：「這次和你來到蘇區的幾位台灣青年同志，他們在外面做過什麼工作？」

「他們都還在學校讀書，完全沒有工作經驗。」我說：「他們到蘇區來的目的，是要來參加實際工作，鍛鍊自己。有幾個青年同志已分配到軍團政治部工作，另外有幾個女青年同志還沒有分配工作。」

周恩來對我說：「現在紅軍中很缺乏政治工作人員，蘇區也需要文化工作者，你們來到

蘇區正適合『革命』的需要。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高潮。你們是從日本帝國主義蹂躪下的殖民地來的。你們若能將在殖民地統治下的生活實況告訴蘇區千百萬老百姓，相信必定會在蘇區掀起反帝高潮，這對『革命』是極大的貢獻。希望蔡同志多多協助他們把這項工作好好領導起來。」

「我們都很幼稚，恐怕工作做不好。」我說。

此時，周恩來對小鬼說：

「你去請任弼時同志到這裡來。」

不一會一個臉黃肌瘦，留著長鬍鬚的老先生出現在我面前，面對他，我發愣了。還是他先開腔：

「蔡乾同志，你認得我嗎？」

聽他這麼一說，我很快到他的跟前和他握手。我說：

「任先生！您好，任先生留著鬍鬚，乍看不容易認出來。」原來任弼時也是化裝老頭子進到蘇區的。一九二四年他在上海大學教俄文的時候，是那樣的年輕，那麼的瀟灑，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老教授，因為他削瘦，看起來比周恩來還要老。

任弼時說：

「你們來到蘇區，我們很歡迎。」他又把周恩來剛才對我說的客氣話重複了一遍。然後又說：

「這次和你一起來的施老先生全家都到蘇區來，真難得。你跟他相處很久，他做什麼工作比較合適呢？」

「施老先生在台灣曾經參加過文化運動和議會運動，他是一個『老革命家』，他對於教育工作很有興趣，就是說國語有點困難，做文字工作大概沒有什麼問題的。」我這樣回答。接著任弼時又問我：

「劉月蟾和施老先生幾個女兒做那些工作比較合適？你說說給我們做參考。」接著，周恩來說：

「我想蔡同志和幾位台灣同志的工作，由項英副主席做具體決定好了。」說著，周恩來就寫了一封介紹信交給我，說到了瑞金交給項英。

周恩來把介紹信交給我時又對我說：

「今天晚上汀洲各群眾團體和省級機關在『省蘇』大禮堂舉行晚會，歡迎你們台灣同志、漳州工人同志和五華工人同志。你們可以在汀州玩幾天，到處看看。」

「我們都想儘快趕到瑞金去。」說著，我便站起來和他們告辭。

二 紅軍醫院

同一天下午，我們和漳州及五華的工人二十多人，在陳正的帶領下去參觀紅軍設在汀州的被服廠。這家被服廠位於汀州城南，有五、六十個工人，大部分是女工。有少數的男工是熟練的裁縫師，他們擔任剪裁工作，還有一部份男工擔任染色和漂洗工作。女工大部分是紅軍家屬。據廠長說，布疋（白布）大部份是紅軍打到「白區」時搜集進來的，小部份的布疋才是通過商人的關係從贛州購進來。都是土布，有時也可以買到一些洋布。這個工人出身的

廠長說：

「現在廠內有二十多部縫紉機，是一九二九年紅四軍第一次佔領汀州時擄獲的。今年紅軍佔領漳州時擄獲的縫紉機也撥了一部份到這裡來。」據他說，除了幾位熟練技工領薪餉外，其餘的工人都是按照紅軍士兵待遇。不過他（她）們的家屬可按照「優待紅屬條例」受到優待。

我們在紅軍被服廠參觀了約半小時，然後轉到城內參觀紅軍醫院。

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失敗後，其殘部經過撫州、廣昌、瑞金、會昌等地竄抵汀州時，有一部份紅軍傷兵也就往當時汀州城內一所規模相當大的英國教會醫院——福音醫院送。當時福音醫院院長傅連璋，本是一位四十來歲的虔誠的基督教徒，他以「神救世人」的精神，熱情的給紅軍傷兵治療。後來紅軍撤離汀州，有幾個重傷的未能帶走，傅院長仍留他們在院內繼續治療。就是這樣，傅連璋便和朱毛紅軍搭上了關係。一九二九年春，朱毛紅軍下井岡山，經過贛南竄入閩西，佔領了汀州，便公然接收了福音醫院，更名為「紅軍醫院」，仍由傅連璋擔任該院院長。就是這樣，傅連璋也就成為「紅色醫生」了。

紅軍醫院是一座兩層的樓房，有一百多個床位。樓上住的是紅軍高級幹部的重傷病號，有一部份是蘇維埃政府或黨部高級人員患嚴重的肺病，需要長期療養者也住在這裡。樓下所收容的是重傷病號。輕傷者都在前方紅軍醫院醫治。這次「東路軍」在漳州地區受傷的重病號，大部份也送到這裡來。

傅連璋的愛人（妻子）原來也是福音醫院的護士，現在她是紅軍醫院的護士長。她嬌小、幹練，經傅院長介紹，她熱情地招待來參觀的女客人。

下午六時，由閩西「省蘇維埃政府」作東，請我們吃飯——蘇維埃式的會餐。「省蘇」主席張鼎丞、「省蘇」土地部長范樂春（女）、文化部長蕭向榮，還有幾位部長級人員（名字記不清），以主人和陪客身分參加了這次會餐。當中共中央要員周恩來和他的愛人（妻子）鄧穎超以及任弼時、顧作霖（少共中央書記）、鄧發（中央局委員）、陳壽昌（全總蘇區執行局書記）、王盛榮（中央蘇區少先隊總隊長）、張愛萍（中央蘇區少先隊總隊部參謀長）等到會場時，參加會餐人員全體起立，並由張鼎丞致歡迎詞。

會餐完畢。我們在「省蘇」大禮堂前面的廣場溜達。不一會，軍區政治部、閩西紅軍學校學生、政治保衛局分局的隊伍，以及省級機關、民衆團體的隊伍，約六七百人，陸續開到「省蘇」大禮堂來。一個盛大的晚會開始了。這次晚會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幾個留俄學生表演的「蘇聯海軍舞」、烏克蘭舞和俄語「國際歌」。此外，由紅軍學校學生表演的「活報」，有如街頭劇的形式，給人以新穎活潑的印象。總而言之，這次晚會有一種「洋氣氣」，與我們在才溪和古城所看到的晚會畢竟是不同的。

三 周恩來這個人

這兩天，我在與周恩來頻仍接觸中獲得了一種深刻印象：他是個手不釋卷，努力勤學的人。

我們在汀州逗留的第三天早晨，周恩來偕任弼時特地到招待所來看我們。他拿出兩本日文書來給我。一本是列寧著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另一本是當時

日本共產黨頭目佐野學著的《國家論》。前者是一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是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本質深入的闡述。列寧這本著作，就在當時政府區也還沒有中文譯本。後一本是佐野學對列寧著的《國家與革命》一書的通俗的闡釋。當時就位居中央蘇區黨政軍最高領導者的周恩來說，確實需要藉助於書本上的學識來提高他在理論方面的權威，以保持和鞏固他的領導地位。

周恩來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抵達江西蘇區的。在此之前，他除了在「法國支部」時期，有時間讀書之外，無論是在廣東時期，在上海時期，以及從一九二七年領導南昌暴動起迄一九三一年進入江西蘇區時為止，都因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進行理論上的修養，尤其是在「白區」的環境中，假若身邊有馬克思主義書籍，便隨時有遭逮捕的危險。現在他在中央蘇區工作雖然非常忙碌，但總還是可以抽出些時間來進行理論修養的。這便是周恩來急於要我翻譯這兩本書的原因所在。周恩來對我說：

「蔡同志，這兩本書很有參考價值，你到瑞金，把你的居住、工作安排好了之後，有空時，請把它翻譯出來。時間不受限制。可把列寧的著作先譯出，佐野學的著作可緩點譯沒有關係。翻譯好了送到中共蘇區中央局來，我們準備把它出版。」

周恩來早年曾留學日本，在東京早稻田大學攻讀過，他是懂日文的。他為什麼要讓我翻譯呢？顯然，時間是主要的因素。書已然送來，我只好接受。

「我恐怕翻譯不好。」我直率地說：「況且現在身邊又沒有一本日文辭典，翻譯不免有些困難。」

「不要客氣，」周恩來接著說：「你需要日文辭典，可到瑞金葉坪『中央人民委員會教

育部」去借用。那邊正在籌設一個「中央圖書館」，有大批的日文書剛從漳州運回來。」

接著他又說：

「日本共產黨雖然實際鬥爭較差，但他們在理論修養方面已有一定的成就。你看，佐野學這本《國家論》真行。雖然佐野學這本書，只不過是列寧著《國家與革命》一書通俗化的詮釋，但卻表現了日本共產黨對於理論修養方面的重視和他們在理論工作方面已有豐碩的成就。在這方面我們還得努力學習。」

後來，我在與周恩來不斷的接觸中，都能深深感到他確實是個學識廣博，思考縝密的人。以上是一九三二年我與周恩來第一次會晤時所得到的直覺的印象。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從他進入江西蘇區後，在處事做人等方面幾個突出的事例，給予我的印象也很深刻，那就是：

周恩來是善於隨風轉舵，擅長縱橫捭闔的人。

周恩來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進入江西蘇區時，正值「富田事變」和蘇區中央局成立之後，以項英為首包括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在內的反毛集團，指責毛澤東在擔任「總前委」時期對於處理「富田事變」和「肅反」工作犯了嚴重的錯誤，因而罷免了毛的軍權（總政委）和黨權（總前委書記）造成中央蘇區內部嚴重的紛爭。周恩來到達瑞金後，曾召開了很多次會議，對於蘇區「肅反」工作做了徹底的檢討，並力求調解這場鬥爭和糾紛；此即一方面批評反毛集團把「AB團」擴大化了，把「肅反」範圍擴大化了，造成「肅反中心論」使黨組織和蘇維埃工作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另一方面也指責毛澤東濫用黨權、武力鎮壓和屠殺，造成黨內嚴重的糾紛和恐怖，使蘇區陷入非常狀態。

顯然，周恩來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是站在「中間立場」，力圖加以調解，以期保持黨內團結的。由此看來，後來周恩來會被譏為「調和主義者」，顯然是有事實根據的。

寫到這裡，我想再回憶一下一九三六年我參加由周恩來主持的一次工作會議的一個「小插曲」。那是一九三六年九月，我被調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任書記，專管對國軍的滲透與瓦解工作）屬下的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工作對象是兩高（高桂滋、高雙城）。有一天，我在保安參加由中共中央召集的「白軍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葉劍英，工作對象是張（學良）楊（虎城），這是當時中共「白軍工作」的主要方向；西線工作委員會書記張浩，工作對象是兩馬（馬鴻賓、馬步芳）；此外，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克農、張經武、邊章伍等。當會議正在展開討論之際，電話鈴響了。周恩來和前線的一個司令員通話，他用嚴肅而中肯的言詞在說服前線司令員儘可能避免動干戈，盡量用政治爭取。他並立即拿這個事例作為經驗教訓，在會議上加以強調渲染。他說：

「在目前我們的環境中，類似這樣的事例很多，有時候我們的朋友（指已與紅軍勾結的軍隊）對我軍（指紅軍）打一下，並不表示對方已經反臉或破壞協定。這種情況，你們要特別小心，靈活掌握運用。」接著周又說：

「你們要注意策略的靈活運用，我們在不傷大局的前提下退讓一下，讓對方佔些『便宜』，在眼前雖然吃點虧，但為了爭取更多的朋友，孤立主要的敵人，這樣做才是合算的。」不一會，通信員送來一篇稿件，是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報》）的一篇社論。周恩來看完了稿件之後，拿起電話機和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講話，他說：

「社論關於正在爭取，或有待爭取的抗日軍發動宣傳攻勢的一段文字，應該予以斟酌。」

要把語氣改溫和些。」最後他強調地說：

「從整個『社論』的精神看來，未免火氣太大了，要修改一下才好。」

周恩來在這個會議上引證了一些事例，特別加以強調，確實在以後的工作中發生了功效。我在這裡追溯了這一段回憶，目的在於使讀者對於周恩來這個人的個性、處事做人等方面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四 中共蘇區中央局

當我於一九三二年六月踏進閩西蘇區的時候，周恩來已接替項英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兼工農紅軍總政委，成為蘇區炙手可熱的第一號人物。先是一九三〇年九月，中共三中全会決定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設立蘇區中央局，負責領導「全國蘇維埃」區域內各級黨部，指導各個地區的工作。三中全会並決定以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顧作霖（少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曾山（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王首道（中共湘贛邊特委書記）等為委員，並先派項英和顧作霖進入江西蘇區主持中央局工作。此時蘇區中央局因人事不健全，領導脆弱，威信不高。及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擔任中央局書記，同時增加鄧發（閩粵贛邊省委書記）、王稼穡（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為中央局委員以後，領導才算加強了。

在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的前夕，由項英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曾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瑞金召開「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清算毛澤東領導時期蘇區黨所犯的嚴重錯誤，主要表現

在：

(一) 在總前委領導下，蘇區黨繼續執行了立三路線，使蘇維埃運動和紅軍受到了很大損失和挫折；

(二) 在土地問題上，提出所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和「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等錯誤口號，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路線，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

(三) 在紅軍建設問題上，犯了嚴重的游擊主義傾向，將紅軍中的政治機關和軍事機關的經常工作，由黨機關包辦和代替，使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獨立工作的能力，成為黨的附屬機關；

(四) 在肅反問題上，把一切對黨和蘇維埃不滿的分子和一切犯了錯誤的人都當做「AB團」看待，主觀地把「AB團」擴大化了，形成為所謂「肅反中心論」，以「肅反」代替黨內思想鬥爭和黨的工作，使紅軍的建設和蘇維埃運動遭受重大損失。

在蘇區中央局領導下，經過幾次重要會議和嚴重鬥爭的結果，終於剝奪了毛澤東在軍中和黨的一切領導權。當我到達瑞金的時候，毛澤東僅保持著虛有其名而無實權的「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名位。從這裡明顯可看出那時蘇區內部派系的複雜和鬥爭之激烈。

現在將我初進入江西蘇區時，中共蘇區中央局的組織機構和人事名單列舉如下——

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包括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顧作霖、朱德、鄧發、王稼穡；

書記：周恩來

組織部長：任弼時

兼宣傳部長：顧作霖

婦女部長：鄧穎超

蘇區中央局下轄：

江西省委員會——書記曾山（後為李富春）

閩粵贛邊省委員會（後改為福建省委員會）書記——鄧發（後為羅明）

湘贛省委員會——書記王首道

粵贛省委員會——書記劉曉

此外，在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下還有下列機構：

少共蘇區中央局——書記顧作霖

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書記陳壽昌

少年先鋒隊蘇區總隊部——總隊長王盛榮

少年先鋒隊蘇區總隊部——參謀長張愛萍

周恩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他不但要掌握有關全局性的方針、政策問題，而且要照顧各方面、各個戰線上的鬥爭和業務；所以蘇區中央局日常工作的規劃和指導的責任，便完全落在組織部長任弼時的身上。

任弼時是湖南人，早年留學蘇俄，一九二三年同國，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曾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和共產國際東方部聯絡工作。任弼時身材瘦小，面黃肌瘦，臉上留有長鬍鬚，更顯得蒼老憔悴，那時他已患了輕微的肺病。

這次從漳州來的台灣人、漳州工人和五華工人的工作，便是完全由任弼時所決定和安排

的。

我和劉月蟾、施至善先生被分配到「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其具體工作由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項英決定。

沈乙庚、施月英、施月娥被分配到瑞金紅軍學校工作，其具體工作由紅軍學校政治主任歐陽欽決定。

我們在汀州逗留了三天，第四天，我們從汀州出發，約莫走了四十里，抵達古城。它是個古木參天，擁有百把戶人家的山寨。寨上除了鄉蘇之外，還有赤衛軍隊部、少先隊隊部、兒童團、合作社等機構駐此。我們在古城住了一夜。古城鄉蘇也舉行晚會歡迎我們。這個晚會內容沒有什麼特色，印象也就不深。第二天早晨，一出發便登上一座海拔一千多公尺的大山。我們仍沿汀州——瑞金的古道山嶺走。這一天很熱，據「交通」說，今天只走六十里路程，便可以抵達「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所以我們都走得很慢。下午在路上遇到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和他的妻子錢同志（她的名字已記不清楚），毛澤民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他的愛人（妻）也在國家銀行工作，而他的妻舅錢之光（蘇維埃對外貿易局局長）。這說明中央蘇維埃政府的經濟大權仍掌握在毛家手中。毛澤民看到我們汗流浹背，走得很累，便跳下馬來，硬要把他的馬讓我們騎，我們當然不好意思接受，他卻一再叫我們騎上去。盛情難卻，我們只好輪流著騎馬。我們於當天下午四時許抵達「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北郊葉坪。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052

肆、「紅都」——瑞金

一 會晤項英

在夕照斜暉中，我們到達瑞金城郊。

瑞金是一座形容枯槁的古城，清澈、彎曲的綿江，環繞在它的周圍。城東一里餘的山坡上聳立著一座白塔，更襯托出這座古城的沉寂。城西遠處隱約可見綿互的群山。

我們沒有進城，沿著一條彎曲的小徑，走進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

「交通」把我們帶進「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大辦公廳。一個年約三十歲的高瘦青年劉凱——「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總務廳長出來迎接我們，並把我們安頓在他的辦公室休息。

這個號稱控制著五個游擊根據地（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和陝北蘇區不算在內）、六十多個縣、九百多萬人口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辦公廳，其實只不過是一座寬敞破舊的

祠堂而已。它用木板隔成八個辦公室，中間留著一條約四尺寬的走廊，分成兩排：每一排各隔成四個辦公室：右一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項英的辦公室；右二是「司法人民委員會」（又稱司法部）；右三是「土地人民委員會」（又稱土地部）；右四是《紅色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編輯部；左一是「工農檢察人民委員會」（又稱工農檢察部）；左二是「財政人民委員會」（又稱財政部）；左三是「教育人民委員會」（又稱教育部）；左四是「總務廳」。此外，還有「糧食人民委員會」（簡稱糧食部）、「內務人民委員會」（簡稱內務部）、「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家銀行」、「造幣廠」、「被服廠」、「中央無線電台」等機構，則分散在附近村落。

所謂「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它的正式名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按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規定，蘇維埃中央政權機構，包括下列組成部份：

一、「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機關；
二、「中央執行委員會」，它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
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有個「主席團」，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閉幕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

三、「人民委員會」，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負責指揮「全國」政務；
在「人民委員會」之下，設外交、勞動、土地、軍事、財政、國民經濟、糧食、教育、內務、司法各人民委員會，各設人民委員一人。現將當年（一九三二年六月）人事列表如下：

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項英

副主席

張國燾

外交人民委員

王稼穡

內務人民委員

周以栗

軍事人民委員

朱德

土地人民委員

張鼎丞

勞動人民委員

項英（兼）

財政人民委員

鄧子恢

糧食人民委員

陳潭秋

教育人民委員

瞿秋白（時在上海，由副人民委員徐特立代理）

司法人民委員

張國燾（時在川陝蘇區，由副人民委員梁柏台代理）

工農檢察人民委員

何叔衡

此外，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還有兩個機構：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項英

副主席 周恩來

副主席 朱德

副主席 鄧發

國防政治保衛局局長

第二天，項英約我和施至善先生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話。這位相當於民主國家副總理的「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看起來不過三十五、六歲，他是湖北人，少時為一商店學徒，一九二三

年京漢鐵路大罷工時，即加入共產黨，曾任湖北總工會、上海總工會書記，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會時被選為中央委員，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後，他即於一九三〇年秋進入江西「蘇區」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他出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當我們進入項英的辦公室時，他一手捧著白銅製的水煙筒，一手正在寫什麼。他抬頭看我們說：

「我們蘇維埃政府正在籌備在中央蘇區召開一次全國性反帝同盟代表大會，號召蘇維埃區域的工農勞苦群眾積極動員起來，參加紅軍武裝保衛蘇區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他說：「蘇區的反帝運動應該密切配合紅軍行動，但過去由於單純的軍事觀點，只求戰爭的勝利，而沒有充分的政治動員，顯然對於群眾性的反帝鬥爭是做得非常不夠的。」

接著項英又說：

「現在反帝同盟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正在加緊進行中，你們兩位馬上就可以參加這項工作。不過現在中央教育部因人員缺乏，組織不健全，那邊工作也需要加強起來，你們可先到中央教育部工作。」

「說實話，蘇區貧困，生活苦，人事極不健全，蘇維埃工作人員，一般都是一個人兼幾份工作；即使將來反帝同盟機構正式成立，你們仍然要在中央教育部兼差。」

項英口頭上是在徵求我們的意見，而實際上已經打發「勤務員」（小鬼）去叫徐特立（副人民教育委員）來與我們會晤。不一會一個頭髮灰白、戴老花眼鏡的老頭子來到項英辦公室。項英給我們介紹：「這位就是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同志」，一陣寒暄之後，徐特立就把蘇區

教育工作情況作了簡短的介紹。

徐特立說：

「現在蘇區教育工作最迫切要解決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課本』問題。另一個是師資問題。關於師資問題，我們過去曾經辦過幾次短期訓練班。我們並沒有固定的校址或教室，訓練班都是在游擊戰爭的環境裡開辦起來的。部隊走到那裡，我們的訓練班就跟到那裡。今年我們才創辦了一所列寧師範學校。」

接著他說：

「關於課本問題，希望蔡同志和施同志到了教育部之後，我們再作具體的討論好了。」徐老笑瞇瞇地說著，門牙掉得差不多了，講起話來，口沫橫飛，他也不在乎。他的精神好，幹勁足。當徐老知道了我和施老先生在政府區教過書，他更樂得什麼似的。項英已徵求我們的同意，就決定我暫時在中央教育部工作。

我們告辭了項英，就和徐老到「中央人民教育委員會」，作進一步的談話。

承劉凱陪同，我們（我、施至善、劉月蟾、施月英）會晤了工農檢察部長阿叔衡和司法部副部長梁柏台、《紅色中華》總編輯王觀瀾和他的愛人（妻子）李伯釗。何叔衡四十七、八歲，留著短鬚鬚，臉上已有皺紋，但身體還很強健。他是湖南人，曾於一九二一年和毛澤東一起參加過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人民委員中資格最老的一個。梁柏台，三十多歲，身體很結實，他是一個留俄學生。王觀瀾，江蘇人，二十七、八歲，李伯釗，四川人，二十歲左右，王、李是留俄學生，李伯釗更是蘇區唯一的留俄女學生，擅演劇、跳舞，有「蘇維埃明星」之稱。王、李和我們都是同一類型的知識份子，所以彼此還談得來。在以後的一段

日子裡，我和他們接觸得比較多，彼此的了解也較深。

二 瑞金城的爭奪戰

我和劉凱、王觀瀾已經成為很要好的朋友了。我們住的地方靠近「臨時中央政府」大辦公廳，我常來和他們談話。劉凱擔任「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總務廳長，他掌握著不少有關中央蘇區的具體統計資料；王觀瀾也因報社的關係，掌握著不少有關紅軍的歷史資料。以下便是王觀瀾對我所談有關瑞金城爭奪戰的經過：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包括紅四軍軍部、特務營、獨立營和二十八團、三十一團），向贛南、閩西流竄。

紅四軍挺進部隊經大汾、左安、營前之線抵達大庾附近與江西國軍二十一旅李文彬部遭遇，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在這次戰鬥中「紅四軍」損失重大，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負重傷（後死），獨立營營長張渭，二十八團特務連連長鄭特等陣亡。

紅四軍殘部在大庾附近吃敗仗以後，就竄入了三南（龍南、虔南、定南）地區，幾乎每天都要走八、九十里，甚至百人以上。當他們抵達吉潭時，又受到江西國軍劉士毅部的襲擊，紅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的一部曾經陷入國軍包圍中，損失嚴重。殘部再經尋鄔，抵達安遠縣城附近。時有安遠縣境之土共魏善成、杜偏奎，糾合附近農民組織暴動隊，襲擊城內民團，並佔領了安遠城，給了死裡逃生的紅四軍殘部以喘息機會。

此後，紅四軍殘部經閩贛邊境山區抵達閩西武平縣東流後，又折向江西會昌、瑞金縣境

內行動。經瑞金縣屬之武陽圍抵達瑞金城北約二十里之黃柏墟、隘前一帶，他們在這裡休息了一天。此時江西國軍劉士毅部又跟踪追至，紅四軍就在瑞金縣屬的大柏地與劉士毅部發生激烈戰鬥。「紅軍」在這次戰鬥中雖然獲得不少新式武器，但也有些損失。

朱毛在大柏地倖勝後，就乘勝進佔寧都縣城，擊潰當地民團賴士璜部。他們在寧都城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經黃陂向吉安縣之東固前進。他們在東固與江西南部土共第二、第四獨立團會合。紅四軍在東固休息了幾天，毛澤東利用部隊休整期間，召集幹部開會，傳達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幾天後，毛澤東復率部經荇田、東韶、廣昌縣城向南折回瑞金縣北之王田市，東向閩西邊境挺進，於三月初，在長汀縣城附近打敗了盤踞長汀的「地頭蛇」郭鳳鳴部，並佔領了汀州城。在短短的半月時間裡，紅軍就在汀州城內外方圓不過五十里的地區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正當毛澤東在長汀地區展開激烈的群眾鬥爭的時候，忽然接到彭德懷從瑞金縣城送來一封「書面報告」。「報告」中說，彭德懷率領之「紅五軍」沿著紅四軍殘部一九二九年早春撤離井岡山後挺進贛南山區的路線流竄，現在已經竄抵瑞金，並已佔領了瑞金縣城。原來，朱德、毛澤東於一九二九年春突圍撤出井岡山的時候，留下了由彭德懷指揮的「紅五軍」繼續在井岡山堅持鬥爭。自朱毛殘部撤離井岡山後，國軍之包圍圈逐漸縮小，幾次大的進剿，幾把陷入重圍的「紅五軍」殘部驅入接近死亡和飢餓的絕境。最後彭德懷才帶領著七百餘名死裡逃生的隊伍，沿著朱德、毛澤東走過的路線來到瑞金地區。彭德懷在這裡獲得朱、毛率領的「紅軍」佔領汀州的消息。便立即派人來和朱、毛聯繫。毛澤東接信後，立即把隊伍拉出汀州城來與彭德懷會晤。

毛、朱、彭在瑞金會晤之後，就在瑞金一連開了三天三夜的會議，討論中共六大大會的決議和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澤東並根據指示，制定了兩項軍事行動計畫：

第一是以瑞金為中心，把這兩個地區和閩西蘇區連結起來造成為「中央蘇維埃」根據地，這個計畫由毛澤東和朱德執行。

第二是彭德懷率領原來隊伍重返井岡山地區，恢復群眾的土地鬥爭，然後再前往湘贛邊境開展游擊戰爭。他們在瑞金地區休息了兩星期，彭德懷便按照瑞金會議的決定開始行動。此時，毛澤東又接到閩西土共頭目鄧子恢的一份書面報告。鄧子恢代表中共閩西特委請求毛澤東再率領「紅四軍」進入閩西發展游擊戰爭。於是朱德和毛澤東又折返汀州，和鄧子恢率領的閩西土共部隊會合。這就是「紅四軍」第二次竄擾閩境。他們在長汀、上杭、永定、龍岩等地橫衝直撞，攻城掠地蠻幹了一個多月。

正當朱毛「紅四」和閩西土共鄧子恢所部在閩西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時候，彭德懷所屬賀國忠部在當地土共配合之下復於五月（一九二九年）自零都竄入瑞金城，焚天主堂、福音堂、萬公祠及各衙署。這是紅軍第二次佔領瑞金城。

不久廣東國軍金漢鼎部把賀國忠部趕走，進駐瑞金城。直至一九三〇年三月，金漢鼎部他調，當地土共鄧希平裹脅附近農民暴動，佔領瑞金城，組織「紅軍」獨立支隊，由藍夏橋任支隊長。同時組織總工會、農民協會等群眾團體。這是「紅軍」第三次佔領瑞金縣城。

同年八月，佔據瑞金之土共部隊在強大國軍進剿下，不支棄城遁去。至一九三一年元月，閩西「紅十二軍」楊之光部復再度攻陷瑞金。這是「紅軍」第四次佔領瑞金城。不久，「紅三十五軍」軍長鄧毅剛率部來到瑞金，忽大舉捕殺瑞金城內共黨總工會及其他群眾組織首領，

這就是所謂「A B團事件」。嗣經朱德率大隊紅軍來鎮壓，捕殺了鄧毅剛等並調其部隊至寧都解散。同年十一月初，中共在瑞金城北郊葉坪召開「中國工農兵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以項英為首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

三 「中央蘇區」的建立

我們初踏進蘇區的時候，求知慾是很強烈的。尤其是我們已經來到蘇維埃「紅都」——瑞金，並且已經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做事，總想多多了解一下所謂「中央蘇區」是怎樣建立起來的。

我們在明白了瑞金城的爭奪戰經過之後，緊接著又訪問了王觀瀾和李伯釗。他們也很樂意對我們談談有關紅軍的歷史和蘇區的情況。他們在蘇區從事新聞工作有年，掌握著豐富的真實資料。下面是王觀瀾、李伯釗對我們說的有關「中央蘇區」建立的具體情況：

這裡所說的「中央蘇區」，實際上只是包括當時（一九三二年）中共「蘇區中央局」所能領導控制的幾個地區，也就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能直接聯繫和指揮的幾個蘇區，它們是：

贛南蘇區：建於一九二九年，主要包括瑞金、會昌、石城、興國、雩都、尋鄔六縣的全部，和廣昌、寧都、信豐、贛州等縣的一部，人口約二百五十萬，縱橫約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紅軍」主力為一、三、五、九軍團。

閩西蘇區：建於一九二八年，主要包括長汀、上杭、寧化三縣的全部，連城、清流兩

縣的大部，和永定、武平、龍岩三縣的一部；「紅軍」主力為「紅十二軍」。

閩浙贛蘇區：建立於一九二八年，主要包括弋陽、橫峰、金溪、資溪、黎川、建寧、泰寧等縣的一部，流動性大，人口及土地無法計算；「紅軍」主力為「紅十軍」。

湘贛地區：建立於一九二八年，主要包括永新、蓮花、吉安、崇義、上猶、萬安等縣的一部，「紅軍」主力為「紅大軍」。

湘鄂贛蘇區：建立於一九二八年，主要包括茶陵、攸縣、瀏陽、平江、通城、萬載、萍鄉、銅鼓、修水等縣的一部；「紅軍」主力為「紅十六軍」。

下面幾個蘇區雖然與「中央蘇區」沒有直接聯繫，但為了明瞭當時中共所控制的全部蘇區概況起見，仍有簡介必要：

鄂豫皖蘇區：主要包括黃安、麻城、羅田、黃陂、黃岡、黃梅、鄂城、固始、潢川、六安、霍山等縣的一部或一小部，「紅軍」主力為「紅四方面軍」。鄂豫皖蘇區「紅軍」，因屢經國軍圍剿掃蕩，損失慘重，乃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分途西竄，於同年十二月下旬竄抵川北，建立另一個蘇區——川陝蘇區。

湘鄂西蘇區：建立於一九二八年，主要包括洪湖區和湘鄂邊區，「紅軍」主力為「紅二軍團」。

左右江蘇區：此區以廣西省之左、右兩江為中心，建立於一九二九年，由張雲逸和鄧小平所領導，「紅軍」主力為「紅七軍」和「紅八軍」。因屢受國軍掃蕩，損失慘重，乃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開始向江西竄擾，一九三三年春竄抵「中央蘇區」與朱毛紅軍會合。

陝北蘇區：建立於一九二八年間，主要包括定安、保安、安塞、延川、延長、清澗、緩

德、榆林、靖邊等縣之一部。「紅軍」主力為「紅廿六軍」。一九三五年以後，成為紅一、二、四方面各股「紅軍」長途流竄後之救命地。

此外還有海陸豐根據地和海南島根據地，先後建立於一九二七年，因地區狹小，領導薄弱，屢經國軍掃蕩，不久即全部覆滅。

以上這些蘇區，都因各佔山頭，實行武裝割據，各自為政，又因各地區土共頭目個性作風不同，路線政策的執行更難統一。上海的「中共中央」有鑑於此，乃於一九三〇年五月，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於上海郊外。那時正值「立三路線」統治時期，會議召開之目的顯然在使「立三路線」貫徹執行。當時毛澤東在贛南、閩西蘇區，在政治上實行右傾保守的富農路線；在軍事上採取所謂「以農村包圍城市」和「誘敵深入」的戰略及偷襲性的游擊主義。這些，同強調「中心城市的武裝總暴動」、「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立三路線」的方針，顯然是背道而馳的。所以上海中共中央一再催促毛澤東離開部隊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會議」，毛澤東卻拒絕出席。這是參加了那次「全國蘇區代表會議」的郭滴人（閩西蘇區代表）對我說的。後來，王觀瀾也曾和我談到這次會議的情況。他說：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各地黨、工會、民衆團體，「紅軍」及各個蘇區代表共四十多人。會議通過「宣言」——「全國的政治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任務」，以及「土地法」、「蘇維埃組織」、「紅軍作戰方針」、「告全國工人書」、「告勞動婦女及青年書」、「援助東方被壓迫民族」等方案。

會後，中共中央根據「全國蘇區代表會議」決議，於同年九月間召集「中國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決定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即「廣州暴動

紀念日」，召開「第一次全蘇大會」，後因時間短促而展期，直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俄革命紀念日，所謂「中華蘇維埃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在瑞金城北葉坪召開。大會除了通過「憲法」、「勞動法」、「土地法」、「婚姻法」、「經濟政策」及「國內少數民族政策」以及「紅軍問題」等重要事項外，還發表了「告全國工農勞苦民衆書」、「致蘇聯政府電」和「致中共中央電」等文件。大會選舉了六十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成立，並定瑞金為「首都」。

四 紅軍學校

施至善先生的兩個女兒——施月英、施月娥和沈乙庚到「紅軍學校」工作已有一星期光景了，月蟾提議去探望他們。

「紅軍學校」一部分在瑞金城內，一部分在南門外。沈乙庚和施月英姐妹在「紅校」當教官，他們就住在城內的校本部。

晚飯後，太陽落山了，我們走出葉坪村，來到瑞金城內。沈乙庚住在「紅校」俱樂部，我們先到俱樂部。經乙庚介紹，我們認識了俱樂部主任趙品三。他是山西人，高高個子，高瘦清癯約二十五、六歲。他不但擅繪畫，而且寫得一手好字。他也擅演話劇，我們到葉坪的第二天，他還帶領「紅校」的劇團到葉坪「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演戲歡迎我們，他打扮一個欺壓農民的「土豪」，演得很成功，以後的日子裡，我們常來看他，不久便成為很要好的

朋友了。趙品三主持「紅校」劇團，基本演員都是「紅校」的學員，但也吸收了一部份駐瑞金機關團體的人員參加，這些兼差的演員多半是從政府區進來的知識份子，例如政治保衛局的胡底，《紅色中華》社的李伯釗，都是「紅校劇團」的重要台柱。由於趙品三熱情肯幹，人緣又好，所以把「紅校俱樂部」搞得有聲有色。

「紅校」各連隊均有一個列寧室，都歸俱樂部領導。各隊列寧室的人員常常因為「牆報」稿件和編排、插圖等問題來俱樂部求援。有時候由俱樂部主持，組織籃球比賽或牆報比賽等活動。沈乙庚、施月英等除了教課之外，也幫忙趙品三搞俱樂部工作。經過趙品三介紹，我們認識了在「紅校」工作的幾位朝鮮人。

武亭，是「紅校」砲兵科主任，配屬在砲兵連主持有關砲兵戰術的教練工作。他曾在馮玉祥部當過砲兵教練。武亭矮矮個子，在兩條又黑又粗的眉毛下，閃爍著一對明亮的眼睛，顯得熱情而英俊，不久以前，我們在漳州曾經見過面的朝鮮青年航空員陳德勤，也在俱樂部重逢了。他對我們敘述了他駕著那架曾經在漳州城上空盤旋的「紅軍飛機」，因方向上的偏差降落在會昌與尋鄔邊境的經過。那是「紅白」交界的地方。領導上認為發生了那種偏差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政治上有問題。於是這個獨一無二的「紅色航空員」被鬥爭之後，就被派在「紅校」當教官。陳德勤還說，那架「倒楣」飛機還躺在「紅白」交界的農田裡，聽說蘇維埃政府正在動員赤衛軍、少年隊，打算把它運到瑞金來。

同一個時期，我們又在「紅校」俱樂部認識了另一位朝鮮人，他名叫崔音波，是一個左傾的音樂家，他的提琴演奏是一流的，他在上海因參加過「左聯」活動，生活發生了問題，就逃到蘇區來了。他在「紅校」擔任音樂教官。崔音波年約二十七、八歲，個子矮而清瘦，

有點駝背，沉著而不苟言笑。除了教課之外，練琴就是他唯一的消遣。他和沈乙庚住在一起，兩人相處得很好。

後來我們常常在晚飯後到「紅校」俱樂部去玩。趙品三熱情地招待我們。經幾次和他談話，我才對「紅軍學校」的一般概況有了初步的印象：

「紅軍學校」隸屬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它的全銜是「中國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創辦於一九三一年，它是培養「紅軍」連、排級基層幹部的綜合性軍事學校。校長兼政委是前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劉伯承把在前線實際作戰中所體驗、所掌握到的戰術特點和實際戰鬥經驗，有條不紊的整理、總結、揉合成為一套與實踐、作戰、訓練相結合的軍事理論，編成教材，灌注給「紅校」學員。那時恰好是「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結束之後，劉伯承不但自己回到後方，而且把一部份曾經參加過三次「反圍剿」戰爭的連、排級幹部抽調回來訓練。這就使得「紅軍學校」的訓練，更臻於切實而有效。

那時「紅軍學校」學生（第二期）有一千五百多名，共分六個連，包括三個步兵連，一個政治連，一個砲兵連，一個工兵連。只有校本部和政治連駐在瑞金城內，其餘各連則駐於瑞金城南郊區。我除了經常到校本部、俱樂部和武亭的砲兵連以外，其他單位都沒有去過。

一九三三年以後，由於上海的中共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中共為了加強「紅軍」建設，提高軍事教育，乃將「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升格為「紅軍大學」，培養師級以上的軍事幹部。原來「紅軍學校」的三個步兵連擴大組成為步兵學校（又稱彭楊軍事學校），由陳賡擔任校長；原「紅校」砲兵連和工兵連則合併組成為特科學校，由砲兵科主任武亭擔任校長；「紅軍大學」不設政治科，而把培養軍中政治工作人員的任務移到新開辦的「中央黨校」去。此

外，一九三三年以後，中共中央軍委在瑞金郊區開辦了一所「通信學校」，專門培養紅軍中的無線電人才，通信學校校長是中共軍事祕碼專家——曾三。

五 列寧師範學校

說也奇怪，當時中共的「中央教育部」，除了代理部長徐特立之外，再沒有其他工作人員。從漳州運回來的大批書籍，竟然一箱一箱原封不動地放置在教育部的屋簷下；更滑稽的是項英和我們談話的第二天，《紅色中華》就發表一條消息，宣稱「中央圖書館」成立，月蟾也就任「館長」的職務，開始緊張的工作了。我和至善先生也以「編審委員」的名義開始上班。沒有幾天，兩位剛從「政府區」進來的知識份子，也分配在「中央教育部」工作。一位叫林思凡，是廣東人；另一位姓關（名字記不清）是東北人。有一天，在徐老主持下，開了一次編審委員會，著重討論「列寧小學」教科書的編輯方針和編審委員會的工作計畫。徐老還拿出他親自編寫的幾冊「列寧小學」課本來給我們看。其中一冊是這樣開始的：「工人、農人，工人做工，農民種田……」等等，再看下去，是一些類似政治口號的東西。例如軍中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也一條一條地在課本中出現了，真是不倫不類。我們建議「課本」不能太偏重「政治」，應該酌量反映一些農村生活的東西，諸如稻田、禾草、犁、水牛、南瓜、白菜等等。於是建議：三分「自然」，七分「政治」。徐老個人雖然同意我們的建議，但又聲言這一基本方針的修改，必須經過「人民委員會」討論通過和批准。「中央圖書館」也有些政府區小學課本，我們認為有些內容是可以採納，全部否定是不對的。這個

問題成了多數編委同代部長徐老之間爭論的焦點。徐老曾在巴黎留學，吸收過現代科學知識，他又在蘇聯考察過國民教育。所以當時的情況常常是這樣：編委會的意見徐老都同意，但他不敢做主。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拿到有「工人宰相」之稱的項英那邊去就通不過了。

「中央教育部」為了培養「列寧小學」師資，還辦了一所「列寧師範學校」。後來我建議，把編委會的辦公室騰出來給「中央圖書館」，編委會的工作移到「列寧師範學校」去。這樣編委的同仁就可以去接觸到實際，多多了解「蘇區」教育狀況。課本是通過教員去講授的，編者應該多聽聽實際擔任教學的老師的意見。我的建議被採納了。

「列寧師範學校」設在葉坪以北三里路的洋溪。從葉坪村到洋溪要過一條河——綿江，水淺時把褲管捲高就可涉水而過；水漲時就要繞道，先走進瑞金城，過一條細長的河背街，再走一里路就到了。洋溪有一片古杉、樟樹，整個洋溪村七八十戶農家就好像沉沒在濃綠的叢林裡。這裡也有幾所大祠堂，其中有一所「劉家祠」，便做了「列寧師範學校」的校本部和大教室。此外還有幾個小教室，一個俱樂部，學生宿舍和教職員宿舍都分散在附近的祠堂寺廟裡。「列寧師範學校」已經辦過一期，我們到校時，第二期剛開學不久。

我們幾個編委果然兼了差——擔任起「中央蘇區」最高學府——「列寧師範學校」的教授了。後來「紅色教授聯合會」成立，我們也就成為名副其實的「紅色教授」了。

「列寧師範」有二百多學生，大部份是高小畢業生，其中有四十多個女生。學生年齡自十五六歲的年輕小伙子到三十多歲的中年人。學生穿的都是老百姓衣服，五花十色。後來，由於學生要求，「蘇維埃政府」才發給一套藍灰色的工人服。

「列師」按照學生的學歷，共分為三班：高小班、初小班和女子班。女子班學生有的根

本沒有讀過書，她們只是在工作中或在「少先隊」習得百把幾十個字。學生的「階級成分」卻是非常的複雜。就當時「蘇區」一般情形而言，文化程度好一點的，「階級成分」就有問題。在「革命鬥爭」中表現好的青少年差不多都被動員參加「紅軍」去了，而「階級成分」有問題的，就留在後方當「列寧小學」的教員。在戰爭環境裡，「蘇區」的流動性變化很大，常常是昨天還是「紅區」，今天就變成「白區」了。自我們到了「列師」任教以後，曾發生幾次學生逃跑事件，其中有的是因為「階級成分」有問題，當地「蘇維埃政府」把他們送到「中央」來學習，他們害怕被「鬥爭」而逃走了。有的則是因吃不消苦而逃掉了。

不久，「列師」來了四位女教員，其中三位是剛從「政府區」進來的，一位來自「湘贛蘇區」的，名叫李華英，二十七、八歲，擔任過縣委書記，能力很強。剛從「政府區」進來的三位女教員，都很年輕，一位叫石聯星，十八、九歲，擅長演劇、歌舞，後來成了「蘇維埃明星」，她是湖南人。還有一位姓林（名字記不清了），是漢口人，十七、八歲。另一位姓彭（名字記不清了），十六、七歲，她們都是高中畢業生。

「臨時中央政府」為了特別照顧剛從「政府區」來的知識份子，對於我們這批「紅色教授」，每月加發兩元「蘇幣」（蘇維埃紙幣之簡稱）以示優待。按照當時瑞金物價，一元「蘇幣」只能買到二十個雞蛋。「列寧師範」學生和教員每人每天發菜金（包括油鹽）一角二分，大米一斤四兩。一九三三年之後「蘇維埃政府」號召節約，糧食減為一斤，有時候僅發十四五兩。一般「蘇維埃」工作人員都實行吃兩餐。「列師」也因為米不夠吃，常常鬧搶飯吃的「風波」。有一個時期，校長徐老索性下令吃稀飯。所以後來竟鬧出所謂「稀飯學校」（按係「師範學校」之諧音）的笑話來。

伍、蘇區的反帝運動

一 蘇區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至善先生、沈乙庚和我在劉凱陪同下，出席了「蘇區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是在瑞金城內一所破舊的祠堂裡舉行的。會場佈置得五光十色。除了一般性的政治標語之外，還有各色各樣的牆報和漫畫。到會代表三百多人，除了各地區反帝同盟代表之外，還有紅軍代表、朝鮮代表和台灣代表。這個大會是在中共蘇區中央局直接領導之下召開的。「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少先隊蘇區總隊部」、「革命互濟會蘇區總會」等群眾團體負責人都出席了。「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主任陳壽昌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宣佈開幕，並向大會推舉史大林、莫洛托夫、季米托洛夫（共產國際頭目）、特爾曼（德共首領）、片山潛（日共首領）、高爾基、巴比塞（法國著名文學家）、羅曼羅蘭（法國著名文學家）、泰戈爾（印度詩人）、毛澤東、周恩來、項英等為大會名譽主席團。

同時又推舉顧作霖、鄧穎超、陳壽昌、王盛榮、張愛萍、張華（「紅校反帝同盟」主任）、武亭、施紅光（施至善化名）和筆者等二十五人為大會主席團。

這次大會有三個重要議程：（一）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作關於「目前國際形勢和蘇區反帝運動的任務」的報告，（二）討論並通過「反帝鬥爭綱領」，（三）選舉「蘇區反帝總同盟」領導機構——執行委員。

總括起來說，中共召開這個大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蘇區掀起反帝運動的高潮，動員蘇區群眾參加紅軍作戰。「中央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項英代表「臨時中央政府」在大會上致祝詞。接著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以「目前國際形勢與蘇區反帝運動的任務」為題發表「講話」。周恩來的「講話」，集中地強調了兩點：

第一，自從日本帝國主義出兵佔領東三省與進攻上海以後，英、法、美等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公開地、直接地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行動是日益急進了；目前世界政治形勢的特點，表現為兩種政權和兩個經濟體制的對立：一方面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突飛猛進；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走向窮途末路。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矛盾尖銳的發展，形成為目前國際形勢的特點。

第二，蘇區的土地革命與反帝運動必須密切結合起來。國際帝國主義是中國封建勢力、軍閥統治的後台老闆，而封建勢力和軍閥統治則是國際帝國主義在華統治的支柱。國際帝國主義者，在農村通過地主和高利貸者，實行對廣大農民的殘酷掠奪和封建剝削，所以農村經濟的命脈，也就操縱在帝國主義列強手中，進一步加速了廣大農民的貧窮化。在這樣情況下，為了要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在農村的統治，消滅封建剝削，就必須徹底沒收豪紳地主的一切土

地，徹底消滅地主階級，堅決反對富農。

周恩來這篇「講話」，只不過是當時共產國際「關於在中國推進反帝運動」的詮釋；和「反帝運動與土地革命相結合」問題的「指示」之說明而已。

周恩來的「政治報告」（講話）之後，接著由江西、福建、粵贛、閩浙贛、湘贛等省級同盟主任做「工作報告」。根據各省盟代表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反映，「蘇區反帝總同盟」當時（一九三二年六月）擁有五個省盟（即省級反帝同盟），它們是江西省盟、福建省盟、粵贛省盟、閩浙贛省盟、湘贛省盟。盟員總數達六百萬人，其中包括紅軍盟員三十萬人。

第二天上午，大會對於「蘇區反帝鬥爭綱領」（由上海中共中央提出）進行討論。下午，大會選舉鄧穎超（中共蘇區中央局）、顧作霖（少共蘇區中央局）、陳壽昌（全總蘇區執行局）、王盛榮（少先隊蘇區總隊部）、張愛萍（少先隊蘇區總隊部）、彭子星（革命互濟會蘇區總會）、王觀瀾（紅色中華報）、張華（紅校反帝同盟主任）、武亭（朝鮮人）、施紅光（施至善化名）和筆者以及各省級反帝同盟主任等共三十五人為執行委員。最後，大會通過「大會宣言」、「蘇區反帝同盟章程草案」及各種文電之後，宣告閉幕。

第三天，蘇區反帝總同盟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筆者（蔡乾）為總同盟主任；張華為總同盟組織部長；張愛萍為總同盟宣傳部長。執委會選對「蘇區反帝鬥爭綱領」的條文進行討論，並決定由總同盟領導機構負責編印「蘇區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特刊」，將大會開會經過，大會宣言、「蘇區反帝鬥爭綱領」及「蘇區反帝同盟章程」等文獻載入「特刊」內。

二 反帝運動與土地革命

就當時蘇區內外情勢和各種因素觀察，要使蘇區廣大民衆和紅軍士兵都能了解蘇區反帝運動與土地革命的相互關係，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也坦率承認，不僅蘇區一般民衆，就是參加這次大會的代表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也是非常模糊的，事實確是如此。因為蘇區民衆與沿海地區或中心城市的民衆不同，他們看不到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開設的銀行、礦山或其他企業，看不到外國兵艦和輪船等等，他們在蘇區所能看到的，僅僅是一些高大富麗的禮拜堂，高鼻子藍眼睛的神父和牧師。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宣傳，硬要說他們是帝國主義者，這種宣傳，不但模糊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內容，而且越發弄不清楚蘇區反帝運動的意義和作用。當我初踏進蘇區的時候，看到貼在牆上的漫畫也好，看到紅軍戰士在街頭表演的化裝宣傳也好，都是千篇一律：一個穿西裝、戴高帽子的人，高帽子上面寫著「帝國主義者」五個字。這個「帝國主義者」牽著一個穿著長袍馬褂，戴著紅頂碗帽的「豪紳地主」。當時我很懷疑這種宣傳技巧能夠發生什麼作用？

在蘇區，土豪地主已經徹底被打倒了，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宣傳八股」，仍然說他們是帝國主義在農村的「代理人」，硬要說帝國主義是通過土豪地主來剝削農民。顯然這種宣傳完全變成了形式主義，變成了「教條」，因此要使蘇區民衆和紅軍士兵能夠從他們的體驗中認清反帝運動與土改革命的相互關係，確是一件頗費周章的事。

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在宣傳工作上發生這種困難，顯然是因為當時他們所奉為金科玉律的「國際路線」——他們的綱領和政策有偏差。這也就是說：當時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在宣傳

工作上未能獲得預期的效果，乃是因為當時中共的綱領和政策有錯誤。

周恩來向大會提出的「反帝鬥爭綱領」中，還有這樣的一條：

「沒收帝國主義在華銀行、工廠、礦山、交通及其他企業；並把這些銀行、工廠、礦山、交通及其他企業都一概歸蘇維埃『國有』。」

當時中共這種宣傳，只能給蘇區民衆以這樣的印象：中共是在「說大話」。

事實的真相是這樣：中共向大會提出的這個「反帝鬥爭綱領」是根據莫斯科的「國際路線」擬訂的。是左傾冒險路線「集中全力總攻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狂妄政策的產物。中共蘇區中央局竟然把那個根據「國際路線」制定的「反帝鬥爭綱領」接受過來，強加於蘇區的民衆。這不僅暴露了中共充當莫斯科附庸的真面目，而且表現其所遵循者乃是一種典型的教條主義。

總括起來說，當時中共蘇區中央局遵循莫斯科的「國際路線」，將只能適用於沿海地區和中心城市的「反帝鬥爭綱領」硬搬到經濟落後的蘇維埃區域來執行運用，希望在蘇區掀起大規模的反帝運動高潮，這不就是一種全不足恃的海市蜃樓嗎？

我在主持「蘇區反帝總同盟」工作的兩年零四個月的經驗，完全證實了這點。下面我想把這一工作過程回憶一下，作為印證。我主持蘇區反帝總同盟工作，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一九三二年六月「蘇區反帝總同盟」成立，迄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蘇區為止；

第二階段：自一九三三年春中共中央遷入江西，迄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主力西竄為止。

第一階段的工作，只有半年光景，主要是整頓各級反帝同盟，建立經常性的會議制度。福建蘇區（閩西蘇區改稱）的工作，除了上杭和寧化兩縣稍有基礎外，其他各縣反帝同盟工作都很差。江西蘇區的反帝同盟工作，除了瑞金、興國、寧都三縣稍有基礎外，其餘各縣也很差。在這個時期中，我和張榮、張欣分別到過長汀、寧化、上杭等縣去巡視，了解基層反帝同盟工作情況，並參加了在汀州召開的福建省反帝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

第二階段的工作，由於上海的中共中央遷入江西蘇區，各個戰線、各個方面的工作都有所加強，反帝運動也不例外。這個階段工作的特點是加強宣傳，密切配合「擴紅」（擴大紅軍）和「查田」（檢查分田）運動，響應「世界反帝大同盟」執行委員會的號召，展開反戰（反對法西斯主義戰爭）擁蘇（擁護蘇聯）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間，在瑞金郊外召開了《蘇區禦侮救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重要的講話。為了加強宣傳，反帝總同盟還出版了《蘇區反帝畫報》（半月刊），並舉行了一次頗為新穎的「牆報展覽會」。

總而言之，在兩年四個月之中，「反帝總同盟」雖然竭盡全力，做了不少工作，但其實際效果卻是非常有限的。究其原因，乃在於反帝宣傳與當時蘇區的現實脫節，「反帝鬥爭綱領」不適合於當時經濟落後的蘇區，以及宣傳方式未能脫離形式主義的窠臼。

三 毛澤潭這個人

我在主持「蘇區反帝總同盟」工作的兩年四個月之中，先後調到總同盟來與我共事者，為數達十人以上，其中包括毛澤東的三弟毛澤潭（曾任中共江西省委會委員），曾任少共蘇

區中央局組織部長的胡耀邦，曾駕機飛臨漳州城上空盤旋的紅色航空員陳德勤（朝鮮人），曾任中共龍岩縣區級幹部的張榮，剛從政府區進入蘇區的知識分子任質彬、張欣、何覺生等，此外還有從興國縣盟提拔上來的青年幹部鍾加昆，從瑞金縣盟提拔上來的女青年幹部楊秀珍等。這些從各個地區各部門調到總同盟來與我共事的人，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犯了某種「錯誤」被鬥之後，暫時分配到這裏來做群眾工作，使其在實際工作中檢討自己，如毛澤潭、陳德勤、何覺生等是；另一類是剛從政府區潛入的知識分子，先分配他們到總同盟來，使其在群眾鬥爭中取得工作經驗，如張欣、任質彬等是。還有一類是從基層組織提拔上來的青年幹部，使其在領導機構中受到鍛鍊，以培養其領導能力。

在這些人員中，給我印象最深者是毛澤潭。

毛澤潭，當時約二十七、八歲，個子高，清瘦，面有菜色，突出的額骨和深凹的眼睛，顯得更瘦削。他是毛澤東的三弟（毛澤東的二弟是毛澤民。曾擔任過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國民經濟部長等職，一九四二年在新疆被盛世才槍殺）。

毛澤潭是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中央遷入江西蘇區後不久，以秦邦憲為首的國際派清算「羅明路線」時，被指控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執行者」而被整肅的。

所謂「羅明路線」，就是一九三三年二月間，國際派指控當時擔任中共福建省委代書記羅明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國際派指責羅明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悲觀和失望的，說他在敵人大舉進攻的面前，表示了驚慌失措，退卻逃跑的情緒。那時被指控為「羅明路線」而遭清算的，在閩西蘇區，除了羅明之外，還有中共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和中共建寧縣委書記余澤鴻；在江西蘇區便是

號稱毛澤東在江西的「四大金剛」的鄧小平（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古柏（中共江西省委）、毛澤潭（中共江西省委）和謝維峻（江西省委）。國際派指控他們在江西省委內形成「小組織」，進行派系活動。其實，當時國際派要打擊的主要對象卻是被視為「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毛澤東。閩西的羅、楊、余，和江西的鄧、古、毛、謝等，不過是代罪的羔羊罷了。

先是一九三二年八月間，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集了一次重要會議，曾指責毛澤東犯了「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控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提出「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以及「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是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同時又指責毛澤東在戰略上採取「以農村包圍城市」和「誘敵深入」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和逃跑路線。由此說明，一九三三年初，國際派清算「羅明路線」，實質上是清算毛澤東路線的繼續和發展。

毛澤潭，熱情、坦率，在「反帝總同盟」和我共事雖然只有半年光景，但我們之間已建立了友誼。他和我及胡耀邦三人，常常談到深夜。當他談到他在中共江西省委被指控為「羅明路線」的執行者時，總是痛哭流涕，憤恨不已。他的身體本來很衰弱，加上政治上受打擊，情緒激動，說話毫無顧忌。有時，毛澤東的年輕漂亮的妻子賀子貞差遣她的妹子賀懿（毛澤潭的妻子）送些炒辣椒或雞蛋來給毛澤潭，以示關懷。毛澤潭總是把賀懿送來的東西拿來公開，我和胡耀邦也分享了一次「豐盛」的牙祭。賀懿那時約二十一、二歲，雖沒有姐姐賀子貞那樣嬌媚，但也嬌小玲瓏，活潑可愛。因她長期在農村工作，皮膚晒得黝黑，卻具有樸素雅淡的村姑娘的氣質。每次送吃的東西來時，賀懿總要邀她的丈夫到郊外河邊去散步，安慰

安慰他，並把大哥大嫂的近況轉告他。

毛澤潭是一個風流倜儻的人物，閒時總是找胡耀邦下象棋，或者看看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他最喜愛的讀物。毛澤潭給我最深的一個印象是，他不但在文學修養上受到乃兄的影響很深，而且在鬥爭策略上也繼承毛澤東諸葛亮式的「錦囊妙計」的衣鉢。在談話中，他常誇耀他在打土豪和游擊戰爭行動中，常常把《三國演義》中許多「錦囊妙計」應用到實際工作中去。

這個風流瀟灑，被譏為「三國志熱」的毛澤潭，雖然是一個愛說笑話，樂天派的人物，但做起事來卻是滿認真踏實的。他在「蘇區反帝總同盟」擔任宣傳部長，到任不久，迅即出版了一張十六開的《反帝畫報》（總同盟機關報），舉辦了一次別致的「反帝牆報」展覽會。一九三三年七月間由「蘇區反帝總同盟」主持的「蘇區禦侮救國代表會議」開會期間，他夜以繼日地工作，毫無倦態。

也許由於同病相憐的緣故，毛澤潭對於因駕機失敗而受到「最後嚴重警告」（按係黨內處分）的朝鮮青年航空員陳德勤很表同情，當中共反帝總同盟支部討論陳德勤問題的時候，他總是仗義執言，認為中共蘇區中央局沒有了解事實真相，沒有弄清楚陳德勤駕機失敗的客觀原因所在，而是主觀地斷定陳德勤由於政治上動搖，企圖駕機投降國民黨，其唯一的證據是飛機墜落的地點是在「紅白交界」的農田裡。關於陳德勤問題，紅軍學校政治部已經做了結論，這個結論且曾經中共蘇區中央局批准。中共反帝總同盟支部只能依照中央局的結論進行討論和鬥爭。毛澤潭曾帶著陳德勤去見乃兄毛澤東，陳德勤也把墜機經過詳細報告毛澤東，但毛澤東卻說他無權過問此事，叫陳德勤直接到中共中央去申訴。

由於中共蘇區中央局對陳德勤問題處理不當，不但引起在蘇區的朝鮮人和台灣人不滿，而且也引起了一部分中共幹部的不滿。直至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紅軍突圍西竄為止，陳德勤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陳德勤也就因此被留在江西蘇區。自此以後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仍沒有他的消息。

毛澤潭的處境也與陳德勤差不多，紅軍突圍時，他留在「中央蘇區」打游擊，跟陳毅一起行動。一九三五年春，「中央蘇區」全部被國軍攻克時，毛澤潭由贛南地區潛入閩西地區，與張鼎丞、鄧子恢一起行動。一九三五年夏，閩西軍區所屬兩個主力團——紅十九團和紅二十團在長汀縣屬四都被國軍消滅，閩西蘇區全部瓦解後，毛澤潭和羅化成等極少數幹部逃到閩粵邊的深山中藏匿起來，以後再沒有他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三年我在延安會到賀懿的時候，據她告訴我，毛澤潭是一九三五年秋在閩粵邊山區一次慘烈的戰鬥中「犧牲」了。不過當賀懿告訴我毛澤潭的消息的時候，她已經不是毛家的媳婦，而是另一位中共高級幹部的老婆了。緣因毛澤潭死後，賀懿不久也和一位中共高級幹部涂振農結婚。抗日戰爭初期，賀懿的第二任丈夫被派到中共南方局工作，賀懿則留在延安。

四 「禦侮救國代表會議」

正當國軍對江西紅軍的第五次圍剿進入最猛烈階段的時候，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初在瑞金郊外沙洲壩召開了「蘇區禦侮救國代表會議」。這個會議由「蘇區反帝總同盟」主持，出席代表二百多人，都是由各地反帝同盟選舉出來的。這個會議是在「國際反帝非戰同

「盟」中國分盟（設於上海）號召之下召開的。「蘇區反帝總同盟」根據「國際反帝非戰同盟」中國分盟的指示，在二個月前就著手籌備。

一年以來，總同盟（「蘇區反帝總同盟」之簡稱，下同）在黨、團和各群眾團體支持和配合之下，才把「反帝運動與土地革命」相結合問題的宣傳工作做得有點頭緒，蘇區民衆也開始有了認識。現在又要在蘇區民衆面前提出所謂「禦侮救國」的任務。宣傳「禦侮救國」的意義，就當時蘇區民衆的政治意識水平看起來，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什麼是「禦侮救國」呢？要了解它的意義，必須回到同年（一九三三年）三月初在上海成立的「國民禦侮自救委員會」，它是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掛起「禦侮自救」招牌，發動廣泛的反帝國主義鬥爭，推進中國赤化運動的工具。同年三月八日，在共產國際東方部策動之下，集合「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反日非戰大同盟」、「新文化運動同盟」、「中國女權運動同盟」等中共外圍團體代表四十多名，在上海四川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召開「國民禦侮自救代表會議」，正式成立「國民禦侮自救委員會」，作為中共推進反對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政治動員的工具。

「蘇區禦侮救國代表會議」開幕那天，好久未曾公開露面的毛澤東，竟然在特務員的帶引下出現於會場。他穿著一套灰褐色的紅軍服，腳著布草鞋，沒有裹綁帶。他肩佝背駝，頭髮蓬亂，臉上一片菜色。他在大會做了約一小時的「政治報告」。下面就是他「政治報告」的大意：

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了我們的東三省，現在又進攻熱河，威脅平津。日本帝

國主義這樣欺侮我們，我們一定要抵抗，這就叫做「禦侮」。中國只有抵抗日本，才能得救！

我們主張「國難」應由我們老百姓自己來救。當然我們自己要有充分的準備。爭取外援是必要的。假使我們自己不爭氣，完全依賴外國，例如要請什麼「李頓調查團」來調查啦，要請出「國聯」來「調解」啦，這些都是空話，都是帝國主義列強和中國反動派勾結，來敷衍我們老百姓的把戲。中國千百萬民眾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道理很簡單，只要把富有愛國精神的全國千百萬群眾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開到前線去和日本軍閥打仗，不就行了嗎？

我們「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老早就提出要求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和紅軍，與紅軍攜手共同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區的勞苦工農群眾，都要擁護蘇維埃中央政府對日宣戰通電和訂立抗日作戰協定的主張。

若將毛澤東這篇通俗而富煽動性的演詞，與一年前周恩來在「蘇區反帝總同盟」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對照起來看，不難看出，中共這時在宣傳策略上有一個很重大的轉變。周恩來的演詞，對外方面強調反帝擁蘇；對內方面卻強調反帝與土地革命相結合，強調猛烈擴大「革命戰爭」，易言之，強調「堅決地打」。而毛澤東的演詞，對外方面，強調「反帝、非戰」，而在對內方面卻強調要求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和紅軍，強調所謂「停戰」「議和」。顯然這是一種更陰毒的宣傳攻勢。

為什麼會有這樣重大的改變呢？說穿來，這是一年以來在戰爭態勢上越來越不利於蘇區

和紅軍的緣故。一年以前，國軍第四次圍剿剛開始，當時中共紅軍氣燄很高。一年以後，國軍的第五次圍剿進入了最猛烈的階段，鄂豫皖蘇區的紅軍——張國燾、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軍，在強大國軍的追剿下做了戰略的大退卻，流竄到了川陝邊境，苟延殘喘。同時由於中共實行「中心城市暴動」政策的結果，遂使「白區工作」全部瓦解，中共中央不得不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特別是國軍第五次圍剿採取碉堡政策和「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戰略方針，更給紅軍以致命的打擊，使蘇區日益縮小。由於國軍飛機加強對蘇區和紅軍的轟炸，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不得不由瑞金郊外的葉坪村搬到沙洲壩村。所有這些軍事上不利因素，逼使中共中央深深地意識到用單純的軍事力量絕不可能突破國軍的第五次圍剿，而必須在門爭策略上採取強大的政治攻勢。特別透過共產國際的關係，利用國際上馳名的左翼文學家和科學家，組織國際反帝、非戰同盟，進行赤化活動。同時在國內方面利用左翼文化人和知名人士組織「禦侮自救委員會」，搖旗吶喊，為蘇區和紅軍解圍，為中共的武裝叛亂助陣。

陸、查田運動

一 查田運動的由來和經過

一九三三年春，以博古（秦邦憲化名）為首的國際派由上海潛入江西蘇區後，鑑於以前江西蘇區對於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是不徹底的，甚而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乃於一九三三年六月發動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規模的查田運動。

中共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發動查田運動？它的背景如何？這必須從當時整個蘇區情勢說起。

當時的鄂豫皖蘇區，因徐向前、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之撤離而瓦解；賀龍的紅二軍團所盤據的洪湖湘鄂西蘇區，亦大部份已經崩潰；在政府區，尤其是上海武漢等中心城市，中共的組織和工作都受到殲滅性的破壞。中共中央已於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上海遷入江西的「中央蘇區」。遷入之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開展反富農路線的鬥爭，而其具體措施就是「查田運

動」。

中共蘇區中央局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的發出「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中指出：在蘇維埃運動的最初階段，由於雇農、貧農的組織性與覺悟程度不足，以及黨和蘇維埃政府過去對於農民土地問題採取了富農路線——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等，因此，在許多區域中，土地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在這種情形之下，查田運動成為發動農民群眾，展開農村階級鬥爭，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與肅清封建、半封建勢力的主要一著棋。

接著同年六月二十日毛澤東以「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名義發出「第十一號訓令」——即「實行廣泛深入的查田運動」，規定了進行查田運動的具體步驟，其中包括：召開瑞金、會昌、博生（寧都）、雩都、勝利、石城、寧化、長汀等八縣的查田運動大會和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查田運動也就全面深入地發動起來了。

中共蘇區中央局六月二日發佈的「關於查田運動的決議」中，提出了查田運動的鬥爭策略的三項原則：

（一）依靠雇農及貧農，與中農結成鞏固的聯盟，並使雇農（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在查田運動中起先鋒隊的領導作用；

（二）必須在查田運動中，清除一切混進黨內與蘇維埃機關中的地主、富農的暗探；

（三）查田運動要密切聯繫到黨和蘇維埃工作的全部改造，首先是加強肅反鬥爭。

概括起來說，查田運動是以博古為首的國際派進入江西蘇區後所採取的反「富農路線」的尖銳鬥爭，同時又是改造地方蘇維埃，加強肅反鬥爭的有力步驟。

江西蘇區的查田運動自一九三三年六月全面展開以後，到八、九月間達到最高潮階段。

可是，三個月查田運動的結果，又犯了许多錯誤和缺點。因此，中共中央復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通過了「中央關於查田運動的第二次決議」，決議中稱：

中央檢查了各縣查田運動，認為還有幾個重要的錯誤和缺點，表現在：一、許多邊區和落後區，查田運動沒有開展；二、侵犯中農利益的傾向到處發生；三、許多地方沒收的土地、穀子、房屋，沒有迅速分給群眾；四、查田運動中普遍發生了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

中共中央頒發「關於查田運動的第二次決議」之目的，在於所謂「糾正侵犯中農利益和對富農過火的政策」，但又鄭重聲明：「決不是對地主、富農的讓步。」毛澤東是一個倔強好勝的人，他不能讓態勢的發展影響到他的「威信」，於是經數次與佔有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的國際派折衝之後，便草擬了「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一文，並予以公佈。但這個文件頒佈的後果，卻是為地主、富農的翻案、反攻大開方便之門，卻是一件頗為有趣的事情。

總而言之，江西蘇區的查田運動，一九三三年八、九兩月達到最高潮，可是從十月開始，由於國軍對江西蘇區和紅軍展開了第五次圍剿，採取了新的戰略戰術，給紅軍和蘇區以毀滅性打擊。同時也因為許多地主、富農紛紛起來翻案、反攻，因而迄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隨著紅軍主力的突圍西竄，查田運動也就「壽終正寢」了。

二 王觀瀾這個人

當時，我為了深入了解這場殘酷、恐怖的「查田運動」，特地會晤了曾經參與其事的王觀瀾。

在這裡，我要順便敘述當時王觀瀾為什麼被調離《紅色中華報》去參加這場殘酷的鬥爭。這事牽涉到王觀瀾個人的一段饒有趣味的羅曼史，實際上又是一樁有關蘇區男女關係的醜聞。

一九三二年秋，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動了一場所謂「反托派」（反托洛斯基派之簡稱）鬥爭時，王觀瀾被指控為「有重大托派嫌疑的人」，而被免除《紅色中華》主筆職務。之後，他被「下放」到葉坪鄉指導查田運動。後來我才明白，原來王觀瀾的愛人（妻子）李伯釗原本是楊尚昆（國際派悍將之一）的妻子，他們是留俄時在莫斯科結婚的。李伯釗於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由莫斯科返國，楊尚昆則留在莫斯科。李伯釗由上海潛入江西蘇區不久，即愛上了王觀瀾，並與之同居。一九三二年冬李伯釗的前夫楊尚昆從莫斯科返國，他和李伯釗走同一路線，由上海潛入江西蘇區，那時恰好王觀瀾因被指控為「托派」而遭受無情的鬥爭。李伯釗雖未受株連，卻被指責為「小資產階級温情主義」而陷於萬分恐怖之中。一九三四年暮春，一個月色朦朧的晚上，我到瑞金郊外的洋溪去看望王觀瀾。那時李伯釗已離開了他。王觀瀾把他參加葉坪鄉查田運動的經過情形詳盡地對我述說。

正因為葉坪鄉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共中央特別派了一位得力幹部去指導該鄉的查田運動。葉坪鄉的查田運動，在王觀瀾耐心切實指導下，搞得有聲有色。王觀瀾並曾把葉坪鄉查田運動的經驗總結起來，寫成文章刊登在《紅色中華》報和《鬥爭》報上，中共

中央也把葉坪鄉的經驗當做典型加以渲染。下面就是王觀瀾所談葉坪鄉查田鬥爭的實況：

葉坪鄉，是瑞金縣雲集區的第四鄉，劃分為葉坪、洋溪兩個行政村，共有十多個自然村，有兩千七百多人口。它是中共的軍事、政治的中樞「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局」的所在地。這個地區過去「紅」「白」反覆了好幾次，從一九三一年夏，紅軍突破了國軍的第三次圍剿以後，即成為中共軍事政治的中心。

當王觀瀾「下放」到葉坪鄉當查田運動指導員的時候，葉坪鄉蘇（鄉蘇維埃政府之簡稱，下同）只有三個幹部：即鄉蘇主席朱先祺、鄉蘇祕書兼鄉支部書記劉守富和俱樂部主任（姓鍾）。由於鄉幹部能力差，幹勁不足，這個鄉的分田工作就沒有搞好，給那些逃跑了的地主還留著田，有些過去的地主豪紳還鑽進蘇維埃、貧農團或黨組織去，搖身一變也成了「貧苦工農」。總說一句，這個鄉的封建、半封建勢力還沒有徹底打倒，反動派放「謠言」，民心動搖，幹部有顧慮，「深怕國民黨回來」。這些事情發生在「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的葉坪鄉，不啻是一件莫大的諷刺。從這一點看，當時我和王觀瀾拿葉坪鄉的「查田運動」作為一個典型例子來談，自有其不尋常的意義。

王觀瀾在葉坪鄉召開了鄉代表會議、貧農團會議、黨支部會議等一連串的會議，把葉坪鄉的基本情況初步了解之後，便很快地向毛澤東報告。蓋葉坪鄉的「查田運動」，實際上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王是毛直接派去指導葉坪鄉的查田運動。王觀瀾既興奮，又神祕地對我說：

「有一天夜晚，我到毛主席的住處匯報葉坪鄉查田運動的概況。毛主席靜靜地聽著，有時插上兩句話，有時點點頭。匯報結束時，毛主席說：『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當我和

毛主席到鄉蘇時，就看見屋裏微弱的燈光下，貧農團正在開會。」王觀瀾繼續說：

「聽起來爭論得很熱烈。毛主席說：『這就好，總算把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是鬥爭勝利的保證。』為了不打擾他們，我和毛主席站在屋外聽了一會兒就走了。」

王觀瀾繼續說：

葉坪鄉在這次查田運動中，共查出了二十八家地主、富農，經過廣大群眾鬥爭之後，混入黨支部和鄉蘇政府的「反革命」都查出來了。那個姓鍾的俱樂部主任原來是個地主，見勢不妙，也就偷偷逃跑了。

王觀瀾因指導葉坪鄉的查田運動有成績，他在葉坪鄉的經驗為中共中央所重視，更為毛澤東所讚賞。後來他被調往瑞金縣的雲集區和壬田區指導查田運動。他想得開，無條件地將李伯釗歸還楊尚昆，表示與人無爭，而專心致力於工作上，總算搞出「成績」來了。這樣，他就「奇妙」地避開了國際派鬥爭的鋒芒。因此，他在紅軍主力突圍西竄時，才免於留在江西老巢。一九三四年十月，他被調入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工作，隨軍西竄，一九三五年十月紅一方面軍殘部抵達陝北蘇區後，「蘇維埃中央政府」實行改組，王觀瀾任中央土地部長。自此以後，一帆風順。一九三八年調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土地部長及邊區參議會秘書長。

王觀瀾因長期在貧瘠的農村中，工作勞累，積勞成疾。當一九四三年我從太行山根據地折返延安時，他病倒在延安「國際醫院」（又名「白求恩醫院」），他患的是什麼「遺精症」，躺在病床已有兩年多了。抗戰初期娶的第二任太太是個年輕活潑的「抗大」學生，此時她服從黨的命令，拋棄一切工作，專心服侍王觀瀾。一九四五年秋我要離開延安時，特地到國際醫院探望了他。這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面。那時他仍不能起床、吃飯，大小便都要有

人照顧。

三 查田運動的缺點和錯誤

王觀瀾對我談到江西蘇區查田運動情況時，不但談到了查田運動的成績，而且也談到了查田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王觀瀾對我說：毛澤東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間，對查田運動做了一個「初步總結」，一九三四年二月毛在「一次全蘇大會」的「工作報告」中，對於查田運動又做了全面的總結。他說毛澤東那篇「初步總結」和「工作報告」中有關查田運動的具體統計資料，都是由他提供的。王觀瀾誇耀地說，在查田運動中，瑞金縣壬田區的查田運動在「中央政府」工作團（按王觀瀾係工作團成員之一）直接幫助之下，在兩個月的激烈鬥爭中，共查出了地主、富農三百多家，槍決了十二隻「大老虎」——「反革命分子」，查出土地兩萬多擔（石），分發了豪紳地主的無數的財物給群眾，徹底消滅了封建殘餘，並且檢舉了一些犯了嚴重錯誤的蘇維埃工作人員，清除了一些混進蘇維埃政府中的階級異己份子。

王觀瀾談了查田運動的成績之後。接著又談了在查田運動中所產生的缺點和錯誤：

（一）放棄領導——查田運動並沒有普遍開展起來，有些地方的黨部和蘇維埃政府放棄查田運動的領導，許多區鄉主席不做查田委員會的主任，有的藉口別的工作忙，放棄查田工作；他們說：「忙得很，沒有工夫照顧查田運動」；

（二）對地主富農投降——在某些地方黨部或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在查田、查階級的鬥爭中，表現了他們機會主義的動搖性。他們丟棄不了姓族和地方的關係，包庇同姓同村的

地主富農，或者把階級成分弄錯，把地主當做富農，或是把富農當做中農；

(三) 侵犯中農——這是查田運動中最嚴重的危險。瑞金城區的查田，一開始就按家按畝去查，查得中農恐慌，竟有些中農跑到蘇維埃政府來請求改變自己的階級成分，要求改為貧農，他們說：「中農危險得很，捱上去就是富農，改為貧農咧，隔富農就遠了一點。」有些地方查得中農非常恐慌，逃跑到山上去；

(四) 對富農也有錯誤觀念——這種錯誤就是把富農當做地主打，全部沒收了他的家產，這是一種消滅富農的傾向。這一錯誤的來源，是由於抹殺富農的勞動力。有些地方，把在生產中用了相當多勞動力的富農份子，認為是「附帶勞動」一類把他當做地主。（筆者按：中共正式的文件規定：「沒有勞動，或者只有附帶勞動而有地租剝削的是地主」）講到這裡，王觀瀾費了好多時間向我解釋富農與地主的差別。他說，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故勞動是區別富農、地主的主要標準。所以說，抹殺了富農的勞動力是錯誤的。

王觀瀾還說，因為在查田運動中發生了許多錯誤，而這些錯誤的產生都是由於基層幹部對於「階級的分析」弄不清楚；還有就是在查田運動中發生了許多實際問題。而這些問題，或是以前的文件沒有規定，或是規定的不明確，或是蘇維埃人員解釋不清楚所致。王觀瀾又說：當時毛澤東自告奮勇，草擬了「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並用「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名義予以公佈。那知由此闖了大禍，毛澤東又犯了一次「右傾路線」的錯誤。

四 毛澤東又犯了一次錯誤

王觀瀾說，毛澤東草擬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頒佈後，立即引起了地主富農極大的衝動，他們利用了「決定」中的一些條文，製造種種藉口，提出各種理由，紛紛起來翻案、反攻，企圖拿「算階級」來代替查階級，玩弄數目字來奪回過去他們所失去的土地和財產。這就是說，許多的地主以「家務勞動」、「腦力勞動」，或「其他重要勞動」為理由，紛紛到蘇維埃政府去申請改為富農或富裕中農；許多富農也都耍著玩弄數字的把戲，以「總收入的多少」和「剝削的多少」的計算為藉口，紛紛到蘇維埃政府去申請改為富裕中農或中農。

接著王觀瀾說，地主、富農翻案、反攻最厲害的地方是勝利、瑞金、西江、會昌等四縣。其中勝利縣，在「算階級」的浪潮中改掉了的地主、富農，比在查田運動中查出來的還多了幾百家。瑞金縣的幾個區和會昌縣的某些區的情形，也都和勝利縣的情形差不多。西江縣的做法則更為荒唐了，他們把查田運動訓練班的學生，組成為改階級的「填表突擊隊」，叫地主、富農到鄉蘇維埃政府去填表。這樣一來，當然地主富農更無顧忌了，經過這樣的「突擊」，西江縣改變了階級成分的地主富農也就大大超過了在查田運動中查出的數目。

王觀瀾有點緊張起來了，他繼續說，「決定」頒佈之後，許多地方的蘇維埃政府竟拋棄了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工作，而是忙於糾正過去在查田運動中，甚至在查田運動前一些過左的錯誤。這樣一來，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以後，一方面是因為國軍的第五次圍剿已經開始，另一方面是因為地主、富農的翻案、反攻，查田運動實際上在許多地區已經停頓了。

事實至為明顯，毛澤東的「決定」闖了大禍，毛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右傾錯誤」。因此，毛澤東丟了「官」，「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三四年一月）時，毛的「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被免除了。國際派第三號人物張聞天取代毛澤東任「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上台後，頭一件事便是鬥爭毛澤東。張聞天發出的第一道命令——「中字第一號訓令」，便直截了當地把毛澤東的「決定」中一些錯誤一一加以糾正。

王觀瀾接著又說，「決定」中稱，如砍柴、挑擔及其他重要勞動，都是主要勞動。「決定」中又稱：所謂「勞動」，包括家務勞動在內。但張聞天的「中字第一號訓令」則稱：區別農民與地主的主要標準的勞動，是指農業生產上的重要勞動，不是指做飯、洗衣的家務勞動，更不是指那些管賬、經商或其他非農業生產上的勞動。

王觀瀾這一比照，再明顯沒有了，那就是：毛澤東的「決定」，完完全全被新任「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的「中字第一號訓令」所推翻了。

王觀瀾激昂地說，「中字第一號訓令」明白地宣佈：在暴動後迄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和富農，不論有任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

王觀瀾最後說，毛澤東的「決定」，在客觀上為地主富農的翻案、反攻大開方便之門，實是意料之外。

以上，王觀瀾不厭其詳的談話，使我當時在心理上掀起了一種奇妙的感觸。

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下井岡山以後，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展開游擊戰爭活動中，曾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實力派，和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在路線政策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和爭論，其中在軍事方面，毛澤東被指控為「游擊主義」、「小團體主義」和「狹隘的經驗主義」。在肅

反問題上被指控為「肅反中心論」和「肅反擴大化」；在農民土地問題上，指控毛所提出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把土地分配給一切的人」，是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階級鬥爭，是一種富農路線的錯誤。由於上述這些錯誤，毛澤東被免除了「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的職務。

當時，在查田運動中，毛所草擬的「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給了地主富農以翻案反攻的藉口，地主富農掀起了翻案、反攻的浪潮，顯然，這是毛澤東繼「羅明路線」之後，又犯了嚴重的錯誤的證明。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王觀瀾係留俄學生，原屬於王明國際派的，只因爭奪李伯釗問題與楊尚昆有矛盾，曾被指控為「有重大托派嫌疑的人」而遭清算鬥爭。旋因毛澤東積極拉攏，而轉向成為毛澤東手下的一位「悍將」。當時王觀瀾和我談他在查田運動的經驗的時候，情緒十分激動，他以毛澤東親信自居，氣焰逼人，說話也就毫無顧忌。因此，當他談到毛澤東的「決定」頒佈之後，引起了地主、富農翻案、反攻，以及新任「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針對毛在「決定」中的一些不正確觀念和錯誤的政策進行清算鬥爭時，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態度是同情毛澤東的。因此，我認為當時王觀瀾對我說的話是真實可靠的。

柒、蘇區的經濟情況

一 蘇區農民爲什麼窮困？

從表面上看，蘇區的基本農民——雇農、貧農、中農都分得了土地，「蘇維埃政府」從地主、富農沒收來的房屋和農具也都分給了農民；在暴動以前的一切債務也都取消了。「蘇維埃政府」還組織了信用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合作事業」。照這樣看來，蘇區農民生活應該有所改善才對，但事實上恰好相反，蘇區農民不但仍然窮困，而且生活較前更苦，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自一九三二年六月進入江西蘇區後，這個問題一直在腦子裡盤旋，久久未能獲得答案。一九三三年四月，「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頒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各級國民經濟部暫行組織綱要」條例，成立所謂「中央國民經濟人民委員會」，由林伯渠擔任部長。據當時中共文件稱，所謂「國民經濟部」，就是貫徹執行蘇維埃經濟政策，領導指揮蘇維埃經濟建

設的「司令部」。

接著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和八月，先後召開了江西南部八縣查田運動大會（六月）和江西、福建兩省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毛澤東在這兩次大會上都作了重要的演說。就記憶所及，毛澤東的兩篇演講，主要內容是強調這兩次大會的意義和作用，是互相關聯的。前者是為了肅清在土地鬥爭中的富農路線，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後者是在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礎上，展開經濟戰線上的活動，突破國軍的經濟封鎖，集中經濟力量來支援戰爭。

當時我不但被邀出席了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並在大會上作了「蘇區反帝運動概況」的報告。會議期間，我還同許多參加會議的區鄉幹部和農民代表談話，進行調查統計工作。我在參加這個會議的全部過程中，獲得了不少重要資料，可以作為解答「蘇區農民為什麼窮困？」的問題之有力印證。

據我當時參照一些「文告」、報刊等原始資料所獲初步了解，蘇區為什麼發生糧食恐慌？蘇區農民為什麼窮困？歸納起來約為下列各點：

第一，米穀價賤——糧賤傷農，是一般的規律，在中共統治下的蘇區也沒有例外。尤其是在收穫時，糧價大跌，這是普遍的現象，往往是在收穫時稻穀一擔（石）的價格不足一塊銀元。當時「蘇維埃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副部長鄧子恢在一篇專論中稱：據一般的估計，農民生產一擔（石）稻穀，平均大約需要七天的人工，以每天工資一角、伙食一角來計算，每一擔（石）稻穀就要一元四角的成本。而在收穫時農民糶出一擔稻穀的價格還不足一元。這就是說，農民每擔稻穀就要蝕本四、五角錢。到了青黃不接時分，農民卻又吃了貴米的虧。

①

第二，農民沒有錢——也就是農民沒有現金。因為土地分配之後，糶米的人大大減少了，當糧食收穫時，是供多於求，而由農民在收穫時既要付工資，又要買油、鹽、肉、菜以及買布做衣服等等，在在需要錢用。但農民自己手裡卻沒有錢，借又借不到，只得忍痛吃虧把糧食賤價糶出。

第三、資金貨物流通困難——據鄧子恢說，當時農民沒有錢的原因有四：（一）蘇區的土產，如紙張、菸葉、木材、樟腦、錫砂、茶油等，因國軍嚴密封鎖，都銷不出去，農民除了靠米穀生產以外，沒有別的路子可以賺錢；（二）地主富農商人把錢（現款）帶走了，或偷運出境，運不走的埋藏起來，不肯拿出來流通；（三）農民中有些存款也各自保藏，沒有借貸；（四）整個蘇區入貨多，出貨少，商人向外辦貨又須現金出境，因此現金日見減少，流通困難。^②

第四、蘇區捐稅繁重——「蘇維埃政府」的各種税金，重重地壓在民衆身上，除了農業稅、商業稅、工業稅（尚未正式徵收）等名目之外，還有各種臨時稅捐，例如「蘇維埃政府」向民衆募集「經濟建設公債」（第一期三百萬元偽蘇維埃紙幣），發行之後，就搞所謂「退還公債」運動；「蘇維埃政府」向民衆借糧（筆者按：一九三四年五月和七月，「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先後向蘇區民衆借穀二十四萬擔和六十萬擔），事後又搞所謂「退還糧票」

①引自鄧子恢著《發展糧食合作社運動來鞏固蘇區經濟發展》。

②同註①。

運動；顯然這些都是變相的苛捐雜稅。

第五、經濟政策的錯誤——由於蘇區農業生產減少，糧荒嚴重，荒田增加，引起蘇區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蘇維埃政府」為了要挽救經濟危機繼續發展，乃採取了各種辦法——例如組織各種合作社，發展農民的集體經濟；設置糧食調濟局，進行調節糧食價格；設立對外貿易局，實行對政府區貿易的經營和統制。但這些政策和措施後來都失敗了，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中共所採取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

二 中共的經濟政策

為了深入了解蘇區的經濟情況，在這裡，有必要把當時——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中共的經濟政策談一談。

關於蘇維埃的經濟政策問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蘇大會（「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簡稱，下同）曾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的條文，提出了蘇維埃經濟政策的原則和方針。嗣後，國際派首領王明（陳紹禹化名）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了「論中國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的專論，就蘇維埃經濟政策所依據的根本思想、蘇維埃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中心任務和具體步驟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說明。接著，博古（秦邦憲）、張聞天等國際派首領，也先後發表了有關經濟政策的專論，其中有一篇題為「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刊載於中共中央理論雜誌《鬥爭》第十一期上。此外，毛澤東在

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以「必須注意經濟工作」^③為題發表演說，對於蘇區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和策略做了扼要的分析。後來，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的第二次全蘇大會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復就「經濟政策」^④的基本原則和中心任務作了概括的說明。

在談到中共在江西蘇區的經濟政策時，首先必須明瞭下列幾個問題：

（一）蘇區經濟的性質——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據當時中共的原始文件稱：因為「蘇維埃政府」所盤踞的區域，在經濟上比較落後，實行土地革命之後，地主經濟已完全消滅，而廣大的貧農、中農和雇農都已經分得了土地。因此，蘇區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農民的小生產的商品經濟佔絕對的優勢；同樣的在工業方面，是手工業的生產者佔著主要地位；私人的資本主義經濟則比較不重要；但小生產者私人的集體的合作經濟，正在向前發展中，並逐漸獲得重要的意義。蘇維埃的「國營」企業，則仍限於「蘇維埃政府」所必需的軍事工業。

（二）蘇維埃經濟政策的原則——中共認為在「民主革命」階段中，蘇維埃經濟政策的中心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點：一、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經濟命脈（包括租界、海關、銀行、鐵路、航業、礦山、工廠等），實行「國有」；二、允許商業自由，但同時嚴禁商人投機；三、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取消一切口頭的或書面的奴隸及高利貸的契約及債券；四、蘇維埃政府全力幫助合作社的組織和發展。

（三）蘇維埃經濟建設的中心任務——根據上述蘇維埃經濟政策的原則，認為蘇維埃經

③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一三頁。
④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二五頁。

濟建設的中心任務是：一、發展農業，進一步提高蘇區生產力，在土地生產方面要有計畫地解決農民在耕牛、種籽、肥料、水利、農具等方面的困難；二、儘速恢復與發展蘇區的手工業生產；三、蘇維埃政府要積極幫助群眾，發展各種合作事業，並容許私人資本家的投資；四、在「國家」企業中實行「革命競賽」，實行共產黨禮拜六^⑤和對於勞力的共產主義態度；五、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換取白區（即政府區）的工業品，同時獎勵私人商業，使他們為輸出與輸入各種必需品而努力。

（四）為將來社會主義轉變而鬥爭——認為蘇區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工商業的發展，即意味著資本主義成分的生長，而在蘇區佔優勢的農民小生產的商品經濟，雖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但它仍然有使資本主義成分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小生產者的集體經濟——合作社經濟，當時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它的發展趨向將隨著工農民主專政走向社會主義。

（五）兩條道路的鬥爭——認為在這裡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在蘇維埃經濟的內部包含有兩種傾向在鬥爭著：一種是資本主義的傾向；另一種是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傾向。因此，在蘇區經濟中，佔最大優勢的農民小生產經濟，是站在走向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十字路口上，它可以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走向社會主義道路。

（六）限制資本主義剝削——認為在蘇維埃經濟建設中，必須在經濟上創造一些前提和優勢，為將來社會主義轉變而鬥爭。當時雖然容許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必須與資本主義作鬥

⑤蘇維埃政府規定，每個機關工作人員，每逢禮拜六（或禮拜天）須為紅軍家屬服務役四小時，叫做「禮拜六工作」。

爭。並認為與資本主義作鬥爭最重要的手段是經過「蘇維埃勞動法」，限制資本主義的剝削。這就是說，對於資本家的企業，實行工人的監督；防止資本家利用他們的企業，進行「消極、怠工」或其他「反革命」活動。

三「向困難投降」的鄧子恢

在這裡，我想談一談蘇區合作社運動情況和當時實際負責領導合作社工作的「蘇維埃中央財政部」副部長鄧子恢這個人。

我在前面已經說到，「蘇維埃政府」為了要創造將來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步驟，便是在蘇維埃區域普遍建立各種合作社，把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改變成為集體的、互助的合作社經濟。據毛澤東在第二次全蘇大會上說：根據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兩省十七縣的統計，蘇區共有各種合作社二千四百多個，股金達偽蘇維埃紙幣三十餘萬元。發展得最盛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其次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毛澤東還說，為了發展合作社經濟和所謂「國營經濟」，「蘇維埃中央政府」還於一九三三年發行了二百萬元（蘇幣）的經濟建設公債。

我為了要深入了解當時蘇區「合作事業」情況，曾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在參加第二次全蘇大會期間，特地訪問了「蘇維埃中央財政部」副部長鄧子恢。

當時我和鄧子恢談話的中心內容是關於蘇區合作社的特點和作用問題。鄧子恢說，蘇維埃政權不是資本主義的崇拜者，共產黨不是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前

途。因此，蘇維埃政權除了經過「勞動法」，實行工人對資本家、廠商的監督，以防止資本家的怠工，來限制資本主義剝削之外，還在蘇區內組織各種合作社，包括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這些合作社完全禁止資本家、富農加入，它是一種小生產者的集體經濟。

鄧子恢說，蘇區各地合作社的種類，在目前只有下列四種：

- (一) 生產合作社——製造各種工業日用品，以抵制資本家之怠工；
- (二) 消費合作社——便利工農群眾低價購買日常必需品，以抵制投機商人之操縱；
- (三) 信用合作社——便利工農群眾經濟週轉和借貸，以抵制富農資本家的高利貸剝削；
- (四) 糧食合作社——調節糧價，抵抗富農、商人剝削的群眾性的經濟組織。

鄧子恢還說，這種小生產者的集體經濟，在目前說來，還不是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它的發展趨向，將隨著工農民主專政走向社會主義，而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在目前，合作社經濟就是要同資本主義的投機與高抬物價做鬥爭。這樣就可以使蘇維埃的合作社具有一些社會主義的成份。

我對鄧子恢這個人，並不陌生。一九三二年五月我在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的時候，鄧子恢是「蘇維埃中央財政部長」，毛澤東特地派他到漳州去主持紅軍的籌款工作。那時承擔籌款的工作機關——「中央沒收徵發委員會」（鄧子恢兼主任），駐紮在崇正女子中學（在漳州公園邊）內。我因被派主持貧民救濟工作，常到「中央沒收徵發委員會」和鄧子恢接洽「救濟品」（主要為食米和舊衣服等）。這是我首次與鄧子恢的接觸。在他的支持下，我的貧民救濟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不久，紅軍撤離漳州，我和幾個台灣學生踏進蘇區的大門——龍

岩的第二天，在一次座談會上又會晤了鄧子恢。我在瑞金時也常常和他保持聯繫。一九三四年一月我參加第二次全蘇大會，恰好又和鄧子恢同在一個小組裡。很自然地我們就以蘇維埃經濟問題作為重點加以認真地討論。不過這個時候的鄧子恢已經在政治上受了嚴重的打擊，國際派指控他是個「向困難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從談話中可以看出當時他內心的苦悶。鄧子恢受打擊的經過情形大致是這樣：

一九三三年三月，當國際派發動所謂「反羅明路線鬥爭」，整肅了羅明、鄧小平、毛澤潭、古柏、謝維峻等人之後，接著在「蘇維埃中央政府」內部掀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鬥爭，其鬥爭的主要對象便是「中央財政人民委員」（即財政部長）鄧子恢和「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中共中央理論雜誌《鬥爭》上有一篇文章是批判鄧子恢的。《鬥爭》所宣佈的鄧子恢的罪狀是：

（一）鄧子恢認為蘇維埃政府把種種稅金加到農民身上，使農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壞。——這種話簡直祇有國民黨的擁護者才說得出口；

（二）在負責領導財政部工作期間，始終不發動群眾來做籌款工作，以為蘇區內的豪紳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沒有餘款可籌了；

（三）向困難投降，在財政工作上不知道從積極方面設法，向白區的豪紳地主及蘇區內的豪紳地主籌款，而是專注意於增加稅收，增發紙幣，向容易方面去做，眼睛向著石印機（印紙幣用）瞄準。

總之，《鬥爭》報指控鄧的罪名是不注意向地主富農殘餘籌款，只向基本群眾增加稅收，財政工作沒有計畫，不但不能從積極方面克服困難，而且向困難投降，不能應付戰爭開展的

局面，完全陷於動搖、保守、右傾機會主義的泥沼裡。鬥爭的結果，中共中央認為鄧子恢不能繼續擔任財政部長，並決定以國民經濟部長林伯渠兼任財政部長，而鄧子恢則降為副部長。更為使他難堪的是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蘇大會選舉的結果，鄧子恢竟然再降為中央候補委員。

就因為這樣，當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紅軍突圍西竄時鄧子恢被留下來，和陳毅、張鼎丞、譚震林、毛澤潭等一起行動，在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山區進行絕望的游擊戰爭。

四 爲糧食而鬥爭

當我們以敏銳的眼光來研究蘇區經濟情況的時候，千萬不能忽視對於當時蘇區糧食情況的探討。

從一九三三年春開始，整個江西蘇區已陷於嚴重的糧食恐慌之中。當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土地部」頒發的一項「訓令」^⑥，起首便說：

「糧食缺乏，米價飛漲，夏荒問題，在中央蘇區許多地方，已經成了一個嚴重問題。」這個文告還不隱諱地說：

「許多地區的米荒現象，不但貧苦工農群眾感受困難，並且部分的影響到紅軍及蘇維埃

⑥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訓令》第七號。

機關的給養。」^⑦

當時「蘇維埃政府」機關和群眾團體工作人員每人每天發糧食一斤二兩，菜金（包括油鹽）一角兩分。一九三三年夏季以後，「蘇維埃政府」號召節約，每天每人的糧食減為一斤，有時候僅發十四兩，一般蘇維埃工作人員多實行吃兩餐。怎樣節約呢？一般的做法是這樣：各機關把一個月的米發給每個工作人員自己保管，他們把每餐自己要吃的米裝在袋子（用細草編成）裡，袋子上面繫一塊寫著自己名字的木牌，送到廚房去蒸。例如每人每天的糧食是一斤，每餐只吃六兩，兩餐吃十二兩，這樣每天便可以節省四兩米。這樣節省下來的米，每月由機關收集起來往「蘇維埃政府」的糧食部上繳。在糧荒最嚴重的時機（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號召每個工作人員在兩個月之內要節省一斗穀子，實在是太荒唐的事，這簡直是把他們逼上飢餓線上。至於蘇區內的老百姓，特別是那些已經被打倒的地主們，在青黃不接，糧荒嚴重的時候，只有嚐嚼米糠、苦菜、樹葉、泥菩薩的份兒了。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為了解救蘇區的糧荒，除了發動各縣、各區鄉的農民普遍地大量種植雜糧和蔬菜，積極備荒之外，還想出兩種辦法：

一種辦法是在「中央糧食部」之下設置一個「糧食調濟局」，各省蘇設置糧食調濟分局，以主持其事。其具體辦法是這樣：

由「蘇維埃政府」向富農籌一筆款子，用高價向貧農雇農糧穀，把收集來的穀子存儲起來，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照原價糴給農民。這個辦法，在當時有些地方起了調節作用。

⑦同註⑥。

但當時部份區鄉政權為富農所把持，富農卻利用調濟局的名義向中農借款，甚至借到貧農身上，結果反引起了蘇區群眾的恐慌。

據鄧子恢說，由於這個辦法行不通，便又想出了另一個辦法，那就是創辦糧食合作社的辦法。

鄧子恢說，糧食合作社是群眾的經濟組織，由中農、貧農、雇農自動入股。集中起來的股本，向社員收買穀子，穀價要比市價高些，收買來的穀子，存儲到明年，以比當時市價便宜的價錢糶給社員，多餘的糧則運往米價高的地方去賣，結算之後賺得的錢，除留存作為合作社的公積金外，其餘則按照各社員所糶穀子多少為比例分配。

鄧子恢自誇的說，這個辦法有幾個功效：

- (一) 使社員的穀子不到市場出糶，可以減少米穀跌價；
- (二) 把穀子存儲起來，可以維持蘇區糧食不致發生恐慌；
- (三) 青黃不接之時，合作社低價糶谷，可以限制米價之高漲；
- (四) 各社員便宜糶出，高價買入之中，給合作社賺去的錢可以分回來，便不致吃商人富農操縱的虧；

(五) 限制商人、富農、商業資本之剝削，消滅價格「剪刀」差現象；

(六) 穀價提高了，可以增加蘇維埃政府的稅收；

(七) 各鄉有了合作社組織，隨時有穀子儲藏，遇到軍事上需要，可以馬上供給紅軍，不致軍食恐慌，影響戰爭。

從以上各點看來，糧食合作社雖然確實在收集糧食，調節糧價，防止商人、富農剝削等

方面，起了一些作用，但這種辦法所費的時間太長，進度遲緩，畢竟不能應付戰爭的迫切需要。所以當時中共中央在萬分緊急的狀況下，想出了一個大借糧、大搜刮的辦法——那就是發動向蘇區群眾借糧運動：

第一次，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借穀二十四萬擔；第二次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借穀六十萬擔。

據當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糧食部長」陳潭秋在一篇題為「為迅速完成廿四萬擔穀子而鬥爭」的文告中稱：

「為了保證紅軍的給養，緊急動員廿四萬擔糧食的運動，截至九號（九日）為止，僅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二，不能依期完成的危險，嚴重的威脅著我們。」^⑧

新任不久的蘇維埃「中央國民經濟部長」林伯渠在一通「訓令」中也說，為了解除糧荒現象，除由「糧食調濟局」向各縣、區、鄉米穀比較多的地方採購外。還號召在最近兩月內每人要設法節省穀子一斗^⑨。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也發出緊急警報說：「紅軍等著二十四萬擔糧食吃！」

有「突擊專家」之稱的國際派悍將羅邁（即李維漢，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在各縣糧食部長聯席會議上發言說：

⑧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紅色中華》第二一四期。

⑨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日《紅色中華》第八十一期。

「現在依據紅軍的需要和群眾的要求，決定秋收後借穀六十萬擔，收購穀子十萬擔，加上徵收土地稅（按：農民以穀子繳納），我們將近要收集一百萬擔（石）的糧食，並且要爭取在九月半以前完成。」^⑩

這就是說，中共中央要在紅軍突圍西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前兩個半月，在江西蘇區來掀起一次一百萬擔（石）穀子的大搜刮運動！

⑩ 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四日《紅色中華》第二一八期。

捌、蘇區的文教情況

一 有關文化教育的幾個統計數字

蘇區文教一般情況，在「紅都——瑞金」篇中，已略有說明。這裡，我想較為全面地、具體地說一說。

蘇區的文化教育，大致可分為：（一）小學教育，有所謂「列寧小學」，收容七至十二歲的兒童；（二）補習夜學，收容十三至十七歲的失學兒童或少年；（三）婦女補習教育，有補習夜學、識字組等，收容失學的婦女；（四）群眾性的識字運動，這是一種所謂「消滅文盲」的運動；（五）報刊雜誌的出版；（六）戲劇運動；（七）高等教育。

在談到蘇區文化教育概況的時候，最具代表性的資料，應當提到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蘇大會（「第二次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之簡稱，下同）上的「工作報告」。其中有幾個重要統計數字，最能表現當時蘇區文化教育的概況。毛澤東說：

根據江西、福建、「粵贛」（粵贛邊區）三個省的統計，在二千九百三十一個鄉中，有列寧小學三千零五十二所，學生八萬九千七百一十人；有補習夜學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學生九萬四千五百七十七人；有識字組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八組，組員十五萬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樂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個，工作人員四萬九千六百十八人；蘇區許多地方，學齡兒童的多數是進入了列寧小學，例如興國縣學齡兒童總數二萬零九百六十九人（內男一二、〇七六，女八、八九三），進入列寧小學的一萬二千八百零六人（內男生八、八二五，女生三、九八一），失學的八千一百六十三人（內男三、二五一，女四、九一二），入學與失學的比例為百分之六十與四十。蘇區很多地方的兒童，現在是大部份時間受教育，做遊戲，只有小部份時間參加家庭的勞動。兒童們同時又組織在紅色兒童團之內，這種兒童團，同樣是兒童們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

在提到蘇區婦女補習教育時，毛澤東以興國縣為例說：

興國縣夜校學生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佔百分之三十一；女子一萬零七百五十二人，佔百分之六十九；興國縣識字組組員二萬二千五百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佔百分之四十，女子一萬三千五百十九人，佔百分之六十。在興國，婦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自己也主持教育，許多婦女擔任小學與夜學的校長，或教育委員會識字委員會的委員：

夜學、識字組與識字版也迅速增加。夜學有一定的地點，識字組在群眾的家裡，識字版在道路的旁邊。領導識字運動的機關是鄉村的識字運動委員會。拿興國縣來說，全縣有一百三十個鄉的識字運動總會，五百六十一個村的識字運動分會，三千三百八十七個分會下面的

識字小組，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九個加入識字小組的組員，這是掃除文盲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蘇區群眾文化運動（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發展速度，由報紙的發行便可窺知個中情況。「中央蘇區」那時有大小報紙三十四種，其中如《紅色中華》，從三千份增加到四萬份；少共中央局機關報《青年實話》發行二萬八千份，中共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發行二萬七千一百份，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發行一萬七千三百份；

蘇區的工農劇社與藍衫團的運動，農村中俱樂部運動，亦在廣泛的發展著；

群眾的紅色體育運動，也是迅速發展的，雖偏僻鄉村中也有了田徑賽，而運動場則在許多地方都有設備；

蘇區還缺乏完備的專門教育的建設，但為了「鬥爭」的需要，中共已設立了紅軍大學和蘇維埃大學、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及教育部領導下的許多教育幹部學校。中等教育與專門教育，應跟著普通教育的發展而使之發展起來，無疑的應該成為教育計畫中的一部份；

為了造就工農的知識分子，為了發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為蘇維埃文教工作服務，這也是蘇維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視的一點^①。

以上所引幾段有關蘇區文教工作的情況和統計數字，係錄自毛澤東在第二次全蘇大會的「工作報告」。

① 一九三四年一月卅一日，《紅色中華》第二次全蘇大會特刊。

二 中共的文教政策

毛澤東在第二次全蘇大會的「工作報告」，只是部份地反映了蘇區文化教育的幾個重要方面的具體數字而已，對於全面地、深入地了解蘇區文教情況的要求說來，顯然是很不夠的。因此，對於當時中共在蘇區的文教政策的探討，當是不可或缺的。在這裡，我想引用當時擔任少共中央局書記的凱豐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全蘇區教育大會」的一篇「報告」，這對於探討中共在蘇區的文教政策是有幫助的。

凱豐在這篇「報告」中，就蘇維埃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則和政策作了重要的說明。它的大意是：

(一) 在一切文化教育的領域內，要使勞動人民能夠造就具有共產主義的觀點的新一代；蘇維埃教育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以共產主義的思想來教育群眾。蘇維埃政權雖然在目前的階段上，還是工農民主專政，但它的發展前途卻是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它的最終目標是要消滅階級，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

(二) 但是在目前的階段上，決定蘇維埃教育的實施方針時，還必須估計到國內戰爭的具體環境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這就是說，蘇維埃教育的中心任務，就是要用蘇維埃教育的力量去推動戰爭的動員和滿足戰爭的需要，教育為著戰爭而服務。

(三) 蘇維埃政府在組織文化教育的事業上，是採取階級路線的原則，蘇維埃政府應當賦予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以教育的優先權利。這就是說，需要廣泛的提高群眾和幹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來執行當前的新的任務，需要經過發展教育的工作，來提高工人和勞動群眾的階級

覺悟；

(四) 各級學校應當成為培養新社會的建設者，及鎮壓仇視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武器。從自己的隊伍中，造就許多熟知建設新社會的文化、科學、技術及藝術的人才；

(五) 學習與勞動相聯繫；理論與實際相聯繫；舊社會最壞的一種傳統，就是把書本與實際生活分離，而蘇維埃教育則應當是與日常的和各方面的工作相聯繫；

(六) 強調勞動與教育相結合——在舊的社會裡，把勞心和勞力分得很遠。這種分離，也是階級社會不可避免的。在蘇維埃的教育中，就是要漸次消滅這種分離；就是把勞心和勞力聯繫起來，實現勞動與教育的統一；

(七) 把宗教與教育和學校分離起來，禁止任何宗教干預教育和學校，把數千年來統治著教育和學校的孔教廢止。^②

凱豐原名何克全，當時任少共中央局書記，是王明國際派的核心人物。他在「全蘇區教育大會」的報告中，大聲叫喊：「中國的蘇維埃政府，在教育領域內，就是根據蘇聯的光榮的經驗來建設文化教育事業」^③，正說明他的論點代表莫斯科的國際路線。

顯然，這個時候的凱豐，聲名烜赫，勢燄灼人。他少年得志，趾高氣揚，睥睨一切。在他的「報告」中，對當時蘇維埃「中央教育部」大肆攻訐，他盛氣凌人地說：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凱豐在「全蘇區教育大會」的報告。

③ 同註②。

「過去在教育部的工作中，存在著一個極端有害的觀點，就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傾向，把教育工作限制在反對封建迷信範圍，沒有提出共產主義的教育。」接著他又說：

「存在於教育部工作中另一種不正確的傾向，就是曲解了『教育為著戰爭』，有些人以為要為著戰爭就是要把學校關起門來，事實上這就是取消教育，阻止教育的發展。」^④

關於中共對待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凱豐也不隱諱地說：「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有著不能容許的錯誤，就是存在著一種反對知識分子的情緒，我們應當根本糾正這種錯誤。」^⑤

三 掃除文盲運動

凱豐在他的「報告」中，講到社會教育問題時會指出：應當確定目前社會教育的中心任務，是消滅文盲運動，在這方面，必須認真地做許多堅苦的工作。他還引證列寧的話說：「在不識字的國家內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凱豐還說：「文盲的存在，對於蘇維埃工作的開展，是一個極大的障礙。」^⑥

據一般的估計，那時蘇區文盲的數字，佔蘇區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因為不識字，不能看蘇維埃和紅軍的各種文件和書籍，所以，群眾的政治水平就不能提高，或不了解蘇維

④同註②。

⑤同註②。

⑥同註②。

埃的法令，以致工作不能進行，甚至弄錯。在日常生活中，如記賬、寫信、看路條、寫報告也容易弄錯，就是有求知識的機會，也因為文盲而輕易放過了。

尤其是那時，正是政府對中共「圍剿」與中共進行所謂「反圍剿」的決戰時期，中共的首腦們更認為，掃除文盲工作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中心任務，是整個階級鬥爭中重要的一環。

當時中共採取什麼方法來推行掃除文盲運動呢？依我記憶所及，在掃除文盲運動中，最有效的方法，要算是在蘇維埃機關內，在各民衆團體中，在紅軍中，普遍地設立識字班。識字班的作用，要比列寧小學、工農補習夜學更為重要，更易收效。因為列寧小學主要是兒童的教育，工農補習夜學，是青年或成年的工農群衆在工作空閒的時候，練習識字的場所。而識字班主要教育的對象，雖然與工農補習夜學相同，但是在教學方式和活動方式方面，識字班卻比工農補習夜學更為活潑，更容易吸收廣大的群衆來參加。一般說來，參加識字班的群衆，不外為下列三種：

(一) 在沒有建立列寧小學、工農補習夜學的地方的群衆；

(二) 因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參加工農補習夜學的群衆；

(三) 各機關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人員。

由此看來，在蘇區掃除文盲運動中，識字班確實是很有效的工具。

識字班的工作方式，大致有下列幾種：

(一) 採取學校的形式，此即借用列寧小學或是俱樂部地方，利用夜晚，依照學生的程度分為幾級，訂好時間，如六時至七時為第一級上課，七時至八時為第二級、第三級合班上課。

(二) 看圖識字的方法，有些農民因為太忙，不能按時到識字班來學習，則採取看圖識字的方法，在農民有時間時，多教他們幾個字，因為有圖容易記起來。農民可以把課本帶在口袋裡，走路時或休息時隨時拿出來閱讀和辨認。

(三) 設立「識字版」——這個方法效果很大。通常是在村莊的每一條路口，檢查「路條」的地方，設立一方橫面可以寫五個字長的木板。木版上面橫寫「識字版」三字。站在「識字版」旁邊的兒童團團員，也就成了過路人的識字老師。當兒童團向過路人查看「路條」的時候，同時叫過路人唸出識字版上的字，過路人不會唸的時候，兒童團就教他唸會才放行。

(四) 識字班還利用下雨天或群眾休息的時候，進行識字競賽，最簡便的競賽方法，就是試驗那一個人認字最多。

此外，擔任識字班的老師（多半由列小教員或俱樂部、少先隊等工作人員兼任），他們要不斷地把不識字的苦處和識字的好處，識字運動的政治意義，利用小調、圖片、牆報、街頭演講等各種方式，深入傳播到群眾中去。「蘇維埃中央教育部」還印發有「消滅文盲歌」和「識字真要緊」等歌曲，在各種群眾集會場合進行教唱。並且在各種形式的宣傳中，隨時徵求群眾加入識字班，使識字班工作同識字運動的宣傳密切聯繫起來。

中共在推行消滅文盲運動的時候，當然也遭受到許許多多的困難，最普遍的現象是農民群眾拿「工作忙」，「沒有時間識字」當作一個主要的拒絕理由。有些年紀大的群眾便說：「我年紀大了，腦子遲鈍了，學不會了。」

有些區、鄉蘇維埃政府，更藉口經費困難，把識字班的簡單的設備和識字版、書籍、紙張等費用，都儘量推給群眾自己去解決，結果又給蘇區民眾增加了一項額外的負擔，引起群

衆的反感，造成掃除文盲運動上的嚴重阻力。

四 徐特立和瞿秋白

在談到江西蘇區文教情況的時候，有必要對當時直接領導蘇維埃文化教育工作的徐特立和瞿秋白作一簡單的敘述。

一九三二年當我進入江西蘇區，在「蘇維埃中央教育部」（「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部」之簡稱）工作的時候，徐特立是「蘇維埃中央教育部」副部長。當時「中央教育部」部長瞿秋白仍在上海，徐特立便以「代部長」的名義領導蘇區的文教工作。徐特立約五十五、六歲，大家都叫他「徐老」。

瞿秋白是一九三三年冬才進入江西蘇區，正式就任「中央教育部長」的。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蘇區紅軍突圍西竄為止，實際負責領導蘇區文教工作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徐特立，湖南長沙人，清末湖南師範學堂畢業，三十三歲時至上海，在江蘇教育會工作，後赴日本研究教育，歸國後任長沙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毛澤東就是長沙第一師範的學生。

一九二〇年徐特立已逾四十歲，參加工學團赴法留學，半工半讀，復至德國、比利時各工廠工作年餘，一九二三年回國，在長沙創辦另一所師範學校，自任校長，並於此時加入國民黨。北伐時期活躍於長沙。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旋即參加南昌暴動。一九二八年至莫斯科，入中山大學特別班。在該校派系鬥爭中，他力持公正與和平，故為幹部派所不滿。唯因其年高望重，未被懲處。一九三〇年冬回國進入江西蘇區，在紅軍總政治部工作。一九三一

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任「蘇維埃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努力推行國民教育，尤注重於成年的識字運動。

一九三四年十月徐特立隨軍西竄時，瞿秋白因留在江西與項英、陳毅、賀昌等一起行動，乃將一匹屬於自己的深咖啡色的壯馬交徐特立說：「騎上吧，牠之對於你比對於我更重要。」徐老再三不肯接受，但拗不過瞿的一片誠意，只好接受了。臨行時，徐特立很不好意思地將屬於自己的一匹老馬交與瞿。徐雖然換得一匹好馬，但在長途行軍中卻很少騎。一九三五年十月抵達陝北，仍擔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一九三七年二月，徐特立六十壽辰那天，中共中央特撥款幾百元祝壽，為中共內部空前之創舉。酒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咸以「老當益壯」等語致賀，鄧穎超竟猝然走去跟徐特立擁抱接吻，霎時掌聲如雷，給這位「風情薄似雲」的老人帶來了「莫名的興奮」。徐特立起立答謝說：「我要繼續奮鬥下去，一直看到中國社會主義成功。」那天，毛澤東還寫了一封信給他，大意是說：徐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老師，現在依然是我的老師，無疑將來也還是我的老師。當大革命失敗時許多人都脫離了黨，而你卻於一九二七年秋才入黨。你「老當益壯」，許多年輕人都不及你，全黨都要向你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徐特立任在延安先後擔任列寧師範學校校長和自然科學學院院長。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當選為七屆中央委員，兼任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副部長，一九四九年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一九五四年當選「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一九五六年當選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八日，這位「要看到中國社會主義成功」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階段中死了，時年九十一歲。值得一提的是他所看到的不是「社會主義成

功」，而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怒潮在大陸上普遍的氾濫。

瞿秋白是我在上海大學攻讀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老師，那時他擔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兼教「社會科學概論」和「社會哲學」。他這兩門課，不但最受社會學系的同學歡迎，而且吸引了不少其他系（英文學系和中國文學系）學生來聽課。那時，瞿秋白很忙，他一方面要擔任教授和系主任；另一方面又要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瞿秋白是江蘇省武進（常州）縣人，生於一八九九年。從小就會背誦詩詞，是他的母親口頭教會的。十一歲時進入常州中學堂讀書，因家裡貧窮，不得不被迫停學（只差半年就畢業），就在他失學那一年，他的母親因貧窮所迫而自殺了。母親死後，他到武昌去找他的堂哥瞿純白，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習英文。一九一七年夏，瞿秋白又跟他的堂哥到了北平，考進了俄文專修館，專攻俄文。一九二〇年「五四」運動爆發了，他參加了這個運動，那時還不過二十歲。

一九二〇年十月，瞿秋白以北平《晨報》記者的身分到了「餓鄉」——蘇俄。他在莫斯科碰到了同鄉張太雷，並由張介紹加入中共在莫斯科的小組（那時中共還沒有正式成立）。他在莫斯科住了兩年，為北平《晨報》寫了不少「通訊」，還寫了兩本散文：《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他曾經兩次見到列寧。

一九二三年一月，瞿秋白回到了北平，不久即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出席了中共在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同年二月他從廣州到上海，擔任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漢「清黨」後，瞿秋白潛入廬山。「八一」南昌暴動失敗後，中共於八月七日在九江舉行「緊急會議」，由瞿秋白主持。這次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並撤換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而由瞿秋白接替。「八七會議」雖然清算了「右傾投降主義」，但卻助長了左傾情緒的發展，為左傾冒險主義開闢了道路。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路線，而使左傾路線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

一九二八年七月，瞿秋白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大會，並繼續當選為六屆中央委員。

一九三〇年九月，瞿秋白主持召集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清算了「立三路線」，李立三本人離開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由王明主持和操縱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卻遭受了王明派的嚴重打擊，並被排出於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之外。從這時至一九三三年冬他動身到江西蘇區為止，他在上海和魯迅合作從事於左翼文藝運動。

一九三三年冬瞿秋白進入江西蘇區，擔任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員（即教育部長）。

瞿秋白就任「中央教育部長」以後，即對蘇維埃文化教育教育工作大力加以整頓。以前教育部門被認為是蘇維埃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經過他苦心規劃大力整頓，也就逐漸活躍和健全起來了。尤其是蘇維埃的戲劇運動方面更有飛躍的進步。他強調一切活動都應當採取「群眾路線」的方式，經過幾個月的整頓，首先是群眾性的識字運動，採用「活報」⑦、山歌、戲劇、牆報等各種形式，生動活潑地發動起來了。他把高爾基戲劇學校的學生組織成兩個劇團，

⑦是用一種簡單的化裝宣傳的形式，把最近發生的重大事情（事件）搬上舞台。

經常下鄉深入農村，一方面與農民群眾生活在一起，勞動在一起，從農村生活中吸取活的戲劇題材；另一方面根據農村中的實際鬥爭經驗和農民生活情況的反映，編成話劇演給農民群眾看。在短短的半年中，蘇維埃的戲劇運動，不論在劇本的內容上或是演員的演技上都有顯著的進步。

瞿秋白除了擔任「中央教育部長」之外，還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和教育部屬下的藝術局局長。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蘇大會」上，他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人民教育委員」。

瞿秋白對工作的領導都很具體，他對高爾基戲劇學校和蘇維埃大學的課程，無論是藝術課還是政治課，怎樣教法，怎樣提出討論題目等，都給予具體的指示。他還常常騎著他那匹深咖啡色的馬，從「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沙洲壩走八九里地來到設在瑞金西郊外的高爾基戲劇學校講課或做時事報告，並切實指導學校制訂教學計畫和演出計畫。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紅軍主力撤離蘇區以後不久，瞿秋白就和何叔衡（中央工農檢察部長）、梁柏台（中央司法部副部長）等十多個人一起向長汀縣以南的山區逃亡，在極端困苦的流程途中，他的肺病更加嚴重起來了。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他們抵達武平縣的水口鄉，被當地的民團包圍了，瞿秋白和其他幾個人當了俘虜。地方民團把瞿等押解到上杭縣保安團團部。

當時他化名林祺祥，自稱是醫生，在上杭被囚禁了一個多月，保安團終於發覺林祺祥原來就是瞿秋白。於是把他解押到長汀國軍三十六師司令部。在監中，他優閒自若，有時寫詩和雜感，有時刻刻圖章消遣，還寫了一篇《多餘的話》。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被槍斃於

汀州西門外刑場，那時他卅六歲。

對於瞿秋白的死，中共對於他的「功」「過」怎樣評價呢？毛澤東說：

「瞿秋白同志是當時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勇地犧牲……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⑧這是他死了十年後，中共對他一生所下的結論。可是善於顛倒歷史的中共，果然把事實顛倒過來了。在「文革」風暴的第二年，北平紅衛兵出版了一份《討瞿戰報》，內稱：「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曾經被人譽為『馬列主義的政治家』、『中國共產黨傑出的領袖』和『戰鬥的文學家』的瞿秋白，於一九三五年被俘以後，在敵人的囚籠中帶著『心上不能自禁的衝動和需要』，寫了一份《多餘的話》，這是一個空虛、動搖、徬徨失措的自供，從根本立場來看，就是一個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自白書』。」^⑨

中共在「文革」風暴中不僅指控曾經被譽為「白區黨」的「模範」的劉少奇是「大工賊」、「大叛徒」，加以清算鬥爭，而且也對曾經為中共而犧牲的「功臣」瞿秋白加以鞭屍，甚至把他的墓碑也給砸了。這就是今天毛澤東對待一位已死同志的手段。

⑧《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五五頁「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⑨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紅衛兵《討瞿戰報》創刊號。

玖、二次全蘇大會

一 砲火連響、戰號頻吹中的大會

中共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瑞金郊外沙洲壩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工農兵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次全蘇大會」），是在砲火連天，戰號頻吹中舉行的一個大會。我和畢士狄（朝鮮）、洪水（安南）和張然和（爪哇），以「少數民族代表」身分被邀與會。開幕的前一天，我們還接到大會祕書處通知：要我們於二十二日五時許拂曉而趕到瑞金郊外操場參加「閱兵典禮」。被邀請參加「閱兵典禮」的，除了全體「代表」之外，還有瑞金郊外少先隊、赤衛軍的模範隊、各民衆團體的工作人員。施紅光夫婦和沈乙庚，還有幾個台灣青年也應邀去觀禮。閱兵式選擇在拂曉前舉行，顯然是因為害怕國軍飛機的轟炸。

受檢閱的部隊有：紅軍郝西史大學、第一和第二步兵學校、通信學校、特科學校、政治保衛大隊、「中央」警衛連等單位約一萬人，各省代表團均推舉一人致慰問詞。我們則推舉

畢士狄為代表。

會議正式開幕，是當日下午二時，會場是半年前大興土木蓋起來的相當大的木造房子。整個的房子隱蔽在古杉密林裡，代表的座位在一個可以容納七八百人的大禮堂，四廂用木材隔成的閣樓，是各機關、團體列席代表的座位。會場四周掛滿了紅、綠色的綢旗，旗面刺有「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保衛蘇維埃每一寸土地」等口號。

到會正式代表六百多人，都坐在中央禮堂裡。旁聽者也有七八百人。大會在鞭炮聲和軍樂聲雜作中由毛澤東宣佈開幕。毛澤東致開幕詞後，選舉大會主席團七十五人，畢士狄、張然和、洪水和我們四人均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中共中央總書記博古向大會推舉史大林、加里寧、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特爾曼（德共頭目）、片山潛（日共頭目）等共產國際頭目為大會名譽主席團。隨由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全國總工會代表劉少奇、少共中央代表凱豐、紅軍代表朱德致詞，然後通過大會議事日程如下：

- (一) 中央執行委員會兩年來工作報告（毛澤東）
- (二) 紅軍建設報告（朱德）
- (三) 經濟建設報告（林伯渠）
- (四) 蘇維埃建設報告（吳亮平）
- (五) 通過「憲法」修正案及各種蘇維埃法令
- (六) 選舉新的中央執行委員

接著中共中央書記博古、少共中央書記凱豐、總工會代表劉少奇、紅軍代表朱德相繼致祝詞。

最後由大會祕書長梁柏台朗讀東北抗日義勇軍、中央蘇區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陝北紅軍、湘鄂贛蘇區紅軍致大會的賀電。至是宣佈大會第一天議程的結束。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毛澤東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向大會作「兩年來的工作報告」。

毛澤東的「工作報告」，長達四萬四千多字，冗長繁瑣，一直到次日下午才講完，主要包括（一）目前國內外的政治形勢與蘇維埃運動的發展；（二）國際帝國主義的進攻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反帝運動的指導；（三）國軍的圍剿與紅軍的反圍剿；（四）兩年來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和設施。

一月廿六日、廿七日，大會以兩天的時間，進行分組討論毛澤東的「工作報告」。「少數民族」代表因人數少，合併於「中央代表團」進行討論。每一個代表團有一個主任負責指導。「中央代表團」主任是鄧子恢，他是實際參與制訂蘇維埃各種政策、法令的，對於我們的討論提供了許多具體的意見。各代表討論的意見都製成紀錄送到大會祕書處去。我們的小組討論了經濟政策、民族政策和婚姻制度三個問題。在討論經濟建設問題時，著重討論了蘇區糧食問題和如何解決蘇區民衆食鹽的來源問題。由於國軍的封鎖，二年來蘇區民衆過著沒有鹽吃的生活。「紅」「白」交界的農民，還可以糧食、鵝、鴨、花生等與政府區商人以「走私」的方式換得一點食鹽。但是「中心區」的群眾，包括「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在內，就沒有這些條件，他們只有用硝鹽來代替，而硝鹽吃起來是苦的。

二十八日上午，由中共「紅軍總司令」朱德作「軍事報告」，他強調擴大「紅軍」要以充分的政治鼓動去代替強迫命令和「拉伕」式的方法，並要求地方蘇維埃政府要充分執行優

待「紅屬」工作，切實幫助「紅屬」解決物質生活上困難的問題，是日下午，照例分組討論朱德的「軍事報告」。

二十九日下午一時，本是財政部長兼國民經濟部長林柏渠作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報告，因為從前線傳來的緊急消息說，國軍分三路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大會主席團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縮短開會時間，並推舉毛澤東向大會作「關於緊急動員的報告」，毛的報告很簡短，約三十分鐘。大意是說：

這兩天國軍已經把福建的十九路軍打敗了，福建的所謂「人民革命政府」那班先生們也已經逃走了，現在國軍正積極向蘇區大舉進攻中，根據這兩天的消息，國軍的計畫是分三路向蘇區進攻：東路由福建的沙縣進攻歸化、清流、泉上，企圖佔領石城、瑞金；中路由黎川向建寧前進，目的要佔領建寧、廣昌與博生（即寧都）；西路由永豐經荇田、沙溪，企圖進攻興國。

毛澤東說：當前的緊急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粉碎五次圍剿。但是應用極大的努力去實現許多緊急任務：第一，要打敗敵人的三路進攻，就要十分努力擴大紅軍；第二，要實行赤色戒嚴，一切赤衛軍、少先隊、游擊隊都要動員起來；第三，要鎮壓「反革命」活動；第四，要在敵人進攻的那些地方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人得不到一粒米吃。找不到一個帶路的；第五，要動員運輸隊到前線抬傷兵；第六，要收集糧食，保衛紅軍給養；第七，要發動全體蘇維埃工作人員戰鬥的動員起來，加緊自己的工作。

毛澤東說：這次國軍用全力向蘇區進攻，蘇區應當用全力去回答他。要向廣大的工農群

衆做普遍的宣傳鼓動，為「徹底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而奮鬥^①。

毛澤東報告完畢，接著由林伯渠草草作了「蘇維埃經濟建設報告」，接著，大會通過會期縮短五天，定二月一日閉幕。最後，毛澤東還說：這樣的縮短時間，是為了代表們早些回去動員群眾^②，對大會的工作並不妨礙。

三十日上午由毛澤東作「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他把廿四日所作的「工作報告」所未涉及或是強調得不夠的問題，在「結論」中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其中特別對於反對國軍第五次圍剿問題，對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策略問題，關於蘇維埃婚姻法問題，戰爭與群眾生活的關係問題，都作了說明。

二月一日上午選舉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一百七十五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三十五人。畢士狄、張然和、洪水和我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表面上名單係由各個代表團討論通過，但事實上是由中共中央組織局決定後向大會主席團提出，經各個代表團討論後再由主席團向大會提出的，所謂「選舉」只是形式而已。

第二次「全蘇」大會至此宣告閉會。

二月三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十七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休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構。並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同時又選舉

①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二次全蘇大會特刊第六期。

② 同註①。

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民主國家的內閣總理）。

由這次人事的安排，很明顯地可看出，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已由國際派首領之一張聞天取而代之，這是國際派對毛澤東的另一次嚴重的打擊。

二 兩種情況、兩種說法

毛澤東在「工作報告」中，一方面誇稱中共在反擊國軍的第四次圍剿中獲得一些「勝利」，但又不能不承認徐向前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因在主觀上犯了某些錯誤，而不得不退出鄂豫皖蘇區；同時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在國軍的追擊下，不得不退出洪湖根據地。

在講到「中央蘇區」時，毛澤東極盡虛妄誇大之能事，他說：不但工農紅軍的數量增加了，而且質量也增強了。蘇維埃的「領土」也擴大了。在福建的西北部和江西的東部已經擴展了廣大的蘇區，增加了近一百萬人口，建立了新的閩贛省蘇和粵贛省蘇。據我記憶所及，當毛澤東作此「報告」時，「中央蘇區」包括下列七個地區：

- (一) 江西省蘇（設於寧都）；
- (二) 福建省蘇（設於汀州）；
- (三) 閩贛省蘇（設於建寧）；
- (四) 粵贛省蘇（設於會昌）；
- (五) 閩浙贛省蘇（設於贛東之廣豐）；
- (六) 湘贛省蘇（設於贛西之蓮花、永新）；

(七)湘鄂贛省蘇(設於湘東和鄂南)。

然而事實上，所謂「新建」的粵贛省僅包括安遠、信豐、尋烏、會昌等地區，其中會昌縣卻是老蘇區，而安遠、信豐、尋烏大部份仍然是時紅時白的游擊區。此外閩贛省、湘贛省的情形大致上與粵贛省差不多。

毛的「工作報告」，一方面炫耀了蘇區的擴大和發展，另一方面對於「蘇維埃工作」中的弱點缺點，也作了有限度的「自我批評」，他說：

在「一切為了戰爭」的任務下，我們(中共自稱)還不能使一切蘇維埃工作完全適合於革命戰爭的要求^③。毛又說，無論在土地革命方面，在工人鬥爭方面、經濟建設方面、肅反鬥爭方面，以及文教工作方面，都有弱點存在。在蘇維埃機關中，也存在著一些不了解，甚至不願意執行蘇維埃法令、政策的份子。這些份子當中，有些是嚴重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者，有些簡直是地主資產階級派遣進來的「暗探」，他們不是推進蘇維埃工作，而是在破壞蘇維埃工作。他們使蘇維埃工作與戰爭分離，他們用空談空喊，甚至用強迫命令——官僚主義去執行蘇維埃工作。……這些就是蘇維埃工作中嚴重的弱點^④。

「工作報告」中又說，在蘇維埃機關中，還有這樣的情形，有些蘇維埃工作人員只講擴大紅軍、派伕子、收土地稅、推銷公債，其他事情都不管，也不講，比如汀州市蘇維埃政府，只管擴大紅軍，動員運輸隊，對於群眾生活問題一點也不管。汀州市的群眾沒有柴火燒，沒

③ 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二次全蘇大會特刊第七期。

④ 同註③。

有鹽吃，沒有房子住，那裡缺糧，米價又貴。這些都是實際問題。汀州群眾都盼望蘇維埃政府幫助他們解決，但汀州市蘇採取官僚主義，一點也不討論^⑤。

「報告」中又說，在閩贛省、粵贛省和湘鄂贛省的某些地區，蘇維埃工作人員與群眾的關係是很不好的。特別是那些嚴重的機會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他們不明瞭下層的情形，不理解群眾的情緒，只是空談空喊，甚至用強迫命令來對待群眾^⑥；

最後，毛澤東說，二次全蘇大會應該嚴厲指責這些蘇維埃工作人員，他們的觀點和方法是絕對錯誤的，是妨礙蘇維埃工作的。……我們要把那些頑強不肯改變的份子從蘇維埃機關中洗刷出去^⑦。

毛澤東在「工作報告」中，對於擴大紅軍工作亦作了誇大的宣傳。他說，紅軍在兩年中擴大了好幾倍。在一九三三年五月的一個月中，僅江西蘇區的若干縣份就擴大了近兩萬紅軍。但「擴紅」的結果如何呢？擴大來的「新戰士」能否鞏固呢？事實證明，由於「擴紅」工作採取了強迫的手段，加以地方蘇維埃政府對於優紅（優待紅軍）工作執行得非常差勁，「新戰士」情緒很壞，鬥志低落。開小差現象非常嚴重，就在中共大肆叫囂的「擴紅突擊月」——一九三三年五月的一個月中，紅一軍團（林彪部隊）逃兵就有二〇三人；紅三軍團（彭德懷部隊）逃兵九十八人；紅五軍團逃兵二百多人；紅獨立一團逃兵一〇二人；而同年

⑤ 同註③。

⑥ 同註③。

⑦ 同註③。

十一、十二兩個月中，開小差回家者，竟達二萬八千多人，僅瑞金一縣逃跑回家者達四千三百多人。這些現象對於中共提出「擴大一百萬鐵的紅軍」，真是莫大的諷刺。

三 「福建事變」的經緯

在這裡，我想回憶一下當時我所接觸到的有關福建事變的若干情況。

所謂「福建事變」，乃是陳銘樞、李濟琛等利用十九路軍的勢力和福建省的地盤，標榜所謂「反日反蔣」，勾結中共，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背叛國民政府的事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陳銘樞出任京滬衛戍司令，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勾結第三黨、改組派等失意軍人、無聊政客，形成所謂第三勢力，並勾結中共，表面上標榜「抗日」，實際上是進行叛國勾當。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時，陳銘樞等復利用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的聲望，更加囂張活躍起來。嗣因上海抗戰結束，十九路軍調入福建，國民政府任命蔣光鼐為福建省主席，蔡廷鍇為十九路軍總指揮。陳銘樞等乃糾合第三黨、讀書雜誌社（陳銘樞自任社長）、孤軍社以及十九路軍、福建省政府重要軍政幹部，組織「生產大眾黨」，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間，派遣蔡廷鍇的秘書陳名鴻為全權代表，攜帶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四人署名的密函至紅都瑞金會晤毛澤東和朱德，要求訂立「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嗣於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和中共全權代表潘漢年（當時化名潘健行）簽訂「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之後，始於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召開「人民代表大會」，背叛國民政府。

福建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即從江西抽調了大部分剿共部隊經閩北向福州挺進，被圍剿中的紅軍，因而得到喘息的機會。那時所謂「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軍，曾要求中共中央迅速派紅軍主力部隊入閩與十九路軍並肩作戰。按照「反日反蔣初步協定」，中共應當迅速把紅軍主力開進閩北支援十九路軍，但中共對此項軍事協定，不但不重視，反而認為這是一種騙局，放在調動紅軍第三、五、七、九共四個軍團開進閩北和閩西南地區，接替十九路軍的防務之後，即按兵不動，坐視十九路軍單獨與國軍作戰。另一方面，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沒有幾天，中共在上海出版的《紅旗週報》即以「福建事變與我們的任務」為題，發表了一篇極為幼稚的社論，大罵十九路軍是軍閥，「人民革命政府」是一種新的政治欺騙。《紅旗週報》認為十九路軍和中共訂立軍事同盟的初步協定，是以暫時對紅軍的休戰來挽救福建危機。按照上海《紅旗週報》這種論調，中共坐視十九路軍孤軍作戰是沒有說不過去的。

據我所知的內幕消息，當陳銘樞等派全權代表到瑞金與中共簽訂「軍事同盟初步協定」，要求紅軍入閩與十九路軍並肩作戰時，毛澤東、朱德等主張採取積極行動，派出紅軍主力往閩北與十九路軍聯合作戰，一方面可吸引國軍到閩北，減輕國軍對蘇區的壓力；另一方面由紅軍的增援，可使十九路軍堅定鬥志，鞏固內部。可是博古、張聞天等當權派則認為「福建人民政府」同國民黨沒有什麼區別，他們的行動只不過是一些官僚政客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衆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是為了要阻止中國民衆的革命化與走向蘇維埃的道路，所以不主張採取積極的行動援助十九路軍。當權的國際派，認為在當時的鬥爭，或者是「帝國主義殖民地道路」，或者是「社會主義蘇維埃道路」，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這就是中共雖然同十九路軍簽訂了軍事協定。不但沒有採

取積極的行動協助十九路軍，反而把十九路軍臭罵一頓的原因所在。

至十二月初，國軍討閩逆部隊已由金谿、南城、臨川、崇仁一帶向閩北方面的十九路軍步步進逼，由於國軍行動神速，十九路軍在南平、建甌等處已陷於被動挨打的態勢，而國軍的實力已佔絕對的優勢。善於隨風轉舵的中共，乃於十二月十二日發表《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指責「福建人民政府」對於「軍事同盟」並無具體部署，「協定」中允許人民以言論自由卻以戒嚴令取消之；保護勞工也沒有具體辦法；「計口授田」卻不讓農民自動沒收地主的土地；武裝民眾也成了一句空話等等，還說「福建人民政府」既不是人民的，也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欺騙人民的把戲」^⑧。

十二月二十日，中共鑑於福建事變對於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有利時機即將消失，乃由毛澤東和朱德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與「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出通電，指責「人民政府」於「初步協定」簽訂後月餘，未積極採取「反日反蔣」具體行動，並要求組織義勇軍，集中一切武裝力量與國軍決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毛澤東、朱德又發出第二次通電，要求廣泛地發動民眾「反日反蔣」，武裝民眾，並肅清隊伍中的動搖份子，立即與紅軍共同作戰到底。

至一月十九日，十九路軍主力雖然竄抵閩南泉州一帶，但又為國軍所追擊，蔡廷鍇乃隻身乘飛機逃往龍岩。二十三日，也即二次全蘇大會開鑼的第二天，十九路軍的最後一個據點——龍岩終為國軍所攻克。至是，十九路軍已全部崩潰，所謂「福建人民政府」自成立

⑧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第三十八期。

迄失敗，為時僅兩月就被國軍收平了。

說到這裡，我想有必要澄清一個問題。那就是當十九路軍要求中共派紅軍主力入閩與十九路軍聯合作戰時。毛澤東、朱德等既然主張採取積極行動援助十九路軍，為什麼毛澤東在二次全蘇大會的「報告」及其「結論」中，大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為官僚政客，指責十九路軍為軍閥呢？

問題的奧秘是這樣：當時毛澤東處境非常艱難，他不但從來就被認為是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富農路線的執行者，而且就在數天前才閉幕的中共五中全會受到了國際派的嚴重打擊，他不能不有所警惕。何況，中共中央對福建「人民政府」政策問題，既有五中全會的「決議」，為毛澤東所必須遵循者。

是以儘管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發表了與博古、張聞天等當權派相左的意見，但在向二次全蘇大會做「報告」或者發表文告時，就不能不遵照當權派的意旨行事了。

四 場邊餘話

在二次全蘇大會正式開幕那天，有個很突出的場面，那就是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瞿秋白的公開露面。瞿秋白是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離開上海，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抵達瑞金的。他參加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之後，接著參加二次全蘇大會。他於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一時許，二次全蘇大會「開幕典禮」之前，在朱德陪同下來到大會場。他穿著一套很別致的棉衣褲，戴著深藍色的絨綠帽，穿的衣服是剛從政府區帶進來的，與普通蘇維

埃工作人員所穿者截然不同，難怪為全體與會人員所矚目。曾經在政府區工作過而能認識他的人，都跑去和他握手問好，不認識他的，也都由朱德介紹與之握手。

瞿秋白抵達瑞金沒有幾天，我從徐特立那邊得知他的住址之後，即去和他會晤。自一九二六年在上海與他握別以後，幾年來一直在兵荒馬亂中奔跑，以前他有嚴重的肺病，臉色很不好，現在看起來，身體比以前好得多，精神也很好。當我介紹月蟾與他認識時，他就慈祥地問這個、問那個。他對於曾經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的幾個台灣同學特別關懷，當我告訴他，他最得意的門生翁澤生（台共創立人之一）已經在政府區失蹤時，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他住的地方很簡陋，一間破舊的民房，是剛用石灰粉刷過的，裡面用竹屏隔成兩間，一為臥室，一為辦公室。這時他雖然還沒有正式上班，但他已經召見了工農劇社和高爾基戲劇學校的主要幹部，初步的了解蘇區劇運的情況，足見他很關心蘇區的戲劇活動。準備在二次全蘇大會上演的《我——紅軍》四幕話劇的劇本，他也予以過目，並提出了修正意見。在二次全蘇大會上他當選連任「中央執行委員」並連任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

二次全蘇大會開幕那天晚上，有個「慶祝晚會」，有所謂「蘇維埃三大明星」的舞蹈、活報、四幕大話劇《我——紅軍》等精彩節目。晚會還未開始，正中禮堂和兩廂走廊的閣樓上下都坐滿了。舞台前三排是大會主席團成員和黨、政、軍首要的座位。毛澤東、博古、周恩來、凱豐等都帶了他們的「愛人」來觀看演出。在前三排的座位上，有兩個特別來賓為全場與會人員所矚目，一個是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常駐代表，他在潘漢年陪同下，前來觀看演出。另一位是第三國際駐蘇區軍事顧問李德，坐在他旁邊的是他年輕的中國嬌妻蕭月華。

晚會還沒有開幕，台下觀眾，特別是那些年輕的紅軍代表們已在高聲唱起「上前線」、「少年先鋒隊」等歌曲。正在這時候，驟然「轟」的一聲，正中後面走廊閣樓倒下來了。一時會場大亂。我看見軍事顧問李德飛也似的立刻跑上去搶救人。

李德是德籍俄共黨員，是第三國際派駐蘇區的軍事顧問。他化名「華夫」，在未進入蘇區之前，曾對中國軍事問題下工夫作過一番調查研究，寫了《論中國軍隊》一書，就國軍的編制、訓練、輜重、士氣等問題做了系統的介紹。他於一九三三年八月間，化裝神父，從汕頭經大埔的中共祕密交通路線潛入江西蘇區。為了解救他在山區的「寂寞」，中共還介紹了一位年輕強壯的女工名叫蕭月華的給他做「愛人」，還請了一個特別廚師給他燒菜。據說他一個人每天要吃一隻雞。蕭月華白天上工廠做工，吃公家飯，晚上才回到中共特別為李德蓋的一所新房子去。

蘇區沒有麵包，特別廚師就用饅頭經過油炸過後當作麵包。軍事顧問的工作也相當的忙，他每天要看紅軍總司令部送來的一大堆軍事情報，由王世泰翻譯給他看，他還經常寫軍事專論刊登在《革命與戰爭》雜誌上。此外，還要去紅軍大學講課。他寫的《紅軍在堡壘主義下的戰術》專論，是當時紅軍高級幹部必須遵照執行的戰術原則，也是當時流行於紅軍中的所謂「構築支撐點的防禦戰術」和所謂「短促突擊」戰術的根本依據。後來毛澤東強烈地反對這種「短促突擊」戰術，他說，「堡壘主義下的五次圍剿時期，我們不能用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禦，從事『短促突擊』這種說法是不對的」^⑨。

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二一頁。

守衛大會場的政治保衛人員已經將閣樓倒下來木板、碎片，被壓壞了的椅子等都收拾乾淨了。全場已恢復了平靜：晚會也就正式開演了。

開頭是聽膩了的那一套軍歌、紀念歌曲、山歌、活報等等。所謂「蘇維埃三大明星」的「農作舞」，完全是從蘇聯學來的那一套，是把蘇區農婦「幹農活」的動作，以優美的旋律和村女樸素健美的豐姿表現出來。「三大明星」之一的李伯釗，四川人，是蘇區唯一的留俄女學生，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就喜歡出鋒頭，參加歌唱和戲劇活動，她擅長蘇聯邊疆民族舞，其中烏克蘭舞和高加索舞最為拿手。她還學會了蘇聯各種歌謠，流行於紅軍中「都娘」、「上前線」等歌曲便是她參與編製的。

李伯釗自與王觀瀾分離後即到工農劇社工作，初任編導，後來任社長。高爾基戲劇學校成立後她又兼任該校校長。她不但是一位很好的舞蹈家，也是一位好演員。將在二次全蘇大會演出的《我——紅軍》四幕大型話劇中，她還扮演重要的角色呢。

《我——紅軍》作者陳微明，係留俄學生，「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也是王明國際派在文藝活動方面的得力幹部，那時擔任蘇維埃大學副校長，兼任教育人民委員部藝術局副局長。他是一九三三年春進入江西蘇區的。

《我——紅軍》是描寫「紅軍」與國軍經過一次劇烈的戰鬥之後，紅軍部隊在進行休整期間一場「攻心戰」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中共的特務頭子李克農竟然粉墨登場，他和特務幹部胡底、趙品三扮演「國軍」官長；前任工農劇社社長、安南民族代表洪水，扮演「紅軍」指導員；李伯釗扮演中共農村女幹部，她經常領導一批農村婦女為「紅軍哥哥」洗衣服，並經常往返於游擊區，偵察國軍情況，把「情報」送給紅軍。這是一齣對國軍大肆造謠誣蔑，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而對紅軍極盡誇大渲染之能事的極為低級趣味的宣傳鬧劇。

拾、擴大紅軍運動

一 經常性的動員工作

在中共的觀念中，紅軍是所謂「統治機器」重要的一部份，是搞暴力革命的主要工具，同時又是蘇維埃政權的支柱，因而擴大紅軍便成為中共各級黨部和各級蘇維埃政府的一項經常性的動員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乘機擴大叛亂，叫囂著要「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省首先勝利」，嗣後又提出「擴大一百萬紅軍」的狂妄號召。中共蘇區中央局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發出「擴大紅軍問題的決議」，規定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三月三個月擴大二萬三千紅軍新戰士。但這次擴大紅軍的動員工作做得非常不夠，乃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復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出「擴大紅軍問題的訓令」，接著同年十月在全蘇區進行了人口統計，普遍組織赤衛軍、少先隊，作為擴大紅軍動員的基礎。

一九三二年六月，我初進入江西蘇區時，正在第一次擴大紅軍運動的高潮中。蘇區反帝總同盟為了配合擴紅，乃督促各省、各縣反帝同盟召開代表大會，進行動員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我由瑞金出發到汀州出席福建省反帝同盟代表大會，會後轉到長汀、寧化、清流三縣反帝同盟巡視工作，並通過各縣盟代表大會進行擴紅的動員工作。

一般的說來，各縣盟（縣反帝同盟之簡稱）工作都很差勁，縣盟本身組織不健全，幹部兼職的多，簡直成了黨團、工會的附屬品，每一項動員工作反帝同盟都參與，但實際上反帝同盟的盟員同時又是貧農團或工會的會員，同盟本身並沒有獨立的工作。

我在長汀會晤了中共長汀縣委書記李堅貞，她坦率地對我說，長汀縣的擴紅工作很差勁，原因是一般基層幹部能力差，不善於做生動活潑的宣傳鼓動工作。關於長汀縣反帝同盟工作，她已按照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將在最近召開縣反帝同盟代表大會，進行動員工作。

李堅貞是廣東省客家人，童養媳出身，由於不滿婚姻，脫離家庭，參加農民暴動，並成為中共黨員，曾在紅軍中擔任民運工作，後來轉入閩西蘇區擔任婦女工作。李堅貞長得高頭大馬，爽朗大方，她穿著一套列寧裝，戴紅軍帽，腰間束著一條古銅色皮帶，裹著綁腿，帶著一種村女所具有的樸素雅淡的儀態。她雖然識字不多，但由於在工作中勤勉學習，已能看懂中共黨和蘇維埃文件。她擅長組織，尤其是做動員工作更有一手。動員紅軍家屬鬥爭開小差回家的老公（丈夫）歸隊去，這是當時中共長汀縣委的中心任務，長汀縣委的幾個部長級幹部都下鄉動員去了，只有李堅貞坐鎮縣委指揮。我住在長汀縣蘇維埃政府，因為縣盟主任由縣蘇文化部長兼任，縣反帝同盟的招牌也就和縣蘇的招牌掛在一起。

我在長汀縣盤桓了幾天，完成了兩件事：參加了長汀縣反帝同盟代表大會；到了一個鄉

幫助擴紅工作。之後又趕了幾天路程，抵達寧化縣。縣反帝同盟和縣工會合署辦公，縣盟主任係由縣工會文化教育部長兼任，而縣盟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也都分別由貧農團、互濟會等群眾團體的職員兼任。

寧化是個古老的山城，全城只有百來戶人家，一條狹小的街巷裡，有二、三十家歪斜斜，破爛不堪的小店，賣一些番薯、花生、黃豆、粗紙、茶油、豆腐乾、菸葉等等，除此之外，到處是斷垣殘壁，顯得非常的蕭條和淒涼。寧化縣一大半是中心區，一小部份是游擊區，因此，無論是黨、團工作、蘇維埃工作，以及群眾團體工作，都很不穩定。縣盟的組織情形及其擴紅動員工作，和我在長汀縣所看到的差不多。它給我的印象是一切工作平平凡凡，沒有值得一提的。

中共寧化縣委書記霍步青是個精明能幹的知識分子幹部，半年前才從瑞金調到寧化。我在瑞金曾會晤過他，那時他在紅軍學校當政治教員，他的愛人朱月倩也在紅軍學校當過文化教員。霍步青在紅軍學校任職時，曾因有托派嫌疑被鬥爭過，調到寧化縣來，顯然有貶謫的意味。我們能夠在這樣荒涼的山城重逢，不免要暢談一番，何況我們又都是知識分子的同一類型，所以彼此都談得很投機。朱月倩還殺了鵝款待遠從瑞金來的客人呢。

我在寧化盤桓了約一星期，便到清流縣去。清流縣大部分是游擊區，縣城還在國軍手中，中共縣委、縣蘇等機關都是隨時移動的。我從寧化縣蘇那邊要了一個「交通」帶路，好容易才找到清流縣一級機關駐紮的地點。我在游擊區趕路時，往往是一天數驚。雖然一路上都有游擊隊暗中「保護」著，但還是時常提心吊膽的，縣黨部、縣蘇等機關人員都全部武裝起來，隨時應付緊急情況。我在清流縣盟，只逗留了兩天，因為情況緊張，擴紅動員工作不好做，

我也只好在機關裡交換一些意見，佈置一些工作，便匆匆告辭了。經過了一段崎嶇陡峭的山路，在整天看不到一個人影的荒涼恐怖的游擊區裡，夜以繼日，繼續奔跑，終於抵達汀州城，嗣由汀州折返瑞金。

我這次在汀州、長汀、寧化、清流等地區所看到和接觸到的有關擴大紅軍的實際情形，與中共在文件上或在報刊上所誇大渲染者完全是兩回事。換句話說，在擴大紅軍的動員工作上，中共所宣傳者完全與實際情況迥異，我將在汀州、長汀、寧化、清流四個地區所看到和接觸到的擴紅動員工作的得失加以綜合整理，大致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地方蘇維埃政府對於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決議」和「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訓令」中關於擴大紅軍的號召漠不關心，甚至對於擴紅計畫的執行表示消極怠工，將擴紅工作委之於擁護紅軍委員會，而自己卻站在不負責任的地位；

（二）事實上各級蘇維埃政府，甚而個別中共黨部，以強迫命令來代替宣傳鼓動工作甚至變相的利用誘的方法（例如送物品鼓勵）來代替政治動員；

（三）大多數的黨組織和蘇維埃工作人員，對於擴紅工作，不是當作一種經常性的工作，而是忽熱忽冷的現象，有時表現出敷衍塞責的態度；

（四）對於「擴大」來的新戰士質量不加考察，不管是體弱的，年紀太小的，年老的甚至連「階級異己分子」都送到紅軍中去充數，這樣不但不能擴大紅軍，反而是破壞紅軍；

（五）最嚴重的是許多區、鄉蘇維埃政府對於開小差回家的逃兵，不積極督促其歸隊反而把他們安插在地方機關裡工作。有的蘇維埃工作人員竟然替紅軍家屬寫信叫紅軍士兵回家，這對於中共擴大紅軍的動員不啻是莫大的諷刺。

二 紅軍的後備隊——赤衛軍

我很客觀地把中共蘇區中央局「擴大紅軍運動」失敗的原因加以考察，發現中共在主觀上認為戰爭的擴大和蘇維埃運動的開展，要求著紅軍的迅速壯大，擴大紅軍便成為「奪取中心城市」和「爭取江西省的首先勝利」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然而中共這種主觀願望，不但與客觀形勢發展相違背，而且與工農群眾的基本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何況，中共擴大紅軍採取強迫命令的方式，使得一般工農群眾害怕當紅軍。雖然中共用物質利誘的辦法（諸如分田地、優待紅屬、耕田隊、慰勞隊、免稅等等）裹脅工人農民當紅軍，但工人農民還是不願意離鄉背井，隨紅軍到處游擊流竄。

中共蘇區中央局鑑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擴大紅軍運動失敗，乃不得不改弦更轍，於一九三二年九月，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頒發「擴大紅軍問題的訓令」。接著又於同年十月，對全蘇區人口進行全面的調查，並根據戶口調查進行赤衛軍的編組。如果說，中共蘇區中央局「擴大紅軍問題的決議」的重點是放在「直接加入紅軍」的話，那麼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擴大紅軍問題的訓令」的重點則是放在赤衛軍的擴編上。

關於「決議」的主要內容及其在運動中的得失，在前面已有分析，不再贅述，這裡擬就「訓令」的主要內容說明一下：

（一）要號召全蘇區的工農群眾武裝起來，建立最廣泛的群眾武裝——赤衛軍、少先隊；（二）凡十八歲到四十歲的男女群眾，都應當編入赤衛軍加以教育和訓練，以建立將來實行義務兵役制的基础；

(三) 赤衛軍編制，以一縣成立一軍；每三區成立一師；每區成立一團；每鄉成立一營；每一營轄三連至五連；每連轄二排；每排三班至五班；每班十人至十五人。城市以工人為主幹，單獨成立工人赤衛軍；

(四) 赤衛軍隸屬於各軍區，軍長由縣軍事部長兼任；政委由中共縣委書記兼任；師長由縣軍事部呈請軍區委任。團長由區軍事部長兼任；團政委則由中共區委書記兼任；

(五) 赤衛軍每區成立一個模範營，每縣成立一個模範師。模範營和模範師，不僅隨時集中，配合主力紅軍行動，並且作為赤衛軍下級幹部訓練的場所，同時又準備到補充團和直接到紅軍部隊裡去；

(六) 為著主力紅軍能夠充分得到兵員的補充，每縣成立一個補充團。補充團接收新戰士加以短期訓練後轉送到紅軍去；

(七) 軍區負責辦一個教導隊或訓練班，經常訓練和培養赤衛軍、游擊隊、獨立團的中級幹部。

以上，我把當時江西蘇區有關赤衛軍的編組和訓練予以簡要的說明，目的在於了解中共在抗日戰爭時期迄竊據大陸前（一九三七—一九四八年）的民兵制度。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人民武裝——民兵組織，以及一九五八年實行「全民皆兵」和擴編民兵師的制度和措施，都是由蘇維埃時期群眾武裝——赤衛軍演變而來者。

三 連續「擴紅突擊」運動

至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革軍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之簡稱），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擬訂了「擴紅突擊運動」的計畫，規定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底以前，全蘇區擴大二萬五千名新戰士。全蘇區的黨、團組織、蘇維埃政府，及工會、反帝同盟等群眾團體，都要按照這個計畫進行熱烈的擴紅突擊運動。黨、政、軍、群、中央一級機關在中共蘇區中央局直接領導之下，立即動員起來，組織了突擊隊，出發到各省各縣幫助各地完成這一計畫。

蘇區反帝總同盟在這一計畫下，也作了緊急的動員，分為二個步驟：一由張華（總組織部長）到瑞金縣幫助突擊工作；二由我和張榮（組織部員）、楊秀珍（青年部員）三人出發到興國、勝利兩縣幫助突擊工作，同時也巡視該兩縣反帝同盟工作。

張華是瑞金紅軍學校反帝同盟主任，調派在蘇區反帝總同盟擔任組織部長，是一個活潑踏實的青年幹部。他到中央突擊隊報到後，被分配到瑞金縣擔任下肖區突擊隊長。他的突擊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曾為中共蘇區中央局所稱讚，《紅色中華》還特別為文介紹了張華在下肖區擴紅突擊運動的經驗。我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完成了擴紅突擊和巡視工作，由石城回到瑞金後，在一次會報中和張華會晤了。他對我有系統的談了他在下肖區擴紅突擊運動的情況，下面是他談話的大意：

我（張華）在下肖區的突擊工作能夠有所成就，主要是抓緊了歸隊運動這一重要的一環。事實證明我的歸隊動員工作是成功的，下肖區一百多個開小差回家的紅軍士兵全部歸隊了，也就是下肖區的擴紅突擊計畫全部完成了。

我們嚴厲地對歸隊運動失掉信心、認為「沒有辦法」的機會主義者進行了思想鬥爭，洗刷了一批消極怠工、妨礙歸隊運動的突擊隊員，並提拔了積極分子。

嚴厲打擊了開小差的頭目，把他們抓起來開群眾大會公審，並把他們槍斃了，逃兵也就立即報名歸隊。在歸隊運動中特別注意逃兵家屬的困難：組織砍柴隊，把砍來的柴火無代價送給逃兵家屬，發動少先隊員給逃兵的家屬挑水，使逃兵覺得他們家裡已經沒有什麼困難，因而自覺的歸隊。在下肖區的區委和區蘇維機關裡面尚有數名逃兵隱藏著，其中包括了以前的區蘇副主席和軍事部職員。「我們的副主席都不歸隊，為什麼要我們歸隊呢？」逃兵總是這樣埋怨的說。突擊隊立即抓住這個事例，展開思想鬥爭，並說服了那個副主席和其他蘇維埃機關的職員歸隊，在逃兵中起領導作用，全鄉的逃兵也就全部歸隊。

張華還說：我們用算帳的辦法來對付逃兵，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我們組織了一個「清算委員會」，對付那些頑強不歸隊的逃兵，清算過去所有群眾幫助他們家屬耕田、舂米、挑水、砍柴的人工和他們從紅軍中所帶回的軍服及其他軍用品，加倍罰他們，要他們賠償，這樣一來，就有許多逃兵報名歸隊了。

張華在瑞金縣下肖區的突擊經驗，只不過是一個典型而已。《紅色中華》把這一典型的事例一披露，各地突擊隊也就競相倣效了。

我們一行（我和張榮、楊秀珍），大約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從瑞金出發，到興國、勝利、寧都、石城四縣巡視工作。其中只有興國、勝利兩縣是去幫助擴紅突擊工作，寧都、石城則主要是巡視該兩縣的反帝同盟工作。我們大概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從最後一站——石城回到瑞金。現將我在興國和勝利所接觸到的有關擴紅突擊的情形簡單的說一說：

興國縣是游擊戰爭開展得最早的老蘇區，工作有些基礎，被譽為模範鄉的長岡鄉，就是隸屬於興國縣。這個縣是紅軍總政治部的突擊區，總政治部動員部長羅榮桓是興國縣突擊隊長。他是一個月前就到興國來突擊的。自從一九三二年五月我在漳州和他握別後，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他頭髮蓬亂，滿臉鬍鬚，臉上一片菜色，顯得非常疲倦的樣子。他對我說，你們來得真好，興國縣盟代表大會後天就要召開了——這是興國縣反帝同盟老早就通知了我的。

羅榮桓雖然十分忙碌，但他還是每天和我碰頭，交換意見。羅榮桓坦率的說，興國縣的逃兵本來很不少。僅長岡鄉就有一百多個，不過這些都已經報名歸隊了。其他鄉的歸隊工作做得很壞，有的鄉蘇對於歸隊工作完全忽視，他們用很簡單的強迫命令方式來對付逃兵。有一個鄉蘇在一個群眾大會上，竟用繩子把逃兵綑綁起來，強迫他們歸隊。因此一般逃兵一見蘇維埃人員下鄉就躲起來。

羅榮桓還說，有些鄉蘇對於優待紅屬工作沒有做好，也很快地影響到擴紅工作。紅屬有許多困難，鄉蘇完全採取不理的態度，有的紅軍新戰士已經去了七、八個月，而家中還沒有得到「優待」，這樣便助長了開小差的風氣。

羅榮桓又說，我們前幾天召開了一次紅軍家屬聯席會議，在會議上用競賽的方式，互訂競賽條約，例如提出「不讓自己的老公（丈夫）不歸隊」，這個辦法很有效果；我們舉行耕田隊會議、合作社會議專門討論優待紅軍家屬問題，並組織慰問隊去慰問紅屬，發動耕田隊去幫助紅屬耕田。在合作社社員大會上宣佈保證優待紅屬，使他們不會發生任何困難等等，這些工作都能收到效果。

羅榮桓在興國縣擴紅突擊工作「超額完成了任務」，獲得「擴大紅軍的模範」獎旗一面。我們在興國逗留了約一星期，就轉到距興國八、九十里的「勝利縣」去。所謂「勝利縣」，乃是中共為紀念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反圍剿」時，在龍岡一役取得「勝利」而得名。

「勝利縣」的擴紅突擊隊長金維映（又名阿金），是個有能力的知識分子女幹部，曾擔任過彭楊紅軍學校的政治教員。她是鄧小平的愛人（太太），本來和鄧小平一起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一九三三年二月鄧小平被國際派整肅後，她就被下放到「勝利縣」擔任擴紅突擊隊長。金維映有一張清秀的臉龐，那廣而明淨的前額，顯出她端莊大方的儀態。她生活簡樸，平易近人，富說服力的談吐，很能夠引起農民的共鳴。她能夠贏得這次擴紅突擊的模範獎不是偶然的。因為她是「女同志」，紅屬都喜歡和她談話，紅屬有什麼困難，都能夠坦然向她訴苦。這次與我同行的楊秀珍是一個紅屬，老公在紅軍部隊裡兩年多了，她有許多困難和苦悶，平時都不敢向總同盟提出。這一次我們帶她出來，旨在使她多了解基層工作的情況。她和金維映很談得來。她所知道的一些情況，在這一次巡視工作中所聽到和所看到的，特別是有關紅軍家屬的情況、擴紅運動中的醜聞等等，都對金維映細說了。同時她又從金維映那邊得知了許多有關擴大紅軍突擊運動中的「小故事」，那是一些錯誤或惡果。這些「小故事」，在一般的會議上是聽不到的，在公開的報刊更是看不到的。現在根據我記憶所及，把那時金維映和楊秀珍對我談的有關擴紅運動中的一些小故事略舉數則於下：

（一）在興國城郊有一個青年農民，一家五口專靠他勞動來維持生活。在一九三二年擴紅運動中，鄉蘇迫其參加紅軍，他逃到山上去，鄉蘇把他的母親和老婆抓起來。他只好到鄉蘇報到，並要求釋放母親和老婆，鄉蘇將其母親、老婆釋放後，他即當眾用菜刀將右手四指

斬斷，並向群眾說，我的手指已經斷了，不能當兵了。鄉蘇不得已處罰其做半年苦工了事。

(二) 瑞金九堡的紅軍殘廢院，經常就有一些年輕的婦女，打扮得花枝招展來要求與殘廢者結婚，她們的理由是：如嫁給身體完全的人，必須去當紅軍；若嫁殘廢，則可保證夫妻相聚到老。

(三) 瑞金縣有一個紅軍家屬，她的老公當紅軍有四年多了，頭一兩年還寫信回家，後來有兩年多沒有消息。那個紅屬幾次到鄉蘇要求離婚重嫁，鄉蘇一直不理，那個紅屬就懸樑自盡了。(筆者按：這樣的事例很多，後來蘇維埃政府才在《婚姻條例》上正式規定，凡是紅軍的妻子三年得不到前方自己老公的書信時，可以提出離婚。)

(四) 興國有一個年輕紅屬，當她知道她的老公已經「犧牲」了，就有許多青年要與她結婚，她都不肯，她寧願嫁了一個四五十歲的老頭子。她的理由是如再嫁壯年人，要去當紅軍，非但夫妻不能團聚，且有再做寡婦的危險。

我們在「勝利縣」工作了一星期，又轉到了寧都去。寧都是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我們會晤了李富春（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和蔡暢（李富春妻，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及少共江西省委書記張績之等人。接洽工作之後，就住在江西省盟，輔助省盟開完了省盟代表大會，又轉到石城縣去。我們在寧都和石城的主要任務是巡視該兩縣反帝同盟的工作，直接與擴紅突擊運動關聯者不多，故從略。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152

拾壹、蘇區的男女關係

一 饒有趣味的一夕談

我們在「勝利」縣工作時間雖很短促，但「勝利」縣擴紅突擊隊長金維映卻很滿意我們給她的支援。事實上這多半還是得力於楊秀珍在紅軍家屬中優異的活動。她在中共「勝利」縣召開的紅軍家屬代表大會上，以「紅屬」的身分現身說法，把她在瑞金和興國的「先進經驗」，以及有關紅軍家屬切身的問題，用生動活潑的實例和富於熱情的話語感動了所有與會的紅軍家屬，當場就有許多紅屬響應了中共「黨」和蘇維埃的號召，互相寫下了「挑戰書」。保證開小差回家的「老公」回到紅軍中去。「勝利」縣紅軍家屬代表大會獲得完滿成果，擴紅突擊計畫也超額完成了。後來，金維映還獲得了「擴大紅軍模範」的獎旗。

我們在「勝利」縣的任務已經完成，第二天就要轉到寧都去了，那天，金維映高高興興地殺了一隻雞請我們吃飯，一方面表示「酬勞」，另一方面表示餞行的意思。

在蘇區「紅白」交界的地區買雞並不困難，困難的是殺了雞，沒有鹽調味，實在是大殺風景。原來向蘇區農民買雞，只要表示「以鹽交換」，這個「交易」立即可成；如果是用蘇幣，雞就難買到了。後來我才知道，金維映是拿出了二兩鹽交給楊秀珍在紅軍家屬中買到的。在鹽的問題上顯示了兩點：第一，由於國軍嚴密封鎖，使蘇區農民過著沒有鹽吃的生活達四年之久；第二，蘇區農民普遍地抵制「蘇幣」，這種現象在「紅白」交界地區特別嚴重。

那天晚上，我們和金維映痛痛快快地談了好幾個鐘頭。我們的話題從擴紅突擊開始，隨即轉為大談特談紅軍家屬問題，其中最中心的一點，就是蘇維埃政府對於紅軍家屬要求離婚採取干涉和壓制的態度是不合理的。楊秀珍率真地反映了這種情況，她激動地說，蘇維埃政府幹麼要過份干涉紅軍家屬離婚自由，結果引起了紅軍家屬普遍的反感，做出許多「不道德」的行為。現在許多的紅軍家屬老長期在部隊中，家裡的農活自己幹，農忙的時候，不免要雇人做活；耕田隊來了，對年輕的紅屬又要勾引，這樣紅軍家屬和「男同志」接觸的機會就多了，說實在的，「守規矩」的紅軍家屬能有幾個呢？

金維映也感嘆的說：連我也有點莫名其妙，蘇維埃的《離婚條例》明明規定，蘇維埃公民離婚是自由的，不但男女雙方同意就可以離婚；即使男女任何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也可以離婚。為什麼非紅軍家屬離婚可以自由，而紅屬就沒有這種自由呢？但紅軍家屬在地下亂搞，年輕的紅軍家屬沒有「秘密老公」的實在太少了。這不就是對紅軍家屬過份的壓制所造成的惡果嗎？坐在旁邊一直沒有開腔的張榮對著楊秀珍開玩笑的說：「秀珍，妳有幾個『秘密老公』嗎？」說得楊秀珍滿臉通紅，好久不能自適。她只是舉起拳頭作揍人狀，要不是在金維映的面前，恐怕就要打起架來了。「好了，好了，妳們在一起辦公，天天見面。有

無還能瞞過大家嗎？」金維映以老大姐的口氣，解圍的說。

因為明天我們還要趕路，這一場饒有趣味的漫談至此結束了。

金維映和楊秀珍的對話，在當時不免引起了我無限的感慨：也許是由於某種神祕感吸引了我，我進入蘇區之後，那奇妙的、混亂的男女關係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

二 性的解放

我又想起了李伯釗、楊尚昆和王觀瀾的三角關係。李伯釗和楊尚昆是在莫斯科結婚的，她到了江西不久，就和王觀瀾姘居了。在這裡，無所謂「結婚」的形式，也不問是否到鄉蘇政府登記（蘇維埃《婚姻條例》規定，男女結婚或離婚，都應到鄉蘇或市蘇登記）。但共產黨是講求事實的。在蘇區，只要男女有了「同居」事實的存在，蘇維埃的法律——《婚姻條例》就承認是「夫妻關係」，登記不登記是無所謂的。李伯釗是「有夫之婦」，她在蘇區和王觀瀾同居，並沒有受到蘇維埃法律的約束，可是誰都得承認李伯釗和王觀瀾的夫妻關係。後來楊尚昆來到江西蘇區，李伯釗又棄王而就楊。李、楊、王的三角關係，只是蘇區男女關係的一個典型。從這裡可以看出蘇區男女關係混亂到了何等程度！

在觀念上說，蘇區的男女關係，只能解釋為「性的解放」的象徵。是的：首先是經濟上的「解放」，蘇區的婦女和男子一樣分得了土地，一個女子出嫁了，她可以把自己分得的土地帶到丈夫那邊去（蘇維埃的《婚姻條例》規定，「男女各自的田地、財產各自處理」），蘇區婦女的經濟獨立了，她們在經濟上不再依靠丈夫了。隨著經濟上的解放而來的便是「性

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說，蘇區的婦女確確實實是被「解放」了。離婚、結婚都是自由的、任意的，只要男女的一方堅決要求離婚就隨時可以離婚。結果是一個女子結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者都是司空見慣。而這裏所說的，還是指公開的婚姻關係而言，至於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類的現象，更是非常普遍。

三 另一種方式的典型

在談到蘇區男女關係的時候，金維映、鄧小平和李維漢的三角關係，又是另一種方式的典型。不過，金維映的遭遇，似乎比李伯釗要「慘」些。一九三三年鄧小平被國際派指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執行者，而遭整肅之後，金維映即與鄧小平分離。此時李維漢（化名羅邁）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金維映與鄧小平分離的同時，也離開了工作崗位——中共江西省委會（設於寧都），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嗣被派到「勝利」縣擔任擴紅突擊隊長。由於她在擴紅突擊運動中立了「功」，因被提拔擔任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武裝總動員部（部長羅榮桓）副部長。由於工作關係，金維映與李維漢接觸的機會多了，不久便和李維漢沒有經過任何手續而結為「夫妻」，而且得到「公認」。一九三四—三五年，金維映隨紅軍西竄到了陝北，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設立「抗日軍政大學」，金維映任該校女生隊隊長：這一段時間她與李維漢的關係是正常的。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大批的女學生湧進延安，李維漢另有新歡，金維映成了黃臉婆，她和賀子貞（毛澤東妻）、劉群先（博古妻）同樣的運命：被送到莫斯科，名為「留學」，實為遺棄了。

以上是「公開結婚」的幾個顯著的例子。還有「祕密結婚」的方式，也不乏其例。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張聞天與劉伯堅之妻王淑貞的曖昧關係。張秉性浪漫，在莫斯科時曾與一俄女結婚。入江西蘇區後即鰥居，時張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黨報委員會書記。劉伯堅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長期在前線。劉伯堅的妻子王淑貞初在瑞金紅軍學校任教，後調入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任祕書。不久，王淑貞就成了張聞天的「祕密夫人」。此事在當時中共高級幹部中成了公開的祕密。

紅軍西竄，劉伯堅留江西蘇區被俘後遭槍斃。王淑貞也留在江西，劉伯堅死後再沒有她的消息。

一九三五年紅軍西竄到四川省松潘之毛兒蓋，張聞天復與劉英同居了。提到劉英，她是中共男女關係中應予大書特書的另一個典型。

劉英，湖南籍，在中學時即加入共青團，一九二七年在武漢戀愛結婚不久，被送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學，另與人同居。入江西蘇區後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經人撮合與伍修權（當時任教瑞金紅軍學校，兼任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結婚，僅同衾兩夜，即宣佈離婚，成為中共內部婚姻史中之趣聞，亦為「一杯水主義」之典型。抗戰初期，劉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學」去了，張聞天復與劉英之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懷孕，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產」，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乃為取名曰「鴻聲」，以影射「聞天」。此一趣聞，當時中共高級幹部幾乎無一不知。

四 柯崙泰女士「自由戀愛」的流毒

以上，我把江西蘇區的男女關係，特別是把中共高級幹部婚姻關係的幾種類型予以簡要介紹。中共在江西蘇區推行的婚姻自由制度，衝擊了贛、閩、湘、粵等邊境廣大的落後地區，破壞了這些地區固有歷史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觀念。換言之，中共在江西蘇區所推行的蘇維埃式的婚姻制度（它的中心內容是以蘇聯的婚姻制度為依據的）和中共高階層內部在婚姻關係上所表演的醜劇，深刻地影響了那些地區單純簡樸的農民家庭生活的劇烈變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在這裡，我想再回憶一下中共紅軍於一九三四—三五年西竄到陝北蘇區之後，將流毒於江西蘇區的、標榜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極端紊亂的男女關係帶到陝北蘇區的情況。

陝北蘇區是由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謝子長等開創起來的。他們雖然執行著列寧主義的暴動政策，但他們在倫理道德觀念方面多少還帶著中國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觀念，所以他們所領導控制的陝北蘇區，在婚姻關係上和男女關係上就沒有發生過劇變。然而自從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紅軍流竄到了陝北蘇區之後，情形就大變了，那表現著蘇維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於自由戀愛的男女關係的鬧劇在陝北蘇區開始重演了。影響所及，原來淳樸的陝北農村家庭生活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一九三六年春，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內務部科長高朗亭在一次由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時筆者任該部部长）召集的紅軍家屬工作會議上激昂感慨地說：自從「中央紅軍」來到陝北之後，掀起了兩個高潮：一為「中央紅軍」老幹部的結婚高潮；二為陝北紅軍家屬的離婚高潮。顯然這兩個高潮嚴重地破壞了陝北蘇區原有的淳樸的家庭生

活。高朗亭率真地說：中央紅軍到了陝北蘇區什麼都好（筆者按：這是當時陝北幹部對中央紅軍表面恭維的話，實際上並不如此），就是蘇維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意思是說，中央紅軍帶來的「離婚高潮」最不好。

中共在江西蘇區以及在陝北蘇區所推行的「自由婚姻」制度，顯然是根據共產主義的婚姻觀念而來的，而他們在江西蘇區所頒佈的《婚姻條例》（一九三一年）和《婚姻法》（一九三四年），不外是蘇聯《新婚姻法》的翻版。那麼，蘇聯《新婚姻法》所依據的是什麼呢？所謂共產主義的婚姻觀念的實質又是什麼呢？

這裡，我想用不著詳細敘述蘇聯新婚姻制度或所謂共產主義婚姻理論的具體內容；我們只要指出把「一杯水主義」的婚姻觀念帶進江西蘇區的幾個留俄幹部之間所表演的幾樁富於羅曼蒂克情調的自由戀愛故事就夠了。

依我在江西蘇區（一九三二—三四年）所看到的一些典型例子（前面已敘述），足以證明當時中共內部「一杯水主義」男女關係的盛行，顯然是柯崙泰女士「自由戀愛」的流毒所使然。柯崙泰女士（Kollontay）是早期俄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在「性關係」與婚姻關係上，主張男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之說，她以所謂「波格達諾夫主義」（Bogdanovism）研究男女關係，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個人應在各種目的下，自由與異性結合，並提出所謂「性本能」說。雖然這種「學說」曾受到列寧的批評，惟由於她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三年間擔任共產國際婦女部書記，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先後擔任蘇聯駐挪威大使和瑞典大使，遂使她的「自由戀愛」理論普遍流行於各國共黨圈裡，嚴重地破壞了舊式家庭。中共在其統治下的江西蘇區和陝北蘇區盛行「一杯水主義」的自由婚姻關係，同樣嚴重地破壞了中國固有歷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史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觀念。

拾貳、最後的掙扎

一 決戰的緊要關頭

一九三四年二月，國軍收平了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後，開始對江西蘇區紅軍進行新的圍剿。國軍鑑於已往幾次圍剿的經驗教訓，第五次圍剿採取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新戰略方針。此即：一方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另一方面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這就是國軍的碉堡封鎖政策。國軍這一新戰略方針，迫使紅軍過去所使用的「誘敵深入」、「圍點打援」、「擊破一方」、「先發制人」等戰略戰術完全無法得逞。

針對著國軍新的戰略戰術，共產國際駐蘇區軍事顧問李德，提出了一個所謂「短促突擊」的新戰術，以圖打破國軍的碉堡政策。李德在一篇以《論紅軍在堡壘主義下的戰術》為題的專論中，闡述了「短促突擊」新戰術的要義，其大意可概括為下列幾點：

(一) 紅軍回應敵人新戰術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堡壘主義條件下，尋求運動戰。不要在進攻敵人的堡壘中，來消耗紅軍的兵力和兵器，而是要在堡壘之外，在敵人的運動中來消滅其有生兵力；

(二) 向在運動中的敵人進行短促的側擊：當敵軍稍向前進時，突擊其先頭部隊；當敵軍較大膽前進到十里以外時，主要的是突擊其後梯隊；但紅軍總應使敵軍在其基本堡壘有效火力範圍以外，並且要截斷敵軍被突擊的部隊與其後續梯隊以及其堡壘間的聯繫；

(三) 在敵軍後續梯隊或從堡壘內出來的增援隊未到達之前，迅速解決戰鬥；這樣可使敵人無法補築堡壘及進行防禦戰；

(四) 為保證在新的方向實施突擊，出敵意表，要有各方面的偵察和高度的敏捷性；

(五) 為要預防敵人使用技術的影響起見，應特別注意：一、利用夜間及昏暗的條件（雨天、單霧、森林等）進行機動的戰鬥；二、採取積極和消極的防空方法；三、隱蔽的接敵。火器主要是用來直接的協助近距離的戰鬥，但最主要的是進行白刃戰鬥；

(六) 在紅軍的後方，與敵人的游擊部隊（即政府的地方團隊）鬥爭，原則上使用地方的獨立部隊，而不得分散紅軍部隊的兵力；

(七) 為要更確實的箝制敵人，紅軍應利用支撐點及其他堡壘。守備的火力隊在堡壘內，而突擊隊則在堡壘外進行反突擊；

(八) 加強在敵人前線、翼側及近後方的游擊戰爭。游擊隊的動作。應有最高度的敏捷性、機動性和彈韌性，其動作主要的靠打埋伏、急襲和偷襲，並且要與紅軍部隊的動作有密

切的配合。^①

江西蘇區紅軍雖然在軍事上採取所謂「運動防禦的持久戰略」和李德的「短促突擊」的速決戰術，來抵抗國軍碉堡封鎖政策的新戰略，以圖衝破國軍的五次圍剿。然而在國軍絕對優勢的兵力和火力壓制之下，李德的「短促突擊」新戰術，並不能挽救蘇區紅軍最後失敗的命運。

在國軍碉堡封鎖的條件下，蘇區紅軍所處的態勢更加困難起來了，到了四月上旬，東線的國軍已迫近建寧；北線的國軍則進抵龍岡和廣昌的外圍，正準備著進攻蘇區的門戶——廣昌。此時，中共中央認為戰爭已經到了最後決戰的嚴重關頭。

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在為《紅色中華》報寫的一篇社論中，不得不發出這樣的狂言：紅軍正處在同敵人進行著最後的決戰關頭，每個蘇維埃公民，都應該武裝上前線，保衛蘇維埃土地。

當時，江西蘇維埃紅軍所處的態勢大致是這樣：

在東線，國軍正沿泰寧向建寧之線挺進；在東南，國軍佔領白沙後，向著南陽、舊縣、連城之線推進；在西南，國軍佔領門嶺之後正在進攻會昌；在西北，佔領招攜之後，正從沙溪向龍岡進攻；國軍這幾個方面的進攻，為的是要配合其主攻方向——北線的廣昌。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中共中央乃決定調集紅軍主力——一、三、五軍團的精銳，組織了一個大規模的廣昌大會戰。

①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中華軍委出版《革命與戰爭》第二期華夫（李德筆名）著「論堡壘主義下的戰術」。

中共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於四月下旬共同發出「給戰地黨和蘇維埃政府的信」，號召紅軍士兵和蘇區民衆為「保衛廣昌」、「保衛建寧」和「保衛會昌」而戰。

國軍方面也集中了三個縱隊九個師的兵力投入戰鬥。紅軍雖一再以短促突擊，從正面或側面猛撲國軍，並利用夜間，實施近距離之白刃肉搏，但均為優勢的國軍各部隊所擊退，而紅軍所憑藉頑抗的堡壘工事，也全部為國軍空軍和砲兵所摧毀。從四月十日至四月二十八日，雙方進行了近二十天的劇烈戰鬥，戰況空前慘烈。至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傾其全力死拚的廣昌大會戰，終於失敗結束了。此役紅軍傷亡達四千多人，國軍亦傷亡二千五百人。

廣昌大會戰失敗之後，中共在北面的戰線更為縮短，而東方戰線又告吃緊。到了七月間，整個江西蘇區已經縮小到只有寧都、興國、石城、瑞金、會昌、雩都、長汀（包括汀州市）等縣，形勢極為危急，這就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採取新的戰略方針了。

二 突圍、西竄的準備

中共中央新的戰略方針是什麼呢？

那就是紅軍積極準備突圍、西竄，其主要的部署是這樣：

第一，以紅七軍團和贛東北蘇區之紅十軍組成所謂「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東進福建，並深入閩浙腹地，以分散國軍兵力；同時令湘贛邊之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政委任弼時）西竄湖南與紅二軍團（軍團長賀龍、政委關向應）會合，加強湘鄂贛邊的軍事力量；從東西兩面來分散國軍圍剿的兵力，以利紅軍作戰和突圍的準備。江西紅軍這一部署的著眼

點，顯然是在用聲東擊西的辦法來分散國軍兵力，阻延國軍的前進；

第二，在石城以北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調集主力紅軍的精銳，採取運動防禦和短促突擊的戰法，圖消滅國軍一路，以扭轉戰局；

第三，從政治上、思想上作各種動員，同時更瘋狂、更猛烈地擴大紅軍，以補充紅軍傷亡；並大量地搜括糧食，以充實紅軍給養。

由此可看出，中共中央這個新戰略方針的基本點在於：不是立即放棄江西蘇區，而只是作最壞的打算，祕密地、積極地作突圍西竄的各種準備。

在這裡，我想回憶一下所謂「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組成及其活動情況。

抗日先遣隊之主力——紅七軍團之軍團長原為蕭勁光（當時任閩浙贛軍區司令員）因在黎川戰役中未能拒守，打了敗仗，被周恩來（當時任紅軍總政委）指為「十足的退卻逃跑主義者」，處以五年徒刑，而以尋淮洲（時任第十九師師長）接任軍團長。這個軍團，下轄第十九師（師長仍由尋淮洲兼）、二十師和二十一師，共九千多人。紅十軍（軍長劉疇西，政委王如癡）共三千多人，總兵力共為一萬二千多人，由閩浙贛省蘇主席方志敏任司令員，尋淮洲任副司令員，粟裕任參謀長。七月初，先由尋淮洲率領紅七軍團由紅都——瑞金出發（時筆者在瑞金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局碰到紅七軍團某師政委樂少華而得知）東進福建。因其「北上」曾一度受阻，轉而南竄，威脅福州。嗣經國軍追擊，尋部傷亡枕藉，乃逃入贛東北蘇區，與盤踞贛東北有年之紅十軍會合後，號稱兩個軍團，氣餒猖獗。

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於七月十五日發表「北上抗日宣言」，其大意是：

工農紅軍願意同全中國的民衆聯合起來，共同抗日，開展民衆的民族革命戰爭，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一切反日的民衆，都應當拿出一切力量來幫助抗日先遣隊。「宣言」號召全國民衆團結在「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幟之下，直接地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到底。

我在《紅色中華》報上看到抗日先遣隊宣言的第二天，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蘇區中央局去談話。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潘漢年接見了我。潘漢年對我說，抗日先遣隊的「北上抗日宣言」，你看到了吧，事情是這樣，黨中央決定由你和朝鮮畢士狄同志以台灣代表和朝鮮代表名義共同發表宣言，擁護紅軍北上抗日。他又說，畢士狄因在前方，「共同宣言」由你負責起草。「宣言」的內容，要強調日本帝國主義霸佔了台灣朝鮮，現在又佔領中國的領土東北，作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先鋒隊。台灣、朝鮮民衆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備受奴役與榨取。正當中國紅軍「北上抗日」之際，我們代表台灣、朝鮮的民衆，衷心地擁護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七月二十二日《紅色中華》登載了我們的「共同宣言」。後來我才知道，當江西紅軍突圍西竄的前夕，中共中央印刷廠開足馬力，把我們的「擁護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加印了幾十萬份，交給紅軍各級政治部沿途散發，迷惑群眾。

三 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

中共中央藉著「北上抗日先遣隊」作瘋狂的武斷宣傳的同時，又動員了全蘇區的黨、政、軍、團、工會、反帝同盟等組織，集中全力進行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

先是，中共中央於五月十二日發出「給各級黨部黨團及動員機關的信」，號召在三個月

內完成擴大紅軍五萬人。在指示信中，以絕望的口吻說：最近幾個月，是我們蘇維埃紅軍生存或者死亡，是最後的、最殘酷的決戰階段。每個共產黨員，每個工人和每個勞苦群眾，都應當準備把自己的血流在前線上。

中共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中央政府並決定在五、六、七三個月擴大紅軍五萬的狂妄計畫，而在五月，必須首先完成擴大二萬七千新戰士。中共中央還派了項英、劉曉、劉少奇、羅邁等先後到閩贛、贛南、粵贛和福建等地區指揮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工作。據後來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公佈，在這三個月中擴大紅軍計畫超額完成，共擴大了六萬三千名新戰士。

到了八月激戰開始了，國軍集中大軍在蘇區的周圍，加緊東線和西線的封鎖，從各方面挺進到蘇區大門內來，實行其佔領興國、石城、汀州、會昌與總攻紅都瑞金計畫。

中革軍委發出了緊急動員令，號召全蘇區工農群眾，要鼓動自己的丈夫、兄弟、兒子加入紅軍中去。

到了九月，中革軍委又決定擴大三萬個新戰士，補充到前方，要各個地區的獨立團充實起來，成立各縣的獨立營，組織五十萬赤衛軍少先隊，一齊準備好，全部參加前線和後方的戰爭工作^②。

接著中共中央組織局、總動員武裝部、少先隊中央總隊部、總政治部動員部、全國總工會戰爭動員部等動員機構發出「聯合通知」，更具體規定各縣動員數目。「聯合通知」說：

(一) 各縣要爭取在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完成，並送到補充師、補充團去；

②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紅色中華》二二九期「中革軍委為擴大紅軍的緊急動員的號召」。

(二) 在模範赤少隊群眾中，鼓動他們武裝上前線的熱潮；

(三) 把動員工作開展到廣大的赤少隊中去，特別是爭取模範赤衛軍少先隊整連整營的武裝上前線；

(四) 要在動員中，保證每個新戰士有一支梭標帶赴前方，用群眾捐助的辦法，極力爭取每個新戰士有一床被毯，草鞋等用具亦須準備充分^③。

據當時兼任中共中央擴紅突擊隊長羅邁在《紅色中華》發表的一篇報告中稱：按照現在動員情形看，嚴重的流產的危險是在贛南。中共中央給贛南的計畫是八千七百名新戰士，其中分配給會昌的是一千七百名，分配給零都是四千五百名，贛縣一千五百名，整個贛南地區的任務佔總動員計畫百分之二十九。因此，贛南地區的落後，給了整個運動以極大威脅^④。

顯然，九月的擴大紅軍動員計畫又告失敗了。《紅色中華》發出了這樣的哀鳴：

「擴紅動員截至九月廿七日止，總的數目只完成一萬八千二百零四名，約達原定計畫十分之六。現在擴紅突擊的時間已經終了，我們的原定計畫還差十分之四。可是為著萬分緊張的戰爭需要，為著爭取決戰的最後勝利，我們無論如何要迅速擴大三萬新戰士武裝上前線，這是決定我們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一個最重大、最低限度的緊急任務。」^⑤

最後，中共中央和軍委決定「把突擊時間延長到十月五日止，在十月五日前，各縣無論

③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紅色中華》二二九期「關於九月間動員三萬新戰士上前線的通知」。

④ 一九三四年九月廿一日《紅色中華》二三六期「贛南不應當落後」。

⑤ 一九三四年九月廿九日《紅色中華》二三九期「最後七天內完成三萬新戰士上前線」。

如何要完成自己的計畫：這是最後的時間，決不容許再延長一分鐘，決不容許差一個新戰士」^⑥。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中共中央為著要準備突圍西竄，在其「生死存亡」的最緊要關頭，不顧蘇區民衆的死活，用最殘酷的手段強迫蘇區民衆武裝上前線。

四 一再進行糧食的搜括

中共中央在擴大紅軍緊急動員的同時，復一再對蘇區民衆進行糧食的搜括。

先是於一九三四年六、七月間，由蘇維埃中央糧食部發出通知，同蘇區農民借穀二十四萬擔（石）作為紅軍的給養。《紅色中華》為此露骨的叫囂：「紅軍等著二十四萬擔糧食吃」。蘇維埃中央糧食部長陳潭秋在一篇題為「為迅速完成廿四萬擔穀子而鬥爭」的專論中指稱：

「為了保證紅軍的給養，緊急動員廿四萬擔糧食的運動，截至七月九日為止，我們得到各縣的報告，僅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二。不能如期完成的危險，嚴重的威脅著我們……戰爭是愈加緊張了，紅軍給養的保證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任務。時間迫促了，千百倍的努力為迅速完成與超過廿四萬擔糧食而鬥爭」^⑦。

⑥ 同註⑤。

⑦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紅色中華》二一四期。

自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起廿四萬擔糧食突擊運動之後，全蘇區民衆，包括工農基本群衆和蘇維埃機關人員在內，每人都要束緊腰帶，節省糧食。名為借糧，實際上是無代價的「奉獻」。這不就是一種更露骨、更殘酷的搜括嗎？在這裡，我們不免覺得奇怪，中共長於宣傳鼓動，擅作突擊動員，但這次廿四萬擔借糧運動卻完全失敗了。此時，國軍的圍剿正向著汀州、石城、寧都、興國、瑞金、會昌、零都等基本蘇區進攻。戰爭的形勢，迫使中共中央不能不採取嚴厲的措施來對蘇區民衆一再作糧食的搜括。那就是緊接著廿四萬擔糧食的突擊運動之後，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復於七月下旬發起了六十萬擔借糧運動。此時距紅軍突圍西竄的日期——十月十五日只有兩個半月了。中共這一緊急措施，一方面說明蘇區對中共說來，已經到了羅掘殆盡的地步；另一方面顯露出當時中共「狗急跳牆」的窘態是多麼的難堪。

中共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於七月二十二日公佈的「關於在今年秋收中借穀六十萬擔及徵收土地稅的決定」中稱：

「戰爭形勢要求我們更進一步動員全蘇區群衆，集中一切力量去幫助前線上的紅軍，這裡糧食繼續不斷的供給，是極端重要的條件。為保證紅軍今後糧食的供給，舉行秋收六十萬擔借穀運動，並決定立即徵收今年的土地稅。」

「決定」中還特別指出：「對富農必須用群衆力量強迫其借一部份給蘇維埃。對地主富農及其他反革命份子的造謠與破壞，必須給予嚴厲的鎮壓。」此說明中共對蘇區糧食的大搜括已激起了廣大農民普遍的不滿和反抗。^⑧

⑧ 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六日《紅色中華》二一九期「關於在今年秋收中借穀六十萬擔及徵收土地稅的決定」。

「決定」最後還說，這項工作限於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二十四萬擔加上六十萬擔，再加上徵收「土地稅」（筆者按：蘇維埃的土地稅概折糧食繳納），顯示中共將要搜括近一百萬擔的糧食。

有「突擊專家」之稱的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突擊隊長羅邁（李維漢之化名）在各縣糧食部長聯席會議的黨團會議上的發言中也指出：

「現在依據紅軍的需要和群眾的要求，決定秋收後借穀六十萬擔，收買穀子十萬擔，加上徵收土地稅，我們將近要收集一百萬擔的糧食，並且要爭取在九月半以前完成。」^⑨

當時的所謂「中央蘇區」，實際上已經縮小到只有會昌、寧都、長汀（含汀州）、瑞金、興國、雩都、石城等七個縣了，中共要在這僅有的土地上徵收一百萬擔糧食，多麼的殘酷呀。

⑨ 一九三四年七月廿四日《紅色中華》二一八期「目前黨在糧食方面的任務與糧食部的工作」。

紅軍西竄回憶

小引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偽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洛甫（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表一篇文章，透露了江西紅軍將採「新戰略」，放棄江西蘇區，轉移到新地區活動的消息。這消息有如巨石投水，在江西蘇區立即引起了表面上不易覺察，實際上確是十分深刻的波動。所有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幹部，無不以徬徨心情考慮自己何去何從——留在江西蘇區好呢？還是跟紅軍轉移到新地區好呢？但是這一問題除了中共中央組織局之外，誰也沒有自我決定的權利，大家只好懷著忐忑不安的情緒度日，等待組織局的通知。

我終於接到了正式通知，要我準備行袋隨軍西行，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的事。和我同時接到通知的，在中央一級群眾團體圈子裡還有劉群先（博古妻，全總執行局女工部長）、鄧振詢（二屆蘇維埃中央執委、全總執行局委員）、羅梓銘（二屆蘇維埃中央執委、全總執行局委員）、陳雲洲（全總執行局組織部幹事）、王盛榮（少先隊中央總隊長）、甘時英（女、革命互濟總會職員）等。我們於十月十二日到紅軍總政治部報到後，就先後到紅軍中央縱隊各個工作崗位上去。

紅軍中央縱隊是臨時編成的龐大隊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會、蘇維埃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各部、紅軍總司令部、野戰總醫院、兵工廠、被服廠、印刷廠、造幣廠，以及紅軍大學和由兩個步兵學校學員組成的幹部團、政治保衛局的警衛團等共一萬五千多人，其中由赤衛軍組成的運輸隊六千多人。

野戰部隊包括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八軍團、紅九軍團，共七萬人，加上中央縱隊，總兵力為八萬五千人，對外號稱十萬人。

林彪的紅一軍團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是紅軍的精銳，擔任前衛任務，衝破國軍四道碉堡封鎖線和許多硬仗都是他們打的。紅八軍團是新編成的部隊，由紅軍大學校長周昆任軍團長，戰鬥力較差，經常擔任右衛任務；羅炳輝的紅九軍團擔任左衛任務。寧都暴動的紅五軍團則擔任後衛任務。

江西紅軍——紅一方面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從贛南地區突圍西竄，迄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抵達陝北蘇區的吳起鎮，歷時一年另一個月，共三百七十一天，全部行程六千英里，合二萬五千華里，經過十一個省，越過十八個海拔四〇〇〇至六〇〇〇公尺的高山，其中五個是終年冰凍的大雪山；渡過二十四條大河流，其中包括有天險之稱的烏江、金沙江和大渡河；通過了回、苗、畚、僛、獐、夷等邊疆民族地區。

當江西紅軍損兵折將，十死八九，剩下殘部五千多人抵達陝北蘇區後不久，毛澤東在瓦窑堡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誇稱：「長征是中國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傳隊，是播種

機……」^①

同時也有些天真幼稚的外國文人，盲目地稱讚中共紅軍失敗的事蹟為歷史性紀錄：曾經進入陝北蘇區的美國記者斯諾就說過：「長征是軍事史上的鬥爭……在亞洲只有蒙古人曾經勝過他們……」^②

一位會見過毛澤東而被譏為「形左實右」的法國前文化部長安德列·馬爾勞說：「長征的確是傳奇性的冒險事蹟，它足以同亞歷山大的遠征互媲美。」^③

其實，無論就政治上或是就軍事上而言，所謂「長征」，不過是中共「中國工農紅軍」在強大國軍截、堵、追擊之下東逃西竄的一次嚴重失敗與潰退的歷史紀錄而已。雖然毛澤東把紅軍失敗的責任完全推諉給當時執行左傾冒險路線的國際派，但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總結「長征」經驗教訓時，仍不得不承認，紅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④。

據林彪的紅一軍團司令部製作的「紅軍第一軍團長征行程一覽表」^⑤的統計數字，江西紅軍西竄全部日程三百七十一天當中，行軍二百五十六天，休息一百天，共三百五十六天；作戰只有十五天，僅佔全部日程的百分之二強。故把紅軍西竄描寫成為「長征」，實在是中

- 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四五頁。
- ②斯諾著《長征》中譯本一八六頁。
- ③香港《明報月刊》第四十九期。
- ④《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八五頁。
- ⑤《紅軍長征記》下冊四一二頁。

共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誇大宣傳。

回憶我在江西紅軍西竄行列中的經過，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中央縱隊階段——自瑞金地區出發到遵義會議後，紅軍殘部實行改編為止。

野戰總醫院階段——經過長途行軍後，我體力不支，進入野戰總醫院的幹部休養連行列。這是個收容著包括二十幾位老弱傷殘的高級幹部的療養隊，其中包括徐特立、董必武和謝覺哉「三老」，文藝作家成仿吾，上海老工人朱琪等。

紅三軍團階段——渡過金沙江後，紅軍進入邊疆民族地區，我離開幹部休養連到紅三軍團政治部工作。我的任務是對邊疆民族的爭取，包括在邊疆民族中擴大紅軍和籌糧工作。

由於上述工作關係，我在紅軍西竄行程中，比在江西時期接觸到更多中共黨政軍高級人員、軍事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司號員、護理員、擔架兵、飼養員（馬伕），以及沿途老百姓和邊疆民族。

江西紅軍——紅一方面軍殘部抵達陝北蘇區後，由於毛澤東一再鼓舞，煞有介事的掀起了一陣所謂「講長征故事」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我接觸了不少經歷「長征」的高級幹部，其中包括陳賡、陳光、張愛萍、何長工、羅榮桓、劉亞樓、羅瑞卿、彭加倫、徐夢秋、蕭華、譚政、蕭向榮、宋時輪、曹理懷、康克清（朱德妻）、楊立三、宋任窮等，當時他們對我講的片片段段「長征故事」，將成為我撰寫這篇《紅軍西竄回憶》吸取資料的主要源泉。

在這個高潮中，從一九三六年春至一九三七年春，在延安的幾十位「長征幹部」，合寫了一部《紅軍長征記》，約四十萬字，分上下兩冊，由朱德題字。這一部歷史性軍事紀錄的祕本，是由一位在越過大雪山時凍壞了兩腿而成殘廢（經手術鋸斷了兩腿）的「長征幹部」

徐夢秋所編纂，當年只發給少數高級將領作為研究紅軍戰史之參考。我在延安時曾經看過這部傳奇性歷史事蹟的祕本。

事隔三十年，沒有想到會是這麼奇妙，當我著手寫這一部「回憶錄」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國際關係研究所圖書館裡發現了這部《紅軍長征記》的影印本。不過，影印技術實在太差勁了，十之八九模糊不清，我的眼力又老花得厲害，必須用放大鏡，費「九牛之力」才能攝取到一部分有用的東西。無疑，這些原始資料亦將成為這部「回憶錄」寫作的重要素材。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壹、大規模的搬家

斯諾把江西紅軍西竄的行動，形容為「整個國家的遷移」，自是太過誇大。毛澤東把江西紅軍失敗的罪責諉過於國際派首領，而譏紅軍西竄行動為「大規模的搬家」，這個譬喻比較符合事實，至少在我參與其間的中央縱隊的情形是如此。中央縱隊在西竄行動中，驅策著六千名民伕，搬運著笨重的兵工機器、印刷機、縫紉機、山砲、迫擊砲、彈藥、紙幣等等，的確像個大規模搬家的景象。

一 別了，出發了！

十月十二日，我和羅梓銘、劉群先、陳雲洲一同到紅軍總政治部報到。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接待了我們，交代了我們在部隊中的任務。李富春原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這次調到總政治部代王稼穡（因受重傷送蘇聯醫治）主持總政治部工作。李富春說，他和蔡暢（李富春妻）兩天前才從寧都（中共江西省委會所在地）趕到這裡來的。不一會，蔡暢也出來招呼

我們，與我們稍作寒暄。總政治部的大禮堂裡，集合了從各個部門挑選出來參加紅軍西竄行列的「新戰士」，約百餘人，李富春對他們講話，說明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李富春說，在今天以前你們還是「老百姓」，生活散漫一點沒有關係，現在不同了，現在你們都是紅色戰士，一切行動都要遵守紅軍紀律，特別是要注意群眾紀律，搞好軍民關係。

我們告別了李富春和蔡暢，出發到前方去。我們走了兩天。十月十四日抵達集合地點——寬田。依軍委的命令，我和羅梓銘、陳雲洲三人到中央縱隊政治部工作。劉群先到總衛生部工作。

中央縱隊區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包括紅軍大學、兩個步兵學校和政治保衛局的警衛團。兩個步兵學校的學員合編為幹部團，團長陳賡；紅軍大學的學員編為上幹隊（上級幹部隊之簡稱），隊長蕭勁光。第二梯隊包括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野戰總醫院以及一個由醫生、護士和一百二十副擔架隊組成的醫療隊。整個中央縱隊由葉劍英指揮。

當天，我還會晤了將留在江西蘇區負責指揮「中央蘇區」紅二十四師和其他游擊部隊的項英。他是剛從東線趕到寬田來的。不一會兒，好久未曾公開露面的毛澤東悵悵地出現在寬田。他臉色蒼白，比在二次全蘇大會時更瘦削更憔悴了。當我看到他和項英握手時，我立即想到：這是他們約好在寬田作歷史性的最後會晤。

此時的毛澤東，黨權軍權已被剝奪，現在不過當個傀儡式的「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啥事也不能做主，像這次紅軍「突圍西進」的計畫和部署，他都無權過問。甚至何時出發也不知道。我遠遠的看見他在小山上悵悵地和項英作生離死別的情景，是多麼的悵悵悲感呀！

十月十六日黃昏，中央縱隊從寬田出發了。出發命令是由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周恩來簽

署的。林彪的紅一軍團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已先一日出發，作為開路先鋒。我們是緊跟著紅三軍團的後面前進的。作為後衛的紅五軍團，也已經絡繹湧到，緊跟在我們的後面。

戰士身上的裝備很整齊，衣服都是新的，背包是一律的，每人有二個至四個手榴彈掛在胸脯前面，草鞋每人有兩雙，多的有三雙。戰鬥員的身上，還帶著步槍和刺刀。兩袋十斤重的糧食，掛在肩上，雨笠掛在背包後面。在戰鬥隊伍之後是炊事班擔子，公文箱擔子，有次序地邁著大步前進。

二 走出蘇區

走了兩天，雖然還是在蘇區內，但因怕國軍飛機襲擊，都是夜行軍。乘著月夜，渡過了零都河之後，緊跟著前衛部隊腳步，通過了蘇區邊界的新陂，於是完全走出蘇區了。

踏進「白區」的前夕，軍委的命令說，為深入到敵人深遠的後方，仍執行強行軍。在「白區」的行動，尤應提高警覺，加緊戒備，嚴防剗共團襲擊。軍委的命令還說，為避免紅軍西行的行動被敵人發覺，各部隊名稱一律用代號。中央縱隊的代號是「紅星」，中央縱隊所轄各部隊則用「瑞金」、「汀州」、「會昌」、「博生」、「興國」、「石城」等為代號。陳賡率領的幹部團是在九堡編組的，「九堡」便成了它的代號。

午後五時半吃飯後，預備號、集合號從各部隊的宿營地前後遠近頻吹著。一隊隊荷槍的戰鬥員，一個個挑著擔子的運輸員，抬著笨重機器的赤衛隊、炊事員、指揮員，馬匹都集中到集合場了。

「同志們！我們要開始在白區行動了。」指導員開始進行出發前的政治鼓動。

「為要避免敵人飛機轟炸，我們仍要夜行軍。在白區行動，創共團就在我們的旁邊，隨時都有可能來襲擊。我們更要小心，大家不要掉隊，提高警覺，注意反革命的造謠，防止動搖分子逃跑。……」

最後，指導員發出「一、二、三」口令，部隊開步走了。戰士們只是一個跟著一個，腳跟著腳，發出吱吱喳喳的聲音，緊張而整齊。

我站在一堆荒草的墳墓上，觀看隊伍的行進：幹部團隊伍，個個都是年輕小伙子，每個人都戴著鋼盔，顯得機警。我還看見了毛澤民所率領的「國家銀行」暨造幣廠的隊伍，一擔一擔油污的洋油箱——裡面裝滿著蘇維埃紙幣、銀元、金條、鉛字……等等，還有笨重的石印機，約有二百多箱。毛澤民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掌握著蘇維埃經濟大權，他率領的這個運輸大隊是最富有神祕性的，那毫無保證的幾百箱紙幣，往何處運呢？

開頭二十里路，緊張而有秩序地走過去了，隊伍進入了崎嶇的山路，奇形怪狀的巖石阻礙著隊伍行進。山坡路忽高忽低，有時陡得厲害，就用手抓住前面戰士的臂膊或路旁的樹枝，才不致跌倒。因為隊伍多，又在黑夜裡行動，所以很多時候，都是擁擠著，走也走不動。一會兒前面過去了，後面又要跨大步走，才跟得上。這時不斷的聽到「跟上，不要掉隊呀！」的叫聲。一會又停止了，但又不能把背包或是擔子放下來休息，弄得大家都非常疲倦。為了克服疲勞，打發睡意，戰士們開始說說笑話，講神仙故事，輕鬆一下。

半夜才到達山巔，接著又下山了。下坡路更難走。山徑蜿蜒在樹林中，泥路上長著青苔，滑溜溜的，更加難走。一不小心，就要叫你跌跤的。

好容易走下山來了。只見前面火光灼耀，在朦朧的光芒中，看得出村莊房屋的輪廓，遠遠地送來狗的叫聲，知道那是指營地。——看看錶，已經三點了。先到達的戰士們都睡得鼾兒起夢兒逗了。聽說他們到達時，房屋裡的劇共團還在夢中呢。

村子裡的壯丁和男人都逃光了，剩下的都是老頭子、老太婆和小孩。因為走得太累，人疲倦了，找到了一把禾草舖在地上就睡覺了。

三 夜行軍

夜行軍把日常生活改變，日間睡覺，夜裡行軍，頭幾天總覺得不慣。午夜以後感覺非常的疲倦，拂曉前後，更是睡意沉沉，在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

如果是沒有月亮的夜晚，只要沒有發生敵情，我們就打火把行軍。到了下午三四點鐘，大家把昨晚睡眠不足的損失補足了，又準備晚上行動時，宿營地四周，總可以聽到找乾竹做火把，打碎乾竹桿「霹拍霹拍」的聲音。我們做火把，一天比一天熟練，一天比一天進步。有的用較粗的青竹筒，鑽空之後罐入煤油點燃。有的用松枝，利用松香的膠汁燃燒。但這些做法比較費錢，又費時間，且不容易找到材料，所以一般是找三兩根不大粗的乾竹，打破成幾片，一節一節合攏捆起來，這樣既容易燃燒，火光又大，又怕風，也比較耐燒。

點火把行軍的行列，看起來很壯麗，走在平坦大道上，真是光照十里，穿過森林時，一點一點，一線一線的火光，在叢林中時隱時現，如火蛇鑽洞，紅光普照，燦爛奪目。

過山嶺時，先頭隊伍魚貫地抵達山巔，宛如一條長龍，金鱗閃閃，彎彎曲曲的蜿蜒舞動。

從山巔回頭下望，但見山腳下火光萬道，如波浪翻騰，一線一線，一股一股的奔馳，交織成一幅大自然的奇景。

但是夜行軍有時是很苦的。最令人討厭的是遇著隘路或是上山下坡，過橋涉水。前面隊伍一遇阻礙，後面隊伍簡直走不動了。常常是走三兩步，就要停十步八步的時間，極不痛快。有時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幾里路，既不能一鼓作氣的前進，又不能真正停下來休息，走幾步，歇一下，更容易增加疲勞，往往一停就睡著了。這樣一來，行軍速度逐漸下降，掉隊的多起來了。常常發現前面的隊伍停下來歇了好半天，運輸隊員把擔子放下來，在路邊燒樹枝木頭烤火。有時隊伍整個兒脫了一大節，動也不動，後面的隊伍趕到時，發現一路上亂七八糟，東倒西歪地睡大覺咧。在這種時候，就有宣傳隊來進行政治鼓動：

「同志們不要打瞌睡，你們掉隊了，前面走得老遠了，趕快跟上去呀！」宣傳隊的小鬼們唱起山歌，振作振作戰士們的精神。

夜深了，一陣豪雨驟然而下，把山徑的泥路弄得一塌糊塗。經過隊伍的踐踏，更是泥濘載道。那怕是小翼翼的踏上去，爛泥也會立即蓋滿了草鞋，而且越陷越深，稍停一下，就要使你的腳拔不出來。但如果使勁過甚，草鞋就要埋在泥沼裡了。越走上去，路越來越糟糕，隊伍不時擠成一堆走不動。

忽然「嘩啦」一聲，紅小鬼——衛生員（護士），跌在泥巴裡了，他兩腳向前一溜，跌得一屁股都糊滿了泥巴。大家都取笑說：「還沒有叫『休息』，你就坐下來了，哈哈！」他趕快爬起來，一邊揩去泥巴，一邊繼續走著。

再過一會兒，又是「嘩啦」一聲，一個挑著擔子的運輸員跌跤了，把公文箱摔得轟隆大

響。有人大聲叫道：又是誰「坐汽車」^⑥！大家都大笑起來。那些挑著大鋼鍋的炊事員更小心了，他們一手拉住擔子，一手攀著路旁的樹枝，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著又陡又滑的泥巴路走上去。

四 想念家鄉

深秋的氣候是多變的。忽然颳風下雨了。一時找不到避風雨的地方，只有硬著頭皮繼續前進。好不容易趕到村莊時，已經滿身濕淋淋了。捷足先登的戰士，脫下濕衣服，在老百姓的屋裡烘烘衣服邊烤火。他們是老掉隊的，看見後面的隊伍來了，還是也滿不在乎，等到收容隊來把他們攆走，後來的戰士才擠入屋裡去烤火。

最倒楣的莫過於那些抬著笨重機器的運輸大隊了。他們掉隊在老遠的後面，當他們趕到村莊時，房子裡已擠滿了人，指導員也不讓他們離開自己的位置。他們只有站著稍作休息，擦乾臉上的雨水。他們實在太勞累了。一部重型機器，要八個人才抬得動。天黑，路又滑，遇到過河，或是上山下山，真像個小腳婆娘，寸步難行。這時候，任你叫喊個「快跟上去，不要掉隊」不停，不但毫無效果，反會遭到反擊：「媽的，你來抬抬看！」他們有些不耐煩了，就回敬你幾句。拿起棍子打他吧？他乾脆不幹了，要求回家去。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兄弟，孩子……他們的生活怎樣呢？田地，莊稼，農活……這麼多的憂慮，這麼多的心事，

⑥這是紅軍西竄途中流行的一句俏皮語，意指跌倒。

不由得湧上心頭。想念家人的情緒，時刻繚繞在心坎裡，一切的氣力都沒有了。下雨，天黑，路難走，弄得頭痛如裂，心裡如焚如灼，戰士們開始動搖了。這個時候，那裡有什麼「反革命份子」造謠？開始時還是個別的，後來變成少數，逃跑的事件不斷發生了。一切的現象，是辯證地，按照事物發展規律而變化。這些在擴大紅軍運動中被動員來的新戰士，雖然經過了嚴格的政治訓練和思想教育，但殘酷的「階級」戰爭，恐怖的戰場，艱險危難的行動，監視，打罵，一切一切，激起他們的傷心、悲愴、憤怒。他們想念家鄉，懷念親人。他們從那裡來，就要回那裡去。共產黨的政治口號，宣傳鼓動，都不能動搖他們。路走得越遠，情緒越來越不穩，逃跑的現象越來越嚴重。那些笨重的機器，原來由十人抬的，減為八人抬，原來是八人抬的，減為六人抬。有些挑擔子的運輸員跑掉了，擔子沒有人挑，就加在別的運輸員身上，或者丟棄到河裡去。問題都是從這些地方產生，逐漸嚴重起來的。這些問題在老蘇區內是容易解決的——鬥爭、肅反，扣上「反革命」帽子，如此等等。但在「白區」行動，問題就嚴重起來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壞下去。

戰士們想家，懷念親人，士氣低落，紀律鬆懈，部隊中這些病態，毛澤東不知道，知道了有何用？這個時候的他，除了坐在擔架上看他的《西遊記》、《三國演義》之外，什麼事也管不了。朱德和周恩來呢？也不會知道的，他們每天忙於報告，發號施令。博古更不會知道，他每天陪著國際顧問跟著前衛軍團走，後面發生了天大的事情，他是無從獲悉的。唯一比較了解這種病態的是政治保衛局長鄧發。這位眼睛銳利，面貌黝黑的恐怖人物，在中央縱隊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會議上，假惺惺地說：

「這種現象，不能容忍再繼續擴大下去。必須加強『十人團』^⑦的活動。各部隊抽調一定數目的人員參加收容隊工作。根據一般規律，逃跑者總是先裝病，走路沒有力氣，故意掉隊，脫離自己的隊伍，乘黑夜潛入老百姓家裡，然後乘機逃跑。……」鄧發的結論是：「加強偵察，加強監視」，如此而已。

根據後來估計，紅軍從江西蘇區出發到渡過湘江突破國軍第四道封鎖線為止，兵力已損失三分之一，其中絕大部分是中央縱隊。西竄前夕新編、擔任護衛任務的紅八軍團，在掩護中央縱隊渡湘江時被國軍截擊，潰不成軍，其中有一個師被殲於湘江邊。

⑦ 蘇維埃時期紅軍中的一種特務組織。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188

貳、衝過四道封鎖線

從贛南的桃江到湘桂邊的湘江

紅軍於十月二十日分兩路在贛南信豐附近渡過桃江（又稱信豐河）之後，即在南康、大庾兩縣（均屬江西省）之間渡過章水，並於十月二十一日衝過國軍包圍紅軍的堡壘封鎖線，越過贛州至南雄的公路，衝過第一道封鎖線。十一月廿九日，渡過廣西境之湘江，越過湘桂公路，衝過第四道封鎖線。計自十月十六日開始西竄，迄十一月廿九日渡過湘江，共歷四十四天，逃竄了二千四百多華里。在這一行程中，紅軍渡過了桃江、章水、瀟水、灌江和湘江（廣西境），越過了南嶺山脈的萌渚嶺、都龐嶺，爬過了人跡罕到的大王山、雪峰山、雷公山等縱橫山脈。紅軍在經由江西、湖南、廣東、廣西諸省的流竄中，在強大國軍的追、堵、截擊之下，遭受極為慘重的損失，當十二月初到達貴州邊境時，人數已減少了三分之一。

一 碉堡封鎖線

紅軍渡過章水之後，旋即衝過贛州——南雄線公路。國軍在古陂、新田及贛州——南雄線公路兩側山巔都築有碉堡線，並有守軍。國軍的碉堡係用以圍堵和封鎖紅軍者，一般築於公路兩側，重要隘口及路旁之山巔。碉堡，這是中國從一九三三至三六年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以石塊或磚頭構築，形式不同（方形或六角形），大小不一，分為排堡、連堡、營堡等級，平日國軍即守於碉堡內。堡內有步槍、機關槍之槍孔，可以向外射擊，並有投擲手榴彈之設備。出入碉堡只有一小門，遇有紅軍襲擊，守碉堡之國軍即閉門固守，向外射擊。這種碉堡封鎖線對紅軍西竄行動阻礙極大。

十月下旬某日（記不清楚日期）紅軍從下午五時出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沿途不斷受到國軍的襲擊。午夜，閃爍的星光，微弱地，靜靜地映射到漆黑的大地。槍聲已聽不見了，空氣非常沉寂，除了最前線的部隊仍與堡壘裡的國軍對峙外，大家都在宿營地呼呼地睡覺了。顯然，紅軍是在養精蓄銳，要在明天大打一場。

這只是大戰前片刻的寧靜。不時有冷風吹來，令人身上打著寒噤。天空的星光，只剩下了幾顆亮晶晶的懸掛在東方，轉瞬拂曉到來，「喂！喂！起來，起來，快些，集合啦！」滿山盈野到處發出這樣的聲音。紅軍東一團、西一團聚集在集合場上。指導員以激烈的聲音進行著戰前五分鐘的戰鬥鼓動。

拂曉的總攻擊開始了：「啪！啪！蹦！蹦！」槍聲夾雜著手榴彈聲，不停地從山巔上的堡壘裡射下來，也從山下四周集中地射向堡壘去，這是紅軍西竄以來首次的戰鬥，也是越過

國軍第一道封鎖線的戰鬥。

槍聲、砲聲，震天動地的響起來，我自踏進江西蘇區以後，除在閩西游擊區和贛南參加擴紅突擊運動的那一段時間，曾體驗到一些戰爭滋味之外，有好長時間沒有聽過槍砲聲了。

我以一種奇妙的、緊張的心情等待著戰況的發展。出我意料，槍聲停止了，戰鬥結束了。親臨前線率領一個團參與這一戰鬥的謝團長，操著湖南口音對我述說這場戰鬥的經過：

「開始時只有幾百民團（國軍地方團隊）守著前面一個高地，扼制我軍前進，被我們一個衝鋒，便把他們打垮了。我們跟踪追擊……」

「當後續部隊跟著追擊部隊繼續前進時，忽然另一支國軍部隊向我左側襲擊，企圖截斷我們的聯絡。……這有些討厭……但又算得什麼呢？只不過延誤一些時間而已……」

「太不幸了，已經把敵人打垮了，但從堡壘內射出來一顆流彈……」謝團長壓低了聲音說：「擊中了我們的洪師長……他犧牲了。」

紅色的隊伍繼續向前逃竄，戰鬥後的空氣仍然緊張得很。除了卡嚓卡嚓的腳步聲和路旁小溪潺潺的水聲之外，還有那宣傳隊小鬼們的歌聲。

紅軍雖然突破了第一道封鎖線，但卻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二 游擊隊長的匯報

紅軍突破國軍第一道封鎖線後，即向贛粵邊大庾嶺地區前進。記得那也是個黑沉沉的夜晚，中央縱隊參謀長張雲逸十分興致地來到縱隊政治部。管理科長帶進一位農民打扮的青年

來會晤張參謀長。原來他就是活躍於這個橫互數百里高山峻嶺的大庾嶺地區游擊隊——聶都游擊隊隊長。他昨天才從他們的根據地趕來找主力紅軍的關係。縱隊政治部接待了他，並安排了他們和縱隊參謀長作一次談話。下面是當時他們所談有關聶都游擊隊的活動情況：

聶都游擊根據地位於贛粵湘三省交界，東毗粵東之南雄；南連粵北之仁化；西與湘東之桂東、汝城兩縣毗鄰；北接贛西南之南康、崇義。四周有巍峨的高峰環繞，青綠的叢山密林，連綿的山脈縱橫數百里，地形非常險要，的確是個理想的游擊根據地。

聶都游擊隊原是南雄游擊隊（由中共南雄縣委領導）的一部份，他是在一九二七年農民暴動中產生的，已有六七年的歷史，曾裹脅農民組成紅軍獨立營送到主力紅軍中去。過去他們在南雄、信豐、大庾地區打游擊戰爭，因為領導者犯了右傾保守主義錯誤，遭受了很大損失。

在殘酷戰爭過程中，南雄共產黨終於認識了保守主義的錯誤，堅決的同右傾保守主義作無情的鬥爭，並將原來部隊重新整編為三部分：一向聶都地區；一向三南（龍南、全南、定南）地區；一留原地區活動，以分敵勢。

聶都游擊隊，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工會、貧農團，消滅了一些地主武裝，屠殺了一些地方士紳。游擊隊把沒收地主、士紳的一部份東西分給貧苦的群眾。在這些行動中，游擊區也就擴展到縱橫一兩百里之廣。

我在這一小節裡，特別把聶都游擊隊來與主力紅軍取得聯繫的事跡作一回憶的描述，乃基於下面的幾種感想：

第一，聶都游擊隊由於地處贛粵湘三省邊境，地勢險要，確是一個理想的游擊根據地。

加以中共地下組織運用得力，取得鞏固和發展，因而它的活動對於江西蘇區和紅軍起了一些配合作用。

第二，這次江西紅軍突圍西竄能夠順利衝過國軍第一道封鎖線，反映了中共中央軍委選擇這個地區作為突圍的缺口，是與聶都游擊隊的活動有密切關聯的。

第三，江西紅軍西竄後不久，江西蘇區全部為國軍所收復。在軍事上負責領導「中央蘇區」的陳毅，於一九三五年春率領著紅二十四師殘部百餘人（原有二千多人）來到大庾嶺地區（聶都游擊區屬此）的油山根據地苟延殘喘，此又說明了聶都游擊區對於爾後陳毅在贛粵邊山區的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三 彭德懷砲攻大來圩

江軍突破第一道封鎖線之後，迅速沿熱水、益將之線疾進。熱水是從江西到湖南必經之處，從熱水——益將——汝城——大來圩——宜章，是國軍的第二道封鎖線。沿途兩側山嶺都築有碉堡，攔阻著紅軍前進。因怕國軍飛機轟炸，我們仍是夜行軍，而且都是急行軍。

我們一口氣跑了七十里，到達距熱水五十里的村莊宿營。第二天十時抵達熱水附近。據偵察員報告，今天熱水逢圩，圩場熱鬧非常，附近村莊的農民，挑著豬肉、雞鴨、糧食、米酒、香菸等到圩場來賣。紅軍派出的便衣，就以小販為掩護混入圩場內，乘民團不備，向團部蜂擁而上，只摔了幾顆手榴彈，就把一百來個民團解決了。紅軍部隊就一連一連，一營一營，陸續開進熱水。

說也奇怪，益將的民團還不知道熱水已被紅軍佔領。

「喂！是熱水嗎？熱水到了共匪沒有？」益將的民團在電話裡這樣發問。

「是，我是熱水，沒有敵人……」紅三軍團的王團長這樣回答。

據俘虜兵說，益將距熱水只有四十里，駐有一百多民團。江三軍團派出了兩個團向益將急進。沿途馬路兩側山巔的堡壘不斷的向紅軍射擊，紅軍邊抵抗邊前進，又是一個急行軍。

右翼的部隊開始和民團接觸了，經過一陣小戰鬥，很快就將益將的民團解決了。殘餘的民團拚命的向大來圩方面逃走。我們沿馬路向大來圩方面追下去。潰退的民團沿途丟棄了許多軍毯、軍服、鞋子、綁帶、香菸等，我們一口氣追了幾十里，抵達距大來圩二十里的地方宿營。

第二天拂曉後，紅三軍團第四師的隊伍，已經接近到國軍的堡壘下面去，準備向大來圩的堡壘發起攻擊。指揮員下定了攻奪大來圩的決心，戰鬥員緊握著上了子彈的步槍，最前面的戰士拿著手榴彈，等待砲聲一響，堡壘一炸裂，立即向前衝。

但情形有些不妙，砲聲已轟轟的響了四五下，而國軍的堡壘卻依舊無損地直立著。

「真不中用呵！」怨言從隊伍中發出。軍團長彭德懷向砲兵陣地走去，拿起望遠鏡望了又望。

「為什麼距離這樣遠？……」彭德懷著急的說。

「快移到這邊來。」彭德懷下了命令。

大砲從指揮陣地後面的一個山頭移到距堡壘約四百米的地方。又打了四砲，仍然沒有擊中目標。

「等我來！」彭德懷急促地說，他是砲科出身，對於砲擊很有一手。他有一支半舊的牙刷插在左肩下的軍皮包外面，左肩下掛著望遠鏡，背上還揹著一個半新的斗篷。他急促的跑到砲兵陣地瞄準了一下。

「真是不中用。偏差這樣大，還打得中嗎？」

「要他們準備好……」彭德懷一面弄著砲，一面命令著：「一打中就衝……」

後來總算給彭德懷打中了一砲，接著又連續打了幾發砲彈以後，於是，「衝呀！衝！」彭德懷高高的舉起他那個破舊的紅軍帽，在空中不停揮動，要紅軍趁機會衝過去。

四 築路工人

今天，紅軍要向粵漢鐵路（尚未鋪軌）前進了。大家不免要高興起來，因為一方面到了鐵道邊，總不致再有什麼高山要爬；另一方面鐵道邊地方總是比較大，物產豐富，並且到了那裡也許有幾天休息，可以讓疲勞的身子輕鬆一下；還有一樁使人高興的事，是絕大部分的紅軍戰士都未曾看過鐵路，不免充滿著好奇和興奮的心理。

距離鐵道還有二十里光景，縱隊政治部向所屬部隊政治處和各黨委會發出通告：「今天到白石渡，那裡是鐵路旁邊，有很多築路工人。各部隊要動員去擴大紅軍，並進行比賽。」

白石渡是宜章縣的一個小市鎮，為粵漢路必經之地，由於興建鐵路的關係，這裡的生意一天一天興旺起來。開工築路已有好幾個月了，有些地段已經修好了路基，有些地方卻正在開始修築。這個地方地質不好，石頭太多，工人要從老遠的地方挑土來填，工作很吃力。這

個地段（包括宜章縣）的築路工人原來約有三四千人，一部份在紅軍未到達以前，已經跑掉了。工人中湘南人佔絕大多數，由於年來遭到水災，收成不好，因此使農民不得不遠離家鄉，到這裡來做工。也有一部份是北方人，有的是因為逃災而來的。築路工人住在棚子裡，一個棚子住著十來個人，也有住二三十個人的。每一個棚裡都有一個工頭，由工頭去包一段路的工程來做，然後把工作分配給每一個工人，工人每天工資七角八角不等，他們住的棚子是用松樹幹架成的，上面蓋著濃密的稻草。床舖也是用松樹幹架成的。

紅軍到了，保衛他們的民團逃走了，工頭也跑掉了，工也停了，工人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政治部派出的工作人員立即展開了政治鼓動工作。分別召開了好幾處的工人群眾大會。進行對失業工人的欺騙說服工作。發給了糧食和衣服，使工人們先嘗到一點甜頭。政治部組織擴大紅軍突擊隊，到了工人群眾中去進行工作。棚內棚外，一群一群，一堆一堆都是擴紅突擊隊員，到處充斥著演講、鼓動的聲音和歌聲。經過持續不斷的鼓動，工人們終於在欺騙宣傳之下，被逼參加了紅軍。

擴紅突擊隊員把一批一批的掛了紅布條的「新戰士」帶到縱隊政治部來。只有兩天的工夫就擴大了四五百名「新戰士」。這些「新戰士」大部份補充到各運輸大隊，接替了那些逃跑回家的赤衛軍。在白石渡擴大紅軍，是紅軍西竄行動中一件值得記述的插曲。

紅軍在佔據白石渡的同時，經過一次小戰鬥就佔據了宜章城。宜章城是紅三軍團打下來。這是紅軍突圍後經過的第一個大城。紅軍在宜章城也召開了一個三千多人的群眾大會，槍殺了好些地方士紳，把沒收來的衣服、糧食都分發給群眾，並且擴大了幾十個「新戰士」。這時，紅軍已突破了國軍的第二道封鎖線。

五 竄進道州城

紅軍佔領宜章城之後，就向臨武、藍山、道縣（即道州）之線前進。這也就是紅軍衝過國軍第三道封鎖線的行程。

此時，國軍統帥部大體上已看出紅軍西竄的目標是湘西，要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因而在寧遠、零陵、道縣、全州這一廣大地區，集結了軍隊，其中包括國軍湘、粵、桂的部隊和中央的周渾元縱隊、吳奇偉縱隊。這對中共是極為嚴重的形勢：前面和左右兩側是國軍湖南和廣西的部隊，後面是國軍廣東的部隊和從江西一直緊跟著上來的追擊部隊——周吳兩縱隊。上空則有飛機的監視和轟炸。同時在紅軍的前面還橫阻著瀟水、灌江和湘江三條河流，顯示紅軍已陷於重重包圍之中。

中共中央軍委鑑於形勢之嚴重，乃向各野戰軍和中央縱隊發出命令。軍委的命令說：

「薛敵（即薛岳兵團）在我野戰軍後面緊追，湘桂兩敵正向寧遠、道州前進，企圖截我於天堂圩道縣間，道縣現尚無大敵。我軍為先敵佔領道縣，轉入機動地區，除著各野戰軍按原計畫迅速佔領道縣外，中央縱隊各部尤應加強行軍速度，注意行軍警戒。」

縱隊政治部立即召集幹部會議，傳達軍委命令，並分別集合各部隊進行政治鼓動。

為了加強行軍速度，中央縱隊還進行了一次清查行李，清查擔子，減輕行裝的動員工作。但這一工作並不簡單。有許多因大批運輸員逃亡而無法抬走的大機器，必須想辦法丟棄。這項工作又必須秘密進行。機關部隊的大批表報、統計表、文件、圖書、識字課本等，也必須丟棄。政治工作人員的背包，也必須盡量減輕，不必要的衣服，多餘的鞋襪（其實都是必需

品）都應盡量扔掉。此外，宣傳隊、文工劇團的一些服裝、道具、化妝品等暫時不用的東西都應丟掉。經過這次減輕行裝的動員，部隊確實輕捷得多了，行軍速度增進了。雖然每天還是下著毛毛雨，路還是那麼滑，但我們有兩天日夜兼程，走了二百二十里。部隊在一處樹林下休息，每人都檢查兩天急行軍的「成績」：這個叫：「我的腳起了好幾個泡，痛得要命……」那個叫：「衛生員呀！請分點凡士林給我吧，我的腳痛得要命，不能走路了。」

宣傳隊的小鬼們來了。小鬼們習慣地喊出了那一套口號：

「同志們：我們要吃苦耐勞……我們快要到大地方去。道州城有好東西可以買……同志們！勇敢，堅決地前進吧！」後面的戰士盲目地跟著叫喊，部隊繼續前進。

這個地區產竹，我們每人都找到一根竹棍做手杖，經驗告訴我們，手上有一根手杖，對於夜行軍有很大幫助，尤其是下雨天。這兩天都是下雨，國軍飛機沒有「光顧」，我們一口氣走了二百多里。夕陽西沉，黃昏時候，我們進入一個小村莊宿營了。房子不多，實在擁擠不堪。幸好縱隊政治部打前站的羅梓銘，已為我們安排了一個睡覺的位置，很快我就睡著了。

第二天，我們走了七、八十里，爬了一個小山。下山時只看見前面來了十來個人，有穿長袍的，有穿短襖的，有的挑著擔子，有的挑著籬筐的。我和羅梓銘就停下來和他們談話，打聽一下前面情況。首先請他們坐下來，看看他們的臉色，有點害怕的樣子。我們分給他們香菸，表示親善，就開始問他們往道州的途徑和沿途各村莊的情形。經過我們耐心的解釋和安撫，他們的態度也就轉為和緩了。據他們說，從這裡到道州還有一百二十里，道州東南面橫著一條河，叫瀟水，靠近城的渡口有一座浮橋，從這裡進城，就要從橋上過，浮橋是用幾條小船做成的，用鏈子栓住。你們（指紅軍）如要進城，必須先奪得那座橋；如果他們（指

國軍）知道你們要去，他們就會把浮橋拉過河那邊去。

這個消息對紅軍太重要了。我們立即把這個情報轉給前線司令部。

下了山就是一片平原。雨過天青，部隊加速步伐前進，到了一個大村莊，戰士們買些花生、烤番薯、甘蔗，邊吃邊走。成千的群眾，擁擠在路的兩旁，附耳議論著：那裡來的這麼多軍隊呀！跑得多快！怎麼也不歇一下。一缸一缸的茶水，放在路邊上，任紅軍喝。又過了幾個小山頭，看見前面有一個高塔，塔下面一個大村莊，有幾十戶人家，房子都很漂亮，自白的牆，紅紅的瓦，但門窗都緊閉著。村莊前頭站著十多個短袖露腿的農民，以奇異的眼光望著我們。

「那所房子那樣漂亮，一定是大土豪的。」戰士們不由得說出了他們的願望。忽然從遠遠的地方跑出來一個大漢，等他走近來一看，原來卻是一個團丁（民團）。我們一個快步把他捉住了。團丁逞強的說：「不要抓，我是縣長派去送緊急公事的。」

「你說個清楚，你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指導員這樣發問。

「你們是什麼人的隊伍呀？是不是中央軍？」

「是的，我們是中央軍，是追共匪來的。」指導員這樣回答。

經過一番反覆的盤問，終於摸清了道州城內的情況：

城內原來只有四十多個民團，三十多支槍，前天才由國軍廣西部隊派來一連人守城。聽說這兩天中央軍就要到，但至今還沒有到……這個團丁就是送公事給中央軍，請中央軍趕快進城的。

我們繼續前進，經過了幾段開闊地。夕陽西下，時近黃昏，紅軍已抵達道州城附近。

老百姓說的不錯，道州城守軍已經把浮橋拉過對岸去了。紅軍部隊雖然陸續開到河邊，但只是「望河興嘆」。前衛團已經在河這邊的上下游佈置了警戒，並進行渡河點和攻擊點的偵察。

今天我們已經跑了一百多里，雖然戰士們都非常的疲倦，但一到了宿營地，大家又忙於擦槍，擦刺刀，準備著明天的戰鬥。工兵連則忙於做雲梯，找繩子，準備著明天拂曉爬城和巷戰。

一輪皎月，照射著河水，反映著月亮放出的光輝。此時紅軍工兵營、攻城突擊部隊都已陸續來到位位置，火力配合好了，工兵開始浮水過河。經過幾分鐘的時間，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一點響聲也沒有。忽然，只見城牆上火光一冒，「拍！拍！」一連幾響向河這邊射擊，後面的城內守軍已由西門突圍逃走了。

東方顯出了魚肚白，天快亮了。浮水過去的戰士已登上了對岸的船。船夫幫忙著紅軍官兵架橋和撐船，不到二十分鐘，就架設好了一座四米寬，可以通過四路縱隊的大浮橋。

前面突擊部隊開始過橋，由南門城牆上面分東西兩面沿城前進，其餘各後續部隊則直出北門，並乘機佔領北門外之碉堡，同時向通往零陵的方向警戒，後續部隊也開始進城。

天大亮了，陽光柔弱的從那濃重的山霧裡鑽出來，從遙遠的天空飄來飛機嗡嗡的聲響。司號員發出對空警報的號音。部隊不到兩分鐘工夫，都跑進樹林底下或屋內，一點形跡不露現。道州城變成了死城一般。國軍飛機，只是在道州城上空盤旋，忽高忽低的向地面上偵察，幾分鐘後，仍向東飛去。這次沒有丟下炸彈，大概飛機沒有發現城內已駐滿了紅軍。不一會兒，又有兩架飛機來了，其勢洶洶，向道州城丟下了幾顆炸彈又飛去，緊接著又飛來了一架，

飛得低低的，城牆上紅軍機關槍「拍！拍！拍！」一連幾響。忽然飛機的聲音變了，尾巴冒出濃煙在空中飄盪，「打中了，打中了！」看著飛機越來越低，幾乎接近地面……「嘩啦」一大響，是多麼大的風呀，幾乎要把人們吹倒在地上。飛機墜落在城外田野裡，一排端著槍上了刺刀的紅軍往飛機墜落的地點跑去。

這是一架戰鬥機，飛機的號碼是 No. 709，兩個駕駛員：一為廣東人，一為江西零都人。飛機是從南昌飛來郴州專打紅軍的。墜地的飛機被燒毀了，兩個駕駛員被紅軍帶走。紅軍也被炸死了一個馬夫和兩匹馬。

六 險渡湘江

紅軍雖然沒有費多大力氣就竄進了道州城，渡過瀟水。但更嚴重的情況卻擺在他們的面前：左右兩側有國軍廣東和湖南部隊的夾擊，後面有國軍中央和廣東的部隊緊追，企圖在湘江與湘江之間一舉消滅紅軍。國軍飛機不斷的在天空盤旋，不時擲下炸彈，並散下來大量的傳單。傳單上的話，句句是夠嚇人的，表現了國軍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消滅紅軍於湘江邊。傳單上這樣說：

「共軍士兵們！我們等你們很久了，請你們快來，來進我們安排好了的天羅地網。」

這無疑又將是一場惡戰了。幾省國軍的精銳，利用天然的地形，佈置好了第四道封鎖線，比過去任何的一道都來得更兇。那天險的湘江，洶湧的橫在紅軍的面前，惡戰即將來臨了。

夜色朦朧的籠罩著大地，遠遠的山峰黑沉沉的伏臥在深藍的天際。紅軍一隊又一隊，以

急速而緊張的步伐，日夜兼程，向著天險的湘江前進。在這一段行程中，中央縱隊是緊跟在紅九軍團的後面前進的。走了兩天兩夜，沒有吃，也沒有休息。右翼的紅一軍團在全州城附近與湘軍激戰中。左翼的紅三軍團在湘江界首渡河口地段與國軍廣西部隊激戰中。靠近中央縱隊左側擔任掩護的是紅八軍團。中央縱隊的後面是紅五軍團，他們自西竄以來即一直擔負後衛任務。

頭一天戰鬥，國軍湘南部隊三個師向覺山猛攻，紅一軍團的第一師和第二師，從拂曉到黃昏，一直在頑強抵抗，堅決固守，終因兵力懸殊，不得不放棄覺山，而在水頭、下坡田集結。第二天繼續戰鬥，同國軍猛撲，才恢復了昨天失去了的陣地。那天下午，國軍三個師在飛機掩護下，全線出擊，反覆衝鋒六、七次，均未奏效，旋即反攻為守。此時紅軍也因連續三夜未得睡眠，兩天多未吃飯，體力顯得不支也就不再主動出擊。因此正面戰事暫時沉寂。

我和羅梓銘正在休息，談論著這兩天的戰況，忽然後面槍聲又起，原來國軍是從右邊迂迴過來了，紅八軍團約兩個團被包圍了，一個團急忙從左邊衝出，另一個則從右邊衝出，正當國軍之來路，他們越過了一個小山坡，抵達馬路邊集結時，國軍成四縱隊從馬路上衝過來，正當紅軍紊亂的時候，忽然從左側的山崗上發出呼聲：

「同志們！大家向左邊山坡靠。」這一下大家一哄而散，拚命的向著左邊的山坡奔跑。此時國軍主力——周吳兩縱隊向著紅軍右翼蜂擁而來，從側面向紅一軍團進行重重迂迴，紅軍只得退卻到獐子江附近，利用獐子江隘口扼守。全州戰鬥至此便告結束。

全州戰鬥，僅是整個湘江戰役比較劇烈的一仗，但掩護中央縱隊以及全部野戰軍渡過湘江的任務並沒有完成。

在左翼的戰線上，紅三軍團第五師正在湘江界首渡口地段與國軍激戰中，這一戰鬥已經持續兩天了。中央縱隊和全部野戰軍都要在這個渡口渡江。軍委給紅五師的命令是：

「以全力阻擊廣西部隊，保證整個野戰軍左翼的安全，掩護中央機關縱隊過江……」命令嚴厲地規定：「不惜任何代價，全力堅持三天至四天……。」

戰鬥一開始，就非常激烈，國軍先用排炮向紅軍前沿猛轟，一時卧在臨時修築的工事裡的戰士們全被濃煙遮住了，國軍部隊整營、整連向紅軍逼進，越來越近。當國軍前進到距前沿只有幾十公尺時，突然在國軍陣營中騰起了一片濃厚的煙霧，成排的手榴彈爆炸了，接著炮彈也在國軍陣營中爆炸了。紅軍猛烈地向國軍還擊，國軍的損失自是不少，但紅軍在國軍大炮轟擊和機槍掃射之下，傷亡也相當大。

第一天在連續不斷的戰鬥中過去了，從第二天拂曉起，戰鬥更加激烈，國軍加強了兵力和火力，輪番衝擊，並不斷地以小部隊迂迴紅軍。情況越來越緊張，前沿的幾個小山頭已經丟失了，有的山頭是在全部隊伍傷亡之後才被國軍佔領的。傷亡越來越增加。傷員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後面去。軍委的電報頻頻地傳來：

——中央縱隊正在向江邊前進……

——中央縱隊已接近江邊……

——中央縱隊已開始渡江。

幾乎每一份電報都要求紅五師「繼續堅持」。紅五師已經頑抗了整整兩天，中央縱隊還在渡江。到這個時候為止，紅五師已經有一個師參謀長，兩個團長，一個團政委相繼陣亡了，另有兩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受傷了，連、營級幹部的傷亡更多。

第三天的情況雖然更為嚴重，更為險惡，但紅三軍團為要遵守軍委「不惜任何代價，堅持到底」的命令，還在頑強地堅持著。指揮員傷亡了，立即就有人自動的代理其職務，傷亡的戰士越來越多，帶傷繼續戰鬥的戰士自動地向前衝殺。

正當太陽已經西沉，天色漸漸近暮的時候，傳來一個消息：中央縱隊已全部渡過了湘江……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在後面擔負掩護任務的紅八軍團的一個建制師，距離渡河點還有四十里，他們一面抵抗國軍追擊，一面拚命的往渡河點奔跑。但已經來不及了，這個師就被殲滅於湘江邊。

紅軍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搶渡了天險的湘江，衝過國軍的第四道封鎖線。

紅軍搶渡湘江的戰鬥（含全州戰鬥）是紅軍西竄戰役中比較劇烈的一仗。在這一戰鬥中，顯示了中央機關縱隊這一大包袱，成了整個紅軍野戰軍的絆腳石，遂使紅軍因此而被拖累，被拖垮……由此導致了紅軍西竄失敗的嚴重後果。

叁、在廣西僛苗山區

紅軍渡過湘江，跨過湘桂公路，衝破最後一道封鎖線之後，即攀登湘桂邊南嶺山脈的越城嶺，進入廣西境內僛苗族聚居的區域。這是一個山嶺縱橫、森林茂密的高原地區，境內丘陵廣佈，人跡稀少，住有僛、苗、獯、侗等少數民族。

紅軍越過那越城嶺高峰——老山界之後，即沿著尖頂——龍坪——廣南寨——通道——黎平之線前進，而進入黔東南地區。

紅軍從十一月二十九日渡過湘江進入廣西境內起，迄十二月十四日抵達黔東南苗族聚居的黎平止，共歷十六天，走了九百多里。紅軍在這一艱險的行程中，由於高山延綿，密林蓊鬱，雖能擺脫國軍追擊於一時，但卻遭受到住房和糧食的兩大困難。

一 老山界的一夜

老山界，又名僛山，是湘桂邊越城嶺的一個高峰。這是一座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是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攀登的大山。據說上山九十里，下山六十里。我記得是一天的下午，中央縱隊的隊伍抵達老山界的山腳下一個小村莊，名叫千家寺，我們就在這裡休息，吃飯後即開始上山。

上了十來里，走到一個小村莊，是一個只有六、七戶人家的傜人^①小村。我想，整個老山界住的都是傜人，此山也因此得名吧。我和羅梓銘、陳雲州就在這個小村莊稍作休息，打聽一下前面的路程，據傜人說，前面四十里地方有個高峰叫雷公岩，非常的陡，往上爬三十里，往下走十五里。此時太陽已西沉，部隊要繼續前進。為了夜行軍，我們就在這個小村附近竹林裡找乾竹做火把。隊伍過得多，那些可以做火把的乾竹差不多被前面的隊伍拿走了。傜人的房屋和籬笆都是用乾竹編成的。我們看見有些籬笆只剩下了幾根木柱，顯然是籬笆上的乾竹都被前面的隊伍拆去做火把了。我問了傜人，知道前面路邊還有竹林可找火把，便叫縱隊政治部宣傳隊寫了幾張標語，用米湯貼在外面醒目的地方，要後面隊伍不要拆老百姓的房屋或籬笆做火把，並派人到前面竹林去預備火把。後繼部隊來了，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天完全漆黑了，果然前面有一大片的竹林。打前站的人員已為我們預備好了火把。

滿天星光，火把也亮起來了。仰頭一望，只見火把的光排成許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與星光連在一起，分不出是火把還是星光。我們在贛粵邊境攀登大王山時打火把行軍的燦爛奇景，又呈現在眼前了。

① 傜，本「僮」字，因犬旁含有畜意，政府過去在僮區設置「安化局」，曾將「僮」改為傜。中共據大陸後又將「傜」改為「瑤」。

看到了這種奇觀，就不難想像這座山是多麼的陡了，不由得渾身緊張。於是有人發動喊起口號來，藉以鼓舞：

趕快跟上去！

不要掉隊呀！

勇敢前進呵！

在「之」字形的路上一步一步上去，走得很慢。向上看，火把在頭頂上一點點排列到天空，往下著，簡直是絕壁，火把照著人們的臉，就在腳底下。

常常是前面走不動了，等了好久才走動幾步，又停下來等。路又陡又狹，只有兩尺來寬，隊伍擠得緊緊的，路上站得滿滿的。站累了，就在路旁坐下來，等前面叫喊「走，走，走」，才又站起來走路。天氣寒冷，山高風大。每個人都很疲乏，但不敢合眼，因為路太狹了，一不小心，跌跤不打緊，萬一滑下去可不是就成「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嗎？後面總衛生部就有一個小鬼（衛生員），因疲倦，睡意朦朧的走著，忽然一失足滾入深坑裡去了。當時雖由傳令兵提了馬燈，慢慢的拉住樹根攀到深坑裡，可是那小衛生員已跌得不能言語了。這就警惕了大家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著。因走得慢，即使下午預備了火把的人，這時候已經把三兩根火把燒光了，以後簡直前前後後都不見火把了。只有那稀稀的幾隻馬燈的光在走動著。隊伍越走越慢了，走幾步，停五十分鐘，既不像走路，也不像休息。

我索性停下來大休息，一面看看中央縱隊整個隊伍情形，一面鬆一鬆身體，藉此紓解疲勞。我故意掉隊，但算不了什麼，整個隊伍走得這麼慢，等一會自己使勁走，很快就可以趕上自己的隊伍的。

忽然，遠遠的一隻馬燈的光，引起我注意。等他走近一看，原來是蘇維埃中央財政部長林伯渠，這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隊伍，都走得很不錯。此時林伯渠兼任紅軍總沒收徵發委員會主任。在宜章城時，我看見他在分發清算鬥爭弄來的物資，包括糧食、衣服、食鹽等等，林伯渠停下來和我稍作寒暄，詢問前面部隊的一些情形。藉著馬燈的光，我看看錶，已經是午夜過一點多了。

「林老同志，很冷吧！」我問他。

「不冷，不冷，再上一個坡就不冷了。」林伯渠回答。後來他被稱為「長征中老英雄」。我和他一起走了一會，就再趕到前面去。

走了半天，忽然前面又走不動了，傳過來話說，前面有一段路在峭壁上，馬爬不上去。那恐怕就是傳說中的雷公岩了。又等了一點多鐘的光景，時間已經是次晨兩點鐘了。前面依次的傳下來縱隊司令員的口頭命令：「各大隊、連隊，隨地靠路旁露營，各連炊事員（火伙）到前面煮飯。」大家就依順序叫喊：「向後傳……」這算是在高山宿營的正式命令。大家實在太疲倦了，不管地上是乾還是溼的，把氈子往身上一裹，就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上就睡了。人生再沒有比此時此地更需要睡眠的了。不要幾秒鐘，都鼻息呼呼的進入睡鄉。

睡了一會，忽然醒來，才覺得寒氣凜冽，渾身戰慄。把氈子捲得更緊些，把身子蜷曲起來，還是睡不著。舉頭一看，天空滿綴著鑽石般的星星。一陣一陣的冷風，從山谷的隙縫中吹來，不禁使人毛髮悚然。那黑沉沉的波浪形的連巒，巍巍然地在四周矗立著，把這個山谷包圍得像一口天井。還有幾處未熄滅的火堆，凍醒了的人們在圍著火堆低聲地談話。除此之外，就是靜寂佔據了整個的山谷。……不知什麼時候我又睡著了。

黎明的時候被人推醒，說是準備出發了。炊事員從前面山坡送飯上來，趕忙盛了一碗來吃。又傳下來命令，要中央縱隊全部隊伍，今天無論如何要越過這座山。因為路難走，一路上必須進行鼓動，督促前進。於是縱隊政治部宣傳部的幾個工作幹部就暫時停下來，立即寫標語，並分發宣傳隊到各段去喊口號，貼標語，演說，幫助病員和運輸員，俾能把這笨重的中央縱隊運過山去。我和羅梓銘忙了一陣之後再向前進。

過不了多遠，只看見前面有個垂直的峭壁，就是昨夜所說的「峭壁的路」，也就是傳說中的所謂雷公岩了。果然陡得使人心驚肉顫，幾乎是九十度的垂直的石梯，只有一尺多寬，旁邊就是懸崖，深得夠嚇人的。崖下已經聚集著很多馬匹，都是昨晚不能過去，要等到今天全縱隊過完了才設法把牠們搶救出來。有幾匹曾從崖上跌下去，腳骨都折斷了，看來只有把牠們殺掉打牙祭了。

很小心的過了這些石梯，前面的路雖然還是陡，但並不陡得那麼厲害。我們一路走，一路檢查標語。爬完了這座陡山，到了一處平地，我以為所謂的雷公岩就是這麼高而已，恰巧來了一個僑人，我們就請他坐下來談談。經他一說，才知道還很遠，前面還有一個二十多里的很陡的山，真夠使人發急啊！

到了一個山巔，只見前面有個高峰，那知爬過了那個高峰之後，前面又是一個高峰。這樣一個又一個的爬過去，大家不停的喘息，汗流浹背。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聽見前面隱約有留聲機的聲音，正唱著「罵一聲毛延壽你賣國的奸賊……」一張唱片唱完了，又聽見一陣歌聲，原來是總政治部的宣傳隊正擺著宣傳棚，這是為鼓勵行軍，提高部隊戰鬥情緒，使之忘卻行軍的疲勞而設的。在宣傳棚旁邊的石頭上寫著：「同志們，努力前進，還有二十五里就

到山頂了。」

「大家比賽一下，看誰先爬到山頂」，宣傳棚裡的留聲機和宣傳隊小鬼們的歌聲，效果非凡，可使隊伍賣力向前奔跑。我站在一個平頂上觀看一隊一隊的運輸大隊都走上了前頭，剩下來的的是野戰總醫院的隊伍。總醫院這一隊伍是夠辛苦的，因山陡，病員和傷員都要從擔架上下來走，旁邊都有人攙扶著。在醫院工作的女護士也極辛苦，她們要處處照顧幫助病員。終於走到山頂了，極目向來路下望，那些後面的高山都變成「矮子」了。

忽然聽到後面遠遠的機關槍格、格、格響聲，夾著飛機嗡嗡的聲音。機關槍的響聲，越來越密，大概是在我們昨天出發的地方，紅八軍團和紅五軍團正與追擊的國軍開火。

到了山巔已是下午兩點多鐘了。昨天的晚飯和今天的早飯，都沒有好好的吃過，此時感覺很餓，很疲乏，但又必須奮勇前進，戰勝這座難以逾越的老山界。

下山四十里也是很傾斜的。我們一口氣跑下去，跑得真快。路上有幾處景色很別致，濃密的樹林中間，清泉湧出像銀子似的流下山去，清澈可見底，在每條溪流的旁邊，戰士們用面盆、飯盒子、鐵口杯等煮稀飯吃。顯然他們已經很餓了。我雖然也很餓，但仍一口氣跑下去，一直到宿營地——唐莊。

老山界雖然是紅軍突圍西竄以來所遇到的第一座難走的大山，但當我們後來渡金沙江、大渡河，爬大雪山，過草地之後，老山界的險阻，比較那些困難來，無寧是小巫見大巫的了。

二 僑人村莊

我們越過老山界之後，就進入僑、侗、獐、苗雜居的山區。從地圖上看，是屬於龍勝縣。這次紅軍經過幾處僑苗地區——尖頂、龍坪、廣南寨等即係龍勝縣所轄。

廣西的僑族，主要分佈在都安、萬岡（中共竊據大陸後已改為巴馬瑤族自治縣）、西薩（中共已改建為隆林各族自治縣）、金秀僑山（中共已達為大瑤山瑤族自治縣）和龍勝（中共已建為龍勝縣各族自治縣）等地區。在西北部各縣鄉中亦有少數僑族散住其間。據中共調查，廣西之僑族約有四十六萬人。

僑族係中國古老民族之一，據歷史記載，廣西僑族，最早居住五嶺以北，後始遷入嶺南，其與嶺南土著部落，在語言上和文化上有極大的差別。其語言屬於漢藏語系、苗僑語族之僑語支。由於居住分散，僑語間亦互異。

最初之僑族大概聚居於洞庭湖以北地區，因受歷代漢族統治者之歧視與壓迫，乃越過洞庭湖以南而遷至五溪下游之長沙、武陵一帶。依地理形勢觀察，已越過洞庭湖而至五溪下游之僑人，乃沿不同之溪源分三路遷徙：一路經武溪散佈到湖南；一路經由辰、酉、沅三溪進入貴州、雲南；一路沿巫溪而走，除中途殘留若干於湖南之西南部外，大部份進入廣西定居，嗣後其中的一部份再由廣西轉至廣東。

僑人性爽朗而勇悍，團結力強。據說，漢人大量遷入嶺南後，因人口日增，不斷與已定居之僑人發生土地爭奪，加以漢族統治者對僑人之歧視和壓迫，從元成宗時（十四世紀初）到明末（十七世紀中葉），僑族之暴動反抗不斷發生，四百年間，僑族之叛亂前仆後繼，戰

火波及兩廣不少州縣，廣西幾無寧歲。其中如大藤峽之僑民暴動，曾震驚全國。明朝曾以韓雍、王守仁、蔡經等將帥，徵調大軍，用兵達數十年，歷經三次大戰役，始將僑人基本上擊敗。僑族人慘敗後，大部份逃入深山。

由於僑族人歷代居住於高寒貧瘠之山區，一切落後，生活異常艱苦，一般僑人每年平均缺乏三至六個月的糧食，他們主要從事農業和林業，僑族內部亦普遍存在高利貸剝削。

幾天來，我們就在這段以僑族為主要居民的僑、侗、苗各族聚居的山區行動。我們看了不少僑人揹著有繩網的籬筐，有的穿著草鞋，有的打赤腳，他們有著赭赤的臉，粗黑的兩腿。他們在那「羊兒站不住腳」的陡峭的山上耕種著，在耕作的習慣上，他們仍保留著原始的生產方式之「刀耕火種」的方法（即春耕前將大片山林砍燒，然後將種子撒下，不施肥，亦不中耕）。他們整天都在那蜿蜒的狹路，豎梯般的山坡上，不喘息的奔跑著、勞動著。當紅軍的隊伍在那彎彎曲曲的狹路上走著的時候，僑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那深遠的山坡上，在矮小的木房子門口，凝神的俯視著山腳下奔走的紅軍隊伍。

忽然，宣傳隊的小鬼們發出尖銳而宏亮的喊聲：

「僑家弟兄們！下山來打李家狼子^②去！」只見那山坡上耕種的人，伸直了懶腰，在梯子嶺上走路的人們，回首著，浮動著，那木房子門口的人們也浮動著——但都未作表示，沒有反應。宣傳隊的小鬼們有點不耐煩了，便跑向山坡上去和他們攀談起來。

不多久，宣傳隊帶來了一個僑人，約四十來歲，深凹的眼睛，短闊的下顎，赭赤的臉，

②當時僑人稱李宗仁的軍隊為「李家狼子」。

粗黑的手腳，挺露著肋骨可數的胸。宣傳隊員頻頻地請坐、請喝茶，從衣袋裡取香菸來請他喫，但他不接受。他沉默的把他那插在背後的木菸斗抽出來，然後點著菸，拘謹的坐在門邊的石頭上。

「你懂得漢話嗎？」我問。

「不懂漢話，我們就不得到平地來買東西了。」他說著湘南腔的漢話。

「你穿的衣服同漢人差不多。」

「沒有穿這種衣服，我們就不得到平地來。」僑人提了提他的藍布短衫。是的，我們剛才看過一張團總的佈告，佈告上說：

「照得僑民風俗鄙陋，往往奇裝異服走入平地，實屬有礙風化。以後僑民下山進入平地，須穿漢服，違者拘緝。」

宣傳隊員端著飯來了。

「僑家弟兄請吃飯。」他不客氣接過去就吃。他是餓了。周圍的人都凝神的看他吃飯的模樣。宣傳隊乘機不住的發問：

「你們家裡吃什麼？」

「吃包穀。」

「為什麼不吃大米？」

「山上種不得。」

「為什麼不到平地來種田呢？」

僑人只是默默的嚼著飯，眼睛盯住小鬼們的身上，露著驚異的苦笑。

經過地方工作幹部的訪問調查反映，我們大體上摸熟了一點有關僑人的風俗習慣：

僑人普遍流行著一種所謂「祭社」的習俗，每年農曆二月和八月「社日」各祭一次。此種「祭社」屬於集體祭典，所以全社居民均須參加。「祭社」之日，除了宰豬祭祀外，平時負責社廟清潔之社老（社的頭目），即以領袖身份出現，各戶派一人至社廟前聚餐，聽聽社老「料話」，「料話」時宣佈有關生產之規約，及禁止一切對生產有害，或生產時妨礙他人利益之活動。

在僑族中，基本上仍實行一夫一妻制，且婚姻自由。雖部份僑族人的婚姻由父母包辦，但仍須取得當事人之同意，至於入贅之風俗，在僑族中亦盛行。

第二天，我們走了八十多里，到了一個村莊，也是僑人村子，住有二十來家，我們就在這裡宿營了。前前後後都是僑人村子，都住滿了隊伍。因房子不夠分配，許多隊伍在樹林裡搭棚露營。我們弄好了床鋪，洗好腳之後，便轉到村莊的另一個角落，走進一家僑人的小木房裡。一個四十來歲的僑人，在地板中間的火盆（這是僑族人的灶）旁烤火，他嘴裡含著旱菸管，那濃濃彎彎的煙霧，和著房子裡另一種氣味，在寒冷的空氣中包圍著我們。老人很和藹的招呼我們一起烤火。

「我們是紅軍，要來找你們做做朋友。」我一進門便這樣說。

「是的，你們很和氣。」

「為什麼鎮上的人都逃走了呢？」

「這是這裡的團總、保甲長要我們逃走的。」

僑人說著，隨又轉頭向隔著木板的小房內叫泡茶。一般的說來，僑人都是好客的。不一

會兒一個青年小婦人端著一碗茶送過來。她有著閃耀的眼睛，紅潤的臉，豐滿的肌肉，穿著繡有多種顏色的寬大衣裳，圓圓摺疊的裙子，打著赤腳，是個標準的傜族小婦人。

「是我的媳婦，昨天晚上才從後山趕回家來的。」老人解釋著。

我和羅梓銘告別了老人，拐了個彎，走進另一所傜人房屋。裡面住著母女二人。男人大概也是聽到團總的警告跑到什麼地方躲起來了。

「大嫂，借你這裡歇一歇腳好嗎？」

「請到裡面來坐。」她還帶著幾分驚惶的神情。我們便與她攀談起來。

她問我們餓了沒有？她問得真適時，我們確是餓了。她便拿出僅有的一點米來，放在屋中間木頭界成的一個灰堆上煮著稀飯。她對我們道歉，說是沒有米，也沒有大鍋，不然她很願意多做些給我們充飢，我們給錢，她堅決不要。我們和她周旋了好久，剛好此時陳雲洲也趕到這裡，他帶有米袋，是三天的糧食，都送給她，這一下她非常歡喜的接受了。我們吃飽了一頓飯之後，即告別了她，回到自己的住處睡覺。

三 誰是放火者？

我們在傜苗地區行動已有五、六天。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叫做尖頂的傜人村莊宿營。那天我們走了一百來里路，進入村子時，天已全黑了。我和羅梓銘弄好了睡覺的位置，洗腳、吃飯後，正準備睡覺。忽然屋外有人叫喊：「失火，失火，趕快救火呀！」我和羅梓銘、陳雲洲跑到屋外一看，在我們住房下邊的幾棟房子著火了。霎時火光沖天，照耀全村。我們住

的村子是在半山坡上，房屋都是木造的，屋頂用樹皮蓋成，而且多是從山腰架起，彼此連接，很多是由山腳下一直連接到山頂；所以房子一著火，立即成燎原之勢。

由工兵營組成的救火隊雖然很快趕到現場，但在這一片木造毗連的山村，救火並不簡單。第一要有水，第二要有工具，才能把水運到屋頂上去。剛好離著火的屋子幾十米的地方有一小池，但木桶很少，救火隊分頭才找到了十幾個木桶。把救火人員分成幾路排隊，由水池一直排到著火處，一個傳一個遞上去。但是杯水車薪，怎能把這樣兇猛的大火撲滅呢？要撲滅這猛火，使它不致蔓延，不僅要靠水，主要還是要把那些可能蔓延的房子預先截斷，使火勢無法蔓延，然後集中撲滅火勢不大的角落，才能奏效。救火隊採取這種辦法後，經過差不多一小時奮力撲救，才把這漫天的大火撲滅下去，把這一山村從火災裡救出來。一共燒毀了十多棟房子，到了十二點鐘以後大家才睡覺。

第二天早晨，縱隊政治部利用部隊出發前的短暫時間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一方面追究和調查昨夜起火的原因，另一方面要求各部隊加強防火的戒備。會議把防火的工作提到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上來，強調要以最高度的政治警覺性來對待防火工作。政治保衛局長鄧發也出席了這個會議，他說，我們要在縱隊的全體戰士中宣傳火對於我們的嚴重威脅，我們號召縱隊全體戰士要以最銳敏的警覺性來對付放火者，從這兩天的行軍來看，發生火災的地方不只是一處，在我們後面的總衛生部的宿營地也發生過。會議決定縱隊各連隊指定一個排為救火排，各大隊組織一個救火隊，每到宿營地，首先就要找水井或水池，要準備水桶及其他救火工具，不准將火把帶進房屋裡，各連指導員要特別小心炊事員燒火的情形。

從尖頂出發的第三天，縱隊的隊伍到達龍平。龍平還是傣苗族區域，是廣西省龍勝縣管

轄的一個市鎮，有四五百戶人家，是個山城。道路是用很平滑的花崗岩石鋪成的。快進城鎮的道路兩旁，有幾處水車（用來碾穀或磨麵）。這個山城，除了一小部份靠近山坡處是用樹皮蓋的木房外，大部份是瓦房。居民仍以傣族居多，也有一部份漢人——大部份是開店舖的。據說還居住一部份苗族，不過當時我們分不出誰是傣人，誰是苗人，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會說漢話，可以說是「漢化」了的。

那天部隊出發之後，我和羅梓銘，陳雲洲三人分別到各大隊去檢查部隊紀律，佈置防火工作，並派出一些「輕擊隊」、「十人團」在各部隊中活動。雖然我們很早就趕到宿營地，但由於佈置各項工作，所以到傍晚才趕到自己的住處。發生火災的時間總是在吃飯後大家都很疲乏地睡著了的時候，今天也沒有例外。果然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又叫喊「救火，救火」了。我們跑到外面一看，鎮上左邊的一個角落火焰冲天，映得滿天通紅。我們趕到那邊鎮口城門時，火勢已蔓延至城門邊，全鎮有三、四處起火，火勢比尖頂更兇猛，蔓延很快。這次離水源雖然比較遠，但因救火隊已有了救火的經驗，很快就把火勢控制住，不到一小時就把火撲滅了。

政治保衛局對這次火災進行了嚴密的調查和追究。據目睹者說，起火是在一間無人住的木房子裡發生的，接著有幾處同時起火，當某一處發生火警時，即有人發現有人從火坑內跳出來，兩個地方都是這樣。當保衛隊人員把他們捉住時，原來是某一運輸大隊的臨時運輸員，是四、五天前，因該大隊幾個運輸員逃跑了，在雇挑夫時，他們就冒充當地老百姓被雇進來的。經嚴厲審問後，他們直認不諱，並承認昨天的火也是他們放的。據他們供認，他們是龍勝縣政府派進來充當我們的運輸員，有計畫的放火。被捉米到的三個放火者中，除了有一個

在黑夜中逃脫外，其餘兩人都被政治保衛局槍殺了。

四、大家動手碾穀

紅軍進入廣西僑苗地區，除了住房的困難之外，還遭到糧食的困難。由於僑苗地區民衆普遍受到團總的警告都逃走了，他們逃走時也把糧食帶走，帶不了的也都埋藏起來，連水磨、石臼等造米工具也給毀壞了。紅軍來到時，雖搞到了一些穀子，卻找不到工具可以把穀子碾成米。紅軍隊伍到得麼多，不但要碾出當天晚上吃的米，還要準備好明早吃糧食和帶走一餐的糧食。

縱隊政治部根據這些情況，認為除了發動全體戰士大家動手碾穀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可想。於是在部隊中掀起了大家動手碾穀運動。所謂大家動手碾穀這個玩意兒，就是搜出僑民的穀子，拿來放在磚頭上、石板上或是地板上，用石頭、空瓶子或短木棍，用力不斷的碾，一直把穀子碾成米來。這個玩意兒大家不但未曾看過，而且也未曾聽說過。縱隊政治部的命令說，發動全體戰士大家動手碾穀運動，以解決在僑苗地區行動的困難，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

縱隊政治部的命令還具體的規定：戰鬥員不僅要碾出當晚的米，而且要碾出明早一餐和帶走一餐的米。軍事首長們由於職務上的關係，可以不參加碾穀，但必須督促他們的特務員（勤務兵）碾出兩人份的米來。政治首長包括政治處主任在內，則應以身作則自動參加碾穀工作。在野戰醫院休養的幹部，只碾出一餐的米，體力強的幹部便和一般戰士一樣碾出三餐

的米。當大家一齊動手碾穀的時候，只聽得絲絲察察的聲音，開始時還不感覺得怎樣，可是搞久了，大家的手掌都磨出血來了，把穀子的皮脫掉之後，又必須把穀皮和米分開來，才能把米煮成飯。由於缺乏工具的關係，這一道工夫也不簡單。一般老百姓是用風箱把穀皮吹出去，而此時此地，我們既沒有機器又沒有風箱，只有用兩隻手掌捧看碾出來的米和穀皮，靠嘴巴用力不停的吹，把穀皮吹落在地上。這個辦法當然很費時，碾出一斤米，至少要費一小時。

我和羅梓銘、陳雲洲碾好了自己份內的米之後，便分頭到各大隊各連隊去檢查碾穀工作。我到了毛澤民（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所率領的運輸大隊去檢查，毛澤民對我說，他規定吹事員不參加碾穀工作，運輸員只碾出自己吃的米，工作幹部除碾出自己吃的一份之外，還要碾出炊事員吃的一份，連他自己也不例外。我看見他的手掌已經磨出血來了，還在繼續的幹。我又到蘇維埃中央政府隊伍的宿營地去檢查，恰巧碰到徐老特立。從瑞金出發的時候，徐老率領看蘇維埃中央教育部暨蘇維埃大學部份學員的隊伍。他對我說，過湘江之後，蘇維埃大學的隊伍解散了，學員都分配到各戰鬥部隊的政治都工作。徐特立自己也動手在碾穀，他已經碾好了一餐的米，他說還要再碾好足夠兩餐的米。他這種以身作則的苦幹精神，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

肆、在黔東南苗族聚居區

紅軍越過廣西僛苗山區後，即向湘西北轉進。此時國軍薛岳兵團及湖南部隊為恐朱毛紅軍與湘西之賀龍、蕭克部會合，乃集中於湖南之城步、綏寧、靖縣、會同等縣，廣西部隊亦以一部扼守於湘桂邊以堵紅軍再度南下，另以一部尾追紅軍。惟此時朱毛紅軍之前鋒已竄抵湘西之通道縣。

中共中央發覺紅軍正面臨著國軍之堵擊，自知無法突破國軍的強大防線而衝入湘西與賀龍、蕭克紅軍會合，乃放棄入湘西的企圖，轉而西竄貴州。

紅一方面軍在西竄歷程中，損失慘重，抵達貴州黎平時，其兵力已由西竄開始時的八萬五千人減至三萬人，約損失三分之二，戰力空前削弱，且因長途跋涉，部隊疲憊不堪，逃亡現象有增無已。中共中央乃於佔領黎平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五日），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討論當前的戰略方針。會議決定迅速搶渡烏江，到遵（義）桐（梓）地區休息整補，進而伺機在川滇黔邊境建立新的根據地。

紅軍自十二月十四日竄抵黎平至十二月底強渡天險烏江前這半個月期間所經過的地區，

為黔东南地區，境內住有苗、侗^①、布依、水家、夷、回、獐、僑等少數民族，其中以苗族為最多，侗族次之。中共踞貴州後，在凱里設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據中共調查，貴州苗族約一百六十萬人，分佈於全省七十五個縣市，主要聚居在苗嶺山脈及清水江流域一帶，其中心地區為台江、雷山等縣，其中苗族人口約佔百分之九十以上；鹽山、劍河、黃平、施秉、丹寨、麻江之苗族人口佔百分之四十至七十不等，在此區之苗族人口約四十萬人。

侗族，主要住在黎平、從江、榕江、三穗、錦屏、劍河等縣。貴州全省之侗族約四十萬人，其中以聚居在黎平者為最多。

一 苗族的神話

有一天，太陽已西沉，暮靄四佈的時候，我們在苗人聚居的一個小村莊宿營了。那天下著毛毛雨，顯露著「天無三日晴」的景象。我和羅梓銘剛弄好了床鋪，將要睡覺的時候，宣傳隊的小鬼帶進來一位中年苗人。他一進門，就深深作了一個揖，滿面笑容的連聲喊道：「紅軍大人」，流利的說出那帶著湖南腔的漢語。我們的小勤務員倒茶給他喝，他也稱呼「紅軍大人」，也很恭敬的作揖。此人約四十來歲，不很高，身體很結實，臉部稍帶赭黑色，眉毛很粗，眼睛大大亮亮的，嘴巴紅紅的，露出了一排黃牙，一條大辮子盤在頭上。上身衣服有

① 侗本獐字，亦因犬旁，過去經政府改為侗字，中共據大陸後仍襲用。

好幾塊補釘，肩上一個大洞露出了黝黑的肌肉，下身褲子是白的，已變了黃色。他打著赤腳，手裡拿著一個斗篷。

他又深深的對我們作了個揖，然後很神祕的從口袋裡掏出一摺紙來，使我們覺得很稀奇。紙像和尚的袈裟一樣的黃，開頭是一行用硃筆寫的大字：

「奉太上天皇……致紅軍弟兄……」那好像是一摺莊嚴的奏章，內容大概是說，「現下時勢不好，天下大亂，冀紅軍大人秉承太上天皇意旨，救災救苦……」一類的神話。文字是漢文，詞句多土話，後面還有很多符咒，都是用硃筆寫的，我們看了暗暗地好笑。苗人滔滔不絕的告訴我們許多有關苗族歷史的神話。大意是說：

「我們太上天皇在幾歲的時候，有一天，滿天金光萬道，忽然一面大旗從半空中降落，旗桿插入土中很深，很多人去拔，都拔不起來，天皇跑去，不費一點力氣就拔起來了。又有一天，天皇去看牛，忽然一座石山崩裂，出現一座大屋子，天皇跑進去，一個百多歲的老人，授給他一套兵書和寶劍。天皇出來以後，石山又合攏了，所以後來天皇能知過去未來，能斬妖除暴。……」

苗人一再作揖，盼望紅軍幫他們的忙，「救災救苦」。我們研究苗人提著奏章來訪的目的是什麼，當時我們這樣猜想：從這個苗人的衣著、儀態，以及他滔滔不絕的一套神話觀察，他是代表苗族的統治階級來的。他所供奉的太上天皇，也就是苗族統治階級的化身。他所求助於紅軍者，無疑是要求紅軍不要在這個地方打土豪，分地主的財物。

他是那麼的恭敬有禮，又是那麼一副可憐相，我們也就不好意思不施給一點小惠，把他打發走了。

苗人走後留給我們的印象是：無知、迷信、落後、貧困。我們自跨進貴州以來，除看見居民之貧困外，還有兩件事顯得是貴州地方的特殊景象：一為天下著令人厭煩的毛毛雨；一為處處是高山峻嶺。所以有一句被傳誦的俗語：「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確實是如此。尤其是「人無三兩銀」這種情況，不獨苗人，一般漢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二 苗族人之風習

那個中年苗族人給我們的印象是無知和貧困；但這樣還不能概括苗族人所具有的特殊性格。我們對於苗族人的歷史、文化以及他們的風俗習慣等等還是一無所知。職是之故，當時我們對於聚居黔东南地區的苗族做了一些具體的調查工作。

我們進入黔东南地區之後，先後佔領了黎平、錦屏、三穗、劍河、施秉、鎮遠、台江（台拱）、綏寧、黃平、餘慶、甕安等縣，縱橫四百餘里，境內住有苗、侗、布依、水族和夷等少數民族，而以苗、侗兩族為最多。我們到過的地方越多，接觸過的苗族人也就多了，慢慢我們就摸熟了一些有關苗族的歷史文化和他們的生活情形。

苗族，亦為我國歷史悠久民族之一，自宋朝起，史冊上已有關於苗族之記載。惟其來源支系尚缺乏詳細之歷史資料。據中共之「民族調查」，亦只述及清朝有過一次「乾嘉暴動」（十八世紀末葉），清政府在苗族地區先後設置「屯堡」，駐紮軍隊，實行所謂「屯田養勇」與「設卡防苗」政策，利用苗族中之地主，作為維護統治之重要支柱。至嘉慶年間以後，將「土守備」、「土千總」、「土把總」等官職分封他們，實施所謂「以苗治苗」策略，藉以

羈縻與鎮壓苗人。

苗人所居多在山區，以十戶至幾十戶聚居為一寨，稱為「寨子」。他們聚居在僻鄉荒野，性格強悍，具有刻苦耐勞之特性。

苗族人多以農業為主，居住地區多屬大森林，故亦營林業，諸如種植桐樹、茶樹、柑橘等。由於他們生產技術落後，且受地主剝削，因此糧食不足，生活備極艱苦。在漢人聚居的地區，一般傳誦著所謂「人無三兩銀」，至於苗人，還流傳著「老鴉無樹棲，苗家無地方」，和「火柴當棉襖，赤腳當鞋跑」等俗語，以形容其貧窮狀況。

據當時我們初步調查所得，黔东南地區苗族，一般有四種風習，表現著苗族內部有一種自由社交與團結友愛之特殊風格：

趕坡——每逢農曆正月初五、正月十六、八月十五等苗族節日，苗族青年男女盛裝新衣，女子都穿著艷麗的繡花外衣和五彩繽紛的百褶裙，從各處趕至預定之寬敞的山坡上，舉行盛大集會。其間架台羅列，均置滿蘆笙，時而齊奏和鳴。苗女們則和著音樂拍奏，紛紛婆娑起舞，笙聲悠揚，山鳴谷應。此外尚有山歌比賽，大抵以生活與愛情的唱和較多。過去的趕坡，僅屬單純娛樂性之聚會，後來商人亦涉足其間，藉機招攬買賣，此娛樂性之聚會逐漸變成物資交流的趕墟大會。

坐妹——這是苗族青年男女相聚利用歌唱傾吐愛情的玩藝兒，通常在節日或適時適興之晚間舉行。炎夏多在橋畔涼亭或村莊守望棚中，嚴冬則聚集於較寬敞之屋內圍爐而坐。他們談笑話，講故事，伴笛歌唱。每當月明風清，夜闌人靜，而笛韻悠揚，歌聲娓娓時，正是苗族青年男女自由戀愛之天地。倘遇別村的青年男女趕至本寨，則全寨青年男女必須趕赴坐妹，

否則視為不禮貌。

趕山——這是苗族人狩獵的集體活動。如發現野獸之足跡時，則邀集本寨與附近各寨男子組織一次趕山，大家各攜明火槍、火藥包、鐵砂、獵犬等分頭去搜山，倘遇野豬黑熊衝過卡口，如第一第二兩槍擊中，但野獸尚未倒下，狩獵人即憑氣力、機智、勇敢，群起與獸搏鬥。分配獵獲物時，先擊中第一槍者獲一腿，餘則分配予各參加者。此足以表現苗族人之智勇與團結精神。

走同年——此係苗族人寨與寨之間在春節日集體互相訪問之一種形式。是日參與者各換新衣，背蘆笙，前往訪問，抵寨時齊奏蘆笙，被訪問之長者即代表全寨出迎，並備酒宰豬以款待「同年客」。蓋豬乃每年初由全寨出資豢養（其辦法將各戶所出資金購小豬一兩頭，寄養某戶，而養大宰用時與養戶平分），酒由各戶湊集。聚餐後，吹笛踩堂（舞蹈的一種形式）聯歡。苗族中之不少青年男女，每年以此為媒介而獲得自己喜歡的配偶。如今年甲寨至乙寨走同年，則明年乙寨定必回拜，以表謝意與友好。

三 貴州的乾人兒

紅軍由湖南轉入貴州，如入無人之境，一舉連陷黎平、劍河、台江（台拱），而入通往貴陽汽車公路要點的鎮遠。防守貴州東部和西部的為王家烈、侯之擔、猶國才，號稱貴州三首領，其總兵力為十萬人，雖然他們的槍彈都是赤水兵工廠所土造者，但無論如何總比紅軍的武器要優越得多。那麼為什麼會連戰皆敗呢？

原來貴州部隊士兵大多吸鴉片，故有所謂「雙槍兵」之稱，譏諷貴州部隊士兵除握有一支步槍之外，還攜有一支煙槍。據一個王家烈的俘虜兵說，他們每次出發打仗之前，必先發銀元給弟兄們買鴉片，吸個痛痛快快的，才有勁賣力打仗。不然的話，打仗時煙癮一發作，那便只有被繳槍的份兒了。前天王家烈便發給他們每人兩塊銀洋，才算打了個像樣的仗。

我們踏進貴州之後，如果把我們所經過的地區作一概括，那麼「地瘠民貧」四字似乎是最恰當的字眼吧。貴州人稱呼有錢人為「紳糧」，意思是說錢和糧食很多的人；稱呼窮人為「乾人兒」——意思是說乾乾淨淨，一無所有。

講到貴州乾人兒的貧苦，實非我們所能想像者。當我們踏進貴州境內時，常看見一些老婦穿著已補縫千百次的單衣，牽著一絲不掛的小孩，立於路邊發抖，向過路的人討錢。貴州乾人兒冬天唯一禦寒的辦法，就是烤火取暖。俗語說得好，天無絕人之路，偏偏在這樣一個地瘠民貧的地方，卻到處有天然的煤礦，煤炭便宜得很。在大城市賣十塊銀洋一噸的煙煤，在貴州地方只需一吊錢（按一塊銀洋可兌二十吊錢）就可買到。一般乾人兒不用買煤，他們只需到出煤的地方，挖些碎煤，或撿些煤屑，摻以泥土，揉成小煤球來燒。有些乾人兒則不燒煤球，而是燒木片、木頭或包穀棒取暖。

有一天下午，仍是雲霧瀰漫細雨連綿，我和羅梓銘在一個小村子休息。我們跑進一家十分昏黑的屋裡，不由嚇了一大跳。原來屋裏住的是母女三人，一個中年婦人，衣服破得連下身都遮蓋不住了，她抱著一個小孩。竟然沒有穿衣服。更使我們吃驚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赤身裸體的躲在媽媽的背後。原來她是在火堆邊烤火，看見我們闖進了，她既驚惶又害羞的跑開了。大姑娘一絲不掛的被人撞見了，不覺得害羞嗎？什麼害羞不害羞，這是鐵

一般的現實，這是窮得沒有辦法，她們連今天的一餐飯都成問題呢。中年婦人淌著眼淚對我們說，她的丈夫以前是種莊稼的，無奈紳糧的租額太狠了，如果把全部收成都給了紳糧，自己就要餓飯了，還有那王家（指王家烈）的捐稅也是多得不得了，他們就乾脆不種田了。現在她的丈夫在外面做腳夫，打短工，揹煤炭，挑鹽巴過活。中年婦人對我們說出了許多苦處，她那深凹的眼裡不斷的滴下淚水。我們說話安慰她，並拿出一些「打土豪」鬥爭來的衣服和糧食給她，她非常高興的接受了。

住在山區的人，不論是少數民族也好，漢人也好，都是比較好客，富人情味的。我們在黔東南地區的行動中，曾深深的體驗到一樁富人情味的故事：

那是中央縱隊的隊伍抵達鎮遠的第二天早晨，我們將要出發到城郊進行宣傳安撫的時候，一個乾人兒模樣的中年農民揹著包袱，手牽著一個拐腳的青年來到縱隊政治部的宿營地，說是要來拜見「紅軍大人」的。我和羅梓銘接待了他們。不等我們開腔，那個拐腳的青年就自己介紹的說：「同志！我是紅六軍團的戰士，我當了兩個多月的老百姓，今天總算找到自己的隊伍了。」青年流著眼淚，哽咽的說。我走上去和他握手。中年農民說：「是的，他是你們的人，收留他吧！」

青年指著中年農民說：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們一家人都對我很好的。他們治好了我的傷口，兩個月來的生活都是他們給我安排和照顧的。」

原來兩個月前，紅六軍團蕭克部由湘贛蘇區突圍到黔東南地區，準備去會合由湘鄂邊區南下的紅二軍團賀龍部，在鎮遠附近遭到國軍貴州部隊的襲擊，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激

戰之後，紅六軍團第十八師的一個團（團的番號記不清）被國軍部隊截斷了，和軍團主力失掉了聯繫，旋即陷入國軍的重重包圍之中，在一場激戰之後，終於被打散了。那位青年是某團團部的通訊員（傳令兵）當時也受傷了。他一五一十的說：

「當時我只是受輕傷，勉強還可以走路。我爬上一個小山頭一看，糟了，滿山都是國軍部隊，四處搜索，嘴裡還不住的喊：『出來吧：繳槍饒命，再不出來就開槍啦。』我趕忙鑽進草叢裡，動也不動，不久，國軍吹起集合號，撤走了。」

「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我倒在地上，作各種各樣的猜想：這是敵佔區，人生地疏，我孤零零一個人，以後怎麼辦呢？越想越增添了無限的憂愁。但我下定了決心：我要活下去，要找到部隊——自己的親人……我開始向山腳下探視，在山腳下有一所小茅房，屋頂上飄起了晚炊的白煙，我斷定那是乾人兒的家。我打算晚上去找他們，碰碰運氣。」

「天黑了，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摸下山去，我終於找到這位好心腸的老鄉，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收留了我，並且治好了我的傷口，兩個月來的生活都是他們照顧的。好幾次地方團隊來搜索，他都把我隱藏在峭嶺上或草寮裡。」

「老鄉的家本來就是很苦的，驟然添了我這個食客，就更加艱苦了。」青年把他兩個月來當老百姓的處境，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我們把青年留下來，參加縱隊政治部工作。對那位好心腸的中年農民，我們也拿出一些「打土豪」來的衣服和糧食給他，他一再的作揖。我們留他吃飯後才讓他回去。

四 紅二方面軍的西竄

爾後這個青年戰士常來看我，我們常在一起行軍。慢慢地，他把他參加紅軍的經過，以及他隨紅六軍團西竄的情形，如數家珍的說了好幾遍。下面，我把他對我細說的情形，參照一些有關資料，將紅二方面軍暨紅六軍團西竄的經過情形，作一概括的追憶：

這個青年戰士，湖南桂東縣人，名叫曾二毛，後來我們開玩笑的叫他「兩毛錢」。小學畢業，十四歲時在家鄉先後加入兒童團、少先隊。十六歲時正式參加紅軍——入紅六軍團第十八師某團當戰士，一度調入紅十八師某團團部當司號員，紅六軍團由湘贛邊區西竄時才調入紅十八師某團團部當通訊員。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共中央命令蕭克、任弼時率領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向湘西行動，與賀龍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合，並轉入湘鄂川黔邊區活動，以策應和配合紅一方面軍的西竄行動。

紅六軍團於七月底由湘贛蘇區出發，經湖南、桂北、湘西地區，先後竄擾城步、靖縣、通道等縣，於同年十月竄抵貴州的黎平後，先後陷錦屏、天柱、三穗、劍河等縣，但在鎮遠附近吃了敗仗，損失慘重。

紅六軍團於是年十一月在黔北的沿河縣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合，成立紅二方面軍。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紅二方面軍為著箝制國軍，使紅一方面軍迅速轉進新的根據地——川滇黔邊區，遂由西陽竄龍山、永順，進而陷桑植、大庸，囂張一時。一九三五年初又竄抵茲利、石門、桃源、澧縣、常德。此時賀龍以前之老巢——湖鄂西蘇區

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了。紅二方面軍乃重新以龍山、永順、桑植、大庸、鶴峰等縣為基礎，建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以任弼時為省委書記，並建立了一個臨時性的政權——「革命委員會」，以賀龍為該委員會主席。先在龍山、桑植等縣部份地區，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擴大紅軍。

一九三五年四月，紅二方面軍以紅十七師四十九團作開路先鋒，強渡澧水，衝過國軍的重重包圍，開始了第二次的流竄。

此時國軍看見紅軍向南逃竄，以為紅軍要重返湘贛老根據地，乃在東南方面佈置重兵阻擊。出乎國軍意料，紅二方面軍猛然掉頭西竄，邊打邊走，竄抵黔東南地區。這是紅二方面軍第二次逃竄貴州。紅二方面軍一路上連陷玉屏、石阡、餘慶、甕安等縣，直抵貴州腹地，並竄進公路幹線上的息烽、修文。此時，國軍以為紅二方面軍必然會步紅一方面軍後塵，北渡烏江，奪取遵義。因而將貴陽、黔西的部隊全部調出，集結於烏江、遵義地區。出乎國軍意料，紅二方面軍卻突然揮戈南下，直指貴陽，虛作攻勢，主力即乘機西渡鴨池河，向黔東逃竄，連陷黔西、大定、畢節等重要城鎮，旋即竄入雲南，搶渡金沙江。

紅二方面軍渡過金沙江以後，一直向北挺進，在甘孜和紅四方面軍會合。至一九三五年底，紅二方面軍又從甘孜出發，越雪山，過草地，沿著紅一方面軍的路線繼續向北流竄。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232

伍、強渡烏江

紅軍部隊通過了黔东南苗、侗族聚居區之後，沿著黃平、施秉、甕安前進，逼近天險的烏江。此時，紅軍的戰鬥序列是：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組成為右路軍，於十二月卅日竄抵距烏江南岸十來里的龍溪；紅三軍團組成為左路軍，差不多同一時間抵達距烏江南岸只有幾里的江界；中央縱隊緊跟在紅九軍團之後前進；紅五軍團仍然擔負掩護任務，緊跟在中央縱隊的後面。

一 逼近江邊

當紅軍逼近烏江渡口的時候，參謀人員就針對烏江的具體情況，進行有系統的偵察。

烏江，又稱黔江，是貴州省境的一條大江，從西南貫串貴州中部，向東奔流，差不多把整個貴州省截隔成為兩半。它是縱橫苗嶺、大婁山、梵淨山三大山脈的重要水系，同北流入四川境內的長江水系之一（其他兩條長江水系為赤水河和綦江）。號稱貴州第二大城的遵義，

即位於烏江以北。

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後，當中央縱隊逼近烏江南岸渡江地點的時候，我和羅梓銘趕到江邊一個小村莊做群眾工作。我們站在陡峭的石崖上向江面俯瞰，夕陽從我們側背斜射到江面，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條蔚藍的江水在山峽的緊束中靜靜地奔流著，時時現出一團團小漩渦。

烏江，名不虛傳，真是天險，江的兩岸是矗入雲際的峭壁峻嶺，從江的碧浪中聳起來，像是兩堵高牆，呈現著嚴肅的、恐怖的景象。對岸，沿著江邊的高地，國軍臨時構築的大大小小碉堡型工事，疏密不等地排列在那裡，烏黑的槍眼，陰森森的盯著江面和南岸的灘頭，只要有人在江邊一顯露，從那些黑眼裡就會噴射出無數的子彈來。我們的部隊逐漸集中，與國軍隔河對峙。我們從山上的老百姓得到了這樣的情況：

前兩天，江的南岸還駐有王家烈的軍隊，他們徵集這裡的老百姓幫他們挖壕溝，砍樹木搭棚子。昨天一聽到紅軍要到了，他們就連夜退過江去，把所有的船隻也都拉過對岸，因此，用船渡江的辦法是行不通的。綜合從各方面偵察來的情況判斷，除了採取強攻的辦法，奪取一兩處渡江口架橋過江之外，再沒有其他辦法了。但是架浮橋，並不簡單，只有用強攻奪取據點，才能架橋。

當我們問當地民衆，是否能架浮橋的時候，他們都帶著奇異的、懷疑的神氣告訴我們，架浮橋是萬萬辦不到的，前年王家烈和猶國才打仗的時候，架了好幾天都沒有架成。

我們把偵察來的情況反映到縱隊司令部去，作為組織渡江戰鬥的參考。

不管渡江戰鬥是多麼的艱險，但強渡烏江，奪取遵義的任務，無論如何是要堅決執行的。為了完成渡江任務，縱隊政治部用了最大的力量，在部隊中進行政治動員。各野戰部隊

和軍委直屬部隊，都已進入了渡江作業和渡江戰鬥動員的緊張階段。

二 各項準備工作

各野戰部隊和軍委幹部團，都按照軍委的命令，根據他們自己所偵察來的情况，各自擬訂了渡江行動計畫和各項準備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著，就是從所屬部隊中挑選善於泅水的戰士，組成偷渡的突擊隊，並根據偵察所得情况，決定適當的渡江點，同時準備如果正面的偷渡失敗時，就迅速轉變主攻為佯攻，在別處偷渡。渡江的各項準備工作正在緊張的進行，這裡是叢林地區，從各處砍來的毛竹和樹木堆得到處都是。戰士們緊張地捆紮著竹筏。突擊隊都是年輕力壯的戰士。他們帶著一式的好武器，八個手榴彈，裝束得乾淨俐落。火力隊也已經組織好了，部隊中最好的輕重機槍都集中起來，在江邊的山坡上排開，瞄準著對岸的國軍。我們一方面加緊推進偷渡或強渡的各種準備，同時又緊張的進行架橋的各項作業。

架橋的主要器材是毛竹、木材、門板、繩索等等。這裡是山林地帶，毛竹、木材到處都可以砍伐，橋板主要是把一些逃亡的地主、豪紳家裡的門扇卸下來用，繩索可以到附近的市鎮去大量購買。我們用三層疊起的竹排做橋腳，每對橋腳中間鋪上兩根枕木，枕木上連結三、四個橋桁，橋桁上鋪門板，門板上又紮橫木，組成一節一節的門橋。假如國軍的砲彈落在橋上，因為橋是用竹排紮成的，打斷了這節，還有那節，如果不是每節都灌進水，竹排就不會下沉。對岸的王家烈部，看到紅軍開始架橋就集中射擊。我們已經搭好了的橋雖然中了好些砲彈，但影響並不大。最難防的是國軍的機關槍和步槍專打我們的水手，這對紅軍架橋作業

的阻礙很大。

當紅軍各野戰部隊在前線緊張的進行渡江準備工作的時候，設在稍為「後方」仍然在江邊的軍委各直屬部隊和中央縱隊，聯合在江邊的一個小村莊舉行了一個慶祝元旦的除夕聯歡晚會。這是紅軍所謂嚴肅、團結、緊張、活潑的作風。每一次有什麼節日，除了碰上必須要打的「惡戰」之外，總要在前線舉行紀念大會暨晚會，一方面活躍部隊的文化娛樂活動，以鬆弛部隊的緊張氣氛；一方面藉著軍隊的文化娛樂活動，可以在居民中進行宣傳鼓動。

聯合同樂晚會在村莊的一個平壩子上進行。主持這個晚會的是中央縱隊政治部，演出的單位有總政治部的前線劇團和縱隊政治部的宣傳隊。演出節目有：活報、話劇、唱歌和舞蹈等，其中有李伯釗的蘇聯海軍舞和農作舞，王盛榮的烏克蘭舞和高加索土風舞。唱歌方面有賴大超（中央兒童局）的「搖籃曲」，是「母親」唱的小曲，賴大超還是一個稚氣的「兒童」，他那幽弱的童音唱出女性所具有的柔潤的音色，贏得了全場的喝采。黃鎮編的「一雙破草鞋」短劇，一方面描寫紅軍在強渡湘江時，被國軍「追」、「趕」、「截」的慘狀，一方面譏諷國軍老是跟在紅軍的後面鹵獲一些「破草鞋」。

晚會過後，大家回到宿營地便睡，等待著明天緊張的渡江戰鬥。

三 渡江戰鬥

元旦的下午，淡弱的陽光晒在碧藍的烏江。烏江岸上瀰漫著一片驚人的沉靜。這正是每次激烈的戰鬥前的正常現象。縱隊參謀長張雲逸和軍委幹部團團長陳賡，以及突擊隊的幹部

們都來到江邊實地觀察渡江口的地形。縱隊司令部從部隊中挑選了善於泅水的戰士，組成偷渡的突擊隊，同時派出了一個加強營，配屬一個工兵連尾隨突擊隊跟進。渡江點就選在臨近江邊的一道山溝口子上。當一切準備完成，天已漸漸黑下了，暮色籠罩著山谷和江面，對岸的山坡和國軍臨時構築的碉堡工事，都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

突擊隊出動了，戰士們彎著腰，抬著竹筏，急速的向渡江點跑去。突然一個戰士腳下一滑，跌倒了，指導員搶上去幫他把竹筏放在他的肩上，隨口說了一句：「沉住氣啊！老表。」

「指導員請放心，只要筏子沉不下去……」那戰士回答。

突擊隊已經陸續趕到江邊，有的已經把竹筏推進江裡。首先登筏的五個戰士，他們帶著一挺機關槍和一些手榴彈。第二筏也是五個戰士，都約定靠北岸後用手電筒向南岸示光。天更黑了，突擊隊的戰士們都消失在夜色和江霧中，看不見他們的活動，也不見登岸的戰士們發出的信號——手電筒的光。

突然，一響刺耳的槍聲劃破了夜空，接著從對岸的碉堡裡吐出了一串串火光——對岸的國軍發覺紅軍偷渡了。他們拚命的向南岸這邊發射，一條條的火箭不停地掠過江面射到南岸來，更有好幾次迫擊炮在江中爆炸，激起了一叢叢白色的水花。雖然對岸的國軍還摸不清我們這邊的兵力，雖然他們只是盲目的發射。但是這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偷渡已經失敗了。

渡江戰鬥指揮員鑑於夜間偷渡失敗，只好改變計畫，決定在明天早晨進行強渡。第二天，也就是元月二日拂曉時分，烏江邊灘頭上一場惡戰——渡江戰鬥開始了。

首先渡江的一排戰士，把重機關槍架在竹筏上，每個戰鬥員的槍都是子彈上膛，槍口對準著碉堡工事。在江的這邊——南岸，軍委幹部團機關槍連佔領陣地，掩護著渡江部隊。

對岸國軍的機關槍一刻也不停地射擊著，但射擊目標卻不時地變化，開始時是掃射我方的岸邊，接著便慢慢收縮，瞄向了江心，最後一齊都集中到南岸灘頭上來了。

不多時，忽然從對岸國軍陣地上騰起了一簇火光，一個碉堡工事被打中了，隱隱約約可以看見幾個紅軍士兵正向那個著火的碉堡撲去。看看無數的紅軍士兵湧過江水，衝上河岸，對岸的國軍開始慌亂起來了，但他們還是頑強地從其他的碉堡內湧出來，趕向紅軍士兵已經佔領的河邊據點，企圖把紅軍士兵壓回到江中去。於是一場激烈的登陸戰鬥展開了。「同志們！」指導員進行鼓動：「我們背後是江，只有衝，不能退，退就等於死，堅決、勇敢、前進啊！」突擊隊戰士們打得十分艱苦，他們在通過江面時，有不少戰鬥員被打傷了，還是奮勇前進，有些戰士犧牲在滔滔的江流裡了。所有登岸的戰士都連衝帶喊的衝上去了。

這時機關槍也響起來了。

「呼，呼！」手榴彈向著國軍陣地擲過去了，指導員又進行著鼓動：「不顧一切衝過去啊！堅決地衝啊！」

後續渡江的隊伍，緊跟著追下去。

大約經過了三個小時戰鬥，紅軍把對岸王家烈十幾個碉堡工事全部摧毀了，又打垮了王家烈一個營的增援部隊。至此，渡江點已經牢牢的控制在紅軍手裡了。這就給了紅軍著手架浮橋的好機會。

但，架浮橋這樁事並不是那麼的簡單，首先是國軍封鎖江面的炮火一直没有停止過，炮彈老是圍繞著門橋爆炸，江面時時冒起一股股水柱，沖出陣陣狂浪；槍彈在紅軍士兵身邊掀起了密密的水花，有些戰士中彈犧牲了，有些戰士受傷了。但這些對於架橋並沒有多大的影

響，大約經過十小時，一座二百多公尺的浮橋終於跨過了天險的烏江，先遣部隊發出「察、察、察」的腳步聲，靜寂地、急速地走過江去。

四 奔向遵義城

各野戰部隊陸續過江後，一部向通往遵義的大馬路前進，追擊後撤的國軍；一部即迂迴到烏江下游的幾個渡口，並加以控制，以確保全軍渡江的安全。

當天——元月三日晚上，中央縱隊趕到烏江北岸四十里的豬場（地圖上已改稱「珠藏」）宿營。據老百姓說，豬場距遵義城還有一百二十里，這個小鎮是國軍「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還相當熱鬧，先遣部隊佔領後，即馬不停蹄，繼續前進。我們趕到時，街上熱鬧得很，紅軍戰士最為矚目的香菸、酒、鞋子、毛巾、白糖等等，應有盡有。自踏進貴州境以來，天天下著毛毛雨，草鞋老早就破了，丟棄了，大部分戰士都打赤腳走路。王家烈新開的馬路，碰到細雨連綿，路面爛污不堪。有些戰士買了鞋子捨不得穿，打赤腳走路已是司空見慣了。現在就要跨進貴州的第二大城——遵義了，紅軍戰士的儀容非好好的整頓一下不可。這是縱隊政治部抵達豬場，召開的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決定的當前政治工作的重要項目之一。政治工作會議還具體規定了進城的紀律，不外是那所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延伸，不過整頓紅軍戰士的儀容卻是一再的強調。

第二天早晨，部隊在一所小學的操場集合了。昨夜政治工作會議的決定發生了作用，紛亂轉成了秩序，散亂的隊伍，成了整齊的行列。「同志們！」指導員的政治鼓動開始了：「今

「我們要開進遵義城，我們要花些時間，把服裝整理好。」

指導員發現，有些戰士還打著赤腳，有些背包沒有打好，伙伕擔子更是糟糕，飯鍋不要說刷亮，連洗都沒有洗就挑出來了。一陣陣碗盤、飯鍋的唏哩嘩啦聲，夾雜著衣服、斗笠、乾糧袋的摺疊聲，到處喧嚷，爭吵不已。

「不准打赤腳！鞋子穿起來！」指導員斥罵著。原來幾天來連續下雨，現在路上還有積水和污泥，有些戰士怕將還未穿過的新鞋弄髒了，故寧願打赤腳。

「不行，今天要進城，不准打赤腳。」指導員動火地說。

「進城要穿漂亮一點啊！遵義有好多女學生，女學生不愛打赤腳的。」大家七嘴八舌的笑著，故意挖苦那個戰士，在衆目睽睽之下，那個戰士終於勉強地穿上了他那雙心愛的新鞋。柔弱的陽光，照射著山嶺上的樹梢和鮮艷誘人的罌粟花，照射著馬路上的污泥，夾雜著室內的怪味兒。汗從額頭流過了眉毛，滲進眼角裡，令人感到刺激的難受，用污髒的毛巾使勁地揉搓。受著不容自由的快步行軍所束縛，戰士們一個緊跟著一個，像水車上的板子一樣，絲毫也不能緩慢一下步子，簡直是在早操跑步了。突然，嘩啦一響，有人跌倒了。

「又是坐汽車咧，漂亮啊！」

「你搗鬼！濺我一身泥！」

真是禍不單行，那個被強迫穿上新鞋的戰士，因急不擇路，把他那雙唯一心愛的新鞋陷在泥沼裡了，溼淋淋的。大家又在取笑他。於是又演出了一幕短短的笑劇。

大家急著前進，現在雖然跑得令人難熬，但那嚮往已久的遵義城在心坎裡浮動著、引誘著，渴望中的花花世界，驅走了兩腿的痠痛和目前的疲乏。

陸、在遵義地區

紅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渡過烏江，五日陷遵義城，六日至八日，毛澤東在遵義召開了對中共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檢討左傾冒險路線，並決定新的戰略方針和當前紅軍的戰鬥任務。

一月十五日紅軍撤離遵義，經桐梓、溫水、良村、東皇殿、土城，向赤水河方面北進。一月廿四日，紅軍渡過赤水河，進入川南地區。此時國軍統帥部以為紅軍要在宜賓一帶渡江入川，與張國憲、徐向前率領之紅四方面軍會合，乃在長江南岸佈置重兵堵截。不料紅軍卻竄向雲南邊境，於二月十一日進入雲南省之扎西（又稱威信）後，即揮戈東向，二渡赤水河，再佔桐梓、婁山關和遵義城。自此以後，紅軍輾轉流竄於赤水和烏江之間，裹脅農民，並揚言將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川滇黔邊區。

三月中旬，紅軍又從遵義地區再度西進，佔仁懷，經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國軍以為紅軍又要渡江北竄，乃趕忙集大軍堵截。紅軍自知力不能敵，乃折回黔北，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旋即折返烏江北岸。三月底，紅軍又以突然行動，掉頭向南，再渡烏江。

紅軍南渡烏江後，一面繼續向西南流竄，一面向貴州省會——貴陽方向佯動，國軍以為紅軍去而復返，要在貴州西北部建立根據地，乃又集合薛岳兵團、貴州部隊和湖南部隊大舉堵截。紅軍卻避實就虛突入雲南，以一部向昆明方面佯動，主力則直指金沙江疾進。

紅軍從一月初渡烏江，迄三月底再渡烏江這一段期間，馬不停蹄，人不歇步，疲於奔命，流竄於赤水 and 烏江之間，陷於腹背受敵的窘境。

遵義會議後，紅軍各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按：此時毛澤東已取代周恩來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實行改編，撤銷師的建制，精簡機構，師長、師政委以下，團、營、連各級幹部依次下放。中央縱隊也相應進行了整編，我由中央縱隊調入野戰總醫院幹部休養連。

一 遵義民衆大會

紅軍進入遵義城的第二天早晨，我和羅梓銘由中央縱隊政治部到了縣立第三中學。我們在那裡召集了遵義各界代表會議，與會代表包括工人、農民、學生、商人、攤販、小二等五、六十人。會議討論了有關召集遵義各界民衆大會，成立「革命委員會」和「紅軍之友社」以及救濟貧民等事宜。

當天晚上，遵義地區中共地下組織的負責人鄧君和朱君（他們的名字都記不清）來與我們聯繫。他們把遵義地區的地理環境、政治、經濟、文教以及地方派系等方面作了有系統的報告。

鄧君貴州人，卅多歲，大學肄業（當時失業），是個典型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朱君也是

貴州省人，二十七、八歲，遵義其中學教員，他因有公開職業掩護，工作上比較方便，是個文化人型的統一戰線工作者。

第三天，「遵義各界民衆大會」在縣立第三中學的大操場召開，首先由朱君代表「遵義各界民衆大會籌備委員會」宣佈開會，並致開幕詞：

從江西出發以來，一直躺在擔架上被抬著走的毛澤東，竟然出現在大會主席台上，並在大會上講話。毛的講話，仍然是那套陳腔濫調，叫囂「抗日救國」，他只是將三年前中共在江西蘇區向國民政府提出的三個要求：（一）停止進攻蘇區；（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三）武裝人民，以富煽動性的聲調重複了一遍而已。紅軍總司令朱德也在大會主席台出現，並作演講：他把紅軍「北上抗日」的一套謊言，作了難以自圓其說的解釋之後，轉而說明了紅軍中的所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一個在紅軍中生長的貴州籍青年排長，在大會上報告他參加兒童團——少先隊——紅軍的經過和在紅軍中的生活情形。

遵義某中學的一位女學生，叫做李少俠，代表「紅軍之友社」，向大會報告「紅軍之友社」成立經過和它的宗旨，她大聲疾呼歡迎青年學生踴躍參加。

大會最後通過由大會主席團提出的「遵義革命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名單，並介紹「革委會」（革命委員會之簡稱）主席羅梓銘與全場群眾見面。旋即由革委會主席羅梓銘說明「革委會」的性質和當前任務。他說，「革委會」是過渡時期臨時性的「民衆政權」形式，他的任務是動員武裝群眾，支援紅軍，打倒豪紳地主階級。他說「革委會」將設置「肅反委員會」、「沒收徵發委員會」和「貧民救濟委員會」等機構。

最後，仍由朱君高呼口號，宣佈散會。

大會散會後，接著在大操場舉行籃球比賽，是紅星籃球隊（紅軍中代表隊）與遵義學生聯合籃球隊的比賽。這場比賽相當精采，結果學生聯合隊輸給了紅星聯合隊。

當晚，在縣立三中操場舉行軍民同樂晚會，主要節目包括話劇、唱歌、跳舞、國術、相聲等等，國術由當地人士表演，其他話劇和歌舞等由紅軍宣傳隊擔任。他們表演的節目，只是把幾天以前在烏江邊舉行的慶祝元旦晚會所表演的節目再一次重演而已。由遵義女學生們表演的「可憐的秋香」、「蘇武牧羊」、「木蘭從軍」等在政府區普遍流行的歌唱和舞蹈節目，對於長期在戰場上的紅軍戰士說來，仍有清新悅目的作用。

大會過後，遵義「革委會」正式在縣立三中辦公，我和羅梓銘也由中央縱隊政治部搬到「革委會」來住。我在「革委會」的任務是協助羅梓銘處理「革委會」的日常事務，其中最緊張的是「沒收徵發委員會」的工作，那是把「打土豪」沒收來的糧食、衣服、藥品、食鹽等物資分發給市內民衆和近郊的農民；並對貧民普遍發給救濟米。顯然，在這些小惠的誘惑下，民衆不免要上鉤，在紅軍宣傳隊大力煽動羈縻下，就有好幾百青年報名參加了紅軍。

二 遵義城一瞥

「遵義革命委員會」和「遵義紅軍之友社」兩塊衆人矚目的招牌，掛在縣立第三中學的校門，每天總有一批一批的青年男女學生到「革委會」受領任務之後，出發到附近鄉鎮去替中共做宣傳，於是遵義城內外，也就顯出一種不正常的政治性的熱鬧。

至於「紅軍之友社」，由於女學生們的進進出出，輕歌曼舞，更是變成了那些自幼生長於山區，長期流竄於戰場的「紅色戰士」們的迷失之所。每天，總有許多青年紅軍幹部，「工作」之餘，借故來到「軍人之友社」和女孩子們打情罵俏，尋求一些應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刺激，「領導」對這些事也視若無睹，任其發展氾濫，不久之後，就經常有紅軍戰士邀請女學生訪問、參觀營房的事情發生。「領導」仍然不聞不問，反正共產黨從上而下對男女關係都是抱著「一杯水主義」的態度，紅軍的幹部們，也就從這些好奇的女孩子們身上取得了莫大的安慰，而他們的所謂「革命鬥志」，就在花花世界中和女孩子們的身上受到了嚴重的腐蝕。

不過，也有些紅軍幹部是另有目的而來的。那就是縣立第三中學的圖書閱覽室裡，有許多來自上海、南京、貴陽的報紙和雜誌。自紅軍撤離江西蘇區以來已有三個月了，國軍部隊向著紅色戰士的家鄉——江西蘇區步步逼進，包圍圈日益縮小，一批一批的地主老爺回到老蘇區去，把失去多年的土地收回了。這些情況，從外地來的報紙都有許多披露。當紅軍幹部們看到了這些記事，想起那家鄉的妻子、父母、兄弟，他們的遭遇會是怎樣呢？他們不敢設想，有的只是無聲的流著眼淚，靜靜地離開了閱覽室。我看見了一個團級的紅軍幹部，看了報紙之後，暗暗地流淚。

有一天我在朱君和幾位學生陪同下，到了大街上去逛了一逛。

遵義分為新舊兩城，新城為商業集中區，市面尚稱繁榮；舊城為官署和住宅區。兩城之間隔一小河，中間貫以石橋，街道鋪的是紅磚和石頭，崎嶇不平，城中官署、學校和廟宇，悉為紅軍機關所佔住。貴州軍某師長柏輝章的公館（在舊城），即成為紅軍總司令部。

當我們一踏進遵義大街時，看到三種店鋪，門庭若市，生意特別好：一種是百貨店，店中所賣的牙膏、香皂、毛巾、膠鞋、香菸，幾乎被搶購一空。二為書店，新城有三家書店，那些從上海運進的小說，圖畫、鉛筆、墨水、筆記本等等都已售完。三為酒樓飯館，紅軍進城後，莫不利市三倍，不過在遵義的飯館中，大多數頗饒川菜滋味。朱君把我們帶到一家叫做「川黔飯店」，規模最大。因我們來得太早，尚未開門，便由當地學生同掌櫃商量，掌櫃見是本地人，不好推卻，便請我們上樓入座。我們點了他們最拿手的辣子雞丁、回鍋肉、醋溜魚、血花湯、四川泡菜等幾樣菜，均饒川味，價錢還算公道。我們給的是蘇幣。

「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城裡，設置了幾處兌現處，使流入商店的蘇幣能夠隨時兌換現洋。貴州省主席王家烈氏所經營的鹽業公司的食鹽，值幾十萬元，和幾家大商行所銷售的上海南洋菸草公司白金龍香菸及外國香菸，均被紅軍所沒收。紅軍將那大批的食鹽和香菸在市面傾銷，一塊銀洋可買到食鹽七斤，白金龍香菸四罐，其售價遠比平時賤。「蘇維埃國家銀行」僅以食鹽和香菸兩項收入之銀洋來兌付蘇幣，就綽綽有餘了。

三 在赤水、烏江之間徘徊

我們在遵義休息了十天。最後那天午後兩點多鐘，一架國軍的飛機飛臨上空盤旋了好久才向東逸去，顯示國軍的追擊部隊已逼近遵義城了。當天晚上我們得到命令準備行動。同時我和羅梓銘奉命到野戰總醫院幹部休養連休養。總衛生部長賀誠接待了我們。賀誠告訴我，同我們一起進入幹部休養連的還有徐特立、董必武、謝覺哉三老，文學家成仿吾，上海老工

人朱祺，二屆全蘇大會朝鮮代表畢士狄等。當我弄好了床鋪時已九點多，來不及和隊裡的夥伴們寒暄就進入睡鄉了。

第二天早晨，紅軍撤離遵義城，向桐梓方面北進。出發前站隊時，才發現除了上述人員之外，還有因領導無方，而被撤職的前紅八軍團（按：紅八軍團渡湘江時部隊損失過半，經中共中央黎平會議決定撤銷其軍團番號）軍團長周昆和官田兵工廠廠長韓日升，還有幾個師級以上的幹部，因受傷未癒，仍留在休養連。

幹部休養連連長何長工（曾任紅九軍團政委）、指導員羅明（曾被指控為「羅明路線」的推行者而遭整肅），全連休養員只有二十幾個人，加上特務員、勤務員、飼養員（馬伕）、擔架員（運輸員）等共五、六十人。所謂「幹部休養連」，說穿了，不外是集老弱傷殘之大成罷了。後來，到了雲南邊境的扎西（威信）時，幾個中共要人的太座們——何子貞（毛澤東妻）、鄧穎超（周恩來妻）、劉群先（博古妻）、蔡暢（李富春妻）、廖施光（凱豐妻）、楊厚增（羅炳輝妻）都陸續加入了幹部休養連的隊伍。我們的隊伍龐大了，可是麻煩也就多了。這些太座們各有各的背景，事雜意見多，實在不好惹。她們常因細事吵到連長、指導員那邊去，有時甚至到總衛生部賀誠那邊去告狀。

當時我們和這些中共顯要的太座們為伍，每天談笑風生，饒有趣味，一些傳奇性的戰場軼事，中共頭頭們的反目傾軋，甚至閨室祕聞，都經過太座們的敘述而傳播出來。諸如關於江西蘇區反對五次圍剿路線的爭論，關於紅軍西行出發前毛澤東的沉悶處境，周恩來的尷尬情況，博古的趾高氣揚，李德顧問的專橫跋扈等等為外間所不知的祕聞，都可以在幹部休養連裡獲悉其詳。關於遵義會議的經過及其論爭的焦點，所謂單純防禦戰略的實質是什麼？

所謂「左傾教條主義」的實質又是什麼等問題，單憑洛甫（張聞天）在軍委直屬部隊和中央縱隊團長以上幹部會議上的傳達報告，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文件，只能知道一個概要，真正關鍵性問題，大都從太座們輕鬆的「談笑」中豁然知曉，而且了解得更具真實性。

從遵義經板橋、婁山關至桐梓間的公路，隨山勢而漸高，間有幾段築有汽車路基，但這種汽車路，恐怕是全世界最難行的了。我們經過時，正值下雪，路上爛泥膠腳，真令人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嘆！

桐梓是黔省軍政領袖之家鄉，美輪美奐的樓房屋宇比比皆是，王家烈的別墅最為富麗豪華，竟然成了我們幹部休養連的住處。

我們在桐梓休息了一天，即經溫水、良村、東皇殿，抵達赤水縣之土城，在土城遭遇郭助祺部和侯之膺部，經一晝一夜激戰，紅軍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才在土城、太平渡二鎮架浮橋渡過赤水河，向川南之古藺縣前進，此即由貴州跨進四川矣。以後紅軍經四川邊境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經過許多崎嶇小徑，為紅軍西行以來最艱難的一段行程，尤以兩河隘最為險要。由兩河隘至扎西（威信），約三十里，懸崖削壁，谷深水急，只要把小徑破壞幾尺寬，軍隊便無法通過。我們抵達扎西時正值舊曆正月初三，天空飄著雪花，嚴寒逼人。我們沒有炭火取暖，甚至連煮東西吃的木炭都沒有。如今雖事隔數十載，每一憶及對當時的飢寒威脅，猶有餘悸。

四 婁山關戰鬥

紅軍本來擬由扎西繼續西進，由宜賓附近渡江入川，但在扎西休息一天之後，突然又轉向東返，實因中央軍委鑑於當時情勢對紅軍不利，不敢冒險過江之故。不過紅軍之突然折回黔省，確出國軍意料之外，當扼守在江邊的國軍發覺而折回時，紅軍早已渡過赤水河而向桐梓、婁山關疾進了。

紅軍由川南折返遵義的途中，曾在婁山關附近與黔軍王家烈兩個師遭遇而展開了一場激戰。紅軍按照當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的新戰略方針，展開了高度機動靈活和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游擊性運動戰，打了一個勝仗，打垮了王家烈兩個師。中共自詡這是西竄以來，特別是毛澤東重新掌握中共軍事大權之後首次獲得勝仗。

按照毛澤東的戰略計畫，紅軍必須堅守打勝仗，在戰場上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原則。為此，必須避實就虛突入遵（義）桐（梓）地區，再佔遵義。而婁山關是從川南到遵義的大道上的大關口，倘若佔據了婁山關，那無險可守的遵義城便成了囊中物了，所以婁山關便成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

婁山關雄踞婁山山脈的最高峰，關上有幾間茅屋，石碑一塊，寫著「婁山關」三個大字。周圍山峰如劍。萬丈矗立，插入雲霄，中間是十步一彎、八步一拐的汽車路，真有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概。

所謂婁山關戰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據當時親臨指揮戰鬥的紅三軍團十一團（改編後）政委張愛萍（按：張係彭德懷親信幹部，曾任中共副總參謀長，在「文革」中被整肅）後來

對我說，婁山關戰鬥經過情形大致是這樣：

那天，大馬路上，浩浩蕩蕩，人聲鼎沸，紅三軍團十一團的隊伍正向著婁山關前進。在距婁山關十里路的地方，從遙遠的山頭送來一聲尖脆的槍聲，接著又是一聲。預期的遭遇戰最要緊的一著，便是奪取先機。紅十一團的戰士們奔向左翼的山坡，佔領了制高點。紅色戰士在輕重機關槍火網下，鑽到黔軍的側翼，光亮耀眼的刺刀，在陣地前像幾千枝箭似的飛過去了。

山脚下是團的主力，不顧一切地沿著馬路跑步前進，指揮陣地的前進號音，衝鋒號音，激勵著紅軍奮勇衝鋒。

由俘虜口中得知國軍的主力昨夜趕到板橋宿營，兩個團伸出婁山關，其中一個團又由婁山關向桐梓城前進，一個團固守婁山關的陣地，在地形上說，顯然對紅軍是不利的。國軍已搶先佔領了婁山關，且由一個團兵力固守著，幾乎每一個山頭都成了堅強的陣地。軍委給紅十一團的任務是，無論如何要奪取婁山關。

右翼的山，一律是懸崖絕壁，中間是馬路，被國軍火力封鎖了，左翼的山雖然無路，還可以爬上去。指揮員先派了一個堅強機動的連，由最左翼迂迴到婁山關之敵的側右背，主力則奪取了可以瞰制婁山關的點金山。點金山的高、尖、陡、大，不易攀登，足以恃而無恐。

衝鋒號頻吹，喊聲如雷，隊伍向著國軍陣地猛撲過去。一陣猛烈的手榴彈過後，在煙塵蔽天，殺聲震地中紅軍佔領了點金山。

登臨點金山頂四望群山，婁山關口也清晰的擺在眼前，國軍在關口附近各要點趕修工事。這裡距婁山關雖然不遠，但仍須翻過兩個山頭，而這兩個山頭都被國軍佔據著。機關槍連續

地向著紅軍射擊，這是國軍的最後據點。

黃昏時細雨連綿，點金山陣地的弟兄們並未停歇地猛衝下去，只聽到一片殺聲、射擊、手榴彈的轟鳴。然而對面敵人仍在堅持，而且似乎預備隊也增加下來了。紅軍組織了衝鋒，配備了火力，一陣猛烈射擊，一個跑步，國軍後退了，但不等穩固佔領的陣地，國軍又吶喊著反攻，把陣地奪回去。於是紅軍組織了第二次衝鋒……三次、四次，最後一次猛衝，終於奏效，把婁山關整個佔領了。

這時紅軍的主力在桐梓，一部在桐梓與婁山關之間。因關上没有房子，而且下著細雨，紅軍只留下了一個營，對通往遵義大道四十里的板橋警戒，團的主力則在婁山關下的八、九里處宿營。

次日拂曉，大霧，對面不見人。隱約聽到婁山關上密密的槍聲。據婁山關警戒部隊的報告，國軍以密集部隊沿大馬路向紅軍反攻。軍士哨被佔領了，接著排哨也失了。國軍逼近了婁山關口，那裡只有紅軍兩個連。

紅軍首長派出了增援部隊，以沉重的腳步聲，嚓嚓的刺刀聲，夾著戰士們的喘氣聲，一鼓作氣地跑去增援。輕重機關槍是抬著前進的，手榴彈大量地投，一到剛剛接近手榴彈距離以內，並列的手榴彈就一齊拋下去。震天動地的殺聲中，紅軍又發起了猛追。

五 休養連的夥伴們

婁山關戰鬥一結束，野戰部隊即乘勝追擊，一直追到遵義城下。大家以為紅軍既然能夠

在艱險的婁山關打垮國軍，那麼佔領無險可據的遵義城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何況這又是第二次佔領，遵義內外情況，紅軍是相當摸熟了的。我們休養連的夥伴們高談闊論的討論著，滿懷信心的等待看好消息。

忽然，從左側山嶺上傳來稀疏的槍聲，接著是猛烈的炮轟的巨響，不一會，國軍飛機在上空盤旋，從指揮陣地傳來的消息說，薛岳兵團正分三路向遵義城逼進，企圖增援解圍，那城裡的國軍也正等待著配合衝出去。但為時已晚，紅一軍團正配合紅三軍團側擊，並已切斷了退路。

那天，我們幹部休養連在距遵義城北二十里的一個小鎮宿營，一條古色古香的小街，居然也有飯館和洋貨店，由於「蘇幣」照樣使用，我們都買了些東西回來煮吃。徐、董、謝「三老」自成一個小集團，他們正忙著烤火煮東西。那些太座們則分為幾個小集團，也在忙著燒煮什麼。我和畢士狄、羅梓銘、成仿吾也合成一個小集團，剛煮熟了一鍋糯米飯，準備用來填塞告急已久的飢腸，忽然飄來急促的、出人意外的尖脆的哨聲，大家都知道，這是集合的信號。從什麼地方發出了叫聲：

「什麼事情呀？」每個人的心都是忐忑不安，作各種的猜想。

「出發！」這消息來得太突然太籠統，但卻是正確的答覆。這一突然的哨聲，已將人們欣慰的寧靜的心擾亂了。又是從太座們那裡傳來了消息：經過昨天晚上上的夜戰，遵義舊城終於被紅三軍團佔領了。已經佔領了，為什麼又退出呢？幹部休養連的夥伴們利用出發前的幾分鐘大擺「龍門陣」。

「那是按照『高度機動、靈活和集中優勢兵力於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游擊性運動戰』的戰

略思想啊！」

「政治局的決議」中強調了這一點，在洛甫的「傳達報告」中也著重地說明了這一思想。「不錯，為了避實就虛，在運動中打擊敵人，紅軍毅然決然地放棄了遵義，在城西四十里處與趕來增援的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三個師接觸中。」

休養連的隊伍出發了。走出這一大熱鬧的小鎮，前面又展開了青綠的草和樹，還有那白的、紅的和黃的罌粟花。但我們沒有詩人那種閒情逸致來賞玩這大自然的美麗，只能以不整齊的步伐緩慢地把影子推向前去，把那田疇、房屋、山頭愈來愈遠地丟向後面。羅明指導員來了，他說，今天的宿營地是鯉魚壩，是前一次總衛生部宿營過的小鎮，那裡有些高貴幽雅的地主房屋。羅明這一宣佈，又改變了我們的心情與話題了。

隊伍在一家古色古香的庭院前面停下了。在我們這個老弱傷殘的隊伍裡，能戰勝疲乏的竟然大有人在，大家擺起「龍門陣」來，話題仍然不出「紅軍往何處去？」的那一套，不過，每一次新轉移，總會補充一些新內容。

「我看這次打垮敵人，我們一定會在這個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實現赤化川黔滇的任務。」

「你怎麼知道？」另一個人反問道。

「政治局有了決議嗎？」

「是的，你忘了洛甫在高幹會議的『傳達報告』中確切地宣佈了嗎？」

又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

「建立新的根據地，那是以後的事情，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到湘西去，會合二六軍團。」

這種永遠沒有結論的「龍門陣」，在「前方來信」的驚呼下結束了。大家都擁擠到前面

去看「前方來信」。坐得遠望的人，焦灼地、不耐煩地高叫起來：

「快念來大家聽呀。」

一念到「吳（奇偉）敵三個師已被解決一部，現正在猛攻中……」，人們對前方的懸念冰釋了。但有一樁事卻又擒住了各人的心，那就是：紅三軍團參謀長鄧平陣亡了。這是從剛才抬進總醫院的負傷的三軍團某團長口裡透露過來的。

又是一個壞消息：「紅五師政委鍾赤兵負傷了。」另一個負傷者這樣說。

「團、營幹部的傷亡也不少。」人們在「勝利」的呼聲中又焦愁不安了。

紅軍重佔遵義的第二天，為繼續打擊周渾元縱隊，再一次向遵義南四十里的鴨溪前進。但這次周渾元縱隊謹慎得很，碰也不敢來碰一下。這就給了紅軍在遵義以南烏江以北地區取得休整的機會。我們休養連一面休養，一面做擴大紅軍工作。在這一段時間，紅軍主力曾幾次主動找尋戰機，但國軍則小心翼翼。為了迷惑國軍，在運動中尋找殲敵機會，紅軍乃於三月中旬掉頭再度西進，在魯板場與國軍遭遇，打了一個平手仗之後，旋即繼續北進，接連佔領了仁懷和茅台。記得那天黃昏時正下著大雨，我們休養連隊伍在聞名國內外的茅台酒產地——茅台鎮宿營了。我們都以興奮的心情等待著，想個什麼辦法嘗嘗茅台酒。我和畢士狄、羅梓銘走出營地，到了一座很闊綽的西式房子，一塊大招牌寫著「義成老燒坊」，裡面擺著幾十口大缸，缸內都裝滿了異香撲鼻的茅台酒。「義成老燒坊」的老闆是當地的大富豪，聽說紅軍來了，早已逃之夭夭，他的所有財產，包括幾十缸美酒一律被沒收，由「沒收徵發委員會」管理著，只要有機關的條子就可以去取酒，當場喝或帶回來喝都可以。畢士狄和羅梓銘是嗜酒的，他們都痛飲了一陣，以至於醉了。我不嗜酒，但也陪著他們多少喝了一點。

臨行時還帶了幾瓶回來分給大家喝。喝不完的，第二天行軍時帶走，在路上當作開水，一連喝了幾天。

陸、在遵義地區

255

柒、奔向金沙江

紅軍南渡烏江後，以一支小部隊佯攻貴州省會——貴陽，實際上主力則從貴陽附近突然轉向西南，直向雲南邊境急進。同時軍委除命令九軍團留在烏江以北地區牽制國軍外，另以一支小部隊東向進攻甕安、黃平，佯作東進湖南姿態。

紅軍在向西南急進中，連陷定番（惠水）、長順（長寨）、廣順、紫雲等縣，搶渡了北盤江，打通了進入雲南的道路。

從廣順經長順、紫雲等縣境至北盤江邊，縱橫二百多里為夷族聚居區。紅軍初進入這一區域時，曾受到夷族強烈的反抗，使西進雲南行動受阻，乃運用了一套縱橫捭闔的策略，羈縻少數的夷族頭目，才順利通過該地區，渡過了北盤江。

一 轟炸

四月中旬，一個濃霧的早晨，軍委縱隊（野戰總醫院休養連屬之）的隊伍，正由赤誠鎮

向定番的公路前進。走了約四十里，到了一處地形開闊的大壩子上，忽然從遙遠的天空飄來嗡嗡的聲音。

「的、的、的，噠、噠、噠」，空襲的警戒號，從前後隊伍中響出來。大家都緊張而混亂的東奔西跑，跑得快的人到了樹林下，有的蹲在田溝裡，有的伏在窪地裡。……大家都找著適當的隱蔽地點。可是我們是醫院的隊伍呀！有擔架，有馬匹，有藥箱子，還有炊事班的擔子。這樣龐雜的隊伍，實在是非常的麻煩。我躲在一棵松樹下，遠遠看見賀子貞和劉群先在特務員的扶持下拚命地跑，跌倒了，又爬起來跑。此時地上一切死寂，有如末日，只有上空的飛機，發出轟轟的聲音，飛機在上空盤旋了良久，然後「轟隆」的一聲，開始轟炸了。大家更加緊張了，脈搏更加急促了。

「是在炸前面的森林，那是總衛生部的隊伍啊！」有人這樣叫喊。按以往經驗，飛機總是注意炸樹林的。但這有什麼辦法呢？只得「聽天由命」了。已經聽到了被炸傷者的呻吟聲了。接著又是「轟隆！轟隆」兩顆炸彈，就炸在我們休養連剛剛離開的地方。又是被炸傷者的呻吟。在飛機的噪聲下，氣氛顯得更覺淒慘。畢士狄滿身泥灰，面色蒼白，匆忙地跑過來，他細聲而急促地說：「糟糕！兩顆炸彈都落在我們隊伍中間，韓日升被炸到了，我因為卧下了，所以只打得一身泥土。……」話未說完，又是「轟隆！轟隆」一連幾響。這時黑煙瀰漫了整個松林，碎片、泥土、樹枝，以及被炸死者的血肉，均紛紛飛起，「哎喲」的聲音，從受傷者的口中淒慘地喊出來。真是令人戰慄恐怖。受傷的衛生員滿身都沾著泥灰，面孔蒼白，衣褲已為鮮血染得溼透了。看了他的形狀，令人更加難過。

飛機的叫聲逐漸小了。大家從各自的隱蔽地點走了出來，紛紛地慰問負傷的戰士，為他

們綁血管，找衛生員來照顧，扶著他們在樹蔭下休息。

我和畢士狄走到被炸的地點，真是令人目不忍看，耳不忍聞。被炸傷者輾轉反側，在悲慘的哭啼，在要求大家對他們的安慰和幫助。他們有的手足斷裂了，臉上破爛了，鮮血不斷的流著。有的頭顱已經破裂了，腦漿迸流於地。有的被炸得骨肉碎裂。更使人不忍看的是一些肢體竟被掛在樹枝上，鮮血淋漓，那些帶著血的破碎衣片還在燃燒著，冒著煙。更有的屍體已認不出是誰了。戰鬥員的槍被炸斷了，子彈也燒炸了。炊事員的銅鍋被炸破了，菜盆子也打爛了。運輸員的公文箱也打碎了。地面上留著許多窟窿，松樹也被炸斷了幾株。樹枝、樹葉混著血肉，槍枝、子彈、行李、泥土撒得滿地。未炸前這裡是個很好的休息場所和隱蔽地，現在已成為血肉橫飛，屍體狼藉的血腥場所。

大家動員起來了，有的拿著鐵鍬，埋葬屍體；有的扶著傷員進茅棚休息、上藥；有的砍竹子做擔架，有的收拾槍枝、子彈，直到夕陽西沉，一切才處理就緒。

「的、的、的、打、打、的」，集合號吹了。走散了的夥伴們紛紛歸隊，隊伍繼續前進。大家都噤咕地議論著、埋怨著說：

「今天的轟炸是因炊事班的擔子沒有蔭蔽好，被發現了。」有人附和著說：

「就是那老黃馬夫，飛機來了，還牽著馬在路上亂跑……」我想：事到如今，這種怨言有什麼用呢？

二 北盤江邊

紅軍野戰部隊把紫雲縣城攻下之後，繼續向北盤江前進。第二天，我們休養連隊伍也趕到紫雲宿營。

紫雲是個很小的市鎮，只有三百多戶居民，有幾十間小商店，都是漢人開的。紫雲城附近村莊都是夷族聚居的寨子，城裡商人都大開店門，做紅軍的生意。一個工人報告我們說，黔軍在他們那家裁縫店做了二百套軍衣，來不及拿走。我們厚給了工資之後，還打了「收條」把那批軍衣收下了。這事對於後來我們化裝「白軍」的把戲，有很大的用處。

當晚我們在城裡「打土豪」，分發一部份舊衣服和糧食給民衆，還籌到幾千塊銀洋，爭取了十多個人參軍，他們大多數充當運輸員。

在紫雲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們緊跟野戰部隊，取道夷族寨子保保樹，繼續向北盤江前進。走出紫雲城約二十里，就是夷族聚居區了。

一踏進夷族地區，感覺異常荒涼，沿途行人稀少。就是漢人行商，也很少到這個地方來，走了半天碰不到一個人。這使我們更意識到過去的民族隔閡以至民族仇恨，是何等的深刻啊！前面發生槍聲了，接著兩面山頭上發出「嗚！呼！」的呼聲。由經驗得知。這是接近了有敵意的夷族山寨了。我們鑑於他們是少數民族，為了爭取他們，同時也為了爭取時間，迅速地擺脫國軍的追擊，只好採取監視的態度，不主動地打擊他們，以求得迅速通過。

沿途霹靂拍拍一直打到黃昏，紅軍的便衣隊剛剛進了山寨腳下，夷族的民團便亂打槍，最前面的一個偵察員被打死了。經過了一個多鐘頭的戰鬥，佔領最高的一個山頭後，部隊才

宿營。

第二天，沿途又是同樣地邊打邊走。午後三、四點鐘，到了一個大山寨，這裡就是夷族的寨子保保樹。

我們的便衣隊機警的摸到了山寨跟前，把一個夷族哨兵捉住了。我們好好地對待他，對他宣傳紅軍的主張和少數民族政策。他有點害怕，只是頻頻點頭，其實他並不懂得所謂「少數民族政策」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只好寫一封信叫他帶回寨上去。

不多久，哨兵帶了一個三十來歲，穿中山裝的人來，原來他是一位小學教員。他對我們深深作揖，一再地說：「怠慢了！怠慢了！」又說：

「請紅軍先生上寨子去歇一會兒。」

「我們是想今天晚上借貴寨過一夜。」我們誠懇地說。

「這個我想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我還得回去和我們的寨主——頭目商量。」他很快地跑回去，不多久又來了，後面還跟著幾個人，送了幾桶水來，表示親熱。我們同他們談了幾分鐘。他們已派人去通知，經過一條石頭路便到了他們的山寨。

寨子上有一百多戶人家，還有一所小教堂和一所小學。寨子是以土圍牆圍住的，寨子口站著兩個衛兵。我們的隊伍一到，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都出來看熱鬧。他們的言語、服裝和生活習慣，同我們在紫雲城外山坡上所看到的夷族人差不多。經過同寨主交涉之後，他們熱情地讓出了房子給我們住。我們的女同志，還有那些「太座」們還特別找了幾個年輕姑娘談話。我和徐老（特立）就和那個小學教員談了許多有關寨子上的政治、經濟問題和整個夷族出路的問題，他把附近幾個縣的政治、軍事情形和北盤江的形勢等，詳細地告訴了我們。當

談到漢人統治階級壓迫他們夷族時，他們表示要堅決反抗到底，絕不妥協。談到武裝問題時，他們說寨子上現在僅有二十多條步槍，最困難的是子彈缺乏，要求我們送些子彈給他們。我們酌量給了他們一些子彈，他們高興得歡呼起來。

第二天早晨，我們出發時，全寨夷人都站在寨子口上歡送。

從夷族山寨保樹到北盤江還有一百六十里，中間要經過兩座大山，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夷族寨子，是用石頭築成的，非常的險要。

我們對於夷族地區已經做了初步的調查，對於這個山寨已有相當的了解，並且派了代表去和他們的頭目見面，互相諒解，所以能夠順利地通過了整個夷族聚住區，抵達北盤江邊。

三 江邊結盟

紅軍先遣團的隊伍，繼續向著北盤江邊前進。

我們從拂曉時分出發後，一直在爬山，真是萬山縱橫，剛爬完了一座高山，面前又出現了一座高山。就這樣，爬山下坡，不斷地迴旋著。這是上個春末交夏的早晨，濃霧籠罩著大地，山風寒涼，使人不時打起寒顫，身體瘦弱者還穿著棉衣哩。

這一地區的夷族居民，因受到黔軍宣傳的影響，都逃到深山裡去了。好在我們有很好的「土參謀」——嚮導，所以不致迷路。

休養連的隊伍到了一個小村莊，我和畢士狄去找水喝，有一個夷族老人對我們說：

「我們的婦女人家都害怕，娃娃們也怕，他們都逃到山上去了。」這種情形我們很清楚，

所以沒有再追問。我們便問他：

「到北盤江還有多少路？」

「還有一百二、三十里。」夷族老人又對我們說：

「從這裡到江邊都是王司令管的地區。」

所謂王司令，就是這一帶地區夷族的頭目，他是夷族的統治階級。這些山寨大王，差不多都是由國軍委任為什麼「民團團總」啦，「守備隊長」啦等職務，其主要作用是利用他們，共同對付共產黨。

「我們應當派人去和王司令辦交涉呀！」有人提議著。

「噢！什麼交涉不交涉，反正送些武器給他，叫他讓路給我們通過就是。」

「問題不是那麼簡單，民團都是白軍辦的，王司令是民團團總，總要聽聽白軍的命令呀！」

「是的，真有些不好辦。」

「怕什麼。我們是先禮後兵，先派『外交代表』送些武器去，疏通疏通，他們要的是官職，是金錢，是武器。我們照樣委他什麼『支隊司令』之類的官銜，送些武器給他，不是也可以利用嗎？」

我們休養隊的夥伴們又在大擺龍門陣了。

消息靈通的董老（必武）很有把握的說：

「據我所知，我們已經派了『外交代表』去交涉了……」董老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啪」從對面竹林那裡響了兩槍。

「土參謀」急促地說：「紅軍先生，那一定是王司令的兵，等我來打個招呼……」

不等我們開腔，他就叫喊了：

「嗚！兄弟們！不要誤會呀！這是紅軍，是專打王家（王家烈之簡稱）的，不打我們的，大家是一家人呀！不要打槍囉！」

儘管這邊不斷地大聲叫喊，卻沒有什麼功效。我們還是邊走邊議論著。

我和畢士狄故意往前面插隊去。我們插到總衛生部的隊伍裡，目的是打聽打聽有關「外交工作」的消息，剛好休養連連長何長工（按：後來由畢士狄接替）也在那裡，我們聽到了一些有關前面先遣團和夷族頭目訂立「軍事同盟」協定的事，但只是「馬路新聞」，不很具體。後來親自參與談判的先遣團政委張愛萍（當時任紅三軍團第十一團政委），對我談起他與夷族頭目王司令談判的具體情形，他說：

「這是我一生中最興奮，最值得回憶的一件事。那時我們紅三軍團第十一團擔任搶渡北盤江先遣團的任務。從紫雲縣城到北盤江有二百四五十里，是夷族聚住區，其周圍都有黔軍駐防。由於民族隔閡和民族仇恨，向來夷族仇視黔軍，形成勢不兩立的局面，所以夷族聚居區也就變成『獨立王國』，由夷族頭目王司令統治著。

「我們抵達這個地區，按照軍委指示，由我和團政治處主任王平充當『外交代表』，與王司令舉行會談，結果甚為圓滿，訂立了對於紅軍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軍事同盟協定』，其主要內容大致是：

- （一）王司令保證紅軍部隊在他的轄區內通過，不受任何阻撓；
- （二）紅軍保證不在王司令的轄區籌款籌糧和擴大兵員；
- （三）紅軍協助王司令建立一支堅強的夷族軍隊，保衛夷族人民財產和生命安全。」

張愛萍繼續說：

「當我們最初進入夷族地區的時候，曾發生了誤會，他們以為我們是『中央軍』或是黔軍，他們便開槍表示警告。」

「後來經過我們耐心的宣傳和解釋，終於取得協議，並訂立了『軍事同盟協定』。」
結盟之後，王司令派了一個副官帶路作嚮導，並沿途通知夷族各隘卡，對於紅軍部隊不得有任何的攔阻，並且「慰勞」了許多糧食和豬肉。

四 逼近金沙江

紅軍在百層（貴州省貞豐縣屬）渡過北盤江後，即沿貞豐、興仁、普安一線前進，在盤縣越過七盤山，進入雲南省境。於是分兩路前進：一路為主力，連陷曲靖、馬龍、尋甸、嵩明而逼近雲南省會昆明；另一路則先在黔滇邊活動，吸引黔滇軍，在擊敗黔軍猶國材五個團之後，乘勝佔領宣威、會澤、東川等縣而逼近金沙江。

當紅軍主力逼近昆明時，雲南全省為之震動。惟紅軍之目的不在佔領昆明，而在引誘滇軍不開往金沙江邊而急援昆明。紅軍此舉，與四月初佯攻貴陽，乘虛突入黔滇邊境之行動，如出一轍。

我們進入雲南之初，以為雲南為中國西部高原，必是高山峻嶺，道路崎嶇，氣候惡劣，物產不豐。但身臨其境，雖感覺得雲南之地勢甚高，東北部卻構成為盆地平原，這種盆地平原，氣候溫和，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當地人稱此種平原為「壩子」。

雲南氣候，最大的特色，是夏無酷暑，冬無嚴寒，「四季如春」。由於氣候溫和，農業發達，主要農產品有米、小麥、大麥、玉蜀黍、高粱、馬鈴薯、甘薯等，經濟作物有棉花、菸葉、甘蔗等，而聞名全國之雲南鴉片則遍地都種植。

我們在會澤、東川地區行進時，常看見居民在三十以上者，多數在脖子上生有如小碗大的瘤，無論男女都一樣，據說這是因為這些地方的水缺乏碘質所致。有一天，我們隊伍到了一個山寨，突然總衛生部來了緊急「通告」說，這個地方因係深山密林，從地下時有瘴氣冒出，泉水裡含有毒質，禁止在路上喝水。「通告」還說，已經派人在前面燒開水給大家喝。大家都覺得非常奇怪，「瘴氣」到底是什麼呢？但這是總衛生部的通知，一定是有所根據的。雖然大家還是半信半疑，但一走到了前面開水站的地方，還是爭先恐後的用水壺、葫蘆壺去灌滿了開水。

山越爬越高，天氣越來越熱，大家都汗流浹背，這個時候不喝水是不行的。但是每人帶的水只有那麼一壺，路邊的水又不敢喝，沒有辦法，只得開始喝帶來的開水。但今天的喝法有點不同了，以前總是大口地喝，甚至一次喝一壺也不夠，而現在就只好喝一口兩口，稍為潤潤喉而已。

我們經過了極大的艱險和困難，好不容易抵達以火腿聞名於世的宣威城。前衛部隊佔領宣威城是四月底的事，紅軍把一家大土豪的財產沒收了，土豪家的火腿堆滿了幾間屋裡，紅軍把它全部沒收，除了分配給各部隊外，還分發一部份給老百姓。休養連裡的「太座」們，在連裡得到「正當配給」的一份，還有他們的「愛人」送來的另一份。所以一連幾天，大家的菜食裡總是裝得滿滿的。我們與她們為伍，自然多少還可以揩一點油。

有一天，我們休養連隊伍在東川附近的一個小村宿營了。何長工興高采烈地來到我們的住處，他提著一大包東西，我們以為他是來配給什麼慰勞品的。原來是藥品，說是總衛生部部長賀誠送給我們休養連有名的雲南白藥，每人一瓶，他說，白藥不但可醫槍傷刀傷，且可治風溼、關節炎。何長工還講了一樁有關龍雲獻地圖、送白藥的饒有趣味的故事：

當紅軍先遣部隊正從曲靖向馬龍前進的時候，截獲由昆明駛來之龍雲副官所乘汽車一輛，內滿載軍用地圖、雲南白藥、宣威火腿、普洱茶葉等雲南特產。這些東西當即被紅軍沒收了，副官也被俘了。據那副官說，前日薛岳致電龍雲稱，因無雲南省軍用地圖，請龍雲星夜送去。龍雲接電後本擬派飛機送去，那知次日駕駛員生急病，乃改用汽車送來。惟未知曲靖已被紅軍佔領，當汽車距曲靖二十里時，即遭紅軍先遣部隊截獲，那些軍用地圖未送到薛岳，卻落到紅軍手裡。何長工還打趣的說，三國時劉備入川有張松獻地圖的故事，這次紅軍入川卻有龍雲獻地圖，實為有趣的巧合。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捌、從金沙江到大渡河

五月初，紅軍以九天九夜的時間全部渡過金沙江後，即經會理城郊轉進川西南大涼山夷族聚居區域，沿途曾受到夷民強烈的反抗。紅軍乃派出總參謀長劉伯承為代表，與夷族沽鷄頭目結盟，藉以羈縻，而獲通過夷族區域之有利條件。

五月下旬，紅軍先頭部隊趕至安順場，搶渡大渡河。但因水流湍急，船渡費時，架橋不易，乃改變計畫，以紅一軍團之二師為右路軍，其他部隊則組成為左路軍，沿大渡河上游疾進，於五月底搶過瀘定橋。

從金沙江到大渡河，這是紅軍利用了當時國軍——中央軍與地方軍之間的矛盾，利用了邊疆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民族隔閡和民族仇恨，再一次施展其詭譎的統一戰線陰謀而得逞，順利地獲得通過川西南大涼山夷族聚居區的一段富於傳奇性的行動。

一 渡金沙江

搶渡金沙江，為紅軍實現北進戰略方針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鬥任務。

那時，幾十萬國軍——中央軍和滇軍正分三路對紅軍追擊，並且幾乎佔領了所有的渡口；對岸又有川軍扼守著，並且已把所有的船隻都拉過對岸去，如果紅軍搶不到一個渡口，則必陷於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絕境。

為了執行搶渡金沙江的任務，紅軍各野戰部隊：包括軍委幹部團，於炎夏的五月初，在驕陽的曝曬下，每天以一百七、八十里的急行軍，向金沙江邊急進。

五月初的一個夜晚，我們幹部休養連，以戰備姿勢的急行軍，直走到二更時分，從一座高山陡直地下去，趕到了一個夷族小村莊。

據一夷族老人說，從此到金沙江只有五十里。經他這樣一說，大家都期然地叫囂起來，跳躍起來。這時，除了那廣漠的天空裡，閃爍著半明不滅的新月和稀疏的星星外，萬籟俱寂。紅色戰士以輕捷的步伐行進著。上山、下坡，走了約莫兩個鐘頭，突然從前面不遠的地方，隨著一陣陣風蕭蕭地送來江水拍岸的聲音，打破了戰士們深夜裡行軍的寂寥。「聽啊！這是江裡浪濤的聲音呀！」難道這不就是到了金沙江邊了麼？不一會，那天險的金沙江，就在那淡淡的月光下呈現眼底。

我們沿江繼續行進，走了二、三十里，盡是沙灘，且江岸多已塌陷，碎石排列如刀鋒，甚難落腳。大家在小心翼翼的行進中，掙扎了約兩小時，才度過此難關，至三更時分，隊伍始在沙灘上宿營。我和畢士狄把卧具鋪在帶著熱氣的沙灘上，仰視著天空的弓月，讓掠過江

面的涼爽夜風吹拂我們。起初，我們還談著今天行軍中的見聞，不久即被疲勞征服，進入黑甜鄉。

當大地還在魚肚白的曉霧中，我們就揉著疲乏的睡眠爬起來，在沙灘上吃了早餐，餐畢，即匆遽出發。天亮時我們繞過一個小村莊，江流將崖石刷成削壁，我們只好改道繞右側的大山上走。朝陽發出炎威，大家又汗流浹背了。以後或走山脊或行沙灘約四、五十里，又上了一座峻直的高山。此時，傳出今日可到渡江點的消息，大家也就不休息地拖著疲痠的腿勉強前進了。

下午兩時許，我們休養連隊伍趕到渡江點絞車渡，當我們看到遼遠的前方，錯亂山峰夾峙，低處有明澈的一條白紋，每隔一、二十分鐘即有樹葉似的小黑物在白紋上浮盪，大家不覺狂叫起來：「啊！那是渡船，載著紅軍過江咧！」

不一會，趕到絞車渡，廣闊的沙岸上塞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和馬匹輜重。數十個船伕，划著七條大小不一的渡船，陸續把「紅軍」向北岸輸送。

我和畢士狄在興奮快樂的心情下，忘記了走過八十里的疲勞，便停留在沙岸上，邊飲著溶糖的江水，邊看紅軍渡金沙江的情景。「休養連先過呀」，「這一條船只上三十個」，「馬栓在船尾上呀！」呼喊著、奔走著，至下午五時，整個野戰總醫院隊伍才過完。此時大家因疲勞過度，行軍序列紊亂不堪。

這次搶渡天險的金沙江，本選定三個渡江點前進。左路紅一軍團和右路紅三軍團均因架橋未成，不能渡江，只有中路在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親率軍委幹部團，奪取了七條民船，並機警地擊潰了從對岸會理來援的川軍，才奪得了這一渡口，西竄紅軍始得全部由此渡江。

休養連的夥伴們，有的渡江後繼續前進，有的留在北岸住下來。我和畢士狄在北岸一個天然的石洞裡睡覺。對於窯洞，後來我們到了陝北住慣了不覺得怎樣，但當我們第一次住進石洞時，頗有新奇之感。首先我覺得這是很理想的防空洞。但是由於江岸兩邊都是高山，一股股熱風吹進石洞裡來，蒸得有點受不了，睡也睡不好。剛好軍委幹部團政委宋任窮，也住在這石洞裡，也睡不着，我們便和他扯起這次幹部團怎樣奪得絞車渡的故事。

原來幹部團有一個營，由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前天晚上抵達江邊，派出了一排人進行偵察時，恰好對面來了一個人，攜著一只燈籠，大概是民團的團丁或是什麼區公所的交通吧，按照紅軍通常的辦法，這種場合是要活捉的。於是迅速地將一班的隊伍散開，埋伏著。等待那人走近了，把他捕捉了，原來是會理駐軍劉元璋設在對岸的收稅卡的稅吏。

根據稅吏的提供，紅軍偵察人員掌握了絞車渡口和北岸收稅卡的詳細情況。紅軍偵察員將稅吏帶到江邊，乘著仍靠在江岸的渡船過江去，首先去敲收稅卡的門，裡面的人還在夢中。等到一開門，當面站著一群武裝的「不速之客」。

紅軍繳了收稅卡十幾條槍，俘虜了二、三十個煙槍兵。於是一面警戒，一面招呼後續部隊速渡，當渡過約一營人時，已是拂曉時分。便以一連人向通安大道挺進。擴大警戒線，行約十里剛上山時，發現左翼大道上有川軍劉元璋（劉文輝之姪）部一營向紅軍反撲，而右翼山上亦發現有川軍扼守。因山道極小，兩旁又是削壁，川軍採用機步槍射擊外，更滾下巨石，極不易仰攻。紅軍以極迅速的躍進，結果只通過一個排接近隘口，在刺刀和榴彈猛烈衝鋒下，川軍潰退了。接著兩營川軍便全部退卻，紅軍取得了扼要的山口，成為後續部隊渡江的屏障。紅軍搶得絞車渡口後，就以七條船，經九天九夜，全部渡過了金沙江。（按：只有紅

九軍團因留在黔境牽制國軍，在另一渡口渡江。）

幹部休養連渡過金沙江的第二天早晨，即緊跟紅三軍團向通安前進。我們一出發便順著一條陡峭的小徑，攀登一座大山，據說上下約四十里。一爬上山，便是「之」字形的小路，整個山越爬越高。這是一座石頭山，沒有樹木，五月的驕陽一點也不放鬆地照射著，頗有沙漠的感覺。在休息的時候，有一農婦挑著一擔澗水上山來，大家爭著買水喝，每碗兩枚銅元，賣完了再去挑，農婦發了一注小財。休息了再爬，爬了再休息找水喝。就這樣，我們在這個有沙漠感覺的石頭山中，大約走了四十里，再順著一條小徑下去，便到了通安。

通安是滇川商業交通的孔道，有幾百戶人家，一條小街幾十間店鋪，賣一些香菸、鴉片、紅糖、茶葉、花生和鹽等，不過，當我們抵達時，除了鴉片之外，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買了。我們在通安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時分，趕抵四川省境的會理縣城南十餘里的一個小鎮宿營。那時紅三軍團和軍委幹部團正在圍攻會理城，我們只得繞著城西的一條小路向北走。我們從村莊樹林的間隙中，即可窺見會理城垣，但見城邊正冒著濃烈的火焰和煙霧。據說，守城的川軍劉元璋部為了阻止紅軍部隊接近城廂，今天早晨派隊將城垣附近的民房一律縱火燒去，同時又以密集的火力射擊，不讓紅軍施救，以致數百家民房變成焦土。

二 對邊疆民族的爭取

正當紅三軍團和軍委幹部團緊張地圍攻會理城的時候，其他野戰部隊和軍委縱隊，便利用幾天休息的機會進行地方工作（主要是擴大紅軍）和召開各種會議，進行整訓。有一天，

我和羅梓銘、畢士狄和其他幾位休養連夥伴們參加軍委直屬部隊幹部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書記洛甫（張聞天）作「渡江勝利的意義和今後的任務」的報告，大意是：當前紅一方面軍的主要任務是迅速搶渡大渡河，會合紅四方面軍，創造川西北新根據地。為此，必須趁國軍堵截未周時，迅速通過大涼山夷族聚居區。因此，當前紅軍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充分注意「黨的民族政策」，爭取夷族廣大勞苦群眾的合作，加強地方工作。

幹部會議的第二天，我和羅梓銘到紅三軍團政治部報到。徐老（特立）和文學家成仿吾奉調到軍委幹部團去擔任政治教官，畢士狄也奉調到軍委幹部團去擔任陳賡的參謀長。我自三月初到休養連以來，在兩個多月中，體力已逐漸恢復，這是我這次奉調到野戰部隊工作的緣故。

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對我們說：

「現在紅軍部隊就要進入川西南大涼山夷族區域，對少數民族工作，我們在黔西南地區已獲得若干工作經驗，所以對大涼山夷族工作，我們是有信心的。但也不能輕心大意，大涼山夷族地區互七、八百里，無論在民族宗教上，或是語言支系上都與黔省的夷族有所不同。大涼山的夷族又稱『倮倮』，或叫做『蠻子』，性質勇猛獷悍，長期以來，漢族統治階級壓迫他們，欺侮他們，造成深刻的民族仇恨，所以無論是國軍或紅軍，他們是不加區別一律視為敵人。我們的前面橫著天險的大渡河，後面是強大國軍追擊，假使我們不能很好的團結他們，爭取他們的同情和合作，那麼我們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國軍的宣傳機關還向全世界宣稱：『共匪已進入了天羅地網，他們必將被消滅在大渡河邊，作石達開第二。』這是國軍對我們的嚴重警告，我們不能不有所警惕。」

袁國平這一大套話，只不過是把前天洛甫在軍委直屬部隊幹部會議上「報告」的主要內容重複一遍而已。袁國平還對我們說，「黨調你們到紅三軍團政治部工作，主要是要你們來擔任對少數民族的爭取工作。」旋即介紹我們與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郭滴人見面。其實，我和郭滴人老早就認識的。記得一九三二年我踏進蘇區的時候，我們就在閩西蘇區的門戶——龍岩會晤過。那時他擔任龍岩縣蘇主席。龍岩蘇區被國軍收復後，郭滴人被國際派指控為羅明路線的追隨者而遭整肅。當朝滴人在瑞金中央黨校學習時，他的愛人（太太）也調在瑞金列寧師範學習，那時我在列寧師範教書，郭也常常到列寧師範來和我晤談。

三 大涼山夷民的生活習慣

由於工作上需要，當時我根據與嚮導、當地漢人以及參加紅軍的夷民等各方面的談話中，對於大涼山夷民的生活情形，做了一些初步的調查：

夷民分為黑夷、白夷及娃子三大類。黑夷為夷民之統治階級，本地漢人稱他們「黑骨頭」，他們以領袖自居，不直接從事生產，除督率他們的奴隸——娃子從事生產業務外，就是打獵和到各處代人說項、調解糾紛等。白夷原為漢人被黑夷擄去者，他們被輾轉相賣，生活習慣已完全夷化，嗣後經自身勤儉工作，逐漸積有私產，將身價償還主人（黑夷），乃由其主人作主娶妻建屋，或佃主人之地，或佃其他黑夷之地，勤奮自守，建立家業。娃子係黑夷之奴隸，有男娃子和女娃子之分，男娃子主要是代替他們的主人收租及經營農牧等事宜，女娃子主要是管理其主人屋內一切家務。娃子多配合而成為夫婦，終身為其主人服務。

夷民男子無論老少，均於額頂留約二寸長一寸寬之長髮，叫做「天菩薩」，最忌他人以手觸之。女子無論老幼，皆以藍布纏裹其髮，未出嫁女子或少婦概以二三寸寬的藍布條纏裹頭部，如已生子，則改戴黑色的帽子。夷民無論男女都喜裝飾耳部，男子於左耳下穿孔，戴紅瑪瑙或珊瑚珠之類的裝飾；女子則兩耳各穿一孔，有的戴長串的各色小瑪瑙或珊瑚，也有戴各種銀質耳環者。

夷民男女上身多穿裹衣（或稱披衣），除女子有項領，頸部有各種銀質花繡項圈外，其餘男女相似，在肩胸及胸際多有各色花邊。不過貧窮的男子多不著裹衣。男子下身多穿單褲，女子則不穿褲，而穿長褶裙，貧者只延及足脛，富有者則拖於地，不露其足。男女多打赤足。夷民居深山中，土地貧瘠，農產品僅有玉蜀黍、蕎麥、青稞、馬鈴薯等，菜蔬有四季豆、豌豆、青菜、蘿蔔等，糧食不足時則吃野草。他們兼事牧畜。夷民一般都好飲酒，酒有二種：一為水酒，一為燒酒，原料均為玉蜀黍和青稞麥。

夷民之婚姻制度，一般雖為買賣婚姻，但其迎娶時卻用擄搶的方式。其選配多係同族的遠親，對異族則嚴禁通婚。選婚亦甚嚴格，尤其嚴禁黑夷與白夷之間的通婚。

迎親之日，男女兩家皆備酒肉，由男家擇壯丁多人，持酒肉布疋等與新郎同往。女家則集其鄰近女子與新娘候於門口，各持木桶一隻，內盛冷水。當男家的人進門時，即將冷水潑於男家人的身上，以示抗拒。男家的人則忍耐擁入室中，各食酒肉，並以歌舞及其他遊戲助興。而在熱鬧的紛亂中，男家的人即將新娘連搶帶拖背起而走。女家則佯作尾追之，至相當距離而返，途中新娘則大聲啼號，表示不願前往。

夷民因日常跋涉於崎嶇的山區，一般身體都很強壯。但因他們不注重衛生，時常發生天

花、癩疥、瘧疾、傷寒症等傳染病，尤其是因傳染傷寒、天花致死者甚多。他們對於這些傳染病因無法醫治，皆委之於鬼神。惟他們並無特殊之宗教信仰，拜鬼神完全為迷信性質，舉凡婚姻，娶嫁、建屋、戰事、掠奪或遠行打獵等行為，無不求諸筮下。

夷民每逢喜慶佳節，多舉行一種叫「跳鍋莊」的遊戲，參加的男女都著新衣，圍繞鍋莊，並置酒菜，且歌且舞，歌詞多為男女相戀情歌，也有勸孝、勸善之類的歌謠。

四 從會理到冕寧

紅軍從會理城郊出發到冕寧，計程五百餘里，據嚮導說，大概要走八天。紅軍為了爭取時間搶渡大渡河，每天都是急行軍，而且都是夜行軍，太陽落山時出發，一直走到東方發白才宿營。

因為都是在夜間行動，沿途經過的村莊、鄉鎮，以及山川風物等等，都已經記不清了。不過，八天當中，至今猶堪回憶的只有三樁事，都與孔明有關，實在有趣。有一天拂曉前，我們在一個山莊宿營了，只有十來家居民，據當地老百姓說，這個山莊便叫孔明寨，孔明南征孟獲時，曾在這個山莊紮營。

還有一天，卻是在明月夜裡，我們一邊走，一邊看夜景。忽然一陣狂風，吹的勁兒真夠大，撲面吹來，頗有點吃不消。據嚮導說，當時孔明借東風只借到金川橋為止，所以要過了金川橋才沒有風。真奇妙，當我們過了金川橋那天，風勢果然止住了。

還有一樁也是很有趣的。有一天在夜行軍中，我和郭滴人在一個小山莊休息，找嚮導問

談。據他說，北起大渡河，南至金沙江，原為南蠻地區，孔明征南蠻時才開闢的，漢人只在這一狹長的盆地中居住，而兩旁山區則為蠻族所據。現在西昌城裡有一座孟獲殿，頗為富麗堂皇，據說係孟獲稱王時所居。

最後一天，從石龍橋出發，走五十里到達冕寧城。城垣在巒山懷抱中，周圍均約有二十里的平坦地。城裡只有兩條大街：東西一條，南北一條。街上的店鋪，一律是平房，矮矮的。街上已經沒有吃的東西可買了，據嚮導說，冕寧國軍僅一連人，前天聽說紅軍要到，便星夜撤走了，城裡只有幾十個民團。冕寧的漢人，對於保僱，多言之色變，他們槍殺漢人，無所不為，而漢人只要捉著保僱，也是極盡殘酷之能事。冕寧有一專門關禁保僱的監獄，無論男女老幼，都是上了鍊銬。紅軍對於冕寧監獄中的保僱，如不釋放，便不算忠於黨的民族政策，故在政治部的堅持下，終於把獄中的一百多個保僱犯人全部釋放了。但結果卻遭到當地漢人的極力反對，因為恰好當天下午距冕寧四十里的大橋，保僱大搶漢人的財物，幸好紅軍先頭部隊追到，保僱們才跑回山上去，不然大橋又是一場浩劫。

五 飲血結盟

從冕寧出發，翻越一個高山，便是所謂「保僱國」了。據嚮導說，這個山叫做小相嶺，其最高峰便是聞名世界的貢嘎山，海拔七千五百餘米。從小相嶺那邊下山，就是大渡河。兩天的路程共二百四十里，其中純粹的「保僱區」，由南向北，約一百二十里。高原上的土地很貧瘠，加以保僱的生產技術落後，農產品只有蕎麥、玉蜀黍、馬鈴薯和很少的小麥。由於

生活困苦，他們必須從掠奪所得來彌補。他們有時成群結隊下山強搶，有時攔路打劫過路客人，搶劫時把東西完全搶盡，連穿的褲子都不留。紅軍佔領冕寧時，冕寧縣長和其他官員逃到保保區域，除縣長被殺之外，其他官員的衣服都被脫光，甚至一位科長太太也裸體跑轉來。這一趣話，在當時前線部隊中傳佈甚廣。

保保們的體格都很強壯，大部分是打赤足，也有穿麻鞋者。身上穿的是布披衣和布褲，各色各樣，顯然都是搶來的。男人外單羊毛手織的披衣，倒是真正土產，沒有袖子，領小，撒開很大。女子穿的是紅紅綠綠的百褶裙，據說多不穿褲子。我看見有個女人，穿著百褶白布裙，兩耳各垂著杏子大的兩顆紅珠子，披的不是毛布，而是細氈，大概是屬於頭目級的夫人吧。

紅軍部隊繼續前進，走了大約二、三十里，在一片大森林的山頭上，突然隊伍停下來了。偵察連長跑步回來報告說，前面有幾十個保保攔路不准紅軍通過。到處可聽到保保們大叫「嗚呼」「嗚呼」的聲音，顯然是要「過路錢」。經過「通司」（即翻譯）才找到幾個保保來，用了許多辦法，不外是向他們宣傳，結果還是給幾百塊大洋了事。但走了一、二十分鐘的光景，前面「霹靂啪啦」又打起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後來經過調查，原來在紅軍前進的路上有兩個保保部落：一為羅洪部落；一為沽基部落。這兩個部落之間歷來常常發生械鬥。前面經過的那個山寨是羅洪部落，而這一座山寨則是沽基部落。紅軍給了羅洪幾百塊大洋「買路錢」的消息很快地傳到沽基部落，剛才的槍聲顯然是沽基要「買路錢」的手段。不過他們的手段甚為高明，他們派來了一位全權代表要和紅軍正式結盟，事實的經過大致是這樣：

沽基部落派來的代表叫做小黑丹，騎著一匹白馬來到一個小山谷附近的小湖，叫「海子

邊」。海子邊的水，清澈如鏡，倒映著濃密的樹林。結盟儀式就決定在海子邊舉行。

紅軍派出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為全權代表，他騎著一匹黑馬來到海子邊，小黑丹和另外幾位僱傭族首領立刻趨前迎接。劉伯承下馬後，以誠懇的態度重申願意代表紅軍與小黑丹結盟，結盟儀式是用兩碗清澈的湖水，一隻雄赳赳的大公雞，把公雞的頸割破，雞血分滴在兩隻碗裡。

當結盟的儀式安排妥當之後，劉伯承和小黑丹虔誠地並肩跪下，在他們的面前擺著滴過雞血的兩碗水，劉伯承高高地端起了一碗，大聲地唸出誓語：

「上有天，下有地，我劉伯承今天代表中國工農紅軍，在海子邊願與小黑丹結為兄弟，願同生死，如有反復，天誅地滅。」說了一口飲盡。接著小黑丹也捧著碗說「我小黑丹今天同劉司令結為兄弟，願同生死，如有反復，天誅地滅……」，也是一口飲盡。

經過了這樣飲血結盟之後，小黑丹和僱傭們才放心。此時，夕陽的餘暉映紅了海子邊的水，一陣陣涼風，蕭蕭地、輕輕地拂動著湖水，舒展著和平的微波。紅軍部隊為著迅速搶渡大渡河，又繼續前進了。

六 搶渡大渡河

第二天早晨，小黑丹帶領著由三十多個僱傭組成的隊伍，每人都拿著梭標，笑瞇瞇的站在路邊歡迎紅軍隊伍，說是要到紅軍部隊裡學習軍事，準備學會了回去打劉家軍（按：指劉文輝的軍隊）。劉伯承送給他們三十支步槍，送給小黑丹一支駁殼槍，並把一面寫著「中國

紅軍沽基夷民支隊」的紅旗送給他們。

那天上午，我們大約走了五十里，才走出了倮倮區。據嚮導說，由此至大渡河邊有兩路：一條北行經盆羅至龍場渡口，一條西行。越過一座高山至安順場渡口。整個部隊分兩路：我們政治部跟著走後一條路。出村不久即上山，走約十里，忽然濃霧瀰漫，峰巒對峙，路又彎又陡，下山到一小村休息，找水喝後復上山。至山巔，但見遠遠山腳下一條白浪滾滾的大河，便是大渡河。大渡河，當地土人稱之曰「銅河」，沿河右岸上行三十里即達安順場，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傳奇性的地方。

據嚮導說，大渡河上游，只有富林渡口，水比較平穩，在那裡不要說架橋，就連漕渡也不可能。而龍場和安順場這兩渡口，只有六條民船，渡一次，來回要一個鐘頭。

當紅軍先遣團趕到安順場時，得到當地居民報告，該地有川軍一營，已把所有船隻毀壞，並準備燒街上的房屋。紅軍當即派精幹的尖兵連跑步下山，急驅街口。街上有川軍一個營長，率兵一連駐守，河岸尚有渡船一隻，是營長留下準備渡河的。紅軍尖兵連以極迅速的動作衝入街口後，川軍才發覺，尖兵連當即以一部圍攻川軍於一間大房內，一部奪取了渡船。團主力趕到後，即將困守中的川軍一連人解決，立即準備強渡，驅逐對岸的川軍。但此時對岸川軍一連，伏據數線散兵壕裡，以強烈火力射擊，船只有一隻，河流湍急，一次只能渡十餘人，來回即需一個鐘頭，不但船在中流有被擊沉危險，而在綿密火力與急流的衝擊下，船是否能靠岸呢？再則，渡過後，支援部隊若不能立刻趕到，已渡過的少數人更有覆沒的危險。但決心既下，只有求諸冒險的成功了。此時，部隊中湧出了十七個勇士，自告奮勇地報名先渡。於是紅軍先遣團集中了六挺重機關槍，幾支自動步槍，集中了十來個特等射手，以密集連續

的射擊，雖然還不能完全壓倒對岸川軍的火力，但船已安全放至中流了。大家在歡呼著，忽然急流衝擊，船向下游直駛，不能靠岸，稍下數十米，河面愈寬，且直當川軍火網下，更是危險。此時大家幾乎絕望了，但已經上船的戰士盡最後的努力，卒將船靠彼岸，而十七個勇士如生龍活虎似地跳上去，他們「衝呀！」「奮勇前進呀！」高呼著，跳躍著，在機關槍聲，步槍聲，手榴彈爆炸聲和硝煙塵灰的瀰漫中，衝過了川軍的第一道戰壕，旋即發揮所謂「三猛」——猛打、猛衝、猛追的戰術，把川軍一連打垮了。這一戰鬥在紅軍西竄的歷程上創了一個奇蹟：紅軍克服了一切困難險阻，把天險的安順場搶到手，沒有作「石達開第二」。

紅軍搶得安順場渡河點後，一面繼續用渡船把一批一批戰士運過去，一面趕緊紮竹排架浮橋。但這些工作很費時。於是紅軍先遣司令部不得不改變方針：以已渡河之先遣團組成右路軍，其餘組為左路軍，夾河而上，直驅瀘定橋，而僅以軍委幹部團分別在龍場和安順場渡河，以掩護全軍通過；同時迷惑國軍，使其仍以為紅軍是要在安順場渡河。

據當地一老漢說，太平天國軍統帥石達開，渡過金沙江後，深得夷民歡迎，為之帶路至此，因無舟楫，乃用蠻藤布帛牽纜架設繩橋，讓石達開的軍隊萬餘人渡過。但因其後續部隊尚遠，石達開以為孤軍在北岸有危險，乃又下令渡回南岸，候大隊到齊後再渡。不料渡回後，連日大雨，河水暴漲，繩橋被沖毀，以後又因材料缺乏和水流湍急，架橋不易，遷延甚久，而大隊也已經集中，但此地糧秣告缺，人心浮動。石達開又疑夷民故意帶其至此絕地，乃開始虐待並殺戮夷民，於是激起夷民憤怒，斷絕石軍的一切糧秣的來路，並群起圍攻，從各方面與石軍為難，而四川清軍又大舉合圍，石軍更加潰散解體，以至於最後全軍覆沒，縱橫南中國赫赫一時之石達開遂在此就擒。

紅軍雖然搶佔了安順場，但因水流太急，架橋不成，渡船又非常費時，尾追的國軍已相隔不遠了，緊張的情況當然不容許再拖延，現在只有用飛行軍的辦法搶奪瀘定橋了。

至於紅軍是怎樣搶佔瀘定橋的，據後來幹部團參謀長畢士狄對我說，其經過情形大致是這樣：

為了搶佔瀘定橋，紅軍先遣司令部作了這樣的部署：部隊分兩路沿河岸前進：以紅一師為右路繼續由安順場渡河，由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和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指揮；以紅二師為先頭，隨後整個野戰軍為左路軍，由紅一軍團長林彪指揮，紅軍部隊就這樣前進了。

右路軍沿河而上，左面臨河，右靠高峰，崎嶇小路，真是難走。爬了幾個大山，經過了一些蠻子的村莊，一切都很沉寂。經過半天的急行軍，便和川軍接觸，川軍在隘口上築了碉堡扼守著，紅軍因受地形的限制，一路都是仰攻的背水戰，稍有失手，就有滾到河裡的危險，右路軍是這樣地前進著。

左路軍從安順場出發，軍委的命令，限於三天之內趕到瀘定橋，要走三百二十里。路也是沿河而上的，情況和右路軍差不多。大約走了三十里左右，川軍在對岸不斷地掃射，路不能通過，只好走彎路。但走彎路就要攀越大山，大概繞了十里多光景，又走出河岸上來了，川軍又在對岸打槍，跑也不行，只好又走彎路，這樣彎來彎去，費了不少時間。終於黃昏時分，趕到猛虎岡，這是到瀘定橋的最後一道關口，山高三十多里，左右完全不能攀登，也不能迂迴，只有中間一條小路，甚為陡峭，上面也有個隘口，照樣築有碉堡，駐有川軍哨兵，強攻已不可能，只有用偷襲（夜襲）的辦法了。

在黑暗中，一切都是沉寂，稀稀疏疏的冷槍，斷斷續續地由山巔碉堡裡射出來。紅軍士

兵一個一個悄悄地摸上山去，山巔上的川軍一點也未察覺。紅色戰士拋出了幾十個手榴彈，把這一險要的關口佔領了。這天整整跑了一百四十里。

第二天，大約跑了六十里，到達摩西面的大山上，有川軍一營扼守著。經幾次衝鋒肉搏，才把川軍擊潰，隨即乘勝猛進，趕到山下，有一條小河，橋被川軍毀壞了，只得動員工兵再架，這樣一再拖延，抵達河邊的一個小街上，已經天黑了，而距瀘定橋還有一百一十里。天黑得十分可怕，大雨又像傾盆一樣倒下來，戰士們還是拂曉前吃的一頓飯，跑了這麼多路，肚子餓得難過。指導員立即在連隊中進行鼓動，政治工作人員、黨團幹部以身作則做模範，於是掀起了一陣「不怕苦，不怕餓，一切為了奪取瀘定橋」的高呼。

經過了一晚的急行軍，戰士們顯然極為疲乏了，肚子十分餓，衣服也全濕透了，在這樣既飢餓又疲勞的情況下，有時忽然站著不動，被後面的人衝撞時，才忽然驚醒，而又蹣跚地前進。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中，直到天亮時才趕到瀘定橋邊。

橋是由九條像飯碗般大的鐵索做成的，每根相隔在一尺以上，兩邊有鐵條的扶手欄杆，橋的中間沒有墩柱，只是鐵索的兩端埋在兩岸，橋頭的地下打了許多很粗的鐵樁，鐵索上鋪的木板，都被抽掉，只剩九根鐵索。河面數十丈寬，由橋上到水面也有數十丈高。往下著，奔騰的水勢，無底的深淵，真叫人毛骨悚然，瀘定橋之險，於此可見。

對岸橋頭那邊，就是瀘定縣城，駐有川軍一個團，構築著堅固工事攔在橋頭，並附有一個砲兵連在橋頭固守著。因為是在白天，所以當時紅軍沒有發起攻擊，只是派了一部分隊伍，配備一些輕機關槍，不斷地向對岸射擊，目的只是在監視，而決定黃昏時實行搶橋的總攻擊。快到黃昏時分了，從部隊中挑選了二十二個戰士組成衝鋒隊，一概用短槍、手榴彈、馬刀，

在連長和指導員率領下，在橋這邊的重機關槍、迫擊砲的強力砲火支援之下，冒著濃密的彈雨，一手扶著鐵欄，踏著鐵索，衝鋒過去，剛到對岸橋頭，川軍放起大火把橋頭的小亭子燒燃了，火焰沖天，無法衝過去。此時紅色戰士有些躊躇起來了，徘徊不前。團政委高聲叫喊：「同志們！這是搶橋的最後關頭，不要忘記黨交給你們的光榮任務啊！拿出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來，勇敢衝鋒呀！」這些在紅軍的惡戰中聽慣了的一套喊話，頓使二十二個「不怕死」的紅色戰士投進熾烈的火焰中去了。他們的衣服燒著了，眉毛頭髮也燒著了。但紅色戰士一切都不顧，只是橫衝直撞，一直衝進街口上和川軍進行肉搏的巷戰。川軍也集合全力，猛烈地反撲，紅色戰士的子彈、手榴彈都打光了，態勢萬分危急，幾乎支持不住了。正在這樣的嚴重關頭，團政委率領著支援隊趕到了，在最後的決戰中，橋頭街上的川軍被打垮了，紅軍終於佔領了天險的瀘定橋。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286

玖、紅一、四方面軍會合

紅軍渡過大渡河後，即繼續西進，經化林坪，從二郎山旁翻過行人絕跡，危崖峭壁，陰森森的密林——抱相崗。六月初在天全突破川軍六個團的包圍、堵截之後，相繼佔領了天全、蘆山兩縣，嗣於六月十二日，經寶興縣屬的大燒礮翻過終年積雪，海拔四千公尺以上的夾金山，旋在夾金山麓與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會合。

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兩個方面軍會合後的行動方向問題。會議在討論當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時，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意見分歧，並因此造成中共領導階層內部，特別是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的權力鬥爭。

兩河口會議之後，紅一方面軍即經卓克基——梭磨——馬塘——康貓寺，越過兩座大雪山，抵達黑水蘆花地區，一面整休，一面籌糧，準備越過松潘西北一片茫無邊際的草地。

一 抱相崗的一夜

紅軍渡過大渡河後，即向抱相崗急進。有一天下午四時許，我們剛出發不久，一架國軍飛機在上空盤旋了好久才飛去，我們雖然沒有被發現，但為慎重起見，還是在樹蔭下蹲著，直至夕陽快西沉，隊伍才開始走動。部隊從此開始攀登絕壁峻嶺，人迹罕至的高山——抱相崗。據嚮導說，抱相崗只有一條小徑可通到天全縣。紅軍選擇此路行進，旨在隱蔽目標，使國軍摸不著紅軍的行動方向。剛走不久，部隊停下來，說是前面部隊走不動。自瑞金出發以來，什麼崇山峻嶺，什麼危崖峭壁，不是走過很多嗎？難道還有比越城嶺（廣西）、火燄山（川滇邊）更高更難走的大山不成？轉過了一處山坡，又到密林裡來了。有些細竹，橫七豎八地被踩在地上，要把腳提得高高的才能跨過去，新砍伐的刀痕，刺目地陳列滿地。原來這裡根本就不是路，是完全由先頭部隊開闢出來的。樹木繁茂叢雜，因終年不見太陽的緣故，泥土都變成了黑色。要小心地攀著樹枝或小竹，一腳跟一腳地走，要使腳踩著泥裡的硬土或是小石，一步跟一步地踩上去，才不致跌倒。實在是太陡了，這就需要緊握著小竹，小心翼翼地行進。走完了一段泥濘路，又來到一處陰森森的密林。我問嚮導，這座大山有多高？是不是快走完了呢？嚮導說，還早呢！更難走的路還在前面。這條根本不是路的路，只有些所謂攀藤負葛的痕跡罷了。

已經是黃昏時分了。據嚮導說，到山嶺還有三十里，今天到達不了。忽然前面響起了叫聲：「宿營了，就地宿營。」怎麼樣的宿法呢？這裡簡直找不到一塊可以放下行李包袱的三尺寬平地。於是大家只好像鶴一樣的佇立著，每個人都知道這一夜是不好過的。

雖然是盛夏，但在這樣的高山密林裡，夜晚非常的寒冷，沒有燒火是不行的。幸好枯枝竹片到處都有，不一會，這裡一堆，那兒一堆，都燃燒起來了。我和羅梓銘、郭滴人圍著火堆，先烘乾衣服，掛在竹枝上晾著。有火堆的地方，泥土也就漸漸乾了，我們就把背包放在烤乾了的地上，當做椅子，因為沒有水，開水燒不成，吃的事已成泡影，只有坐著，坐著。

但禍不單行，猝然下起暴雨來了，雨水從從上面嘩啦嘩啦的流下，於是有些人打著雨傘，有些人戴著斗笠，但也有人疲倦得不管風吹雨淋地坐著打鼾。我和郭滴人是徹夜沒有睡，很想燒點水喝，勤務員便點著火把下澗去取水，約半個鐘頭光景，才提上來一鐵桶水，正架著燒，他也睡著了，不知道是誰作孽，竟把鐵桶踢翻，水灑了滿地。開水喝不成，只好等待天亮了。天剛亮，炊事員已煮好了兩桶包穀稀飯給我們喝。吃過包穀稀飯，倒也感到渾身有了勁似的，至少可以抵抗那刺骨的寒冷。

部隊開始行進。我站在山巔上俯瞰，所謂的路還是由先頭部隊走出來的，泥濘不堪，陡峭而滑，稍平坦一點的，卻是泥深沒膝，有幾匹馬陷在泥沼裡愈陷愈深，好不容易才拔出來。為要繞越泥淖，有的人下澗，沿著岩邊走，有的人攀著樹枝爬上岩去，逢到澗不能下，若不可攀的地方，就只有攀著路旁的雜草或樹根一步一步前進。

天大亮了，當朝陽從迷霧中露出微弱的光線來的時候，我們終於走出了那神祕的抱相崗。山腳下一條小河，水聲潺潺，部隊在這裡大休息。大家都到河裡洗腳，洗衣服，有的在河邊燒開水或煮著什麼。昨夜開水沒有喝成，渴極了，剛好羅梓銘和他的小鬼（勤務員）先到此，用臉盆煮著什麼，開水也好，稀飯也好，「給我一碗吧！」我說。他們給了我一大口杯，喝了一口，有點怪味道。原來是驢子肉湯。羅梓銘笑了。他說：「不知道小鬼從那裡弄

來的一塊騾子肉。」「昨天晚上不是跌死了一匹老騾子嗎？」小鬼認真地辯解著。在紅軍中吃馬肉或是騾子肉，不算是第一次了。所謂「飢不擇食」，吃起來味道還是不錯的。這算是我們在抱相崗熬了一夜的「代價」吧。

二 翻越夾金山

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在夾金山麓和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合了。六月中旬的一天，我們紅三軍團隊伍從大蹺磧（寶興縣屬）出發，向著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前進。

夾金山，位於寶興縣城西北，懋功之南，是一座海拔四千公尺以上的大雪山，我們自江西出發以來，雖然翻越過不少高山，但翻越大雪山卻還沒有經驗。為了翻越夾金山，紅三軍團政治部事先作了一些調查工作。

據嚮導說，夾金山上下要走九十里，必須在上午九時以後上山，下午三時以前登完。因為下午三時以後，雪山地區就有狂風、大雨，以及核桃大小的冰雹衝擊而下，到了那時，行人就無法通過。這時候是盛夏，但夾金山上卻白雪皚皚，寒冷異常。嚮導還說，上山時要多穿衣服，最好帶些燒酒或辣椒湯，抗寒壯氣。

九時許，部隊向夾金山進發了。從山腳下仰望去，山巔高不可見，那白皚皚的冰雪，在驕陽的光輝下閃耀著刺目的光芒。按照規定，我們每人都帶了辣椒湯或薑水，還帶了一根木棍，以防跌倒。

上了差不多二十里的地方，看見前面的人群走得比螞蟻還要緩。我們彎彎曲曲而上，越往上爬，山勢越陡，幾乎要筆立起來了。

將近中午，我以為差不多已攀越過半個山腰了，那知剛拐過一個彎，便又出現了一座更高的山，也是滿山積雪，路窄且滑，積雪越來越厚，再向上爬，好幾層的積雪，差不多有兩尺多厚。山勢更加陡峭，路更加崎嶇狹窄，要是一步走不穩滑下去，因為手腳都凍僵了，很難爬起來。草鞋早就被雪水浸透了，腳趾凍得僵硬麻木，好像全部癱瘓了似的。

越往上爬，空氣越稀薄，胸口好像壓著重擔似的，透不過氣來，走幾步就得喘半天。

走在我後面的一位老飼養員（馬伏），臉色乾黃，兩頰清瘦，額上汗珠直流，看樣子連往前爬的氣力都沒有了，他絕望地坐下來。指導員從後面跑步上去，把他的手架在自己的肩上，把他扶起來，懇切地對他說：「同志！翻過夾金山和紅四方面軍的弟兄們會面去，在這裡，無論如何是停留不得的。」

「我自己還能走。」老飼養員慢慢地站起，搖搖晃晃地走了。

不一會兒，忽然西南方湧起一片烏雲，迅速地挨著山頭壓過來，越來越黑暗，接著暴風挾著冰雹，劈頭蓋臉地打來。再過一會兒，又變成了鵝毛大雪。高山之上，真是瞬息萬變。我們身上的單軍衣早已被浸透了，有些地方還結成了一層薄冰。冷風襲來，人們就把被單、氈子披在身上。氈子被風吹鼓起來，像船上的帆，拖得來回直晃盪。

風越颯越大，雪越積越厚，腳陷在一尺多深的雪裡，要費好大的勁才能拔出來。我和羅梓銘、歐陽武、郭滴人幾個人互相挽扶著，一步一步向前移動。真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下午三點鐘我們到達了山巔。大家是那麼高興。跨過山頂，開始下山了，我心裡想，下

山總該少費點勁吧。誰知道上山難，下山也不容易，身子總是往下滑。前面一個戰士，一不小心，一滑就是幾尺遠。

下山，大家跑得多麼快啊！大家只有一個心願：和紅四方面軍的弟兄們會面去！連滾帶跑，三十里一口氣就跑下來了。

此時，烏雲已漸散開以至消失，天空豁然開朗，在斜暉夕照中，這座折磨人的大雪山，終被我們跨越了。

到了山腳下，我們沿著一條小溝走下去，走不遠，看見一支戴著紅軍帽的隊伍，正是我們想念中的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我們就在紅四方面軍弟兄們熱烈的歡呼中湧入大維。

大維，是個擁有百來戶藏族聚居的大村莊。一座高大的喇嘛寺雄踞在山坳的凹深處，四周是一層層木造的房子，屋頂蓋的是樹皮或石片。喇嘛寺前面有一廣場，周圍有二三十家店鋪，但店內除了鹽、豌豆和「蠻子茶」^①之外，什麼也沒有了。我和歐陽武進到一家店鋪裡去，裡面烏煙瘴氣，一片幽黑。原來是一所煙窟，房裡陳設著幾張床鋪，倒卧著十來個煙鬼，都是藏人。他們看我們進來，睬也不睬，仍卧在那兒吞雲吐霧。

當天我們就在大維宿營，房子都是紅四方面軍騰出來給我們住的。晚上吃的是包穀麵糊糊，裡面摻些馬鈴薯片和豌豆苗。餓極了，也就覺得特別好吃。餐畢，大家就進入睡鄉。

①是用一種類似茶的樹葉焙成，煮出後作紅褐色，帶澀味，為藏民所嗜飲，當時紅軍名之為「蠻子茶」。

三 歡迎大會

紅一、四方面軍主力會師後，即在懋功舉行盛大的聯歡晚會和會餐。隨後雙方各組慰問團或參觀團到各部隊互相慰問和觀摩。我和郭滴人也參加了這種慰問和參觀活動。我們參觀了不少紅四方面軍的隊伍，與他們的幹部作了廣泛的接觸。我覺得在服裝和武器裝備方面，紅四方面軍要比紅一方面軍好得多，當然這和他們的作戰行軍歷程有極大的關係。不能抹殺他們之間不同的戰鬥歷程和地理環境。紅一方面軍自江西出發以來，已越過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等七省，走過一萬里以上路程，因而它們的兵力由八萬五千人減至抵貴州時的三萬人，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時則只有七、八千人了。紅四方面軍於一九三五年三月撤離川陝蘇區時擁有八萬人，雖然自三月強渡嘉陵江，迄六月中旬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前後兩個多月，沿途不斷與川軍作戰，傷亡和減員約一萬多人，但在兵力比例上，紅四方面軍當時約為紅一方面軍的七倍。一般地說來，紅一方面軍幹部打仗比較沉着、機警、靈活而狡猾；而紅四方面軍幹部一般地說來，比較頑強、勇敢、衝鋒力特強。在幹部政策上，毛澤東與張國燾比較起來，張的作法比較靈活，只要你打勝仗，可由連長升至團長，再打一次勝仗，又可以升至師長。團長也有一下子升至軍長的。而毛的作法則比較保守。紅一方面軍在經過一次大戰役之後，甚至經過一次較為劇烈的戰鬥之後，只要時間允許，必定舉行檢討會，總結經驗與教訓，這對於幹部的軍事技術訓練有很大的幫助，而紅四方面軍在這些方面就比較差。

我當時因和許多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經常有接觸的機會，留有深刻的印象。現在依記憶

所及，將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陝蘇區，竄抵川西北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的經過作一概括的追述：

一九三五年一月，紅一方面軍竄抵川黔邊境徘徊於北起赤水河，南迄烏江邊的遵義地區，幾度企圖偷渡長江均告失敗，此時中共中央命令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嘉陵江，策應紅一方面軍北進。

紅四方面軍乃於二月初開始撤離以通江、南江和巴中為中心的川陝蘇區西進，於三月初在蒼溪強渡嘉陵江後，就以快速的行軍直奔天險的劍門關。

紅四方面軍在劍門關和國軍胡宗南部及川軍劉湘部展開了一場惡戰，雖然奪得了劍門關，但卻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紅四方面軍突破劍門關後，繼續西進，先後攻佔了劍閣、梓潼、彰明、中壩、平武等縣，接著渡過涪江，佔領北川、茂縣、汶川，再渡岷江，攻克理番縣，並於六月初旬，兵分佔領懋功，圍攻松潘，嗣於六月中旬和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於夾金山腳下的藏族聚居區大維。緊接著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後，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當前紅軍行動方向問題。同時特在兩河口佈置了一處寬闊的會場歡迎紅四方面軍領袖張國燾。

兩河口是一個有五十來家藏族的小山莊，四周群山環抱，古樹參天，但地勢傾斜，很難找出一塊幾十米寬的平地。經紅軍參謀人員周密的察勘，會場選定在東溪南岸一處稍大的山腳斜坡上。這裡不知名的雜木和荊棘叢生，亂石遍地，軍委調來工兵連伐木斬荊，拋石挖土，工作了數小時，佈置了一個頗為別致的會場。

左首高處佈置著主席台，下面是歡迎的隊伍列隊的地方。四周的樹幹上貼滿了紅紅綠綠

的標語。最惹人矚目是一塊橫掛的大紅綢，上寫著「歡迎紅四方面軍領袖張國燾同志」。

歡迎的隊伍整齊地開進會場了。每個人，每個隊伍都向右著，鵠立著，等待著被歡迎人的來臨。

可是，老天爺偏不作美，忽然大雨滂沱，一切的雨具都失去了作用，冰冷的雨水，濡溼了外衣，滲蝕到肌膚，霎時間大地茫茫一片。但歡迎的隊伍還是整齊地等待著。

不一會兒，東面山坡上隱約出現了幾匹馬，漸漸地走近來了。首先出現的是朱德，他緊緊握住了前來的人群中一個人的手，隨後便是大家蜂擁而上，混作一團。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只見許多手揮動著，好像小孩似的跳躍著。

「歡迎紅四方面軍的領袖！」

「歡迎張副主席！」

呼口號聲像暴雷般地響起。

暴雨又襲來了，雨聲，呼口號聲，軍樂聲，織成震耳欲聾的交響曲。

大會主席朱德致歡迎詞：

「同志們！我們在這裡熱烈的歡迎紅四方面軍的領袖、蘇維埃中央政府副主席張國燾同志……兩大主力紅軍的會合，不僅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的勝利，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勞苦群眾的勝利！」

在雨聲中朱德急速地講完了他那短短的介紹詞。

張國燾講話了：

「同志們！這裡有八年前我們在一起鬥爭的朱德總司令，更多的是從未見面的同志。多

年來我們雖然分隔在幾個地區鬥爭著，奮鬥著，但都只是為著一個基本目標——為著無產階級鬥爭的勝利！為著黨的戰略路線的勝利……川西北這個地區有著廣大的少數民族需要我們去幫助他們，解放他們。這裡有優越的地勢和有利條件，我們有著創造川康新根據地的很好的條件。……」

狂風暴雨，逼得說話者不能再繼續講下去了。隊伍開始移動，排列出漫長的人巷，讓紅軍首長們首先通過。軍樂聲、口號聲以及唱歌聲在咆哮的洪流中震盪著。

四 兩河口會議

緊接著歡迎大會之後，中共中央就於六月二十五日在兩河口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紅一、四方面軍主力會師後行動方向問題。在會議中張國燾提出以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問題，他對於遵義會議決議中，認為過去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論點提出反駁的意見。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提出遵義會議改組中共中央違反黨章規定，是不合法的，他強調中共中央應重行改選，並建議中共中央書記應由張國燾擔任，張、陳這些問題的提出立即引起會中一場劇烈的爭論，會後在紅一、四方面軍幹部與幹部之間激起了彼此猜疑，相互鬥爭，並由此導致中共領導階層內部之間，特別是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最後演成紅一、四方面軍在巴西和阿壩的分道揚鑣。這個問題，這個事件，當時任中共川陝甘邊區黨委書記、隨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行動的郭潛先生瞭解最清楚。現在根據郭先生對我所談有關兩河口會議時，毛張之間意見分歧各點概述如下：

(一) 關於當前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毛認為整個中國革命形勢正趨高潮中，因此他主張紅軍主力應當向北發展，與陝北劉志丹部會合，以便背靠外蒙，進而打通「國際路線」，爭取蘇聯的直接援助。而張卻認為當前革命形勢是在兩個高潮之間，因此他主張紅軍主力應立即南下，在川康邊境建立新的根據地，背靠西康，相機圖取成都平原^②。

(二) 關於遵義會議改組中共中央問題：張國燾認為政治局會議無權改組中央，是非法的，而毛澤東等人則認為在行軍作戰的緊急時期，這種變通辦法應該是被允許的，何況已派人向共產國際報備中。陳昌浩則強調中共中央應重行改選，並建議中共中央書記應由資歷深、功績大的張國燾出任。後經折衝協調，中共中央暫不重行改選，而增補紅四方面軍徐向前（原為候補中委）、王樹聲、傅鐘、周純全、李先念、李特、何畏、曾傳六等八人為中央委員^③。

(三) 關於過去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問題：張國燾認為江西「中央蘇區」的失敗不單純是軍事路線上的錯誤，而是中共中央整個政治路線錯誤的結果。他認為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是政治路線錯誤的總根源。毛澤東、張聞天等對此則提出反駁的意見。嗣經朱德建議以行軍作戰期間，暫緩討論此一空泛問題，商得雙方同意，留待以後再詳加研究^④。

(四) 會議結束後，紅一方面軍幹部對於紅四方面軍增補八名中委極表不滿，認為這無異是武力威脅的結果。張國燾想當中共中央總書記，更暴露其篡奪中央領導權的野心。而紅

② 引自郭華倫著《中共史論》第三冊五八頁。

③ 同註②。

④ 同註②。

四方面軍幹部則認為中共中央既然犯了路線錯誤，打了敗仗，而且進行非法改組中央，這樣的中央是不配領導全黨全軍的^⑤。

⑤同註②。

拾、在黑水、蘆花地區

六月中旬，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懋功與紅四方面軍一部會合後，即向卓克基、梭磨、馬塘、黑水、蘆花地區前進。此時，整個部隊面臨著飢餓的嚴重威脅，因而進行了籌措糧食的緊張工作。中共中央軍委在蘆花和毛兒蓋兩個地區，分別設立籌糧委員會領導這項工作。我和地方工作部的幾位夥伴，擔任了黑水、蘆花兩地的籌糧任務。我們於七月初抵達黑水、蘆花地區後，即進入緊張的籌糧工作中約達四十天之久。八月中旬，我們由蘆花出發，經蒼德、打鼓、拖羅崗、黑馬寺等地，約八月二十日左右抵達毛兒蓋。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舉行政治局會議，仍然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仍主張北進，打到陝甘邊區去，而張國燾則仍主張南下，佔領天全、蘆山、雅安等地，並重提兩河口會議尚未解決的問題。但張國燾的意見並沒有被毛澤東、張聞天等人所採納，會議決定按照毛澤東原來計畫，迅速通過草地，向陝甘邊境轉進。

一 卓克基

兩河口會議後，我隨紅三軍團先頭部隊向卓克基前進。從兩河口到卓克基，路程一百三十里，因為中間要爬一座九十里的大雪山——夢筆山，所以頭一天，我們只走了三十里，在夢筆山腳下的黃草坪宿營。第二天，我們從黃草坪出發，即攀登夢筆山。這座雪山雖然沒有夾金山那樣的陡峭，但從山腳下仰望它的氣勢，卻也十分不凡的。軍委的命令還說，必須在下午二時以前爬完，可見攀越此山並不簡單。我們已經有了攀越夾金山的經驗，所以除準備了一些抗寒的辣椒水和充足的乾糧之外，其餘什麼困難是不在乎了。

我們經過一陣艱苦的連爬帶滾的掙扎，終於翻過夢筆山，再走一段狹長幽邃的山谷便抵達卓克基。

卓克基位於小金川畔，群山環抱，澗碧崖青，兩河合流處，矗立著一座巍峨瑰麗的土司宮。

土司宮高達約十丈，寬約二十丈，全部建築係石塊砌成，遠遠望去，儼然像一座宏偉的洋式大樓。整個土司宮分為前後左右四大棟：前棟和左右兩棟為四層，後棟為六層。紅三軍團司令部和政治部都駐於此。當時，我和郭滴人為好奇心理所驅策，會對這座土司宮內部構造和陳設裝飾進行了仔細的觀察。現在雖隔幾十年，但尚依稀記得其概貌：

最下層：前棟是大廚房，內有巨大的鐵鍋數十口。左右兩棟的最下層是馬廄和下人的住室。

第二層：已記不大清楚，大概是一些藏兵的住室，以及收藏食品器具和被服的屋子。

第三層：美麗極了，因而它給我們的印象也最深。內部全是玻璃窗，用上材製造，有雕鏤的大門和木壁。右樓數室的陳設精美雅致異常，和壁相聯的架子，分成許多格，格內陳列一些玉如意、小玉佛像、磁佛像以及其他珍貴的古玩。有長方形的黑木，鑲以大理石和翡翠。有精緻的書桌和茶几，都是最好的木材製成的。這大概是土司的臥室。

左右兩棟是陳設相同的兩個大客廳。有木匠、桌、凳、壁飾等都很雅致。

第四層為大小不一的佛堂數間，裡面都是陳列著許多經典、特製的大銅鼓、大銅鐸等，壁上掛著許多佛幛，都是綢質的。有許多壁畫，因年久都薰黑了，看不大清楚。還有許多佛教圖畫很瑰麗，人物栩栩如生。

土司宮的旁邊建有一座碉樓，有五六層之高，各層都有砲眼。

藏人種的地都是土司的，要向土司納租，土司有什麼差事，都派遣番民去做，甚至土司宮門前守衛都由藏民輪值。番民見了土司就跪下，等他過去了才敢起來。

據有關川西北地區史地書籍記載，明末清初，大小金川地區的藏民，因常常出擾邊疆，滿清政府曾屢派大軍圍剿，並採取「以夷制夷」政策，調派歸順之藏民頭目協助滿清政府鎮壓叛亂。每於征服之後，對於有功者則分別擇險要關隘之戰略地點建築城垣，並劃附近之肥沃土地為其屯土，免收糧賦，且予以世襲之特權，使其守衛邊疆。民國以來，四川軍閥顧摩土司，有更加高明有效的一套。他們時常把各地土司請到成都、重慶，一住幾個月，住洋房、坐汽車、花天酒地，使其樂而忘返，漸漸就可以向土司統治的地方進行各種剝削。同時送他們一些洋槍，使他們更有力量鎮壓藏民的反抗。現任卓克基土司叫索觀瀛，據說曾在成都大學讀過書，我們在他的臥室的書架上發現《三國演義》、《水滸》以及許多歷史書籍，可見

此人已有相當的漢化。

二 藏民的生活

由於工作上需要，我對當時黑水、蘆花地區藏民的生活風俗習慣進行過一番的調查，先從藏民的住屋說起。

一般藏民住屋多係二層建築，外表頗像西式房子，牆壁多為石塊砌成、厚三四尺。屋頂蓋以泥瓦或石板，作為曝曬糧食之用。其下層為牲畜廄舍，屎尿狼藉。樓上間隔，有臥房和廚房。殷富之戶，則住三層樓房。下層仍為牲畜廄舍，二樓為住家，三樓則係佛堂，打掃得很乾淨，裝飾、陳設都很精緻。但這種建築，即使蘆花城這個比較富庶的地方，仍不多見。

一般住屋的門窗多係木製，惟窗小且少，空氣、陽光都不夠。屋頂的晒房則四面空曠，可以遠望。因此若遇戰爭，即可由高處射擊。富裕的藏民，則多在屋傍建一碉樓，用石塊砌成，以木材為樓梯，有高至幾丈者，每層均有砲眼，甚為莊嚴而矚目。

藏民的飲食，因氣候關係，大都以玉蜀黍為主，小麥、青稞麥為副，蔬菜則以洋芋、蘿蔔、四季豆、豌豆等為主，其生活非常簡單。

藏民的食物中，有一種叫粘粑，是用玉蜀黍或青稞麥炒熟，磨成細粉，再用酥油調和者，味道很不錯。藏民在村落的溪邊大都有水磨，家中也多有手磨，不過只是兩片光石，沒有齒。可是他們磨出的麥粉，卻細得和洋麵粉一樣。我們來到時，水磨大多被藏民臨走時毀壞了，只能用手磨，部隊這麼龐大，就連粗磨也來不及。因此，我們只好將一粒一粒的青稞麥煮熟

就吃。

藏民的婚姻，與大涼山之夷民，大異其趣。婚娶的聘禮，據說按歲計銀，大致一歲一兩銀。迎娶時，男家除了聘金外，另送女家幾十斤酒和幾斗糧食。女家則賠送床被全套及女衣幾件。婚禮完畢後，女則返娘家住月餘，再返婆家，住二三日則又返娘家，直至生子後始返婆家長住。

藏民之服裝更為特殊，男女均不穿褲。男子普通皆戴氈帽或皮帽，不穿襪，穿革履，靴腰甚長，邊綴有藍布筒，約五寸長，以便捆綁。上身多穿深紅色披衣，無紐扣，僅以帶束於腰。其披衣普通比本身還長，夜間則解開兼作被。平時多袒右臂，工作發熱時，則袒雙臂，而裸其上身。腰帶上常繫刀、劍、火石等。男子亦喜穿耳，耳環大多為銀製品，有的在耳環下更加一墜子。女子至十幾歲時才蓄髮，成年女子皆梳成大辮盤纏於頭上，一般都戴大盤帽，緣邊綴以小珊瑚珠。身上多穿紅色長衫，外罩鑲以各色花邊的長袍。袒右臂，腰繫紅帶，不穿褲，不穿襪，足著長靴，這是比較富裕者，貧者都打赤足。

據通司說，藏民多信喇嘛教，有紅教、黃教之分，這一帶藏民信的是紅教，其所供之神及所繪的壁像皆極可畏，處處顯示其魔神之森嚴以驚世人。信奉紅教者禁婚娶和飲酒。黃教則以釋迦牟尼佛為宗，教人向善，普渡衆生，為世人贖免其生前死後之罪者，黃教除禁婚娶及飲酒之外，還禁詛咒邪術。

藏民之語言，因地勢或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其文字亦與藏文相同，有字母三十個，寫法橫行，自左而右，藏民當中除信喇嘛教人寺院習經文外，一般識字者甚少。

黑水蘆花地區的藏民，在原始時代皆為家族部落制度。至元明兩朝，由於採取羈縻政策，

對歸順之首領均酌量頒給土司、頭人、寨首及鄉約等職，並在各軍事要地，採屯田制度，設所謂「土守備」、「千總」或「把總」等職，以管理其屯兵或老百姓，普通對老百姓墾種有土糧；對各種土職有土餉，民國以來，對土餉土糧之支收業已廢除，但對土官、土司之繼承亦多形停頓，惟他們多擅自承襲，繼續執行，形同「獨立王國」。

我們——紅三軍團政治部部分人員住在蘆花城達四十天之久，這是西進行軍中停留最久的地方。蘆花是一個擁有三百多家藏民的大寨子，四面環山，看起來好像是城垣，也許這就是被稱為蘆花城的緣故。它的周圍有十幾個小村落。蘆花因地勢傾斜，所有的建築皆成高矮不一的階級式的樓房，遠遠望去，好似是一棟一棟的西式樓房，很是瑰麗。我們地方工作部住的是一棟三層樓房，有一根大木材，刻成一級一級做樓梯，上樓時拾級而上。我和歐陽武住二樓，不過我們在外面的日子多，住的日子少。我們經常率領著十幾個藏民運輸隊到維吾、以念、瓦布梁子等地去割麥子，有時出發去運糧。

這個時候，整個紅軍部隊的中心任務就是籌糧。司令部除了擔任維護交通，隨時對付藏民的襲擊之外，還要抽出一部分戰鬥員去進行割麥、打麥和晒麥的工作。後勤部主要擔任搜集皮革、羊毛及毛織品等，準備過草地用的物資和熬鹽的工作。政治部除了負責對藏民的宣傳和安撫工作之外，每個人還要參加割麥，籌足十五斤糧食。

三 割麥的鬥爭

按照軍委規定，每個指戰員——從高級指揮員到一般戰鬥員都要籌足十五斤糧食，每個

人都要參加割麥工作，大有「不參加割麥不得食」之勢。為了達成十五斤糧食的任務，部隊抵達蘆花城的第二天早晨，我和歐陽武率領著由幾十個戰鬥員組成的割麥隊，從蘆花出發，沿黑水河而上，走了二三十里，到了一個有一百來家的大村落。周圍滿山坡都是綠油油的青稞麥。但令人失望的是麥穗還是青青的，到成熟至少還要個把半月。我們豈能挨餓等死亡，靜待麥子成熟？怎麼辦呢？前面部隊已經發明了一種法子，就是把那已屆飽滿的麥穗割下來，放在火上焙烤，再耐心地採搓，簸揚，這樣可以得到一堆混雜著麥稈和糠粃的青稞麥。在開始時，因為不熟練，火候不到，麥拉則採不下來；焙烤過久，麥粒就枯焦了。還有，採搓時用力小，麥粒不脫，用力過大則把麥粒弄扁了，漿子流出，只剩了一點糠粃。因為有這樣的麻煩，所以一個人盡了一天工夫，也只能得一兩斤。

頭一天，我們只能找到一家比較大的房屋住下，準備在這裡苦鬥幾天。次日我們就開始動作起來。到麥田裡割的割，打的打，篩的篩，簸的簸，大家忙作一團。這還不打緊，最困難的是這裡沒有水，要到幾里路的山腳下去挑。由於割麥，出力流汗，一天下來，衣服總是濕淋淋的，挑水回來洗澡太費勁，只有下山去洗澡兼洗洗衣服。就這樣，我們在這裡搞了幾天，大家弄得筋疲力竭。每天吃的是一粒粒的青稞麥煮的飯，加一點酥油和鹽巴。吃起來滿口是芒刺似的，實在很難嚼，但這卻是我們唯一的「續命湯」哩。有時我們到麥田裡採些豌豆苗或蘿蔔葉回來當菜吃。但這些東西，初吃時，總覺得比没有的好，但天天吃起來就不是味了。

割麥的艱苦，生活的煎熬，逼使我們「異想天開」，想奇蹟出現！不知道從何處傳來一種「竅門」，一種叫做「找窯」的祕訣。這一「竅門」的傳佈，竟使最敏感的歐陽武高興得

跳起來。究竟「找窯」是什麼一回事呢？據通司說，藏民地區部落與部落之間常發生械鬥或戰爭。藏民多預先把糧食、炊具以及其他貴重物品，秘密地埋藏在窯洞或密室裡。只憑通司說出的這一線索，大家就冒冒失失地從每一家房屋的樓上樓下，屋前屋後，草堆裡、牛欄中、神龕下，到處都找遍了，但是毫無結果。突然歐陽武在牛欄內叫喊起來了，他好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高興得直跳。當我點燃火把去看時，果然發現牛欄內有一用石頭砌成的牆是新的，上面糊的泥巴是濕的，走到外面看，牛欄外牆很大，但裡面空間並不大。這就是裡面有「寶藏」的證據。我們把那新牆拆開，走進去一看，幾口大鐵鍋盛著小麥、雪白的麵粉、玉蜀黍、南瓜、黃豆、豆角、紅辣椒、酥油、青稞麥酒，還有銅器、佛像等等。這顯然是紅軍到時，藏民把家裡的糧食和貴重的物資埋藏起來，然後舉家逃亡。

我們憑著這一竅門，還相繼發現了好幾處「密窯」，獲得不少糧食和其他物資。這一大發現，使我們在這裡過著幾天好日子，我們割麥的任務也就提前完成了。

四 宣撫與運糧

我們剛把割麥、籌糧工作告一段落，新的任務又來了。

一天，我和歐陽武率領著十幾個藏族青年和一班士兵，從蘆花城出發到附近各村落去做宣撫工作。我們見到的只是一些老太婆、老頭子和小孩子。年輕力壯的藏民都逃匿在深山老林裡，有時他們乘機下來騷擾。為了爭取藏民，我們在各處貼出「保護藏民」佈告，對於凡是回家的藏民，每家都發給「保護證」，使他們安心生活和勞作，並在他們的田地裡插一塊

「保護牌」，責令一切部隊不得任意侵犯。經過我們一連幾天努力爭取，回來的藏民逐漸增加起來，我們便加緊與他們聯繫，爭取更多的藏民回來。據通司說，跟土司逃走的一批藏民，因已和地方上的民團勾結，都不敢回家。而一部分藏民因他們的農作物已被紅軍沒收或割完，他們也就堅決表示不願意回來。其實，紅軍初到時，由於飢餓的威脅，不管是「地主」的或是「反動派」的，只要看見麥子成熟（天曉得熟不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動手割麥。那裡還顧到什麼「少數民族政策」？

其實，當時中共這種作法是極為虛偽的，因為按照當時情形，那個地區地廣人稀，地是「誰種誰收」，並沒有「地主」與「佃農」之分。那時中共把逃走的藏民一概當作「反動地主」，把他們的財產和農作物一律沒收，那真是最荒唐的劫掠。

一天，我和歐陽武還是率領那十幾個藏族青年和一班武裝，由蘆花出發到波羅子去運糧。波羅子在松潘東北，沿黑水河東去，只有三天路程。黑水河兩岸都是危崖峻嶺，河灘上盡是怪石嶙峋，淙淙的河水在亂石中沖擊，浪花四濺，訇然地響徹山谷的水聲，震耳欲聾。我們總是沿著河邊狹而險峻的道路走，都是傍山作路，有些地方簡直沒有路。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走的叫做棧道，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走的道路。所謂棧道，是在危崖的山邊，借用著崖下木椿之力，另用人工打好了的石孔，架以一根橫的木棍，上面鋪著木板或木條，彷彿一座漫長的橋樑一樣，走起來搖搖晃晃的，人們必須小心翼翼地走著。有時遇到川軍或土司派出的藏民從對岸密林裡向棧道這邊放冷槍，或從山上滾下石頭來，轉瞬間就有死神臨頭的危險。我們發現了被藏民殺害的紅軍士兵，遺體橫臥在棧道下面，感慨不已。

第二天繼續前進。中午時分到達一個大村落，十一團司令部駐此。我們就在這裡休息。

不多久，從對面四五百米遠的高山上發出一陣陣「呼呼」的呼聲，原來是藏民的襲擊，來勢兇猛。一座藏民房屋頂上架起了重機關槍，做了十一團的指揮陣地。對面山崗上的藏民號呼一陣，這邊機關槍就以「格、格、格」的響聲回答。我和歐陽武爬上藏民的屋頂觀戰，這邊的機槍一響，那邊就「嘩啦嘩啦」叫個不停。有些已經下山來了，這邊就拋丟手榴彈，他們就飛快地退走了。停一會兒，又是「號呼、號呼」的狂叫一陣，這邊機關槍一響，他們又退回去。這樣反覆幾次，才把他們打退，當天我們就住在十一團司令部。第三天，我們繼續前進，翻過了一座高山，大約走了八十里才到達波羅子。

波羅子，是坐落在黑水河邊的一個擁有三百多家藏民的大部落。附近有幾十家、百來家大大小小的村落圍繞著它。有些小店都開了門，當天晚上我們住在紅三軍團供給部。軍委籌糧委員會的分支機構——糧站，也在這裡。有一團的武裝駐紮著，維護這個地區的交通線。紅三軍團供給部在河邊沙灘上熬鹽，據說每天可以熬出七八斤鹽，勉強足供部隊食用。

我們在波羅子休息了一天，將運回的糧食捆包妥當，第二天早晨又沿黑水河走原來的路線返蘆花城。

五 準備過草地

八月中旬，我跟紅三軍團先頭部隊從蘆花出發，經三天抵達毛兒蓋，我們在這裡有幾天的休息，整理行裝，準備乾糧，向草地前進。

毛兒蓋在松潘西北，是個有四百多家藏民的大部落。中共中央在這裡又召集了一次政治

局擴大會議。議題仍然是當前紅軍的戰略方針問題。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兩河口會議的延續。兩河口會議爭論的問題，在毛兒蓋會議上展開了更劇烈的爭執與鬥爭。爭論的焦點是：毛澤東主張北進到陝甘邊區去。張國燾則主張在川康邊開創新的根據地。會議採納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先走過草地，擺脫國軍的包圍和追擊。

毛兒蓋會議決定整個紅一、四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軍，右路軍包括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和三十軍；由徐向前指揮；左路軍包括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以及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和九軍團，由張國燾率領，朱德、劉伯承等隨行。

八月二十三日，由紅一方面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一部組成的第一梯隊從毛兒蓋出發之後，即由紅三軍團接防。

我們住在一座相當大的藏民樓房的三樓上，從屋頂可以俯瞰毛兒蓋全景。這裡的藏民房屋大致和黑水、蘆花地區相同，不過我發現少數房屋院內，插有一根一兩丈高的旗桿，旗桿上一塊長方形的白布，上面書寫著經文（藏文），據說這是表示這一家有喇嘛出家「以經傳子」之意。

我們在毛兒蓋，只有四五天的時間可進行過草地的各種準備。這幾天毛兒蓋的天氣是陰淒淒的，綿延的細雨下個不停，真是討厭，不過現在不必再為那些割麥、打麥、晒麥等勞作而操心，我們可以從容地準備著。我們幾個夥伴——我、郭滴人、羅梓銘、歐陽武，大家合作，首先找到一個手磨，先把十五斤青稞麥倒出一部分，磨成細粉，調以少許的水和酥油，烘成幾十個三四兩重的乾餅，又將其餘的青稞麥炒熟。我們夜以繼日輪流做。「公家」還發給我們每人一塊咖啡色的毛織料子，自己縫製大衣。歐陽武對針線比較內行，我便和他換工，

他為我縫製大衣，我為他烘餅、炒麥子。

最初據說過草地要十五天，所以我們一切的準備都是按照十五天計算的。但後來又聽說只要七八天就可過完。草地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怎樣的過法？當時我們對此不免有些惶恐。

歐陽武以一天多的時間把兩件大衣製成了。所謂「大衣」，其實很像是日本的「和服」，又好像是和尚的袈裟。穿起來寬寬大大的，夜晚還可當被子蓋。歐陽武是江西人，小學畢業後當學徒。一九二九年春紅軍下井岡山，在江西南部開展游擊戰爭時，他參加了紅一軍團的隊伍。最初在團政治處當文書，後升任連指導員。紅軍西竄時調到紅三軍團某師政治部工作。遵義會議後，紅軍部隊整編，他被調到軍團政治部工作。紅軍渡烏江後進入大涼山夷民地區，他才調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他是在紅軍中長大的，身體很結實，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寬闊的下顎和厚厚的嘴唇，講話時總是眼睛眨一眨的。他剃著光頭，穿上那件新製的毛大衣，看起來真像個小和尚，他是個回族，不吃豬肉的，部隊中打牙祭吃豬肉時，他總是避而不吃，而吃蔬菜。因他自己是個少數民族的緣故，所以對於爭取少數民族工作很有耐心。來到紅三軍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後，他一直擔任著少數民族的爭取工作，在大涼山夷民地區時，他帶領著十幾個夷族青年進行宣撫。進入藏民地區後，他又帶領著十幾個番民擔任運糧工作。這次從蘆花來到毛兒蓋，由於他的努力爭取，運糧隊伍中的四個夷族青年，參加了紅軍，都由他帶在身邊，隨時可予以照顧和教育。

拾壹、從毛兒蓋到巴西

毛兒蓋會議後，由紅一方面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一部組成的第一梯隊，於八月下旬從毛兒蓋出發，向著松潘西北千里茫茫、人跡罕至的草地前進了。

草地，到當時（一九三五年）為止，一直是世界地理學者的一個謎，找不出可以註明這一塊神秘地區的地文地圖。我在毛兒蓋時，曾與通司及幾個藏族青年攀談，看能否在與他們反覆的談話中，獲得一些有關草地情況的資料，結果大失所望，他們對於草地的知識也僅限於道聽塗說的不可靠的傳聞。

此時，國軍胡宗南部已在松潘地區的潭臘、龍虎關、包坐一帶集結了四個師；東面的川軍已佔領了整個岷江東岸，一部已佔領了岷江西岸的雜谷腦；劉文輝則已陷懋功，並向撫邊逼進。情急矣！向草地進軍刻不容緩。毛澤東派了林彪麾下的一位悍將楊成武率領一個加強團，作為進軍草地的開路先鋒。楊成武請來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藏族通司作嚮導，憑著唯一的法寶——指北針，向著濃霧濛濛、方向莫辨的草地前進。

紅軍先遣部隊經六天的路程，抵達包坐西面的班佑。此時，紅軍的搜索隊湊巧碰上了來

自駐防包坐的國軍偵察隊。似乎是他們有意的接引，卻把紅軍帶到包坐以北的阿西，從而為紅軍尋出了進入甘肅南部的新途徑，而不必按照原來預定由班佑北進的十五天草地行程。

一 第一夜

我們從毛兒蓋出發了。第一天向北走，一開始便向著通往松潘的大路前進，約走廿里抵達七星橋。路的左邊有五、六十間矮小的「牛房」，據說是游牧藏人屯牛的所在。牆壁是用小木條隔成許多格子，格子內塗以調牛糞的泥巴，成黝黑色，不甚堅厚，屋頂是平的，也是用牛糞塗抹的。

走過「牛房」後，即轉向西北進入山谷中。這裡有一片樹林。按照出發命令規定，我們就在這裡撿些乾柴枝。作為途中燒開水之用，還砍一支木棍作架棚子之用，大家都按照規定做了。每個紅軍士兵身上，除了武器背包之外，還有十五斤乾糧，現在又增加了一捆柴火，逼使原來已經疲乏到了極點的紅軍士兵有點吃不消了。但草地上飢寒交迫的威脅，逼著紅軍士兵只有忍從、再忍從，揹柴火繼續前進。

草地天氣一日三變，早晨濃霧濛濛，天昏地暗，伸手不見五指；中午時分，天空豁然開朗，從輕雲裡射下柔弱的陽光。到了午後，烏雲密佈，氣溫驟降，不一時狂風四起，大雨滂沱。此時，因大家的雨具已破舊不堪，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戴著斗笠，勉強可以抵禦，大部分士兵都被那碎石似的冰雹驅入樹林中去了。

暴風雨、冰雹過後，河裡的水暴漲了，河水異常的冰冷，刺入肌膚，非常難受。

五時許，到了一處有稀疏樹林的河壩，叫做臘子塘，我們就在此宿營——其實是露營。有好些現成的棚子是用樹枝搭成的。這是前面先遣部隊留給後續部隊用的，已被捷足先登的人們佔去了。我和郭滴人、歐陽武，七亂八忙的，用帶來的木棍和樹枝做支柱，先把棚子的骨架搭起來，然後打開油布、雨傘以及被單蓋在上面，棚子就搭成了，勉強可擋風避雨，「住」的問題算解決了。吃的問題怎樣呢？從七星橋帶來的柴火，雖然全給雨水打混了，但還不致失望，我們好不容易把馬背上的柴火取下來，架在濕柴枝上面，點燃了它，費了半天工夫才燒開了一臉盆開水，每人分了一口杯；很節省地用它嚙下乾餅或炒青稞麥，解除了飢餓的威脅。我們把背包放在乾柴之上，當作椅子坐著睡覺。但老天爺偏不作美，驟然間傾盆大雨從天而降，樹棚、油布、雨傘等工具全失去作用，雨水淋在背上，把衣服打濕了，全身冰冷得一直發抖。雨徹夜未停。這樣，頭上是綿延不斷的雨水，下面是兩腳泡在污爛泥淖裡，我們三人，不，所有在這裡的人，只是背靠著背，坐在背包上面，半醒不睡地坐著、坐著，熬過了草地的第一夜。

二分水嶺

次日，拂曉時分，在集合號音中，大家揉一揉睡眼，舉起疲乏痠重的兩腿，向著無垠的澤國進發，沿途不知越過了多少錯綜複雜的溪流。除了遠處還可看見矮山和小樹之外，腳下所踩的全是綠茸茸的水草，水草下面是深黑的污水爛泥。腳踩在水草上，異常滑溜，踩下去搖搖晃晃，非常難走。

走了約四十里，發現前面有一片叢林濃蔭的山坡上冒出了一縷縷的炊煙，顯然是先頭部隊在那裡宿營了。我們再走約十里，攀登一處山背上。從此開始，我們就在山坡上行軍。剛轉了一個山頭，又是一個山頭，好像是有無數的山頭擋住我們的去路。這就是世界上的地形學者以及地質學者尚未研究清楚、但已做了假設的長江與黃河的分水嶺地帶。

所謂分水嶺的形象，依我當時直觀的感覺是這樣的：我們從毛兒蓋出發以來所涉過的河流，是由東南趨南而下，分別流入岷江，並由此至宜賓匯合為長江。過此分水嶺以北，各河流則由北趨南而下，在瑪曲匯合流入黃河。

當我們行至山坡俯瞰時，極目力所及是一片廣闊蒼茫的草地。草地的實質是什麼呢？它是從川康高原，以及青藏高原大雪山融化後流下來，經過各河流分別流入那廣漠的草地，氾濫成為一片汪洋的水域。

下午，繼續前進，仍然是一望無際的水草和泥潭。但由於地面比較平坦，河流不能趨直而下，於是便隨著水勢沖刷出一條條彎彎曲曲的水道，看起來十分綺麗，在綠茵茵的草原上像一條條彩虹扯成「之」字形圖案。

涉過這一段水勢複雜、河流交錯的水道淺澗之後，我們就踏進真正的草地了。所看到的盡是綠茸茸的水草。所謂「路」卻是浸在污濁的水裡，地下是多年的腐枝爛葉。土質異常鬆軟，一插足至少陷半尺深，有的簡直是無底的泥潭，人馬一陷入，愈掙扎愈往下沉，假若沒有別人援救，永遠爬不起來。

大家都懷著一份如履薄冰的心情，踏前面的人的腳跡前進。每一步都得慎重地舉起，慎重地踏下，一不小心，一步踩錯，就有可能陷在泥淖中，要費很大勁兒才拔得出來。

黃昏時到達宿營地，我們被指定在河邊露營。我和郭滴人、歐陽武仍舊通力合作，找一塊比較乾燥的地方，用木棍做支柱，上面蓋油布，四面用被單圍著，搭成一個棚子，裡面分三堆，用樹枝疊成，使之與地面污水隔絕，上面放自己的背包做坐墊，中間燒一堆柴火，一面烘乾淋濕了的衣服，一面燒開水。費了好大的勁才燒開了幾杯開水，沖泡青稞麥粉，制止了飢腸的告急。

正在欲睡未睡，迷迷糊糊中，忽然聽到後面傳來頻仍的槍響，據說是松潘反動派指使的藏族騎兵來襲擊。因紅軍時刻準備著應付敵人突然襲擊，所以很快就將藏族騎兵打退了。原來紅軍開始向草地行進時，很快就被松潘的國軍發覺了，他們除了集結主力在阿壩（松潘西北）堵截外，還派出無數的藏族騎兵沿途襲擊。

三 后河

第三天早晨，出發命令說，今天要進入海拔四、五千尺的奇寒地帶——真正的草地，要求每個人自帶一捆柴火。雖然大家都像剛從病床爬起來的病人一樣，而且身上本來已經背著十幾斤乾糧和全副的裝備。但一想起數十里行軍之後，得不到一杯開水潤喉的痛苦，就不得不執行命令。我們把昨夜架起做椅墊的樹枝撿起來，分成幾捆各自背著，準備到宿營地時當燃料。

跨過一段漫長的、全是綠茸茸的水草之後，一條大河橫在我們的面前。這一條叫做「后河」的河流，雖然只有五、六丈寬，但卻有三、四尺深，河流湍急而冰冷，河岸上站著黑壓

壓的人群，大家只好把綁帶解下來，結成一股粗大的繩子。又把衣服脫下，體力強的幫助體弱的，荷負他們的背包。一個個手拉著繩子，有秩序地渡過去。有的十來個人手挽著手，形成一個「集團」，這樣一來抗拒力強了，可免被沖走。有些人，這多半是小鬼們或馬伕，三兩個人拉緊馬尾巴被帶過去。我和郭滴人、歐陽武是由一匹孱弱疲瘦的老馬負過了河的。因為還有許多年老體弱的戰士尚未過來，這匹老馬還得辛苦的來回負人渡河。為著等馬，我們在河邊停留了一個多小時。親眼看見幾個戰士因體力不支，被水流沖倒，掙扎不起來，搭救又來不及，竟被捲走了。

過河之後，部隊沿河邊向水草叢裡前進。水草是一叢一叢長在水中，草叢與草叢之間，就是很深的污水，發出令人嘔心的霉臭。我們都小心地踩在草叢上，腳底下卻是軟綿綿的，有點滑，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前進。

下午，部隊到了一處有稀疏矮樹的小山邊停下來，站著休息，從乾糧袋裡倒出炒麥子來嚼：走了一會兒，天又變了。那陰沉沉的天空，忽然被深黑的濃雲全遮住了。一剎那間大雨傾盆而瀉。我們長期在風雨中過慣了的人，對於來自天上的狂風暴雨並不覺得有所畏縮，但對於腳下浮動著的一叢一叢的水草卻是苦於應付。我們搖搖晃晃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路腐污的泥土浸滿了黝黑的污水，沒有草根的地方，腳陷下去，直沒過膝蓋，馬匹經過處，即埋沒了四蹄，有的陷下去，就掙扎不出來了。

由於長期行軍，給養不繼，士兵們的體力一天一天地下降，有的士兵在冰凍的雪山倒下；有的在藏民地區敵不過飢餓的威脅倒下去；現在茫茫的草地又把許多紅軍士兵吞噬了。這兩天來，我先後看過好些紅軍士兵因體力不支倒下去。我和郭滴人正懷著惶恐不安的

心情，談論著這些在部隊中不斷地發生的嚴重問題時，忽然「嘩啦」一響，又是一個戰士倒卧在水草泥潭裡了。旁邊的一個士兵很快地把他扶起來，把那枝「漢陽造」的步槍背起。

倒下去的士兵臉色蒼白，消瘦得不成樣子，他顫動著灰白的嘴唇，無氣力地說：

「我不行了。你們走吧！」

「不，同志！堅強起來，我們一定把你帶走！」

「不行了……！」這是他最後的話語。

士兵們把他那支步槍卸下來，把他的乾糧袋解下來，裡面什麼也沒有了，顯然他是被飢餓逼死的。

四 色既壩

今天——過草地的第四天，出發的命令說，今天的宿營地是色既壩。所謂色既壩，地處三叉路口，右邊可通松潘，左邊通往班佑；再向北走就是青海邊的阿壩了。據嚮導說，所謂色既壩為松潘到阿壩的主要商道之一，它是從東南面的山口穿出，同我們的來路合攏起來，形成為一橫四十餘里，縱長約百餘里的大壩。我們今天走的一段約四十里。這一段地勢很平坦，滿地鋪著綠茸茸的野草，一望無際。

這塊地方的特色是乾燥，沒有泥淖。幾天來我們兩隻腳都泡在水裡，現在走這樣乾燥的路，大家都感到格外的舒適，兩腿特別輕快，行軍速度也就增加了。

據嚮導說，色既壩是出草地的主要商道，春夏兩季，來往的商隊比較多。因此路形在人、

畜長期蹂躪之下，在叢草中，逐漸地、自然地形成為幾尺寬的乾燥的路面，無數條並列著，好像幾條白帶一樣地直伸向西北望不盡的平原去。紅軍士兵們走到此地，那三天以來的愁眉苦臉，也就頓時舒展。那群天真活潑的宣傳隊小鬼們，又站在路邊，唱起「同志們，快快拿著槍」的歌兒來。他們高聲叫喊：

「同志們！我們快要走出草地了。勇敢向前進啊！」

我們已經走了四天，三夜露營，白天，腳始終泡在爛污的泥淖裡，夜晚說不上有什麼睡眠，尤其是無時不在飢餓中掙扎，臉上是可怕的蒼白，身上是濕淋淋的衣服，背上是不堪荷負的重擔。眼睛凹下去了，大家只有一個心，迫切地期待著趕快達到草地的終站——班佑。

下午，幾天來未曾露面的太陽，竟然從雲際中射出了微弱的光線，但它對於紅軍士兵沉悶、憂慮、惶惶不安的心情，並不會有什麼改變。

我們在一個小山坡的平壩子宿營了。附近挖了許多像戰壕樣的土坑，是前面部隊挖的。這種土坑，既可作戰壕，以防備藏族騎兵的襲擊，又可作為睡覺的地方，只要用油布往上面一蓋，便是很好的睡處了。我們到達時，那些土坑，已由一部分戰鬥部隊駐進去，大部份隊伍還是搭棚子過夜。

今天我們睡覺的地方也很特別，三軍團政治部全部，一百多人都擠在一個傘式的帳篷裡。炊事班則另外搭棚，炊事班今天特別為了我們燒了開水吃乾糧，而且還供給熱水給大家洗了腳。幾天來腳一直泡在污水裡，怪不舒服的。現在有了熱水洗腳，晚上可以舒舒服服的睡覺。

老天爺太刻薄，半夜又下起雨來了。雨水隨著帳篷浸入帳篷內，睡在邊沿的人只好捲起

卧具坐著。慢慢地水勢擴大，又一批人不能睡了。於是大家乾脆不睡，起來坐著，等待天亮。

五 到班佑

第五天，天一亮，預備號、出發號接連響起。我們就向目的地——班佑前進。出發時，我以為仍是跟昨天一樣走平壩路。大約走了一個鐘頭，情況起變化，忽然大雨傾盆而瀉。隨著河水也漲了，隊伍繼續前進，本來是乾燥的路，越走越不對勁，不一會又變成泥濘路了。所以走了大半天，才走了四十里。

大家都向班佑那邊瞭望，看看有沒有房屋可住？人是多麼的渴念著安定的住處啊！但大家的幻想終於被現實衝破了。遠遠地看到前面隊伍在前面有許多樹棚的地方宿營，這使我們大失所望。接著我們也就跟著開進附近小森林的地方宿營了。露營要搭棚子。但所有的樹枝都被折光了，連燒飯都成了問題。我們只有跟以前一樣，用雨傘、油布、被單，以及隨身帶來的木棍等等，把棚子搭起來。我和郭滴人、歐陽武三人擁擠在一個「棚子」裡，不一會也就睡著了。

第六天，天亮出發：雖然明知班佑只有百來間「牛屎房」，但大家還是那樣的嚮往。幾天來，我們都是搭棚子露營，其實差不多天天都下雨。再走了十多里，看見前面遠遠的地方冒起火煙，那兒是不是班佑呢？大家的腳步似乎顯得更有勁。雖然一連涉過兩條河流，水雖不深，但卻很冷。

不過，草地的神祕、恐怖的感覺，已逐漸消除了。路邊已有石頭、小矮樹，也有小山。

可是剛到了一個山口，轉了一個彎，又是一個小山，真是奇妙！路越走越是廣闊。路邊長著綠油油的野草，也有許多不知名的野花。還有些人發現了野菜。大家的炒麥子差不多吃光了，一看到一種金黃色的小野果，有黃豆那麼大粒，每穗都結著，可以吃，於是大家都採來吃，雖然有點酸味，但總比吃樹葉、吃牛皮強得多。因為競相找野果吃。隊伍有點亂了。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忽然有人尖銳的喊聲：「看見牛屎房了！」「班佑到了！」多麼響亮的叫聲啊！大家都跳躍著、歡騰著。班佑的特色，就是有百來間「牛屎房」，並不臭，是可以住人的。我們從毛兒蓋出發那天，在七星橋曾看過許多「牛屎房」，只是沒有進去住，今天我們可就要經歷一番「牛屎房」的風味了。

真是湊巧，我在一間牛屎房裡，竟然又碰上許久不見的畢士狄。他過金沙江後即調任軍委幹部團參謀長。現在他率領幹部團一部在班佑執行警戒任務。他說他的部隊昨天還和藏族騎兵打了一仗。現在他已經把警戒任務交給了紅三軍團先遣部隊，馬上就要離開班佑趕到阿西去。

阿西由此東去二十里，那邊有好多房屋、糧食也多。有一座大喇嘛寺，可容納四、五千人，畢士狄的特務員正在為他整理行裝。不待我開口，他就叫特務員把馬鞍上的乾糧袋取下來，把所有剩下的乾糧全部倒出來給我。他知道我們正在鬧饑荒。畢士狄走了，我回到我們的住處，郭滴人、歐陽武早已燒好了開水，我把畢士狄送給我的乾糧拿出來，分享大家飽餐一頓。

六 分道揚鑣

當我們從班佑各個角落的「牛屎房」出來，將要出發到巴西（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駐此）時，在路邊「牛屎房」旁插著一塊木板，上面寫著幾行十分具有誘惑性的文字：

「今天的宿營地巴西，只有五十里，有房子住，糧食也多，同志們！快速前進！」

大家很高興，都把昨天採來的野蔥、野果丟棄於地，一心想到巴西去飽餐一頓。

走了約二十里，一條河橫在我們面前，水流湍急，中間一段架了木橋，走起來搖搖晃晃的好像坐舢板一般。頭尾兩段水淺，卻是稀疏地排列著大石頭，讓人們一步一步地踩過去。只能一個挨一個過去，身體虧弱的，在石頭上站不穩的便跌到河裡去。雖然有人幫助將他拉上來，但畢竟要耽誤一些時間，我們到下午二時許才到達巴西。

巴西，在中共的歷史上是個不堪回首的不祥之地。原因是毛澤東和張國燾就是在這裡分道揚鑣的。毛兒蓋會議時曾決定整個紅一、四方面軍分成左右兩路北進，分別由徐向前和張國燾率領。右路軍穿過草地，抵達班佑後即轉巴西，但毛澤東卻突於九月二日晨，就指令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及軍委縱隊，從巴西出發向北轉進，臨走沒有通知駐在巴西、阿西地區的徐向前及其率領下的紅四軍和紅三十軍。毛澤東這種行動形同逃跑，等於鬧分裂。在紅四方面軍廣大幹部中引起疑惑和不滿。

紅一方面軍殘部由巴西向北轉進時，毛澤東把他所率領的部隊改編成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支隊司令員，毛澤東自任政委，下轄三個縱隊：第一縱隊由紅一軍團改編，林彪任司令員；第二縱隊由紅三軍團改編，司令員由彭德懷兼，軍委縱隊改編為第三縱隊，

由葉劍英指揮。毛澤東這一舉措，一方面是為了隱蔽自己，一方面是欺騙國軍，使國軍集中兵力對付紅四方面軍，消滅張國燾的力量，他這一詭譎手段果然獲致成效，後來事實證明，紅軍分裂後，國軍確實集中兵力對付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這就使得毛澤東贏得時間，從容地翻過岷山，抵達甘南。

拾貳、從甘南到陝北

陝甘支隊走出草地之後，即沿白龍江前進。九月中旬突破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脫離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地區，進入了甘肅南部的大草灘、哈達鋪。

此時，國軍集結了二、三十萬大軍，準備在渭河堵截。紅軍在哈達鋪休息兩天，佯作向天水行進狀，誘使國軍將主力集中天水，紅軍卻以急行軍自武山、漳縣之間渡過渭河，相繼佔領回民聚居的榜羅鎮和通渭城。

紅軍在榜羅鎮休息兩天，毛澤東在此召開幹部會議，闡明中共對少數民族政策及紅軍在回民地區的守則。

十月初，紅軍陝甘支隊先後突破會寧、靜寧之間的封鎖線以及平涼、固原之間的封鎖線，翻過甘肅有名的六盤山，然後從白楊城北走，迅速通過環縣附近之何蓮灣後，即沿鐵腳城、老爺山東進，於十月二十日抵達陝北蘇區游擊根據地的吳起鎮。

從江西西竄的紅軍，搶險強渡，翻越雪山，跨過草地，經過二萬五千里大流竄而死裡逃生，終於狼狽抵達陝北蘇區。

一 突破臘子口

九月初，林彪、彭德懷率領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從巴西、阿西開始行動，溯包座河上游向東北行進。出發的那天晚上，細雨綿綿，天空晦暗，我們在荊棘、泥濘的小徑中摸索前進，從巴西至阿西二十里路，足足走了六個鐘頭，直到次日拂曉才趕到。

紅軍在阿西集中後繼續行進，通過卡岡寺堡壘線後，即連續攀登了兩座二三十里的大山。當我們剛攀登另一座大山時，突然在右側山坡上出現了一支隊伍，他們站在山坡上向我們招手高呼：

「一方面軍的同志們！不要跟高鼻子^①走！

趕快回頭呀！

向北走是死路！

南下才是出路！」

原來是紅四方面軍派出的宣傳隊向我們喊話，這無異把一般紅軍士兵無從知曉的紅一、四方面軍分道揚鑣的內幕向全體戰士揭露了。

這一突發的事件（事實上是必然的發展），使一般士兵惶恐異常。政治部立即派出大批人員到各個部隊督促士兵們快速前進，以防止動搖份子乘機逃跑。

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況，覺得張國燾提出的口號不高明。為什麼把紅一、四方面軍分裂

①指共產國際駐蘇區顧問李德，一般紅軍士兵都這樣稱呼他。

的責任推給「高鼻子」？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喊出「不要跟毛澤東走」呢？所以當時紅四方面軍這些喊話，非但不發生效果，反而引起反感。

次日下午，我們在一個渺無人煙的曠野休息，「公家」燒了開水給大家吃乾糧，然後繼續前進。

此時，毛澤東和彭德懷猝然出現在我們行進的路邊，觀看部隊的行進，他臉上的表情是嚴肅的、又是憂慮的。顯然昨天紅四方面軍的喊話使他覺得不安，而他突然出現在紅軍士兵們的面前，一方面固然是想安撫士兵的不安情緒，一方面似乎是藉此仔細地觀察在他面前走過的每一個士兵。這是他從江西出發以來第二次出現在紅軍士兵約面前。（按：毛澤東在西竄中首次在公衆面前露面是在遵義民衆大會上。）他何嘗不知道紅軍士兵變成那樣的焦黃消瘦？何嘗不知道現在士兵們穿的衣服是那樣的破爛不堪？他何嘗不會想到從江西出發時的龐大隊伍，成為這樣七零八落、遍體鱗傷？何嘗不知道部隊傷亡是這樣多？掉隊、逃亡的現象是這樣的嚴重？

現在將要踏進陝北蘇區了。除了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因隨張國燾、朱德率領的左路軍不算外，陝甘支隊現有人數有多少呢？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今天憂心忡忡站在路邊觀察部隊行進的原因吧！

毛澤東臉上毫無表情，只是以炯炯的目光注視著每一個在他面前走過的紅軍士兵。

雨後的路泥濘不堪，異常難走。我們是沿著包座河而上，左邊是危崖絕壁，右邊是湍急的河流。在俄界休息兩天之後，部隊沿白龍江向莫牙寺前進。當部隊跨進瓦藏寺和莫牙寺境內時，即進入一段相當長的棧道地區。這些棧道的構造，大致與卓克基、梭磨地區大同小異，

只是「反動派」指使下的藏民騎兵，從白龍江對岸山上向棧道放冷槍的威脅，更為猖獗更為嚴重而已。

一天，我們到達莫牙寺。它是一座宏偉堂皇的大喇嘛寺，裡面住有喇嘛五、六百人，我們第二縱隊全部住在這裡。寺內裝潢陳設，異常高雅精緻，每所喇嘛住舍前面，都有一個小花園，種植著菊花、向日葵、牽牛花、葡萄等。我們在莫牙寺休息一天。

第二天早晨，從莫牙寺出發，走四十里到瓦藏寺大休息。

瓦藏寺在白龍河右岸，這裡通往左岸的橋已被燒毀了，樹木體無完膚，這是紅軍與國軍在這裡有過一場惡戰的殘跡。

下午，部隊繼續向黑拉前進，走了約二十里，在一個藏民小村落休息時，前方傳來了令人興奮的消息，說天險的臘子口被先頭部隊攻破了。一時大家活躍起來，忘記了一天走了八十里的疲勞，為了迅速通過拉子口，大家都舉起那痠痛的兩腿繼續行進。宣傳隊小鬼們又出現在路邊高呼：

「同志們！趕快前進！」

不怕苦、不怕死，勇敢前進！

打到甘南地區去上！」

那天，我們走了一百二十里，趕到黑拉宿營時，已是午夜時分了。

第二天拂曉前，繼續向臘子口快步前進。接近目的地時，我站在一處高地俯瞰，臘子口兩邊懸崖峭壁，周圍都是叢山峻嶺，無路可通，中間祇有一條三十餘米的小河。魯大昌用重兵扼守著這天險，企圖阻止紅軍北進。他以為天險重兵一定可以高枕無憂了，卻沒有料到作

困獸之鬥的紅軍，非奪取此天險臘子口即無法生存。我和郭滴人談論這種情況時，又碰上了畢士狄，他正在指揮著軍委幹部團通過臘子口。幹部團過完，便是三軍團（即紅軍陝甘支隊第二縱隊）的隊伍。宣傳隊小鬼們在宣傳棚高喊口號，引吭高歌，鼓動部隊飛快地前進。所有的後續部隊走出了臘子口十里，就在河壩上的樹林裡宿營了。

二 哈達鋪

陝甘支隊突破臘子口後，即攀登岷山。

岷山是青海、甘肅、四川三省交界的名山，其雄偉的山勢，起伏的高峰，與蘆花、毛兒蓋地區的雪山相比，並無遜色。岷山山脈綿延數百里，我們將攀登的地段，上山約三十里，下山約二十里。上山的地段路面寬闊平坦，樹木稀疏，因此可分為幾路縱隊並進，路邊有不知名的野花、野蔥和野果，因大家都忙於採野物，部隊雖分為幾路縱隊走，其實是亂七八糟，毫無秩序。

部隊下了岷山，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區，抵達甘肅南部的回民區。

當隊伍到達一個小村落時，忽然響起「地、地、地、地、地、地」的緊急空襲警號，東面天空出現了國軍飛機三架，在我們頭上盤旋了約半小時才飄去。我們都隱蔽得很好，所以未被發現。飛機走後，我們又走了約二十里，在一個只有八、九戶居民的小村落休息，燒開水吃乾糧。據嚮導說，從這裡到哈達鋪還有三十里。

我們站在山崗上，眺望遠處，一片廣闊平靜的田野，成群的綿羊啃著雜草，牧童坐在牛

背上向著不遠的山坡下趕，三五成群的農夫、農婦在田野裡勞作著。

由此下山便是大草灘了。際此天高氣爽的秋天，我們來到這樣廣闊的大平原，看見那橙黃的稻穗，個個喜形於色，心情為之豁然開朗。

再走十多里，便是回漢雜居的哈達鋪了。居民中回民約佔百分之六十以上。但越向北走，回民的比例就越多，以至於完全是回民聚居的地方。

甘南地區的回民與我們在貴州境內所看到的回民差不多，都會講漢語，不過都是帶些陝西腔的國語。這裡的東西，對於我們說來，真是便宜。五塊銀元可買一隻肥豬，二塊銀元可買一隻肥羊，一塊銀元可買五隻雞，一毛大洋可買十幾顆雞蛋。部隊在這裡打了好幾家土豪，都是漢人。政治部規定，在回民中不打土豪，因為我們對於回民內部階級關係還未弄清楚。

我們在哈達鋪休息一天。總政治部召開了團級以上的幹部會議，由代主任李富春做報告。李富春語氣沉重地、正式向紅軍幹部宣佈一、四方面軍分道揚鑣的經過，當然主要是攻訐張國燾。李富春說：

「張國燾違反毛兒蓋會議決定，擅自把紅四方面軍拉後退，企圖在川康邊區建立新的根據地，以實現他個人的野心，妄想搞個『獨立王國』，以達篡黨篡軍之目的。」

李富春還說：「雪山草地的艱險困難都被我們克服了，但國民黨正聚集大軍來截堵，阻止我們北上。國民黨的軍隊在數量上超過我們幾十倍，我們要發揮猛打、猛衝、猛追的戰鬥精神，克服一切困難，打到陝北去！」

最後，李富春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決定：紅軍在回民地區行動應該遵守的事項：

(一) 進入回民地區，應先派人與阿訇^②接洽。說明紅軍「北上抗日」的意義；
(二) 尊重回民宗教信仰，不得擅入清真寺；
(三) 不得損壞回教經典；
(四) 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
(五) 不在回民聚居的地方殺豬、吃豬肉。
這一天除了發給每個戰士一塊銀元外，還舉行會餐，晚上在一所小學舉行同樂晚會。
第二天，我和歐陽武把公家發的麵粉領回來烘乾餅。按照「回民地區守則」規定，我們向回民借器皿用具是違法的，不得已只有向房東（回民）說好話，懇求他幫忙。歐陽武是紅軍中的回族，他先向房東講明自己是回族同胞，果然房東也就對之另眼看待。房東老闆娘，不但給我們烘餅，還為我們做了麵條。歐陽武到了一家回民店鋪，買了幾斤羊肉和一隻雞、大蒜和花椒等，交給房東替我們燒了幾樣道地的回民菜餚，讓我們飽餐一頓。我們還在回民家裡舒舒服服地洗了個澡。這些事情都由歐陽武出面交涉，可謂做得「乾淨俐落」。

三 渡過渭河

陝甘支隊在哈達鋪休息兩天之後，繼續北進。一天，我們仍以備戰行軍的姿態，一口氣走了九十里，到達一個大山寨宿營。寨內竟沒有一座獨立的房屋，都是一、二十家聚居的一

② 阿訇係回教首領。

個一個的集團，寨子周圍築有兩丈高的大土牆，牆外挖了壕溝，深約丈餘。進口處有一巨大的木橋，如果將橋板抽走，就休想進寨裡去。寨內居民耗費了巨大的人力財力，造就了那座「固若金湯」的山寨，顯然是為了防備土匪。當我們到達寨子時，寨裡的人群只是站在城牆上觀看，不表示歡迎，也沒有敵意。政治部派出外交代表上去交涉借住一夜。交涉成功，但寨子只能容納一小部份，大部隊伍則在附近山林裡露營。

次晨，我們從寨子出發，向渭河方面前進。從這裡到渭河邊約二百里，兩天行程。支隊司令部的命令說，國民黨沿渭河聚集大軍佈防，全支隊必須在後天拂曉以前搶渡渭河。

又是夜以繼日的急行軍，大家以疲乏萬分的身子，痠痛到極點的兩腿，爬爬、走走、走走、爬爬，除了在鴛鴦鎮那天晚上幾小時的睡眠之外，大家總是在迷迷糊糊之中奔跑再奔跑。從鴛鴦鎮到渭河邊六十里，我們一口氣走完，在第二天晚上九時左右趕到河邊，準備次日拂曉前搶渡。

渭河因傳說周代的姜太公在這裡釣過魚而聞名於世，但姜太公究竟在渭河的那一段垂釣。卻無從稽考。我站在河岸一望。河面雖寬，河水不深，一般只到大腿上，既用不著動員官兵搭橋，也不需搖船過渡。渭河對於曾經跋涉千山萬水的紅軍說來，只是一條水流緩緩，水聲潺潺的平平凡凡的河流而已。

紅軍渡過渭河之後，又遇到甘肅魯大昌部的襲擊。紅軍以一小部與之周旋，大部迅速衝過武山、漳縣之間封鎖線之後，旋即佔領榜羅鎮。

榜羅鎮是個二、三百家回民聚居的大市鎮。因為紅軍行動迅速，居民逃亡的不多，市面相當繁榮。陝甘支隊在此召開了全支隊團級以上的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做了約一個鐘

頭的講話，依我記憶所及，他講了下列幾個問題：

(一)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嚴重性；
(二) 陝北蘇區和紅軍的情況，特別說到原在鄂豫皖蘇區的紅二十五軍徐海東部已於本年（一九三五年）七月抵達陝北蘇區；

(三) 華北具有成為抗日根據地的優越條件；

(四) 避免與國民黨軍隊打硬仗，迅速到陝北蘇區去；

(五) 認真對待地方居民群眾，特別是要遵守回民地區守則。

部隊在榜羅鎮休息一天。次晨向通渭城前進，行程約一百里，當天佔領通渭城。

通渭是一座古城，那蒼老殘缺的矮城牆是用黃土築成的。城裡除了幾十家小店之外，其餘都是莊稼人，總共不過三千人，實在比不上南方的一個小市鎮。房屋一律是黃土建造，我們走遍了全城，未見一所像樣的磚造房子。城的西北面靠一座黃土山，沿著山坡，挖了許多窯洞，遠遠看去，好像蜂巢一樣。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窯洞，以前總以為「薛平貴別窯」一劇中的「窯」，是像南方燒磚瓦的那種土窯。現在看見了，實際情況和想像中的完全不同。這種窯洞，以後我們在陝北長久的日子裡，住起來卻是滿舒適的，它的好處是冬暖夏涼。

從通渭向北走，必須衝過西（安）蘭（州）公路。此時國軍已集結於會寧、靜寧之線，嚴陣以待，這是我們最後要突破的封鎖線。但緊張、危難的形勢已緩和下來了。晚間，總政治部組織了一個同樂晚會，會場佈置在城外河灘上。

我們出通渭城三十里，沿途都有零散的回民村落。歐陽武大顯身手，在回民中展開了活

躍的工作。回民的庭院，都是打掃得異常乾淨，他們非常重視禮節，待人接物，親切和藹。我接觸過一位健談的中年回民，他還對我談起今年七月間，徐海東部隊在通渭城駐紮的經過。他說，徐海東的紅軍過渭河後，就打下了隆德，繼而佔領通渭，並在通渭休息。此時國軍毛炳文部從蘭州趕來增援，二十五軍與毛部激戰一陣之後即向北轉移，旋即翻過六盤山轉進陝北蘇區。

四 老爺山

為了迅速通過西（安）蘭（州）公路，天未亮陝甘支隊就出發，仍以備戰行軍的姿態，分為三路平行，同時並進。由於夜以繼日急行軍，掉隊的現象異常嚴重。

走了約三十里，部隊在一條狹長的山溝裡大休息，管理人員在這裡設開水站，宣傳隊小鬼們也在這裡設宣傳棚，高喊政治口號，引吭歌唱「炮火連天」和「三八紀律」歌。戰士們坐著優閒地喝開水、吃乾糧。

下午，我們向甘肅有名的六盤山攀登。這是一座多麼荒涼寂寥的北國山峰啊！剃得精光的和尚頭似的黃土禿山，綿延數十里，看不到幾株獨立的樹，找不到一處巴掌大的綠地。冬耕農作物——玉蜀黍和高粱枯莖孤零零地散倒在黃土山坡上。天哭喪著臉，濃濛濛的秋雲，像快馬似的奔馳。

大家都休息夠了，就一鼓作氣，登完了六盤山，黃昏時到達山腳下，就在一個二、三十家的村莊宿營。

次日早晨，部隊一出發即分為兩路前進，約走六十里抵達白楊城（又稱北洋城）。

白楊城內總共不過四、五十戶人家。有些小店舖，賣些香菸、茶葉、黃豆、鹽、油、砂糖、饅頭等，當我們到達時，除了鹽和黃豆之外，其他東西都被搶購一空了。

由白楊城東去是通慶陽、環縣的大道，向北走是小路，我們是向北走的。一出城便是深狹的山溝。所謂「高山深溝」，便是甘肅東南部這一帶特有的地形構造。它的特徵是：下了深溝之後，即又上山，下了山，又是深溝，常常是山頭與深溝的交相互更迭。有一個地方情形是這樣：先下深溝，再從深溝底下爬到山頭頂點，足足費了兩個鐘頭，爬得滿頭大汗，筋疲力竭。山，仍然是道地的黃土禿山，山坡上除了一些稀疏枯萎的玉蜀黍莖子之外，很難見到其他農作物。偶爾也可以看到羊群在斜斜的山坡上蠕動著，但那是很少見的。

下午，我們到達一個小村莊，它是兩條溝的匯合點，成為「V」形。在深溝裡，抬頭望村莊，只有十幾戶人家。從坡上的一家窯洞出來了一個莊稼漢，牽著一隻毛驢子搖搖擺擺的下來了。毛驢子背上馱著兩個大水桶，路是彎曲的，毛驢一拐一拐，怪模怪樣的扭動著，莊稼漢一邊唱著山歌，不時地喊出「噠、噠」的吆喝聲。有時「叭」的一聲打在毛驢子背上，鞭策牠前進。好容易走下來了，莊稼漢把毛驢子帶到有水的地方去。那是個天然的小水潭，潭水清澈。趕驢子的舀起一瓢自己喝了，再舀了一瓢給驢子喝，驢子搖一搖尾巴，頓一頓腳，其滿足高興的樣子，實在可愛。然後莊稼漢把一瓢一瓢的水，往毛驢子背上的水桶裡倒，水滿了，最後莊稼漢又發出「噠、噠」的呼聲，把毛驢子往山坡上趕，沿著彎曲的小徑走上去。我們在深溝裡休息，欣賞了這一幅西北黃土高原特有的風景畫。

我們終於到達今天的宿營地老爺山了。山上有一座頹廢的古廟，廟是用紅磚建造的，因

歷經年久，已呈灰黑。廟裡有三個和尚供奉香燭。據和尚說，老爺山的鷄鳴，陝甘寧三省都可聽到，當然這是誇大之詞。和尚還說，古廟的菩薩很靈，陝甘寧三省都有善男信女來此參拜，終年絡繹不絕。山上只有一口水井，但沒有泉源，僅靠下雨時注入下去的水，儲水量有限。我們初到時，鑑於飲水奇缺，對於那口井便派衛兵看守，每個單位只分得兩擔水，不要說是洗臉，連燒開水喝都成問題。

黃土禿山地帶，不但吃水困難，柴火的奇缺更是苦惱。我們在一個小村莊宿營了，炊事班到處找不到柴火燒。總算地方工作人員的功勞，為我們搜羅了不少玉蜀黍莖和高粱莖，才勉強勉強燒好了一頓飯。

在村莊的一隅，老太婆在小爐子上烤燒餅賣，大家都搶著買，可是當飢餓群中的一個發現了老太婆烤餅用的燃料是牛糞時，難免惡心，有些人也就告退了。

五 踏進陝北蘇區

下了老爺山東走約二十里，便是陝甘兩省分界的子午嶺。它是陝北蘇區保安縣（按現已改稱志丹縣）吳起鎮之頭道溝、二道溝、三道溝的匯合點，也是洛河的起源。由此東去，地勢雖漸漸低落。但比較平坦，整個陝甘支隊可分兩路並進。

一天，我們到達一個二、三十戶人家的小村莊——馬形莊宿營。次日早晨，我們從馬形莊出發走五、六里下山，下了山便是吳起鎮頭道溝的起點。此時第一、三縱隊在這裡會合了。整個陝甘支隊的隊伍會集在一條路線上，在山溝裡行走，從山頂上俯視，好像江河的洪流。

晌午，馬家騎兵^③突然出現在第三縱隊來路，把軍委幹部團截斷了。馬家騎兵是從會寧、靜寧沿西（安）蘭（州）公路一直尾追下來的。那時因地形對紅軍不利沒有打，現在已經到了陝北蘇區大門，紅軍有了依托，地形又好，這一仗是要打的。

十二月廿日，陝甘支隊就在到達吳起鎮那天，給緊跟在後面的馬家騎兵以「回馬槍」。紅軍士兵在沒有路形中爬行，手攀著黃土、石頭、草根，流汗喘息，爬上了二道溝的山頭，隱約可看到右側頭道溝北岸的山脊上，馬家騎兵的馬，成群地、優閒地啃著地上的枯草，人是七橫八豎地躺在平壩上，白茫茫地飄起一些煙霧，不知是在烤火，或是在燒飯，依照分佈面積估計，大約有一千多人。

「噠、噠、噠」，機關槍耐不住地發吼了，隨著便是織成一片分不清的步槍聲，喊殺聲……，很快的左翼首先進入衝鋒。

右翼部隊指揮陣地響起了「啼啼、噠噠、啼啼、噠噠」的衝鋒號音，一群群的黑影衝上去了。那些優閒地啃草根的馬，頓時亂跳亂闖，那些剛才還以為太平無事的人們，急忙騎上了馬，加鞭飛跑了。來不及騎上馬的，便只有抱頭鼠竄了。不到廿分鐘，那邊山頭、山腰還三三兩兩殘留著一些馬，仍在那裡啃著草根，但卻換了主人。

我和郭滴人站在山崗上，清楚地看見馬家騎兵已失去了指揮，失去了隊形，從山頂、從山腰。從斷崖，從一切的地面上撲倒下去了。

這一陣「回馬槍」打退了馬家騎兵的追擊。紅軍從數十里的山頭上，集中收兵，在暮色

③ 指馬鴻賓、馬鴻逵的騎兵。

蒼茫中走進吳起鎮。

吳起鎮是西竄紅軍跨進陝北蘇區的第一站，因此它給我的印象最深。

據說，吳起鎮是紀念古代名將吳起而起的地名，至於吳起和這個地方有什麼關係，當時我們沒有進一步探討。不過就現狀看，整個鎮上都是一些頹牆廢址，可能就是古戰場的遺跡。而現在卻是陝北游擊隊的重要據點，也是「白軍」的攻擊要點。這裡的老百姓都很機警，也很現實，他們不是看你戴什麼顏色的帽子，而是看你對老百姓真誠的態度如何。

陝北蘇維埃政府雖然在這裡設置了一個鄉蘇，共黨也在這裡設置了一個支部，但都是不公開的。

紅軍雖然把馬家騎兵打退了，但這裡的老百姓也逃走了。紅軍政治工作人員四出找老百姓談話，誤會消除了，老百姓也就逐漸回家。當我們向他們說明我們是從江西來的紅軍時，他們的回答是「害不下」。（按，陝北的土話，不懂的意思。）但在當時從南方來的紅軍聽起來，好像是「害怕」。於是我們便說：「我們是紅軍，是來保護你們的，不要害怕。」由於語言隔閡，彼此之間弄出了許多笑話。

沒多久，當地共產黨支部書記、鄉蘇主席來了。他們說：「已經送『鷄毛信』^④給老劉^⑤報告中央紅軍到了。」紅軍政治部同他們商量如何籌措糧食、菜蔬和柴火等問題，他們以保證的口吻說，三天之內可以籌集一百擔糧食、卅條豬和一百隻羊慰勞紅軍。

④ 這是陝北游擊區通行的一種遞信方法，在信套上插上一根雞毛，表示這是一封最快速信件，必須星夜遞送。
⑤ 陝北蘇區農民對劉志丹的親暱稱呼。

紅軍後續部隊在吳起鎮休息了幾天，就陸續開到陝北蘇區的政治軍事中心瓦窖堡去。

拾貳、從甘南到陝北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338

附錄

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

行軍月日	出發地點	經過地點	宿營地點	里程
十月十六日	銅鑼灣		山王壩	三〇
十七日	山王壩	梓山	下油	七〇
十八日	下油	唐村	新謝	七〇
廿日	新謝		雙荒	六〇
廿一日	雙荒	掩相	新出	六〇
廿二日	新田	石背	大坪	九〇
廿三日	大坪	下山	石材圩	九〇
廿五日	石材圩		老界子圩	九〇

附錄

十五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十一月一日	合計	卅一日	廿八日	廿七日	廿六日
白石渡	平田	三界圩	彭古嶺	桃竹坑	上西坑	麻坑	新田	城口	三江口	陳奢	犁壁嶺	轟都		義安圩	南村	三江口	老界子圩
宜章	花杵下	唐村	獅子八奇	官家橋	大王山	獠山	三載歧		羊牯坳	八丘田	雷嶺	九牛壩		牛皮坑	平頭坳	小溪	烏逕
梅田	白石渡	平田	三界圩	彭古嶺	桃竹坑	上西坑	麻坑	新田	城口	三江口	陳奢	犁壁嶺		轟都	義安圩	南村	三江口
六〇	五〇	七〇	六〇	七〇	七〇	九〇	八〇	六〇	二〇	五〇	八〇	九〇	八九〇	九〇	九〇	六〇	九〇

附錄

十六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廿六日	廿八日	廿九日	合計	十二月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梅田	臨武	羊牯嶺坳	朱家坪	天堂圩	白水塘	道州	蔣家嶺	巷口	文市	石塘圩		紹水	大灣	油榨坪	四十田	站頭	橫路
漿水	電光舖	太平圩	祠堂圩		柑子園	五里挑	永安關		安山壩	太平圩		梅子嶺	清明隘		白茅隘	白茅隘	
臨武	羊牯嶺坳	朱家坪	于堂坪	白水塘	道州	蔣家嶺	巷口	文市	石塘圩	紹水		大灣	油榨坪	四十田	站頭	橫路	茶元
九〇	六〇	八〇	八〇	三〇	九〇	六〇	四〇	二〇	七〇	六〇	一、五〇三	四〇	七〇	六〇	四〇	八〇	四〇

卅日	廿九日	廿六日	廿五日	廿三日	廿二日	廿一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老塘寨	施秉	翁古壠	偏寨	上格東	劍河	南哨	柳寨	河口	八嫫	古頓	平查所	新都	金點	劉延	平等	白竹坪	茶元
	孫家舖	白溪	平寨	烏鴉舖	中斗			南旁	婆洞	鰲魚咀	黎平	新昌	長古	雙江	平溪	廣南城	五塘
餘慶	老塘寨	施秉	翁古壠	偏寨	上格東	劍河	南哨	柳寨	河口	八嫫	古頓	平查所	新都	金點	劉延	平等	白竹坪
五〇	七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六五	五〇	八〇	六五	六五	七五	七〇	六〇	七〇	八〇	七〇	七〇	六五

343

合	計	一月	一日	二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餘慶	龍溪	龍溪	青巷元	餘慶司	雙香舖	黃家壩	夾子場	鯉魚壩	四朱站	桐梓	石門慶	二力子	松坎	石壩	溫水	圖書壩	土城		
土地坳	涼風哨	烏江河		新龍場	湄潭			遵義	婁山關	石牛欄	新站	清水溪	箭頭垭	馬家壩	良村	豐村壩			
龍溪	青港元	餘慶司	雙香舖	黃家壩	夾子場	鯉魚壩	四朱站	桐梓城	石門慶	二力子	松坎	石壩	溫水	圖書城	土城	猿猴			
一、五三五	七〇	五〇	六〇	六〇	六〇	七〇	六五	七五	六〇	六五	六〇	三〇	七〇	六〇	七五	八〇	三〇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二月一日	合計	卅一日	卅日	廿九日	廿七日	廿六日
大平上	扎西	關雄	三口塘	羅海	建武城	吳村	大壩	金鵝池	永寧	大寨	香等壩		龍爪壩	馬路壩	猿猴	沔灘	猿猴
分水嶺		西河崖		麻河塘	洛陽河	炭場							陳家岩	店子壩	老涯溝	楓林坳	楓林坳
半崖河	大平上	扎西	關雄	三口塘	羅海	建武城	吳村	大壩	金鵝池	永寧	大寨		香等壩	龍爪壩	馬路壩	猿猴	沔灘
六五	六〇	六〇	七〇	六〇	五〇	九〇	二五	六〇	七〇	六〇	三五	一、三六〇	七〇	七〇	八〇	五〇	五〇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合計	三月一日	三日	五日
半崖河	營盤山	雙龍村	木脚屯	鎮龍山	走馬壩	馬義溝	東皇殿	大水橋	雙龍場	何子村	栗子壩	蝦神廟	遵義	遵義		凉水井	金刀坑	遵義
見楊溝	麻線堡	沙洪溝	迴龍場	石峽口	太平渡	豐材壩	圖書壩	丁谷橋	九子壩	九子壩	桐梓城	四朱站				羅明城	八流水	八流水
營盤山	雙龍村	木脚屯	鎮龍山	走馬壩	馬義溝	東皇殿	大水橋	雙龍場	何子村	栗子壩	蝦神廟	遵義	凉水井			金刀坑	遵義	才溪
七〇	六五	六〇	七〇	六〇	六五	七〇	六〇	七〇	七〇	六〇	六五	一〇〇	一〇〇	三〇	一、六二〇	六五	六五	七〇

廿七日	廿六日	廿五日	廿四日	廿三日	廿二日	廿一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日	九日	六日
河	排	四	火	安	煙	魚	三	草	茅	翁	明	永	田	平	長	底	才
底	田	土	石	青	房	岔	木	子	台	石	廣	安	壩	家	幹	壩	溪
花	干	觀	新	周	林	石	大	三		觀	觀		井	石		子	
馬	溪	音	田	家	家	峽	材	元		音	音		壩	坑		房	
田	河	排	四	火	安	煙	魚	三	草	茅	翁	明	永	田	平	長	底
底	底	田	土	石	青	房	岔	木	子	台	石	廣	安	壩	家	幹	壩
壩												寺	寺	壩	寮	山	壩
六〇	七〇	七〇	八〇	九〇	七〇	八〇	六〇	七〇	六〇	五〇	四〇	五〇	六〇	五〇	三〇	六五	二〇

附錄

十五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四月一日	合計	卅一日	卅日	廿九日
豬場	壩車	蘇背腳	定番城	鷄昌鋪	哨官田	老壩香	崗寨	高寨	羊場	底窩壩	老鴉河	小龍窩	王家坪		烏江河	沙土	底壩
紫雲縣			谷宋	上馬司	混子場	觀音山			林坡崗	馬場	白馬洞				牛場	原山	灣子場
臘崖	豬場	壩車	羊毛場	定番城	鷄昌鋪	哨官田	老壩香	崗寨	高寨	羊場	底窩壩	老鴉河	小龍窩		王家坪	烏江河	沙土
七〇	七〇	五〇	六〇	八〇	八〇	九〇	七〇	三〇	三五	七〇	八〇	四〇	四〇	一、四三五	五〇	六〇	五〇

二日	五月 一日	合 計	卅日	廿九日	廿八日	廿七日	廿六日	廿五日	廿四日	廿三日	廿二日	廿一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奇 馬	冷 水 溝		嵩 明	草 鞋 橋	鷄 頭 村	朱 子 街	溪 流 水	寬 塘	白 雲 青	豬 場	觀 音 山	羊 市 屯	北 鄉	大 藍	拉 芷	楊 家	臘 崖
			七 甲	易 龍 城	馬 龍 城	馬 洪 冲		營 上	小 羊 場	黃 泥 河		下 壩 腳	屯		高 寨	盤 江	壩 洞
花 橋	奇 馬		冷 水 溝	嵩 明	草 鞋 橋	鷄 頭 村	朱 子 街	溪 流 水	寬 塘	白 雲 青	豬 場	觀 音 山	羊 市 屯	北 鄉	大 藍	拉 芷	楊 家
一〇〇	一四〇	二一、一三五	七〇	八〇	八五	八五	八〇	一二〇	六〇	八〇	八〇	九〇	七〇	八〇	七〇	八〇	八〇

廿三日	廿一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冕	瀘	土	鎮	王	德	金	雪	大	觀	通	金	沙	馬	大	下	五	花
寧	沽	官	南	水	昌	川	麻	橋	音	安	沙	江	口	拉	七	渡	橋
大	馬	溪	禮		假	安		分		望		中	平	龍			馬
橋	房	龍	州		口	子		水		城		屋	地	街			安
拖	冕	瀘	土	鎮	王	德	金	雪	大	觀	通	金	沙	馬	大	下	五
烏	寧	沽	官	南	水	昌	川	麻	橋	音	安	沙	江	口	拉	七	渡
																	河
八五	七〇	八〇	九〇	八〇	八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六〇	四〇	八〇	五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一〇	二〇	八〇	九〇

廿四日	廿五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卅日	卅一日	合計	六月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拖烏	小舖子	安順場	田西灣	磨西面	上田壩	瀘定橋		鹽水井	三道橋	胡莊街	大橋	石坪	陳家壩	劉家溝	始陽	盧山縣	混家壩
	新場	海爾瓦	猛虎崗	楚民壩	下田壩	龍八布		大埡口	坭頭	甘竹山	新廟子	小河子	大深溪		十八道水		雙河場
小舖子	安順場	田西灣	磨西面	上田壩	瀘定橋	鹽水井		三道橋	胡莊街	大橋	石坪	陳家壩	劉家溝	始陽	盧山縣	混家壩	小關子
八〇	六〇	八〇	九〇	一〇〇	六〇	八〇	二、一六五	五〇	六〇	七〇	六〇	六〇	四〇	二五	一二〇	二五	七〇

4573

十一月	小關子	寶興縣	大池溝	寶興縣	六〇
十二月	寶興縣	豐東崖	夾金山	豐東崖	八〇
十三日	豐東崖	大磽磧	大磽磧	大磽磧	八〇
十四日	大磽磧	大磽磧	大磽磧	大磽磧	一二〇
十五日	大磽磧	大磽磧	大磽磧	大磽磧	一二〇
十六日	官寨	官寨	官寨	官寨	四五
十七日	懋功	涼水井	懋功	懋功	四五
廿三日	八角	八角	八角	八角	六〇
廿四日	撫邊	撫邊	撫邊	撫邊	五〇
廿六日	兩河口	兩河口	兩河口	兩河口	七〇
廿七日	黃草坪	夢筆山	卓克基	卓克基	一〇〇
廿九日	卓克基	麻木橋	梭磨	梭磨	八〇
卅日	梭磨	梭磨	梭磨	梭磨	七〇
合計					一、五九〇
七月一日	馬塘	康廟寺	康廟寺	康廟寺	三〇
二日	康廟寺	大板嶺	大板嶺	大板嶺	八〇
三日	寨頭	寨頭	寨頭	寨頭	七〇
六日	蒼德	打鼓嶺	打鼓嶺	打鼓嶺	七〇

廿六日	廿五日	廿四日	廿三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七日	三日	二日	八月一日	合計	卅日	廿九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后	分	臘	毛	卡	小	黑	波	小	卡	毛		臘	毛	黑	大	拖	打
河	水	子	兒	英	拉	水	羅	拉	英	兒		子	兒	馬	杵	羅	鼓
	嶺	塘	蓋		麻	河	子	寺		蓋		嶺	蓋	寺	林	崗	
草	草	草	七			茶		茶				帳	帳				
地	地	地	星	橋		力		力				房	房				
大	后	分	臘	毛	卡	小	黑	波	小	卡		毛	臘	毛	黑	大	拖
草	水	子	兒	兒	拉	水	羅	羅	拉	英		兒	子	兒	馬	杵	羅
地	河	嶺	塘	蓋	英	河	子	子	寺			蓋	嶺	蓋	寺	林	崗
七〇	八〇	七〇	七〇	七〇	七〇	七〇	三〇	四〇	七〇	七〇	六四〇	四五	四五	一〇	九〇	一〇〇	一〇〇

附錄

廿五日	廿四日	廿三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五日	九月二日	合計	廿九日	廿八日	廿七日
新寺	閭井	哈達鋪	鹿元窩	懸窩	臘子口	黑拉	莫牙	瓦藏寺	蠻地	磽磧寺	俄界	毛龍	阿西		巴西	小森林	大草地
		荔川			大刺山			石門				廣利				班佑	草地
鴛鴦咀	新寺	閭井	哈達鋪	鹿元窩	懸窩	臘子口	黑拉	莫牙	瓦藏寺	蠻地	磽磧寺	俄界	毛龍		阿西	巴西	小森林
五〇	一〇〇	八〇	三五	三五	一二〇	九〇	七〇	四〇	七〇	六〇	五〇	九〇	六〇	八六〇	二〇	五〇	八〇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十二月 二日	合 計	廿九日	廿六日
鞏 家 灣	洪 德 城	真 家 灣	毛 家 川	蘇 家 灣	三 岔	陳 家 灣	佈 置 要 峴	乃 家 河	張 義 舖	常 家 集	高 家 舖	紅 家 大 莊	四 子 川	通 渭		榜 羅 鎮	鳶 鴛 咀
廟 家 河	曹 家 灣	廟 家 河			黑 家 元			白 楊 城	青 石 咀	黃 父 子 甫	先 聖 廟		紅 四 兒	王 家 河			
木 爪 城	鞏 家 灣	洪 德 城	真 家 灣	毛 家 川	蘇 家 灣	三 岔	陳 家 灣	佈 置 要 峴	乃 家 河	張 義 舖	常 家 集	高 家 舖	紅 家 大 莊	四 子 川		通 渭	榜 羅 鎮
六〇	四五	九〇	七〇	一〇〇	五〇	九〇	九〇	七〇	七〇	七〇	一〇〇	三〇	七〇	六〇	一、一三〇	九〇	九〇

說明：

十七日	木爪城	周家小莊	左家要峴	六〇
十八日	左家要峴	田背后	鐵邊城	六〇
十九日	鐵邊城	馬刑莊	吳起鎮	六〇
廿一日	吳起鎮	林家導	唐兒灣	四〇
合計				一、二二五

(一) 此表以一軍團直屬隊為標準，各師另有行動，均未列入此表。

(二) 經過地點之空格，因材料早已毀去，難以記憶，故未填入。

(三) 統計西竄行程，共為一萬八千零九十五里；但據一般的估計，走得最遠的部隊，走了約二萬五千里。

(四) 除休息外，行軍作戰時間，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天，十一月廿四天，十二月廿四天。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二天，二月廿六天，三月廿四天，四月卅天，五月廿七天，六月廿三天，七月十天，八月十四天，九月十六天，十月十九天。

(五) 七、八兩月行軍時間少，是由於在毛兒蓋、波羅子休息的時間多。

編按：原書中即缺十月、十一月的行程。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

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著者 蔡孝乾

出版人 黃溪南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四〇巷三號一樓

電話：(〇二) 二二六八二五二五 傳真：(〇二) 二二六九八二二二

港澳總經銷 文星圖書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龍新清崗大有街三四號

電話：(八五二) 二二七八九一七三六・二九九七七五三三

排版所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六六一七四五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〇〇二年三月

初版 三五〇元(平裝)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57-2040-18-9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

蔡孝乾著，一 初版 一，一 台北市：海峽學術，

2002〔民 91〕

冊； 公分

ISBN 957-2040-18-9（平裝）

1. 蔡孝乾－傳記

782.886

91003204

台共蔡孝乾於1932年進入中共江西蘇區。
1934年10月，他跟著毛澤東為首的紅軍展開
「二萬五千里長征」。經歷整整一年的煎熬
苦煉，殘餘人馬終於在1935年10月抵達陝
北。

作者親身參與，提供所謂「長征」的第一
手史料，彌足珍貴，堪作正史之佐證。

ISBN 957-2040-18-9



9 789572 040188

00350



定價：350元